



中国佛教 百科全书

赖永海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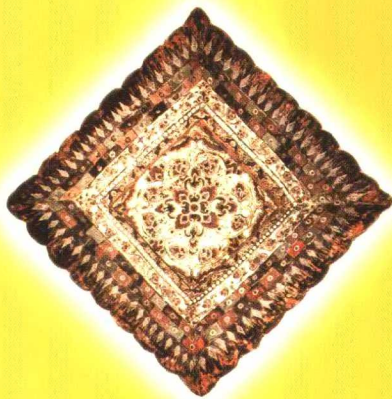
经典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防大学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



经典卷

陈士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 / 陈士强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25—2840—5

I. 中... II. 陈... III. ①佛教—中国—百科全书
②佛经—中国—研究 IV. B9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9680 号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

经典卷

陈士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5 插页 5 字数 349,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25—2840—5

B·326 定价: 30.10 元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赖永海
副主编 刘迎胜 莫励锋 徐小跃
编辑委员 王雷泉 业露华 刘迎胜 张宏生 张晓敏
吴为山 李书有 李向平 陈士强 罗 颢
洪修平 徐小跃 莫励锋 麻天祥 董 群
赖永海 潘桂明

组编单位 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南京大学宗教学系

策划编辑 张晓敏

责任编辑 王 纯 江建忠 吕 健 罗 颢 郑明宝

编 审 史良昭 汪贤度 李剑雄

统 筹 罗 颢

美术编辑 速泰熙

总 序

佛法广大,号称八万四千法门;经典浩瀚,总有三藏十二部之众。这是一份极可宝贵的人类遗产和精神财富。随着人们对其宗教、文化乃至社会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时下学佛者日多。然而,面对八万四千法门,究竟应该从何而入?浩如烟海的经典宝藏,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开卷有益?初学有得者,怎样才能循序渐进、更上一层楼?素有研究者,又如何广开思路、进一步发掘佛教的文化、社会价值,为净化人的心灵、创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做贡献?凡此种种,《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将试图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佛教经典浩繁、义理精深,《经典卷》对所有重要佛教经典的结集、分类及各部经典的撰译者、基本思想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地位等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与评释,让你一目了然,阅藏知津;《教义卷》则对整个佛教基本教义的形成、思想意蕴和哲学内涵等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与评述,使人们对佛教义理的思想内容和哲学意蕴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了解。

佛教源远流长,宗派繁多,《历史卷》对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历史发展及这种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据、思想文化背景等进行了线条清晰而又资料翔实的梳理与剖析,以有限的篇幅展现了中国佛教的历史衍变和发展大势;《宗派卷》则对中国佛教史上从魏晋南北朝般若学的“六家七宗”到隋唐佛教的四大宗教各自的思想渊源、学



术传承、基本义理以及各派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此消彼长等,进行了颇为深入的论述与辨析,一展隋唐佛学盛世之风采。

中国佛教,自汉魏至明清,高僧辈出,代有其人,《人物卷》对中国佛教史上较著名大德高僧之生平活动、思想特质、译经弘法、道行德操等的报道,既客观公允,又深入具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风貌。中国佛教的制度仪轨,有些承续于印度佛教,有些则颇具中国特色,史称“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说明中国佛教的寺院制度和礼仪清规多有本土僧人的创造,《仪轨卷》对中国佛教的寺院殿堂、教职教制、节日礼仪乃至罗汉诸天等都有较详尽具体的介绍与述评,借此可以一窥汉化佛教的制度仪轨和寺院生活。

中国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以降,中国化的佛教又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此中尤以禅与传统诗书画的结合进而演化为禅诗、禅画表现最为突出,《诗偈卷》精选了近二百篇的诗词偈句,既深入地剖析了这些诗篇的文学意韵,又着重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佛理禅趣,并且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了禅与中国古代诗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使人们确实地看到,禅与古代诗歌的关系,正如古人所说的:“不懂得禅,不足以论诗。”《书画卷》则采取个案分析与历史叙述相结合的方法,较深入地揭示出佛理禅趣与中国古代书画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僧人禅师常常染指书画,另一方面,书画家也多涉足佛教,一方面,佛理禅趣大量融入书画之中,另一方面,书坛画苑处处流露出禅机佛意,中国古代书画的历史发展,确实与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遥相呼应、息息相关。

佛教艺术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中尤以佛教建筑、佛教雕塑以及佛教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艺术的影响,值得人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发掘。《雕塑卷》对佛教雕塑艺术的传

人、流变及其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对佛教雕塑的造型、装璜乃至石窟艺术中之彩塑、壁画等，都进行颇为深入、详尽的介绍、剖析与论述，较系统地再现了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全貌。《建筑卷》则对中国佛教建筑之历史发展、各派佛教寺院之布局、各种佛教殿堂之结构及其特征乃至典型之佛教建筑如寺塔、经幢等，都进行较全面甚至颇为专业性的介绍和评析，不仅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上的佛教建筑，而且对于日后的寺院、殿堂的构建等，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古来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历史上的名胜古迹多与佛教有联系，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常与寺院之变迁相关联，《名山名寺卷》除了对中国佛教四大名山进行由点到面的详细介绍外，还收录了全国著名寺院数百个，并对其地理位置和人文景观、创寺高僧和宗派特色、历史沿革和现存规模等都进行较为具体的介绍与点评，举凡“到此一游”者，既可一览祖国的名山宝刹、风景名胜，又能从一个侧面窥探中国佛教的此消彼长和迁流演变。

《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凡十一卷，总约三百万字，从经典、教义、人物、历史、宗派、仪轨、诗偈、书画、雕塑、建筑、名山名寺等十一个方面，较全面系统地再现了中国佛教及中国佛教文化的总体面貌及其历史发展，其中，既有基本知识的介绍，又有主要义理的阐释；既有历史发展的概述，又有个案的深入剖析；既有宗教意义的阐发，又有文化价值的揭示。就编撰者的主观愿望说，力图把通俗性与学术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使《全书》既是初学者登门入室之阶梯，对佛学研究者又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当然，由于编撰者的学力识见等多有局限，书中之错讹偏颇在所难免，凡此，均俟之于方家大德的赐正、教示。

赖永海

陈士强, 1949年生, 浙江诸暨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获哲学硕士学位, 现为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编审。著有《佛典精解》、《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宗教卷》(主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哲学卷》(副主编)。

赖永海, 1949年生, 福建平和人, 哲学博士, 现为南京大学教授, 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中国佛性论》、《中国佛教文化论》、《佛道诗禅》、《佛学与儒学》、《湛然》、《维摩诘经释译》、《楞伽经释译》、《高僧传释译》等, 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评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 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

目 录

总 序	1
绪 说	3
第一章 佛说教法的结集	13
第一节 第一次结集	16
第二节 第二次结集	18
第三节 第三次结集	20
第四节 第四次结集	24
第五节 其他传说	25
第二章 小乘三藏的形态	27
第一节 小乘经	28
一、九分数·十二部经	28
二、四阿含·五尼柯耶	30
三、《阿含经》以外诸经	37
(一) 本生类	38
(二) 禅观类	39
(三) 福田类	39
(四) 业道类	40



(五) 名数类	41
(六) 其他	41
四、《阿含经》注疏	42
第二节 小乘律	43
一、广律	45
二、戒本·羯磨·威仪·律论	48
第三节 小乘论	50
一、大众部论典	52
二、上座论部论典	53
(一) 分别说部	54
(二) 说一切有部	57
(三) 贤胄部·正量部·经部	63
第四节 藏外典籍	65
第三章 大乘经典的问世	68
第一节 大乘经	70
一、初期大乘经	71
二、中期大乘经	80
(一) 如来藏系	81
(二) 阿赖耶识系	84
(三) 其他	86
三、后期大乘经	87
第二节 大乘律	88
一、梵网类戒本	89
二、瑜伽类戒本	91
三、优婆塞类戒本	93
第三节 大乘论	94



一、释经论	96
二、集义论	99
(一) 中观派	100
(二) 瑜伽行派	103
三、因明论	113
第四节 藏外典籍	122
第四章 密教经轨的成立	123
第一节 密典的思想渊源与分类	124
一、密教的起源与发展	124
二、密典的部类	132
第二节 早期密典	135
第三节 中期密典	143
一、胎藏部	146
二、金刚顶部	148
三、苏悉地部	155
四、陀罗尼部	156
第四节 晚期密典	165
第五章 佛典的传译与语种	171
第一节 梵文佛典	173
第二节 巴利文佛典	177
第三节 西域文佛典	179
一、吐火罗文佛典	180
二、于阗文佛典	180
三、粟特文佛典	180
四、回鹘文佛典	181



第四节 汉文佛典	181
一、佛典汉译的开展	183
二、译经制度	188
三、译经规则	191
四、目录和版本	197
第五节 藏文佛典	199
一、佛典藏译的开展	199
二、目录和版本	204
三、藏文佛典的特色	210
第六节 其他语种的佛典	212
一、西夏文佛典	212
二、蒙文佛典	213
三、满文佛典	214
四、日文佛典	216
五、欧美文佛典	219
第六章 中国佛教义理类典籍	220
第一节 前宗派时期的义学著作	224
第二节 天台宗教典	240
第三节 三论宗教典	258
第四节 三阶教教典	264
第五节 法相宗教典	266
第六节 华严宗教典	276
第七节 律宗教典	290
第八节 禅宗宗典	299
第九节 净土宗教典	310
第十节 密宗教典	321



第十一节 藏传佛教宗派教典·····	324
第七章 中国佛教文史类典籍·····	332
第一节 经录·····	333
第二节 教史·····	341
第三节 传记·····	347
第四节 宗系·····	357
第五节 纂集·····	362
第六节 护法·····	372
第七节 地志·····	378
第八节 杂记·····	384
第八章 汉文《大藏经》的源流与版本·····	392
第一节 《大藏经》的由来·····	392
第二节 宋版·辽版·金版·····	400
一、开宝藏·····	401
二、崇宁藏·····	404
三、毗卢藏·····	407
四、圆觉藏·····	408
五、资福藏·····	409
六、磧砂藏·····	411
七、契丹藏·····	412
八、金藏·····	414
九、其他·····	417
第三节 元版·····	418
一、普宁藏·····	418
二、其他·····	420



第四节 明版	423
一、洪武南藏	423
二、永乐南藏	424
三、永乐北藏	426
四、嘉兴藏	428
五、其他	430
第五节 清版	431
第六节 近代版	434
一、频伽藏	434
二、普慧藏	436
第七节 现代版	437
一、中华大藏经	437
二、佛教大藏经	438
三、佛光大藏经	438
四、大藏经补编	439
第八节 高丽版	439
一、初刻高丽藏	440
二、高丽续藏经	441
三、再刻高丽藏	442
第九节 日本版	443
一、天海藏	445
二、黄檗藏	445
三、弘教藏	446
四、卍正藏	447
五、卍续藏	448
六、大正藏	449

经典卷

原书空白页

绪 说

公元前六世纪,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辉煌的世纪。差不多在古代文明发祥地的国家,都涌现了一批才思敏捷,富有创见的思想家,他们或聚徒讲学,或游说各地,随时准备给任何乐于聆教的人以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和道德的教诲。在古希腊,泰勒斯创立了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色诺芬尼创立了埃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创立了爱非斯学派;在中国,老子创立了道家学派,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孙武编撰了兵家的代表作《孙子兵法》,子产和邓析分别为以后形成的法家和名家作了理论上的探索;在印度,则出现了与传统的保守的婆罗门教相对立、体现时代变革新意识的沙门(又称室罗摩拏、桑门等,意为息心、净志、劬劳、勤行等,指栖息森林,苦行修炼,或云游四方,传教布道的一批出家修行者)思潮,佛教便是其中的一派学说。

自从原居住在高加索一带的雅利安人,约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越过兴都库什山,侵入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在那里征服了尚处在母系社会的土著部落达罗毗荼人,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以后



又将势力扩张到恒河流域以南,古印度逐渐确定了以“四种姓”为标志的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吠陀经典为核心的文化体系。

四种姓指的是:

(一)婆罗门 即掌管祭祀,充当神与人之间的媒介的祭司。在四种姓中,它的地位最高,是吠陀经典的传授者和解释者,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的指导者。

(二)刹帝利 即掌管政治与军事的王族,在四族姓中位于第二。

(三)吠舍 即从事生产劳动和商品流通的平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四种姓中位于第三。

(四)首陀罗 即奴隶,在四种姓中地位最为低下。

前三大种姓为雅利安人,他们享有诵经、祭祀的权力,故称死后能投生转世,名为“再生族”;后一种姓为达罗毗荼人,他们以侍奉雅利安人为本务,没有诵经、祭祀以及死后投生转世的权力,被称为“一生族”。

吠陀经典分为本集和注释两大类。

本集指的是《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闍婆吠陀》,通称“四吠陀”。

(一)《梨俱吠陀》为“四吠陀”的根本,最古老的婆罗门教的文献,约成于公元前 14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之间。它是劝请僧唱颂的赞歌的汇编,凡十卷,共收入赞歌一千零十七篇(加补遗十一篇,则为一千零二十八篇),合一万零五百八十首颂。其中在《原人歌》中,就已提出了婆罗门是原人(“梵天”)的嘴,武士(刹帝利)是二臂,吠舍是二腿,而首陀罗则是脚的思想,这是“四种姓”出于神意的最初表述。

(二)《娑摩吠陀》为歌咏僧所唱的赞歌及其歌曲的汇编,凡二卷,共收录一千八百一十首颂(除去重复的则为一千五百四十九首颂),其中大多抄自《梨俱吠陀》,新颂仅七十八首。



(三)《夜柔吠陀》为行祭僧所念的祭词及其注释的汇编,凡十三卷。它的传本有两类。一类称为《黑夜柔吠陀》,系糅合吠陀的本文(赞歌、祭词、咒词等)和《梵书》(吠陀的注释)而成。凡四种(或五种、七种、八种)十三卷;另一类称为《白夜柔吠陀》,系分离本文和注释,整理《黑夜柔吠陀》,并汇集咒文的解释而成。

(四)《阿闍婆吠陀》为祭火僧所念的招福类咒词和央耆罗僧所念的禳灾类咒词的汇编,凡二十卷,共收入咒词七百三十一篇,合六千首颂。其中有一千二百首颂是从《梨俱吠陀》中抄出的。

注释指的是《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

(一)《梵书》下分仪轨和释义两部分。仪轨,规定祭祀的顺序、方法、赞歌的用途等;释义,解说赞歌的意义及语源、祭祀的起源及意义等。

(二)《森林书》论述祭祀和人生的意义。

(三)《奥义书》探求人世间和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及其哲理。用散文体写成,书中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与传说。

如果说,吠陀经典的本集主要是汇编祭祀时读诵的赞歌、祭词和咒语的话,那么,吠陀经典的注释则进一步发展了本集的蕴义,奠定了婆罗门教“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婆罗门教通过这些经典,将自然现象、社会、人生道德以及各种抽象观念神格化,宣称冥冥之中的“梵天”是宇宙之主、万物之源,天上的神祇、人间的种姓,乃至现象界的所有形态和名称,都是它创造的,而婆罗门则是梵天的代言人。

二

几个世纪过去了,随着铁器在印度次大陆的普遍使用,农业生



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手工业分工的细密及产品的增多,又刺激了商业活动的繁荣。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之际,一些商人已拥有大规模的船队,它们运载各种货物,来往于印度至缅甸、波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航线上,从事海外贸易。

与此同时,在恒河流域涌现了一批新的城邦国家,据《中阿含经》卷五十五《持斋经》、《长阿含经》卷五《闍尼沙经》、《大毗婆沙论》卷一百二十四等佛典记载,主要有十六国。其中以实行君主制的摩揭陀(以王舍城,又称罗阅祇城为都,其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底赖雅附近)、拘萨罗(又称憍萨罗,以舍卫城为都,其地在今印度西北部拉普地河南岸)、阿槃提(以最胜城,又称唵誓城为都,其地在今印度马尔瓦频闍耶山以北一带)和实行共和制的跋耆(又称拔耆,以吠舍离,又称毗舍离为都,其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穆查发浦尔,此国又称吠舍离国)四国为最强盛。这些国家逐渐吞并了小国和弱国,或将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庸。大国之间为争夺霸权,又互相攻伐,致使干戈不休,战争频仍。其情形与我国春秋末期极为相似。

社会的变革,使原来的种姓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向颀顽自大的婆罗门种姓衰落了,一些祭司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世袭的职业,改行去当商人、医生、樵夫、屠夫、牧人、猎人、佣人、向导等;而原来并不富裕甚至家境贫寒的自由民,也由于各种机遇而发财致富,连婆罗门、刹帝利也转过头来,向他们投去尊敬而又歆羡的目光;至于执掌世俗政权的刹帝利,他们的命运更是漂浮不定,时而贵为国王,时而贱为俘虏。此外,由于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的通婚,也使一些腰缠万贯的商业主已不再满足于往昔听人吆喝的社会地位,他们对婆罗门教陈腐的教义及繁琐的祭祀厌烦不满,对政治、文化也产生了强烈的参预意识,而身为王族的刹帝利因不愿受吠陀经典规定的、由婆罗门解释的各种义务的约束,或明或暗地怂恿和支持反婆罗门教的思想与行动。一般认为,印度是在贵霸王



朝的末期、笈多王朝的初期,即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进入封建社会的。因此,虽说公元前六世纪印度尚处在奴隶制时期,但这是奴隶制经济急速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沙门思潮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三

沙门思潮作为当时反婆罗门教的自由派思想家的集合体,其内部包含理论上互相歧异的许多派别。其中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一定规模的教团、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是六师学说,即佛典中所说的“六师外道”(“外道”为佛教对自己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的贬称)和佛教。

六师学说指的是:

(一)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 顺世派的先驱、唯物论者。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元素(四大)构成的。人死以后,元素散归自然,灵魂随之消失,不可能轮回转世。主张在现世求得幸福。

(二) 删闍耶·毗罗胝子 不可知论者。对一切问题都不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被称为“像鳗鱼一样难以捕捉的理论”。他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后来皈依了佛教,成了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指被称为“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头陀行第一”的迦叶、“天眼第一”的阿那律、“解空第一”的须菩提、“说法第一”的富楼那、“论议第一”的迦旃延、“持律第一”的优波离、“密行第一”的罗睺罗、“多闻第一”的阿难)中的两个。

(三) 末伽梨·拘舍黎 正命派(佛典中称之为“邪命外道”)祖师、宿命论者。认为一切生命体都是由灵魂、地、水、风、火、虚空、



得、失、苦、乐、生、死十二种元素构成的,而元素的结合则是偶然的。无论是贤人还是愚者,只要经过八百四十万大劫,即可自动得到解脱,在命运的锁链中,个人的意志行为是无济于事的。相信可以通过占卜、释梦,预测未来。

(四) 婆浮陀·伽旃那 正命派代表、常住论者。认为构成生命体的是地、水、火、风、乐、苦、命七种元素,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元素是永久存在的,因此心物永不灭。

(五) 富兰那·迦叶 正命派代表、无因无缘论者。奴隶出身。认为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出于偶然,不存在因果联系,人的善恶行为也不会对将来产生任何影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说和因果报应说采取否定的态度。

(六) 尼乾陀·若提子 本名筏驮摩那,尊称“大雄”,耆那教的创始人。刹帝利出身。提倡用严格的苦行和禁戒来净化灵魂,使之得到解脱。据记载,当时常用的苦行,有自饿、投渊、赴火、自坠、寂默、鸡犬戒(单腿站立)、裸形、卧荆棘、睡塚间、以泥涂身、拔须发等。

有关“六师外道”的资料,主要见《长阿含经》卷十七《沙门果经》和卷十四《梵动经》。佛典中还有“九十六种外道”的说法,指的是“六师”和他们各自的十五大弟子。“六师外道”中除耆那教迄今仍在印度流行以外,其余的早已绝传。

四

佛教的创始人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太子悉达多·乔答摩。

迦毗罗卫国,又称劫比罗伐窞堵、迦毗罗、迦毗梨等,意为妙德城、黄头居处。其地在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毗邻的提罗拉科特附



近。1898年1月,英人佩珀在北纬线二十七度三十七分、东经八十三度八分,掘得一个存放遗骨的石壶(舍利壶),上面刻有公元前数世纪流行的婆罗谜文字,意为“这是释迦族佛世尊的遗骨容器,是由有名誉的兄弟及姐妹们、妻子们奉祀的”。从而证实了它的大概的地理位置。

王太子姓名中的“悉达多”是名,意为事业成就者(又译一切义成)、“乔答摩”是姓,意为最好的牛。由于他是释迦族人,觉悟成道以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又称佛陀(意为觉者)、佛、如来、世尊、释尊等。

相传,在喜马拉雅山脚下,今尼泊尔南部与印度交界的罗泊提河的东北,一片长二十里、宽十六里的地方,古时有十个以城为名的小城邦国家,居住在那里的是吠陀时代著名的甘蔗王(又称懿师摩王、义鸠王)的后裔释迦族人(属刹帝利种姓),他们以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为生,保留着原始部落传下来的一些民主传统,而迦毗罗卫的国王净饭王(又称首图驮那)则是十个城邦共同拥戴的首领。净饭王有两个妃子,她们都是与迦毗罗卫国有传统的姻亲关系的邻国天臂城(又称拘利城)善觉王的女儿,即摩耶和她的妹妹波闍波提。公元前565年夏历四月八日,时年四十五岁的摩耶夫人根据当地的风俗回娘家分娩,途经父亲为母亲蓝毗尼建造的花园时,在一棵娑罗树(又称无忧树)下生下了释迦牟尼。

有关释迦牟尼的生卒年,由于古印度典籍(包括佛典)均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各国学者根据不同的史料加以推断,先后得出了六十多种异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一)公元前624年至公元前544年说。这是根据南印度羯陵伽国迦罗毗罗王在优昙耶耆利的碑文推断的;(二)公元前463年至公元前383年说。这是根据孔雀王朝阿育王在摩崖(岩壁)和石柱上所刻的法敕,并参考希腊有关与印度交往的史料,先算出阿育王即位的年代,再推出释迦牟尼



的上述生卒年的；(三) 公元前 464 年至公元前 384 年说。这是根据汉译《十八部论》等所记佛教根本分裂的时间推断的；(四) 公元前 566 年至公元前 486 年说。这是根据汉译《善见律毗婆沙》所传的“众圣点记”，即自释迦牟尼去世的当年结集律藏起，每年七月十五日在这部书的后面记一点，到南齐永明七年(489)，共得九七五点推算的。我国近代学者多取“众圣点记”说。

而释迦牟尼的出生地蓝毗尼园，在今尼泊尔境内靠印度边境的小镇鲁明台旁边。1898 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刻有阿育王法敕的石柱，上面用婆罗谜文字写：“天爱喜见王(指阿育王)于灌顶之第二十年亲自来此朝拜，因此处乃是释迦牟尼诞生之地。兹在此造马像、立石柱以纪念世尊在此诞生。并特谕蓝毗尼村免除赋税，仅缴收入的八分之一。”

摩耶夫人在释迦牟尼出生后的第七天就因病去世了。幼年时代的释迦牟尼是由他的姨母波闍波提养育的。他七、八岁时，就从婆罗门受学声明(语言文字学)、工巧明(工艺历算学)、医方明(医学)、因明(逻辑学)、内明(婆罗门教指的是四吠陀，后来佛教用指佛学)等五明，又从武师学习诸般武艺。十六岁(另说十七岁或十九岁)时，娶表妹耶输陀罗为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罗睺罗。

释迦牟尼的宫廷生活是优裕舒适的。他拥有适合不同季节居住的三座宫殿(三时殿)，冬天可以御寒，夏天可以避暑，雨季可以防潮，衣着华丽，饭食丰盛，每天还有歌舞陪伴。他的父亲对他十分宠爱，希望他将来能绍嗣王位，成为统一天下的“转轮王”。然而，性情温顺、喜欢独自沉思的释迦牟尼对这一切并不迷恋。他目睹当时印度的战争残杀，看到现实生活中生、老、病、死的种种痛苦，从而萌发了“世间无常”，眼前的豪华奢侈短暂易逝的念头，决定舍弃世俗生活，出家修行，以求得人生的真谛，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与超越。



释迦牟尼于二十九岁那一年出家以后，周游访师。起先，他向栖隐在王舍城附近山林的数论派先驱阿逻罗·迦罗摩和邬陀迦·罗摩子学习古印度出家修行者通习的法门——禅定，即静坐思惟，专注一境（其中，禅为禅那的略称，意为静虑，指寂静端坐，思惟审虑；定，又译三摩地、三昧等，指止息杂念，专注一境）。不久，因感到二师指示的禅定境界并非是究竟之道，便离开了他们，来到尼连禅河的苦行林，用严苛的绝食苦行进行修炼，以期得到灵魂的净化升华。他以食用野生果物为生，并且逐渐减少进食的数量，以至每天只吃一麻一麦。这样，持续了六年，弄得他形容枯槁，也仍然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于是，他决定放弃苦行。他在尼连禅河里洗了澡，又喝了一位牧羊女供献的乳糜，恢复了体力。然后，独自来到菩提伽耶（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约十公里处，阿育王后来在那里建造了大菩提寺）一棵毕钵罗树下，铺上吉祥草，在草上结跏趺坐。发誓：如果不得无上菩提（智慧）宁可粉身碎骨，也终不起座。经过七天的冥思苦索，终于大彻大悟。从此，释迦牟尼从一名修行者而成就为佛，毕钵罗树也因而改名为菩提树。

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佛成道日，即夏历十二月八日。

释迦牟尼觉悟成道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特别是人生现象的思维方式，这便是观念形态的佛教；而当他在波罗奈斯城外的鹿野苑（在今印度北方邦贝拿勒斯城西约七公里处。近代，在那里发现了刻有阿育王法敕的石柱），初次向阿若憍陈如（略称憍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摩诃男拘利等五人（他们是释迦牟尼出家以后，净饭王在族人中选派的五个侍者）宣说自己证悟的思想内容，并使他们皈依而成为弟子（世称五比丘）时，便开始了佛教的传播，诞生了佛教的组织形式——僧伽（意为和合众，又称僧团），从而形成物化形态的佛教。



作为观念形态的佛教,它逐渐形成了四谛(有关人生的四种真理,即苦、集、灭、道)、八正道(八种正确的修行方法,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三门必修科目,即戒、定、慧)、五蕴(构成众生的五项要素,即色、受、想、行、识)、十二因缘(构成众生生死流转的十二个因素或环节,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三法印(三项根本佛法,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教说。

作为物化形态的佛教,它逐渐形成了佛教信仰者的团体。狭义的僧伽,指的是出家的佛教信仰者的团体,有四众和五众两种说法。四众指的是:(一)比丘,二十岁以上受过具足戒的出家男子;(二)比丘尼,二十岁以上受过具足戒的出家女子;(三)沙弥,二十岁以下未受过具足戒的出家男子;(四)沙弥尼,二十岁以下未受过具足戒的出家女子。“五众”是在“四众”的基础上,增加“式叉摩那”一众,指成为比丘尼之前二年的出家女子(设立二年的考察期,主要是为了避免已怀孕的妇女出家后生子)。广义的僧伽,还包括在家的佛教信仰者,即优婆塞(男居士)和优婆夷(女居士),与前五众,合称七众。

在以后的发展中,佛教不仅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其他学派和宗教团体,而且传出国界,成为世界性的一大宗教。

释迦牟尼和弟子们的言教,以及他们所反映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形,便是佛教经典的理论来源。

第一章 佛说教法的结集

古印度,又称天竺,按其方位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统称五印度(或五天竺),境内有三条大河: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后,主要在恒河中下游一带从事传教活动。东到瞻波(都城旧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东部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西到拘睢弥(又译憍赏弥,都城旧址在今印度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三十里的柯散),南到王舍城,北到迦毗罗卫,到处留下了他游化的足迹。其中,居住时间最长的是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的舍卫城。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又名迦兰陀竹园,由迦兰陀长者献地、摩揭陀国频婆娑罗王建舍,施与佛陀)、耆闍崛山(又译灵鹫山、灵山,相传佛陀曾居此而说《阿含》等经),舍卫城外的祇园精舍(又称给孤独园、祇树给孤独园、逝多林给孤独园,由须达多,意译给孤独长者和拘萨罗国波斯匿王的太子祇陀施与佛陀)、鹿母讲堂(又称毗舍佉母堂,由一个名叫“毗舍佉”,意为“鹿”的小孩的母亲造精舍施与佛陀),以及吠舍离城外的庵没罗园(又译庵婆罗园、捺女园,由妓女庵没罗施与佛陀),拘睢弥城外的瞿师罗园(又译具史罗园,由瞿师罗长者施与佛陀)等,都是释迦牟尼讲述佛法的重要场所(上述佛教遗迹在东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均有记载)。

释迦牟尼传教的方式是因机施設,不拘一格。他以听闻者易



懂的俗语(即方言,偶而也用规范化的书面语“雅语”,即梵语),温和平易的语调,融合各个领域极为丰富的文化知识的睿智,偈颂、譬喻、敷演、议论、问答等形式,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宣说不同的内容。他既谈论佛教的义理、名相(指名词术语。其中有不少是带数字的,如十二因缘、三法印、五蕴、四禅等,故又称名数、法数)、修持和戒斋,也谈论世人关心的功德和善行,劝诱止恶扬善。他身体力行地倡导“众生平等”,上至国王、大臣、婆罗门,下至农夫、商人、手工业者、渔民、奴隶、妓女和盗贼,一律同等看待,慈悲施化,并且在僧团内部实行民主的羯磨(意译办事、业)制度,即通过僧众会议,集体讨论和决定僧团的各项事务,以期达到僧团内部戒和同修、见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无诤、意和同悦的“六和敬”的目的。所有这些,促成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的传播。

释迦牟尼前后行化达四十五年之久。公元前 486 年夏历二月十五日,他在率领弟子们从吠舍离出发,向北游化的途中,示寂于北末罗国拘尸那迦城(又译拘夷那竭、拘尸那揭罗,意为角城、茅城,其地在今印度联合邦迦夏城)附近的娑罗林(位于迦夏城西北三、四里的阿特多伐底河的对岸),终年八十岁(有关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和史料,参见笔者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释迦牟尼”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以及清代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中所说的佛的“一百二十五事业”,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年 7 月版蒲文成等汉译本)。

由于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佛教尚没有成文的经典,佛陀的言教是通过听闻者的口口相传而得到流播的。为了使佛陀的一代教说能够长久地保存和流传下去,并以此来指导失去导师以后的僧团的活动,就在释迦牟尼入灭后不久,佛教僧团便开始了引人瞩目的佛典编集工作。



最初的佛教经典是以“结集”(又称会诵)的方式,即举行僧众大会(确切地说是比丘大会),由一人当众背诵释迦牟尼生前的教说,经与会者审核通过的方式产生的。其结果是形成了最初的经(又译契经、法、修多罗、修妬路等)藏、律(又译调伏、毗奈耶、毗尼等)藏,以后又产生了论(又译对法、阿毗达磨、阿毗昙、毗昙等)藏。经藏为契经类经典的汇编,起初只收释迦牟尼亲口宣说的教法,后来也扩展为兼收其他佛、菩萨、诸天(天神),以及佛弟子所说的教法;律藏为戒律类经典的汇编,一般只收释迦牟尼亲自制定的戒律条文;论藏为释义类经典的汇编,它是对经藏中所收佛经的义理作出的阐释与发挥,一般由佛弟子撰述。世代相沿的佛教经典体系——三藏,就是由这三大部分构成的。

另外,佛典中还有四藏、五藏的说法。四藏,指的是经藏、律藏、论藏和杂藏(见《增一阿含经·序品》、《大智度论》卷十一等);五藏,一指经藏、律藏、论藏、杂集藏和禁咒藏(见《大唐西域记》卷九),一指经藏、律藏、论藏、杂藏和菩萨藏(见《分别功德论》卷一)。

相传,小乘佛教(以自利,即个人获得解脱为修行宗旨的早期佛教,相对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兴起的以自利、利他为修行宗旨的大乘佛教而言)共有过四次大结集,其中前两次是僧团尚未发生根本分裂以前的原始佛教(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至他人灭后一百年之间的佛教)期举行的,后两次是在僧团发生根本分裂以后的部派佛教(释迦牟尼入灭一百年以后形成的部派鼎立时的佛教)期举行的。其间,先后经历了龙种王朝(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四世纪)、难陀王朝(公元前四世纪)、孔雀王朝(公元前317年—公元前187年)、案达罗王朝(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25年)、巽伽王朝(公元前180年—公元前75年)、甘婆王朝(公元前75年—公元前30年)和贵霜王朝(约公元前80年—320年)。

第一节 第一次结集

第一次结集,又称“王舍城结集”、“五百人集法”。相传,是在释迦牟尼入灭的当年雨季,在王舍城外毗婆罗山的七叶窟(又名“七叶岩”,以七叶树生于岩窟之上而得名)举行的。参加结集的是以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为首的五百比丘。

释迦牟尼在娑罗林的两棵娑罗树中间右胁而卧,半夜入灭的时候,身边只有阿难等少数弟子。时在外地的迦叶等人闻讯赶去,参加了遗体火化仪式。火化后遗存的佛陀遗骨(舍利),为遮罗波、罗摩迦、毗留提、迦毗罗卫、吠(又作毗)舍离、摩揭陀、婆波(南末罗)、拘尸那迦(北末罗)等八国分得,各建塔供养(见《长阿含经》卷四)。对于佛陀的入灭,绝大多数的佛弟子悲痛万分,但也有少数懈怠比丘感到快慰。他们说:佛陀在世的时候,经常说,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如今我等摆脱了约束,从此可以任意所为了。听到这种议论,迦叶十分生气,由此萌发了结集佛陀遗教,依据教法治理僧团的念头。

他的想法得到了众多佛弟子的赞同。佛陀生前制定的僧制规定,在雨季的三个月(六月至九月)中,僧人应定居一处,坐禅修学,禁止外出云游,以免伤害滋长的草木小虫,此为“夏安居”,又称安居、坐夏、坐腊(中国佛教则将夏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定为安居期。安居前一日称“结夏”,安居结束称“解夏”)。于是,众人商议在即将到来的夏安居期间,在七叶窟前举行结集大会。早先曾支持提婆达多分裂僧团的活动,后来忏悔而皈依佛陀的摩揭陀国阿闍世王(又译末生怨王,频婆娑罗王之子),支持了这项动议。他特地在窟前营建了精舍,以供与会者居住,并提供了所需的食物



和生活用品。

这次结集是在迦叶的主持下,从六月下旬开始的,至九月下旬结束,历时三个月。会上,先由优波离诵出律藏,次由阿难诵出经藏。在唱诵每一部经典时,诵持者必须逐一回答迦叶有关佛陀说法的地点、对象、缘由等方面的提问,然后诵出佛陀在那次说法时所说的内容,在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同之后,方才确定下来。原始佛教的开卷语“如是我闻”,意思是“我亲自听到这样说”,便是由此而来的。不过,由于古印度一直盛行以记诵口述的方式传授圣典的做法,佛教也不例外,诵出的律本和经本并没有当即记录成文,成文的佛经相传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才有的,因此,当时形成的是经过核准的口语佛经,而不是书面佛经。

有关第一次结集的内容,佛典的记载不尽相同。《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五分律》卷三十、《善见律毗婆沙》卷一等说,会上只结集了修多罗藏(经藏)和毗尼藏(律藏);而《十诵律》卷六十、《四分律》卷五十四、《大智度论》卷二等说,会上,还由阿难诵出了阿毗昙藏(论藏),佛教的“三藏”在第一次结集时就已齐备。学术界多取前说。另外,《大唐西域记》卷九等还提到,没有应邀参加五百人结集的人,在离七叶窟不远的地方,同时也举行了一次结集,称为“大众部结集”,以别于迦叶的“上座部结集”。说在第一次结集时就存在一些不同意见是可能的,因为《五分律》、《四分律》等都提到有个名叫富兰那(又作富娄那)的长老从南方赶来,与迦叶讨论经与律,提出他亲自听到的一些律文也应受持。但说当时已明显地分裂为两大派,并同时举行了两次结集,这当是部派佛教兴起后的说法,殆非史实。



第二节 第二次结集

第二次结集,又称吠舍离城结集、七百人集法,相传是在佛灭后一百年(一说一百一十年)于吠舍离城举行。参加结集的是以耶舍(又译耶舍陀、耶舍那、耶舍伽乾陀子,相传是阿难的弟子)为首的七百比丘。

耶舍是中印度拘萨罗国的佛教长老。有一次,他乞食游方,来到跋耆国的首都吠舍离城。城北猕猴池边的树林中有一处有名的佛教胜地——重阁讲堂,佛陀生前曾居此传教布道。耶舍到达的那一天,正值寺院举行布萨(又译布沙他、优补陀婆等,意为净住、善宿、长养),即僧人每半月(上半月的十五日、下半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一次的说戒活动,寺僧用铜钵盛水,放在堂宇前,唤请前来观览礼瞻的信众施以金钱,多少不论,以供寺院购买所需物品。耶舍认为,这是“非法求施”,有违戒律。因此,不仅劝说寺僧不要这样做,而且向俗人宣说非法求施的罪过,要他们不施钱。此事激怒了当地跋耆族的比丘,他们责令耶舍悔过,并向信众公开认错,然而耶舍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被摒出僧团。

耶舍离开吠舍离以后,前往(一说遣使前往)吠舍离以西的一些国家,如中印度的秣兔罗国(又译摩头罗、摩偷罗等,都城旧址在今印度北方邦西部马土腊西南的马霍里)、韩若国(又译萨寒若,其地不详)、波理夜咀罗国(又译波利耶,在秣兔罗国以西五百里处)、拘睢弥国(即憍赏弥,上述诸国见《大唐西域记》卷四、卷五和卷七)、西印度的阿槃提国等,寻求各地僧团的支持。这些西方僧团的长老均赞同耶舍的观点,相约同赴吠舍离,裁决此事。与此同时,吠舍离的比丘也到东方一带活动,谋求支持。于是,以耶舍为



代表的西方僧团和以跋耆比丘为代表的东方僧团,总计七百比丘,汇集于吠舍离,讨论包括乞钱在内的跋耆比丘施行的十种做法,即“十事”是否符合戒律的问题。这“十事”是:

- 一、角盐净 即允许用角器贮藏食盐。
- 二、二指净 即允许在中午日影偏西二指时仍可进食。
- 三、他聚落净 即允许午饭后到别的聚落再进食。
- 四、住处净 即允许同一住地的僧人参加不同地点的布萨。
- 五、赞同净 即允许在有人缺席的情况下议事并作出决定,然后再征求缺席者的意见。
- 六、所习净 即允许按僧团先例行事。
- 七、不搅摇净 即允许饮用未经搅拌去脂的牛乳。
- 八、饮阁楼伽净 即允许饮用未发酵的椰子汁。
- 九、无缘坐具净 即允许使用不缝贴边、大小不一的坐具。
- 十、金银净 即允许接受施舍的金银。

由于参加集会的人数过多,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讨论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经双方商定,各推派四位有威望的上座(僧龄长、德行高的长老)为代表,组成最高的仲裁委员会,在婆利迦园开会,对“十事”逐一加以审查。经过辩论,东方僧团的代表被西方僧团的代表所说服,一致通过了关于“十事非法”,即“十事”违背戒律,应当禁止的决定,并把它们写进律文。相传,为统一认识,在对“十事”作出裁定之后,与会的比丘还重新会诵了经藏和律藏。这次结集历时八个月而告结束。

以上记载见于上座部系的律典。而大众部系的律典则对此持不同的说法,《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说,第二次结集所讨论的是“五净法”,即制限净、方法净、戒行净、长老净和风俗净,并且肯定了乞求金银钱币的做法。

第三节 第三次结集

第三次结集有南北二说。南说,指的是南传佛教,即由印度向南传播形成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以信奉小乘上座部佛教为主)的传说;北说,指的是由印度向北传播形成的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佛教(以信奉大乘佛教为主)的传说。

南传佛教所说的第三次结集,指的是“华氏城结集”。相传是在佛灭后二百三十六年于华氏城(又译巴连弗邑、香花宫城、波吒釐子等,摩揭陀国阿育王从王舍城迁都于此,其地在今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举行。参加结集的是以目犍连子帝须(略称帝须,阿育王之子摩晒陀出家后的师父)为首的一千比丘。

据南传佛教史书《岛史》(又名《岛王统史》,斯里兰卡现存最古的巴利文编年史诗,约成于公元四、五世纪,作者不详)、《大史》(又名《大王统史》,巴利文编年史诗,公元五世纪末摩诃那摩撰)、《善见律毗婆沙》(公元五世纪初赴斯里兰卡的印度僧人觉音,又称“佛音”撰的《律藏疏》的节抄本,有汉译)记载,第二次结集以后,跋耆比丘因对大会通过的将“十事”断为非法的上座们的决议不满,另外又举行了一次集会。在这次结集中,他们更改了三藏的一些内容,以适应自己的观点,并且增入了一些新的经典,从而形成了大众部,而将与自己的观点相对立的上座们称为上座部。上座部主张对佛制戒律(包括微细戒)一概严格遵守,而大众部主张对佛制大戒须严格遵守,而对小戒、微细戒可视实际情况有取有舍。佛教史上说的第一次分裂,或根本分裂,就是指统一的佛教僧团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这两大派系。



在以后的发展中,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内部,又因为师承、见解、区域、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而发生再分裂(称为枝末分裂),大部分出小部,小部又分裂为支部,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先后形成了二十四部:大众部分为牛家部(又称鸡胤部)、一说部、制多山部(又称案达罗派),牛家部又分出说假部和多闻部,连根本大众部在内,总计六部;上座部分为化地部和犍子部(又称跋闍子部),化地部分出说一切有部(略称有部)和法藏部,说一切有部又相继分出饮光部、说转部、经部,犍子部分出法上部、贤胄部、六城部(又称密林山部)、正量部,连根本上座部在内,总计十二部;以后印度佛教还分裂出雪山部、王山部、义成部、东山部、西山部和金刚部,凡六部(以上参见《大史》第五章)。

华氏城结集就是在佛教发生根本分裂之后的一百多年时举行的。

南传佛教说,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公元前268—公元前232年在位)杀兄而登王位,后用武力统一了全印度。阿育王在即位之初,粗暴残忍,滥杀昆仲及大臣。征伐羯陵伽国以后,因目睹戮杀十万人,尸骨遍野的惨状,大生悔心。回师后,即皈依佛教。颁发了许多法敕,并将它们刻在摩崖或石柱上;在全国各地大兴寺塔;巡礼佛教遗迹;禁杀生,行布施;派遣大批传教师到各地以及邻国弘传佛教等,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护法君主。南传佛教相传有两个阿育王,一是黑阿育王,一是白阿育王(又称法阿育王),前者恶,后者善,两人相距百年。据学者考证,这“黑阿育王”可能是指阿育王皈依佛教之前讲的,“白阿育王”则是指皈依佛教之后讲的,实为同一人。阿育王在皈依佛教以后,在鸡园寺举行了七年的斋会,每天供养的僧人达数万人之多。大批外道为谋求衣食,混迹其中,造成僧团内部人员混杂,争论不休。为此,阿育王于即位的第十七年(公元前251年),从阿呼山请来了目犍连子帝须,



着手对僧团进行清理。阿育王作成众多隔障,将同一见解的人集中在一隔里。然后从每一隔中唤出一名比丘,亲加审问,凡是属于邪见的,并令还俗。

事后,由帝须主持,在僧众中选出通达三藏的一千比丘,于华氏城举行了历时九个月的第三次结集。会上重新结集了三藏,并且由帝须编纂了《论事》一书,书中记述了部派佛教内部的各种论事,以及帝须一派所批驳的二百多种观点。由于帝须属于南传上座部(又称分别说系)中的化地部,故这次结集也被认为是分别说系或化地部的结集。

北传佛教所说的第三次结集,指的是“迦湿弥罗结集”,相传是在佛灭后四百年(一说五百年,近人考定为二世纪初叶)于迦湿弥罗(又译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举行。《大唐西域记》卷三等记载了迦湿弥罗结集的情况,但没有明确它是第几次结集。而一些藏传佛教史书,如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又称《善逝教法史》、《布顿佛教史》)、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等都明确地将迦湿弥罗结集称为“第三次结集”,并认为具体的结集地点是在迦湿弥罗的恭巴寺或耳严林寺。参加结集的是以世友(又译婆须蜜多、伐苏蜜多罗,一、二世纪之际,北印度犍陀罗国人)为首的五百比丘。由于迦湿弥罗结集按时间顺序是在阿卢寺结集之后,故近人也有将它称为“第四次结集”的。

据北传佛教论书《大毗婆沙论》和史书《异部宗轮论》等说,佛教僧团的根本分裂是由佛灭后一百年左右大天(中印度末土罗国商人之子)提出的“五事”引起的。“五事”指的是:

- 一、阿罗汉(已达到自身修行圆满的人)仍不能摆脱情欲,在梦中会因魔女的引诱而遗精。
- 二、阿罗汉仍会不知道自己修行已达到的果位。
- 三、阿罗汉对教理仍有疑惑不解之处。



四、阿罗汉的修行仍需他人指点。

五、阿罗汉仍有痛苦的感觉,通过发出“苦哉”之声来帮助自己实现解脱。

大天将五事编为一偈:“馥所诱无知,犹豫他令人,道因声故起,是名真佛教。”并在布萨日当众唱诵,从而引起争论。赞成大天的主张的,即为大众部;与之相对立的,即为上座部。大天因而成了大众部的创始人。此为根本分裂。

据《大毗婆沙论》卷九十九说,大天先前犯有三种死后当堕“无间地狱”的罪业(三无间业):一弑父。其父外出经商,他竟与生母相通,待父还家时,又与母合谋杀之;二杀罗汉。大天与母出逃后,在摩揭陀国华氏城遇见认识自己的僧人,惶恐事彰,又杀了那人;三弑母。大天的生母后来与他人通奸,大天又将其母杀死。由于大天是大众部的首领,而《大毗婆沙论》则是与之相对立的上座部系统中的说一切有部的著作,故近人也有对此说持怀疑态度的,认为这未必是事实。

至于枝末分裂,则是指大众部分出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凡八部;上座部分出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分出犍子部、化地部、饮光部(又称善岁部)、经量部(又称说转部),犍子部又分出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住部,化地部又分出法藏部,凡十部。大众部和上座部的支派总计为十八部,加上根本大众部和根本上座部(又称雪山部),构成北传佛教所说的二十个部派(以上见《异部宗轮论》)。

北传佛教说,佛灭后四百年,大月氏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128—153年在位)统治了西北印度。迦腻色迦王是继阿育王之后出现的又一位有名的护法君主。他定都犍陀罗国(又译乾陀罗等,其地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的布路沙布逻城(又译富楼兰,即白沙瓦),在那里营造了被称为“西域浮图



(佛塔)最为第一”的雀离浮图(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有详细的记载),并且与佛教大德(有高深学识和崇高道德的人)胁比丘(又称胁尊者,因勤行苦行,未曾以胁至地而卧而得名)、马鸣(原为婆罗门外道,后受胁比丘的教化而改信佛教)、众护(又译僧伽罗刹,须赖国人)、世友等结为密友。佛像的雕刻就是从他治世的时候开始的。

迦腻色迦王在政务之暇,还阅读佛经,每天请一位高僧入宫说法。由于这些僧人分属不同的派系,所持的见解也不同,致使他产生了不少疑惑而不能得到解答。于是,他采纳胁比丘的意见,在全国选拔了五百比丘,让他们在世友的主持下,在迦湿弥罗举行结集,以统一经典和思想。会上各造十万颂,疏释经、律、论三藏。著名的《大毗婆沙论》就是在这次结集中产生的。由于迦腻色迦王在众多的部派中独尊说一切有部,故他支持的这次结集,实际上是说一切有部的结集。

第四节 第四次结集

第四次结集,又称“阿卢寺结集”,指的是公元前一世纪末叶,于斯里兰卡玛杜勒的阿卢寺(又译阿卢迦寺、光明寺)举行的结集,参加结集的是以坤德帝沙长老为首的大寺派(又称摩诃毗诃罗住部、分别说部,因发祥地在斯里兰卡古都阿努拉达普拉南郊的大寺而得名)的五百比丘。此为南传佛教所传,而为北传佛教所无。

据南传佛教说,公元前一世纪末叶,斯里兰卡经历了一场大的动荡。刚即位的伐多伽摩尼王被反叛者推翻而逃亡外地,泰米尔人又从南印度侵入这个岛国,再加上连年的特大干旱,庄稼颗粒无收,成千上万老百姓连同僧尼死于战乱和饥荒。许多人被迫冒险



渡海去印度,以求生存。原有的寺庙大多荒废。当时全岛能够背诵经藏中《义释》(《经集》的注释)的只剩一个比丘,而那个比丘又是一个淫乱放荡的人。历来靠口头传授、记忆保存的佛经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同时,在大动荡以前,斯里兰卡流传的是以大寺为中心的小乘上座部佛教,而在平息了历时十四年的战乱,伐多伽摩尼王重新执政之后,国王为了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自己流亡期间曾经给予过的帮助,特地为长老兴建了无畏山寺(位于阿努拉达普拉城的北郊)。无畏山寺逐渐成了与大寺相对立的兼习大乘和小乘的一派僧徒,即无畏山寺派(又称阿跋耶祇厘住部、法喜部,曾盛行了好几个世纪,1165年被国王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取缔而告绝)的活动中心。大寺派长老为了保存凭口头传诵流传下来的三藏,使其免受到国王支持的无畏山寺派的改窜,于是在比较偏远的阿卢寺举行了第四次结集。参加结集的五百比丘集体唱诵了律藏、经藏和论藏,并将审核通过的全部三藏,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巴利文)刻写在贝多罗树叶(其形状像棕榈叶)上,装订成册,这就是最初的贝叶经,从而实现了从口语佛经到书面佛经的历史性转折。

第五节 其他传说

除第四次结集以外,由泰国伐奈那亲王子于1789年撰著的《结集史》还提到了南传佛教的九次结集。其中第一次至第三次结集在印度举行,第四次至第七次在斯里兰卡举行,第八次和第九次在泰国举行。据考证,其第一次至第五次结集的内容与《大史》等所载大致相同,后四次结集并未得到其他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的普遍承认。



另外,据缅甸史记载,1871年,缅甸国王敏东(1853—1877年在位)召集了二千四百名高僧,于首都曼德勒举行了第五次三藏结集。

这次结集以律藏为中心,考订校对佛典原文的同异,前后历时五个月。并且将结集的三藏,分别镌刻在七百二十九块方形大理石上,竖立在曼德勒山麓拘他陀塔寺之中,外有四十五座佛塔围绕,至今尚存。

不过,泰国和缅甸提到的这后几次结集,在时间上都是比较晚的,它们对南传佛教经典的整个体系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章 小乘三藏的形态

据史料分析,释迦牟尼在世之时,虽然已有根据直接的听闻或间接的传授,而能讽诵释迦牟尼在某次或数次法会上说法的内容(此为口语佛经的原型)的僧人,但由于那时尚未对佛典作系统的分类整理,因而还没有“三藏”之名。而且第一次结集只结集了经藏和律藏,被后世视为论藏初型的若干部佛说论典,在那次结集中,是作为经藏的一部分而加以收录的,并没有独立成为一类。因此,将全部佛教经典分为经、律、论三大部类,并且以含有“收藏”、“包摄”之意的“藏”字来命名,称之为“三藏”,当是在第一次结集以后的事情。《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四等说,佛陀在世时已有三藏。以情理判断,这恐系部派佛教时的说法,未必确实。

三藏,按其教乘来剖分,可以分为小乘三藏和大乘三藏。小乘三藏,又名声闻藏,“声闻”意为听闻佛陀言教而觉悟的人。此藏主要载录佛陀为弟子们宣说的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五蕴、三学等教法。大乘三藏,又名菩萨藏,菩萨为菩提萨埵的略称,又译觉有情、大士、开士等。此藏主要载录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中心的菩萨行(修行)的教法。小乘三藏的编纂,虽然在尚处于原始佛教期的第一次结集就开始,但真正形成文字的则已是处于部派佛教后期的第四次结集时的事情,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漫长的搜集、整理、增广、成文的过程。在部派佛教时代,各



派都有自己的三藏。据唐慧立、彦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唐代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时,就曾带回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三弥底部(正量部)经律论十五部、弥沙塞部(化地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饮光部)经律论十七部、法密部(法藏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传今的小乘三藏,从传承上来说也分别隶属于一定的部派。

第一节 小乘经

由结集产生的佛说教法类经典,究竟是按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或者说是按何种法则进行分类的,从历史上的记载判别,乃是“九分教”(又称“九部经”)和“十二部经”(又称十二分教);以今存的形式判别,则是“四阿含”和“五尼柯耶”。

一、九分教·十二部经

据巴利文《岛史》所说,第一次结集时编集的佛陀教法方面的内容是九分教,汉译《摩诃僧祇律》等也多次提到九分教,把它当作是原始经藏的最初形态。

对于“九分教”,不同佛典如《摩诃僧祇律》卷一、《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住毗婆沙论·念佛品》等有不同的解释。依照《法华经·方便品》的说法,并参照其他佛书的解释,指的是:

(一) 修多罗 意译契经,指佛典中无固定句式的散文(又称长行)。

(二) 祇夜 意译重颂、应颂,指专对经典中长行的内容进行



概括和阐发的偈颂。

(三) 伽陀 意译偈、颂、不重颂、孤起颂、讽颂等,指佛典中有一定音韵句式的偈颂。

(四) 伊帝目多伽 意译本事、如是语,指记述佛陀教化事迹的故事(《大智度论》卷三十三则认为,指记述由佛陀叙说的众弟子过去世,即“前世”情形的故事)。

(五) 阇陀伽 又译阇多伽,意译本生,指佛陀叙说的自己在过去世情形的故事。

(六) 阿浮陀达磨 又译阿浮达摩,意译未曾有、希有法,指有关佛陀神通变化的故事。

(七) 尼陀那 意译因缘,指佛陀讲经说法的原委以及有关的情况。

(八) 阿波陀那 意译譬喻,指佛陀借物喻理,或因事兴感而说的各种譬喻。

(九) 优波提舍 意译论议、论义、逐分别说,指用问答的方式,对比较艰深的教义所作的解说。

上述九分教中,修多罗、祇夜、伽陀三部是根据经文的体裁立名的,其余六部则是根据经文的内容立名的。而《摩诃僧祇律》卷一说的“九部经”,指的是修多罗、祇夜、授记、伽陀、优陀那、如是语、本生、方广、未曾有经。

至于“十二部经”,根据《大智度论》卷三十三的解释,指的是:修多罗、祇夜、和伽罗那、伽陀、优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目多伽、阇陀伽、毗佛略、阿浮陀达磨、优婆提舍。也就是说,由“九部经”,加上“和伽罗那”、“优陀那”、“毗佛略”三部而成。

(一) 和伽罗那 意译授记、记别,指佛陀对弟子将来证果所作的预言。

(二) 优陀那 意译自说、无问自说,指在无人发问的场合下,



佛陀根据自己意图直接宣说的教义。

(三)毗佛略 意译方广、方等,指佛陀为利乐一切有情(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情识的生命体的通称)而说的较为深广的教理。

由于十二部经包括了被当作“大乘”同义词的“方广”一类的经典,因而有人认为它是小乘向大乘过渡时期的产物。其实,“方广”一词早在部派佛教时期就已使用,只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借用这个词并赋予新的涵义罢了。《四分律》卷一说到十二部经,其名分别为:契经、祇夜经、授记经、偈经、句经、因缘经、本生经、善道经、方等经、未曾有经、譬喻经、优婆提舍经。这里的“方等经”就是“方广经”。另外,《中阿含经》卷五十四《阿梨吒经》也有十二部经之名,以此看来,十二部经的出现当仅次于九分教,也是较早的。

然而,无论是九分教还是十二部经,都可以看作是对全部佛教经典所作的分类,因为它们所设立的一些部类同样适用于律藏和论藏。藏传佛教名著《佛教史大宝藏论》“明所闻说之法”章曾指出,契经、应颂、记别、讽诵、自说等五部属于小乘的经藏;因缘、譬喻、本事、本生等四部属于小乘的律藏;方广、希有法二部,属于大乘的经藏;论议(又称论义)一部,既是小乘的论藏,也是大乘的论藏。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因此,经过部派佛教的不断整理归类,原始经藏的界域日益分明起来,百千种小乘经单本(它们当中包括了九分教所说的九大部类)分别被纳入四部或五部大丛书之中,这就是北传汉文三藏中的“四阿含”和南传巴利文三藏中的“五尼柯耶”。

二、四阿含·五尼柯耶

阿含,为梵语音译,又译阿含慕、阿笈摩、阿笈多、阿伽摩等,意



译为法归、无比法、教法、传承等。“四阿舍”指的是按所收经典篇幅的长短以及事义、类别分别编纂的《长阿舍经》、《中阿舍经》、《杂阿舍经》和《增一阿舍经》。

尼柯耶,为巴利文的音译,意译为部或集。“五尼柯耶”指的是《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今人也有将“五尼柯耶”译为“五阿舍”的,分别称之为《长阿舍经》、《中阿舍经》、《杂阿舍经》、《增一阿舍经》和《小阿舍经》)。

“四阿舍”和“五尼柯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内容上又有出入。也就是说,它们均源于第一次结集时产生的一个原始的共同的祖本,因而两者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然而它们的今存形式又是经过各部派加工整理而告完成的。汉文“四阿舍”是根据一些不同部派的传本译成的,巴利文“五尼柯耶”则全出自上座部的分别说部(又称分别说系),所以,两者之间又存在差殊。

(一)《长阿舍经》二十二卷。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弘始十五年(413)译出。佛陀耶舍、竺佛念的生平事迹分别见梁慧皎《高僧传》卷二、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一册)本等。本经因所收经典的篇幅较长而得名,一说因多说久远之事(如过去七佛、世界成坏劫数),以及通过破斥外道之劣,以显示佛教之优而称之为“长”。据法藏部(上座部的分支)传本译出。全书分为四分,共收录经典三十部。第一分,收四经,始《大本经》,终《闍尼沙经》,主要记叙诸佛及弟子在过去世的事缘。第二分,收十五经,始《小缘经》,终《大会经》,主要记叙佛说教法的纲要及修行等事。第三分,收十经,始《阿摩昼经》,终《露遮经》,主要记叙佛对外道异学的论难。第四分,收《世记经》一经,主要记叙六道众生所居世界的起源、相状以及成败劫数等,在《长阿舍经》所收各经中成立较晚。

《长阿舍经》的别生经(《长阿舍经》收录的小经或根据《长阿舍经》某一部分内容编成的小经的单行本)有:后汉安世高译的《长阿



舍·十报法经》二卷、《人本欲生经》一卷、《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一卷等二十一种(据《佛光大辞典》，台湾佛光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

与《长阿含经》相对应的是巴利文《长部》。《长部》分为《戒蕴品》、《大品》、《波梨品》三品，共收经三十四部。在《长阿含经》收录的经典中，除《增一经》、《三聚经》、《世记经》三经以外，其余诸经均见于《长部》，但文字颇有出入。《长部》的汉译本名为《长部经典》。它的节选本由近代江炼百译出，初被收入《普慧大藏经》，后被编入台湾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台湾华宇出版公司 1986 年版)。此本共收二十三部经，始《梵网经》，终《弊宿经》。《长部》的全本，由今人通妙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台湾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版)第六、七、八册。

(二)《中阿含经》六十卷。东晋僧伽提婆译，隆安二年(398)译出。僧伽提婆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一册)本等。本经因所收经典的篇幅在“四阿含”中属不长不短而得名。一说，因它所说的义理合乎中道，故称之为“中”。据说一切有部(上座部的分支)传本译出。全经分为五诵(一天或一次诵毕为一诵)十八品，共收录经典二百二十二部。据当时协助僧伽提婆译经的豫州沙门道慈统计，总共五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五字。第一诵为《初诵》，五品半，始《善法经》，终《天使经》，凡六十四经。第二诵为《小土城诵》，四品半，始《乌鸟喻经》，终《瞿昙弥经》，凡五十二经。第三诵为《念诵》，一品半，始《柔软经》，终《阿摄想经》，凡三十五经。第四诵为《分别诵》，三品，始《鸚鵡经》，终《说智经》，凡三十六经。第五诵为《后诵》，三品半，始《阿夷那经》，终《例经》，凡三十五经。经中主要记叙了佛陀对弟子、异学、王者、居士等所说的教诫，也包括弟子的说法。

《中阿含经》别生经有：后汉安世高译的《四谛经》一卷、《本相猗致经》一卷、《一切流摄守因经》一卷、《是法非法经》一卷、《漏分



布经》一卷等六十六种。

与《中阿含经》相对应的是巴利文《中部》。《中部》分为三篇、十五品，共收经一百五十二部。在《中阿含经》收录的经典中，与《中部》相同的有九十八经。另外，见于巴利文《增支部》的有七十六经，见于《长部》的有九经。《中部》的汉译本名为《中部经典》，它的节选本由近代芝峰译出。收入《普慧大藏经》、《大藏经补编》。此本共收五十部经，始《根本法门经》，终《呵魔经》。《中部》的全本，由今人通妙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九册至第十二册。

(三)《杂阿含经》五十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求那跋陀罗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册)本等。本经所收经典虽然依据事义粗略区分，但因编次颇杂而得名。据说一切有部传本译出。全经共收录经典一千三百六十二部。其中，卷二十三、卷二十五收录的《阿育王因缘经》、《法灭尽相经》、《阿育王施半阿摩勒果因缘经》三经，其内容相当于西晋安法钦译的《阿育王传》或梁代僧伽婆罗译的《阿育王传》，是后人因原卷阙失，误补进去的。因此，实收经典为一千三百五十九种(多为无经名的片段)。

近代学者根据唐代玄奘译的《瑜伽师地论》中所引的《杂阿含经》的古释，勘定它的原本应当是四分十诵。第一分为“蕴、处、因缘相应分”，凡六诵。其中，《五取蕴诵》相当于今本《杂阿含经》的卷一、卷十、卷三、卷二、卷五；《六处诵》(旧题《诵六入处品》)相当于卷八、卷九、卷四十三、卷十一、卷十三；《缘地诵》(旧题《杂因诵》)相当于卷十二、卷十四、卷十五的一部分；《食诵》相当于卷十五的一部分；《谛诵》相当于卷十五、卷十六的一部分；《界诵》相当于卷十六的一部分、卷十七。第二分为“佛弟子所说、佛所说相应分”，凡二诵。其中，《佛弟子所说诵》(旧题《弟子所说诵》)相当于



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佛所说诵》相当于卷四十一的一部分、卷六、卷七、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五、卷三十七、卷四十七。第三分为“道品相应分”，一诵。即《念住等诵》（旧题《诵道品》），相当于卷二十三至卷三十、卷四十一的一部分。第四分为“结集相应分”，一诵。即《八众诵》，相当于卷三十八至卷四十、卷四十六、卷四十二、卷四、卷四十四至卷四十五、卷三十六、卷二十二、卷四十八至卷五十（见吕澂《杂阿含经刊定记》，《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 1991 年 7 月版）。台湾《佛光大藏经》中的《杂阿含经》就是据此重编的。

《杂阿含经》的异译本（又称同本异译，指同一种梵本的不同汉译本）有：魏吴失译（未署译者姓名）的《杂阿含经》一卷（内收二十七经）、后秦失译的《别译杂阿含经》十六卷（内收三百六十四经，据研究，可能是饮光部所传的一个残本）。别生经有：后汉安世高译的《五阴譬喻经》一卷、《转法轮经》一卷、《八正道经》一卷等二十九种。

与《杂阿含经》相对应的是巴利文《相应部》。《相应部》分为五篇、五十六相应、二百零三品，共收经二千八百七十五部（另说“二千八百六十三部”、“二千八百五十八部”），较《杂阿含经》齐整有条理。在《杂阿含经》收录的经典中，与《相应部》相同的有八百八十三经，另外，见于《增支部》的有一百二十经，见于《中部》的有二十经。《相应部》的汉译本名为《相应部经典》，由今人云庵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十三册至第十八册。

（四）《增一阿含经》 五十一卷。东晋僧伽提婆译，隆安元年（39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册）本等。本经因所收经典以法数（含有数字的佛教名词术语）为序，从“一法”至“十一法”，依次递增编排而得名。据大众部传本（一说法藏部传本，见英国渥德尔《印度佛教史》，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4 月版）译出。全经分为五十二品。共收录经典四百七十二部。初为《序品》，叙述阿难传诵、



本经结集、优多罗受法的因缘。以下各品，依法数分类辑录。一法：十三品，始《十念品》，终《五戒品》，收一百零九经。二法：六品，始《有无品》，终《善知识品》，收六十五经。三法：四品，始《三宝品》，终《高幢品》，收四十经。四法：七品，始《四谛品》，终《增上品》，收六十一经。五法：五品，始《善聚品》，终《听法品》，收四十七经。六法：二品，始《六重品》，终《力品》，收二十二经。七法：三品，始《等法品》，终《莫畏品》，收二十五经。八法：二品，始《八难品》，终《马血天子品》，收二十经。九法：二品，始《九众生居品》，终《马王品》，收十八经。十法：三品，始《结禁品》，终《十不善品》，收二十六经。十一法：四品，始《牧牛品》，终《大爱道涅槃品》，收三十九经。其中，各品及各经之末，多有“摄颂”，以概括要旨。经中主要记叙了佛陀对诸天、世人所说的施、戒、生灭、涅槃等教义，并收有种种因缘故事。《增一阿含经》的别生经有：后汉安世高译的《婆罗门避死经》一卷等二十八种。

与《增一阿含经》相对应的是巴利文《增支部》。《增支部》分为十一集、一百七十一品，共收经二千一百九十八部（一说二千二百零三部）。在《增一阿含经》收录的经典中，与《增支部》相同的有一百三十六经。另外，见于《相应部》的有四十六经，见于《中部》的有三十三经，见于《长部》的有二经。《增支部》的汉译本名为《增支部经典》，由今人郭哲彰等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十九册至第二十五册。

在巴利文经藏中，除了与汉译“四阿含”相对应的《长部》、《中部》、《相应部》和《增支部》以外，尚有《小部》。

《小部》共收十五部经，它们是：《小诵经》、《法句经》、《自说经》、《如是语经》（又译《本事经》）、《经集》、《天宫事经》、《饿鬼事经》、《长老偈经》、《长老尼偈经》、《本生经》、《义释》（分《大义释》和《小义释》），即《经集》中《八颂经》、《彼岸道品》、《犀牛角品》的注



释)、《无碍解道》、《譬喻经》、《佛种姓经》(又译《佛史经》)、《所行藏经》(又译《若用藏》)。

《小部》所收的一些经典的单本,较早就有汉译。如孙吴竺将炎、支谦译的《法句经》二卷(下分三十九品,始《无常品》,终《吉祥品》)、支谦译的《义足经》二卷(收《桀贪王经》等十六部小经)、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五卷(收《那赖经》等五十五部小经)、唐玄奘译的《本事经》七卷(下分《一法》、《二法》、《三法》三品),分别是《小部》中的《法句经》、《经集》(《大智度论》称为《义品》、《波罗延经》)、《本生经》、《本事经》。其中,《义足经》、《生经》、《本事经》在汉文《大藏经》(收录大小乘经律论及佛教撰述的佛教丛书)中,被编在“四阿含外诸经”之中,《法句经》被编入《西域贤圣集传》之中。另外,近代夏丏尊译的《南传小部经典》,内收《本生经》小经一百五十部,黄谨良译的《泰国大藏经小部经》,内收《法句经》、《自说经》和《如是语经》,也是出自巴利文《小部》的经典。有《普慧大藏经》、《大藏经补编》本行世。《小部》的全本名为《小部经典》,由今人悟醒等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二十六册至第四十七册。但所收小经的编次与巴利文本略有不同,《长老尼偈经》以下依次为《譬喻经》、《本生经》、《无碍解道》、《佛种姓经》、《所行藏经》、《义释》。

对于“四阿含”和“五尼柯耶”(或称为“五阿含”)的成立时间,研究者们的看法有种种不同。有的认为,《杂阿含》在先,《中阿含》次之,《长阿含》再次之,《增一阿含》最后。理由是:凡一事并见于“四阿含”中的,《杂阿含》的叙述简洁平淡,《中阿含》犹相近,《长阿含》和《增一阿含》则化简洁为漫长,变平淡成瑰奇;也有的认为,《长阿含》和《中阿含》在先,《杂阿含》和《增一阿含》在后。因为《杂阿含》有引用《长阿含》上的文字;《增一阿含》提到了佛陀逝世后四十年即位的摩揭陀国蒙达王;更多的人主张,“四阿含”是同时形成



的,只有性质犹如“杂藏”的《小部》是后来问世的。

然而,如果更深一层探讨的话,就会发现:无论是对这四部或五部《阿含经》中的任何一部来说,都无一例外地包含成立年代明显不同的一些经典,很难为收入某一部《阿含经》中的众多小经确定一个统一的形成时间表。即使拿公认晚于“四阿含”的《小部》来说,它也包含了一些原始佛教的古老文献。《杂阿含》和《增一阿含》都引有《小部·经集》上的内容。阿育王在加尔各达的巴布罗的小摩崖法敕中,曾劝告僧人和居士经常习诵七部佛说经典:《毗奈耶最胜法说》、《圣圣经》、《当来怖畏经》、《牟尼偈》、《寂默行经》、《优婆帝沙门经》、《说罗睺罗经》(又称《罗睺罗问妄语经》)。这七部经典作为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广泛流传的最为可信的原始佛典,就分别见于巴利文《律藏·小品》、《增支部》、《小部·经集》、《中部》之中。此外,有关“四阿含”别生经甄别、归类,也有待深入。

三、《阿含经》以外诸经

先说“四阿含”以外的汉译小乘经。

“四阿含”以外的小乘经,见于汉文《大藏经》中的,除前面提到的《本事经》、《义足经》、《生经》等以外,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三、明智旭《阅藏知津》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一等编录,还有一百多部。有些被编在“大乘经”中的经典,从所述的义理判别,也是小乘经。不过,这需仔细辨析。这些经典中的绝大多数,产生于部派佛教的中后期,包括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其中,有些经典是根据未编入“四阿含”的原始佛经的散本编集的,保存了原始佛教中的一些古说;也有一些是根据“四阿含”中已经提到的理论,组织敷述的。这些小乘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 本生类

1. 《修行本起经》 又名《宿行本起经》，二卷。后汉竺大力、康孟详译，建安二年(197)译出。竺大力的生平事迹见《开元释教录》卷一，康孟祥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册)本等。本经分为五品：《现变品》、《菩萨降身品》、《试艺品》、《游观品》、《出家品》。主要叙说释迦牟尼托胎、降生、出家、成道的事迹。它的异译本有：吴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

2. 《佛本行集经》 又名《本行集经》，六十卷。隋阇那崛多译，开皇七年(587)至开皇十一年(591)译出。阇那崛多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册)本等。本经分为六十品，始《发心供养品》，终《阿难因缘品》。叙述了释迦牟尼诞生、出家、成道，以及行化、弟子归依等事迹。是最为详尽的一部佛陀传记(略称“佛传”)。据考证，它是法藏部的作品。

3. 《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 又名《佛临涅槃略说教诫经》、《略说教诫经》、《遗教经》，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四年(402)至弘始十四年(412)译出。鸠摩罗什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二册)本等。本经主要叙述释迦牟尼佛在拘尸那迦的娑罗双树间入涅槃前最后垂教的情况。释迦牟尼佛告诫弟子，在自己入灭之后，当以波罗提木叉(即戒条、戒本)为本师，以制五根(眼、耳、鼻、舌、身)，离瞋恚、憍慢、放逸等，精进道业。本经也可看作是小乘的《涅槃经》。由于大乘瑜伽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世亲曾为之注，撰《遗教经论》一卷(陈代真谛译)，故后世也有视之为大乘经的。但就本经的内容而言，并没有涉及大乘。中国的禅宗对这部《遗教经》极为重视，曾将它与《四十二章经》、《沩山警策》合称为“佛祖三经”。



(二) 禅观类

这是一类介绍禅法的经典。其重要者有：

1. 《大安般守意经》 又名《安般守意经》、《大安般经》，二卷。后汉安世高译，汉建和二年(148)至建宁三年(170)译出。安世高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五册)本等。“安般”为梵语音译“安那般那”的略称，“安那”指吸气，“般那”指呼气，即出入息。本经虽然题为“经”，但实际使用的是“论”的体裁，主要论述坐禅时行数息观，默数出入息，令心随意而定，以收敛散心。所说的“数息观”，后为《修行道地经·数息品》、《毗婆沙论》卷二十六等所采用。

2. 《禅秘要法经》 又名《禅秘要法》，三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四年(402)至弘始十四年(41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五册)本等。经中主要介绍了不净观、白骨观、念佛观、数息观等禅观。

(三) 福田类

这是一类宣说各种修行功德的经典。其重要者有：

1. 《诸德福田经》 又名《佛说诸德福田经》、《福田经》，一卷。西晋法立、法矩译，惠帝世(290—306)译出。法立、法矩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本经通过佛答帝释之问的方式，阐明了五净德(即沙弥五德)、七法广施、兴立佛图(佛塔)等福业。

2. 《盂兰盆经》 又名《佛说盂兰盆经》，一卷。西晋竺法护译，泰始二年(266)至建兴元年(312)译出。竺法护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本经主要记叙了盂兰盆会的缘起与功德。说佛的大弟子目连以天眼通，看到



死去的母亲因生前造恶业，堕为饿鬼，皮骨相连，日夜苦闷相续。目连盛饭饷母，未及入口，皆化为火焰。目连向佛陀求救，佛遂指示目连在每年的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即僧众夏安居结束之日），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佛僧，即可救母。汉地每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仪式——盂兰盆会，即是据本经而建立的。本经在古代的佛经目录和《大藏经》中曾被列为“大乘经”，日本《大正藏》编在“经集部”（既有小乘经，也有大乘经），但从内容判别，当属小乘经。

（四）业道类

这是一类论述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的经典的经典。其重要者有：

1. 《分别善恶所起经》 又名《善恶所起经》，一卷。后汉安世高译，建和二年（148）至建宁三年（170）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七册）本等。本经主要论述了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五道”皆由善恶所起，随业受报，无有停息的理论。

2. 《正法念处经》 又名《正法念经》，七十卷。东魏般若流支译，兴和元年（539）译出。般若流支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七册）本等。全经分为七品：《十善业道品》、《生死品》、《地狱品》、《饿鬼品》、《畜生品》、《观天品》（包括四天王、三十三天、夜摩天）、《身念处品》。主要阐明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等十善业道的功德，以及色界、欲界、无色界等三界，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等六道的因果关系。经中时露大乘思想的端倪，据考证，为小乘正量部的后期作品。



(五) 名数类

这是一类解说佛教名词术语的经典。其重要者有：

《阴持入经》二卷。后汉安世高译，建和二年(148)至建宁三年(170)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五册)本等。本经是采用“阿毗昙”(论)的体裁写成的契经。经中对小乘佛教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作了解释，并阐明了通达解脱的途径。内容包括：五阴(又译“五蕴”)，指构成一切有情众生的五种因素，即色、受、想、行、识。其中，色阴为物质因素，其余四阴为精神因素(安世高将“受”译作“痛”)；十二入(又译“十二处”)，六根和六境的合称。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六境，指色、声、香、味、触、法，为六根攀缘的对象；十八界，六根、六境、六识的合称。六识，指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为“六根”攀缘“六境”而产生六种认识；三十七品经法(又译“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的合称，为成就菩提(智慧)、趋向涅槃的三十七种修行法门(安世高译作：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者八种道行)。

(六) 其他

指前五类以外其他论述小乘教义的经典。有：后汉安世高译的《十八泥犁经》一卷、《父母恩难报经》一卷、《温室洗浴众僧经》一卷、《九横经》一卷，吴支谦译的《八师经》一卷，三秦失译的《出家功德经》一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十二品生死经》一卷，沮渠京声译的《八关斋经》一卷、《进学经》一卷，智严等译的《四天王经》一卷，等等。

接下来讲“五尼柯耶”以外的巴利文小乘经。

“五尼柯耶”以外的小乘经，见存于巴利文《大藏经》(编在藏外



典籍类)中的尚有《弥兰陀王问经》。弥兰陀王是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统治西北印度的希腊国王,他曾向一位名叫那先(又译那迦斯那,意为龙军,中印度人。初学吠陀,后出家学佛,研习阿毗昙)的长老询问佛法,内容包括:智慧、烦恼、轮回、业、佛陀、教团、比丘、出家修行与居家修行、涅槃等,并由此皈依了佛教。《弥兰陀王问经》就是根据弥兰陀王与那先长老的这次著名的对话编纂而成的。此经于东晋时期被传译为汉文(译者不详),取名为《那先比丘经》,凡二卷(别本作“三卷”)。内容相当于巴利文本《弥兰陀王问经》的序言及前三篇。《弥兰陀王问经》的汉译本名为《南传弥兰王问经》,由今人巴宙译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全经分为七篇:序话、特相、断惑、难问、比量之问、头陀行、譬喻问。其中后四篇据考证是后人补续的。

四、《阿含经》注疏

有关《阿含经》的注疏,见存于巴利文《大藏经》中的,则有舍利弗的《增支部疏》、觉音(北印度菩提伽耶人,410—432年之间在斯里兰卡学习上座部教法,并将僧伽罗文佛教论疏改写成巴利文的《长部注》、《中部注》、《相应部注》、《增支部注》、《小诵注》、《经集注》等,十分齐全;见存于汉文《大藏经》中的,则只有属于东汉末年失译的《分别功德论》五卷,它是《增一阿含经》的注疏,但仅注释了《增一阿含经》五十二品中的前四品,即《序品》、《十念品》、《广演品》和《弟子品》,此外四十八品阙注。《分别功德论》除解释《增一阿含经》的前四品以外,还叙述了佛弟子的事迹及修行功德,有涉及大乘“六度”和“十住”(即“十地”)的内容,以及对大乘戒和小乘戒的同时认可,在思想上与《般若经》颇为相似。另外,论中还赞



扬大众部创始人大天。因此,它的作者很可能是具有大乘思想成分的后期大众部学者。在巴利文《大藏经》中,有关《阿舍经》的注疏是编在独立于三藏之外的注疏类典籍之中的,而在汉文《大正藏》中,《分别功德论》乃是小乘论藏所收典籍的一种。

第二节 小 乘 律

戒律,作为佛弟子的行为规范和僧团日常生活及行事的纲纪,在佛教中享有特殊的地位。第一、四次结集都是先结集律藏,然后再结集经藏的,第二次结集所讨论的也是戒律问题。在巴利文《大藏经》中,三藏的次序为:律藏、经藏、论藏,强调戒律至高无上。汉译《菩萨瓔珞本业经》卷下说:“一切众生,初入三宝(佛、法、僧)海,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均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戒律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止持戒和作持戒两大类。止持戒,指的是制止身、口、意作恶的戒法,也就是止恶戒;作持戒,指的是策励身、口、意兴善的戒法,也就是修善戒。止持戒,主要是针对僧尼个人的过失所作的规定,它强调的是不应当做什么;作持戒,主要是针对僧团的日常生活和行事所作的规定,它强调的是应当做什么。戒律,顾名思义是由“戒”和“律”两部分组成的,止持戒是名副其实的“戒”,而作持戒实质上是“律”。

佛教的戒律,都是佛陀根据当时出现的情况陆续制定的。它的基本原则是“无犯不制”,也就是说,每一条戒律都是由于某一僧人犯了过失,遭到外人的讥嫌,佛陀在听到弟子们的禀告之后才制定的。在僧人没有犯过失之前,事先就构设一套戒法,公布于众的情况是没有的。

相传,在佛陀创立僧团的初期,出家者的动机比较纯正,他们



大多是为了获取人生的真谛,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而投奔佛陀的。在自愿平等的受学传道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坏事、恶行,因而也没有相应的具有约束力的戒律条文。以后,随着佛教的影响不断扩大,参加僧团的人数迅速增加,逃避兵役的,躲避债务的,谋求衣食的也混迹其中,成员变得复杂起来,倘若再不用统一的纪律和制度来指导僧尼的活动,僧团就无法健康地生存和发展,戒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佛教戒律的最初形式,是性质上属于止持戒的“波罗提木叉”(意译别解脱、别解脱戒、戒本),而最早的波罗提木叉则是“波罗夷”(通常将犯有此罪的,称为波罗夷罪,对此罪进行处分的方法,称为波罗夷法)。据《摩诃僧祇律》卷一至卷四记载,佛陀制定的第一条戒是“淫戒”,那是他在成道后的第五年冬天,于毗舍离城,针对长老耶舍迦兰陀子的初犯制定的;第二条戒是“盗戒”,是在成道后的第六年冬天,于王舍城,针对瓦师子长老达膩迦的初犯制定的;第三条戒是“杀戒”,是在同年冬天,于毗舍离城,针对看病比丘的初犯制定的;第四条戒是“妄语戒”(又称大妄语戒),也是在同年冬天,于舍卫城,针对聚落中诸比丘的初犯制定的。这四条戒合称“四波罗夷”(又称波罗夷法)为佛教的四条根本戒。违反者将受到摈出僧团的最严重的处分。

继波罗夷法之后,佛陀又陆续制定了一些戒法。它们是:僧残(又译僧伽婆尸沙),指性质上仅次于波罗夷的重罪,但经忏悔尚可留在僧团;不定,指尚不能确定其性质的罪行;舍堕(又译尸萨着波逸提,略称尼萨着),指拥有超出规定或用不法手段获得的财物,如舍弃这些财物,并进行忏悔,就可解除的轻罪;单堕(又译单提、波逸提),指只要当众忏悔,便可解除的轻罪;悔过(又译波罗提提舍尼、提舍尼),指向一个人忏悔,即可解除的轻罪;众学,指僧尼应学的戒法;灭诤,指平息僧团内部纷争的戒法。连同波罗夷法,总计



八大类,别称“五篇七聚”。所说的五篇,指的是波罗夷、僧残、波逸提(包括舍堕和单堕)、提舍尼、突吉罗(包括众学戒和灭净戒)。七聚,指的是波罗夷、僧残、偷兰遮(属波罗夷和僧残中的未遂罪)、波逸提、提舍尼、恶作(属突吉罗)、恶说(属突吉罗)。每一类戒法又包括若干条款,少则二条(如二不定法),多则一百多条(如一百七众学法)。戒律中的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就是由此而来的。

与此同时,佛陀也相应地制定了性质上属于作持戒的有关僧团集体修行生活的一系列规定。戒律中的受戒法、布萨法、安居法、自恣法(又译随意,指僧人在每年安居期结束之日举行忏悔集会,既忏悔自己的过失,也可检举他人的过失)、衣法、皮革法、卧具法、医药法、房舍法,以及其他各种“杂事”就是由此而来的。

一、广 律

广律,指的是将佛制定的各种戒律条文,组织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的律典。一般收有:属于止持戒的波罗提木叉(即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属于作持戒的诸法(有关僧团修行生活的规定,有的律典称为犍度);以及其他附属事项。在第一次结集时,被称为“持律第一”的优波离,将佛陀自成道后第五年开始,到入灭前为止的四十年间,陆续制定的众多的戒律,分八十次诵出,结成《八十诵律》,从而产生了原始律藏,同时它也是最初的广律。《八十诵律》作为原始僧团共同尊奉的根本律,前后流传了一百多年左右。以后,由于佛教部派的兴起,各个部派在传持过程中,对《八十诵律》的内容作了一些增减,从而形成了本派自己的律本。渐渐地,作为广律祖本的《八十诵律》湮没无闻了,取而代之的是各派的广律。这样的广律传今的共有五部,其北传的有四部,南传的有一部。



(一)《摩诃僧祇律》 略称《僧祇律》，四十卷。东晋佛陀跋陀罗、法显译，义熙十二年(416)译出。佛陀跋陀罗、法显的生平事迹分别见《高僧传》卷二、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二册)本等。本书为大众部的律典。内容包括：比丘戒法(卷一至卷三十五)，下收比丘戒二百八十八条(又称二百八戒)、杂诵跋渠法(指不是一次诵出的各种戒法。跋渠，意为部、品，与犍度相近，相当于通常说的章节)一百三十三条、威仪法(指比丘戒、比丘尼戒以外的有关行住坐卧等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和礼仪)五十条；比丘尼戒法(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下收比丘尼戒二百七十九条(又称二百七十九戒)、杂跋渠法三十四条。其中卷三十二之末、卷三十三之初记有五百比丘结集法藏、七百比丘结集法藏，即第一、二次结集的情况。

(二)《四分律》 又称《昙无德律》，六十卷。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等译，弘始十二年(410)至十四年(41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二册)本等。本书为上座部系统昙无德部(即法藏部)的律典，因分为四部分(四分)而得名。内容包括：比丘戒(卷一至卷二十一)，凡二百五十条(包括四波罗夷法、十三僧残法、二不定法、三十舍堕法、九十单堕法、四悔过法、一百众学法、七灭净法)；比丘尼戒(卷二十二至卷三十)，凡三百四十八条(包括八波罗夷法、十七僧残法、三十舍堕法、一百七十八单堕法、八悔过法、一百众学法、七灭净法)；二十犍度(卷三十一至卷五十三)，始受戒犍度、终杂犍度；集法毗尼五百人(卷五十四)、七百集法毗尼(同上)、调部毗尼(记优婆离问戒事，卷五十五至卷五十七)、毗尼增一(记律学中的法数，卷五十七至卷六十)。《四分律》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通常说的“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都是指《四分律》所列的款项而言的。

(三)《五分律》 全称《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略称《弥沙塞



律》，三十卷。刘宋佛陀什、竺道生等译，景平元年(423)至元嘉元年(424)译出。佛陀什、竺道生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二册)本等。本书为上座部系统弥沙塞部(即化地部)的律典，因分为五部分而得名。内容包括：比丘律(即比丘戒，卷一至卷十)，凡二百五十九条；尼律(即比丘尼戒，卷十一至卷十四)，凡三百七十七条；受戒法等十九法(相当于《四分律》中的羯度，卷十五至卷二十九)；五百集法(卷三十)、七百集法(同上)。

(四)《十诵律》又称《萨婆多部律》，六十一卷。姚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译，弘始六年(404)至弘始十五年(413)译出。弗若多罗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三册)本等。本书为上座部系统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的律典，因分十次诵出(十诵)而得名。一说，它是《八十诵律》的删节本(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内容包括：比丘律(卷一至卷二十)，凡二百五十七条；七法(受具足戒法等，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八)、八法(迦絺那衣法等，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五。迦絺那衣意为“功德衣”，指安居期结束后施主施与的衣服)、杂诵(调达事和杂法，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一，以上相当于《四分律》中的羯度。调达即“提婆达多”，为释迦牟尼的堂弟。其后自立僧团并数次谋害释迦牟尼，成为最早分裂僧团的一个人)；尼律(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七)，凡三百五十四条；增一法(一法至十一法，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一)；优波离问法(卷五十二至卷五十五)；比丘诵(卷五十六至卷五十七)、二种毗尼及杂诵(卷五十七)、波罗夷法(卷五十七至卷五十九)、僧伽婆尸沙(卷五十九)；善诵毗尼序(五百比丘结集三法藏法品等四品，卷六十至卷六十一)。

说一切有部的律典除《十诵律》以外，尚有唐代义净于长安三年(703)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于景龙四年(710)



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二十卷,前者为比丘律,后者为比丘尼律。虽然这两部律典各侧重一方面,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广律,但是两书的内容总和要超过《十诵律》。一般认为,《十诵律》是说一切有部的旧律,为秣兔罗(又译“摩偷罗”)国一带的有部所传;义净译的两部律是新律,为迦湿弥罗一带的有部所传。

(五) 巴利文《律藏》。此为南传上座部(分别说部)的律典。内容包括:1. 经分别。下分《大分别》和《比丘尼分别》两项,前者说比丘戒二百二十七条,后者说比丘尼戒三百十一条。2. 犍度。下分《大品》和《小品》两项,前者说十犍度,后者说十二犍度,均为僧团的各项制度。3. 附随(又译“附录”)。为戒条的附则和说明,共计十九章。其中,《经分别》和《犍度》两部分的内容,与汉译《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所说大体相近,《附随》部分则大异。一般认为,《附随》成立的时间要较《经分别》、《犍度》来得晚。《律藏》已由今人通妙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一册至第十五册。

二、戒本·羯磨·威仪·律论

除广律以外,今存的小乘律藏还有戒本、羯磨、威仪、律论等形式。

戒本,分为比丘戒本和比丘尼戒本。其内容相当于广律中的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其中绝大多数的戒本都源出于广律,有相应的广律可资比照。如姚秦佛陀耶舍译的《四分律比丘戒本》一卷、《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一卷、东晋佛陀跋陀罗译的《摩诃僧祇律大比丘戒本》一卷,分别相当于《四分律》中的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十诵律》中的比丘



尼戒、《摩诃僧祇律》中的比丘戒等。也有广律已佚而仅存戒本的，如北魏般若流支译的迦叶毗部（即饮光部）的《解脱戒经》一卷。

羯磨，为僧团集体活动的各项制度。其内容相当于广律中的犍度、跋渠。有将比丘羯磨和比丘尼羯磨合为一本的，如曹魏康僧铠译的《昙无德律部杂羯磨》一卷。也有分开叙述的，如刘宋求那跋摩译的《四分比丘尼羯磨法》一卷。

威仪，是僧众行为举止的礼仪规范。其内容相当于广律的威仪法、众学法。有后汉安世高译（一说失译）的《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等。

律论，是广律的解释。比较重要的汉译小乘律的释论有五部，称为律部五论。它们是：

（一）《善见律毗婆沙》又名《善见毗婆沙律》、《善见律》、《善见论》、《毗婆沙律》，十八卷。萧齐僧伽跋陀罗译，永明七年（489）译出。僧伽跋陀罗的生平事迹见《开元释教录》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四册）本等。本书是公元五世纪初印度僧人觉音（又称“佛音”）在斯里兰卡撰写的巴利文《律藏疏》的抄译本。其中，卷一至卷四叙述第一、二、三次结集，以及《律藏》的传持和阿育王之子摩晒陀到斯里兰卡传教等情况；卷四以下为《四分律》（其语句与传今的汉译本有所不同）的注释。下分比丘戒、比丘尼戒、鸯陀伽、大德舍利弗问优婆离律污出品等四篇。书中记有“波逸提法”九十条，在“众学法”中又附记有关佛塔的条文，反映了《四分律》对它的影响。

（二）《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又名《萨婆多毗尼》，九卷。三秦（350—431）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三册）本等。本书为《十诵律》的解释。下分八部分：总序、四波罗夷、十三事、二不定法、三十事、九十事、四悔过、七灭净。

（三）《毗尼母经》八卷。三秦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



二十四册)本等。本书是解释《十诵律》别本的,因自谓一切戒律皆由此出而题为今名。书中主要论述了受具足戒的功德和条件、犯戒的因缘、比丘戒法等。

(四)《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又名《毗尼摩得勒伽》,十卷。刘宋僧伽跋摩译,元嘉十二年(435)译出。僧伽跋摩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三册)本等。本书下分二十九章,也是释《十诵律》别本的。

(五)《律二十二明了论》略称《明了论》,一卷。印度弗陀多罗多法师造,陈代真谛译,光大二年(568)译出。真谛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四册)本等。本书是解释未传入汉地的正量部广律中的二十二律仪的。

第三节 小乘论

由对佛说教法进行解释与说明的各种论典组成的论藏,是在第一次结集以后,从经藏中分离出来,并且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大门类。在成立的时间上,要晚于经藏和律藏。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既讲经说律,纵论佛法大意,也考虑到听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在一些法会上,专门对自己在说法中叙及的某些较为深奥的义理和名相(名词术语)进行解释;或者由他标出纲目,让被称为“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和被称为“议论第一”的大迦旃延代讲,他作印可。如他在拘流沙国的劫摩沙时,曾应阿难的请求,解释“十二因缘”(见《长阿含经》卷十《大缘方便经》);在鸯伽国瞻婆城伽伽池侧时,因患背痛,让舍利弗代讲“十上法”(指一成法、二修法、三觉法、四灭法、五退法、六增法、七难解法、八生法、九知法、十证法。见《长阿含经》卷九《十上经》);在舍卫国给孤独园



时,命大迦旃延对他提出的“分别观法”作广演(见《中阿含经》卷四十二《分别观法经》)。这些说法的共同特点是:采用问答的方式,层层推进,展示佛说教法,尤其是名词概念(名相)的内在涵义,以及名词概念(名相)之间相摄、相应、相生的关系。后经记诵整理,构成了原始经藏最初形式“九分教”中的“优波提舍”,并被收入《阿含经》之中。

随着口语佛经的成型化,出现了对某一部佛经的文句、义理和重要的名词概念(名相)作诠释的论典,这在当时被称为“摩得勒伽”(又译摩怛理迦、摩多罗迦),义译本母,意谓能派生众多义理的要旨。摩得勒伽既有解释契经的,也有解释律典的,前者谓之经论,后者谓之律论。后世为了修持上的方便,将律论归入律藏,而将经论单独列出,名之为论藏。

与此同时,一些原先散见于经藏或经藏以外诸经(这后一部分经典后来被编入杂藏)之中的,佛陀对自己所说教理(尤其是重要的名相)的解释,以及对佛陀教义研究最力的舍利弗、大迦旃延两大弟子的讲解,逐渐从契经状态中分离出来。这些资料经组织整理,被编集为有一定体系结构的论典,这被称为“阿毗昙”,又称阿毗达磨,义译对法、分别法,意谓对佛说教法的分别、抉择和论述。

摩得勒伽和阿毗达磨一般都采用问答的方式,剖析名相,展开议论。但两者起初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摩得勒伽是依经立论,它的重点是对某一部佛经加以疏解,明经旨,释难句,以达其意,犹如后来说的“释经论”;而阿毗达磨是依经作论,它的重点是将佛经中提到的义理和名相作分门别类的辨析和阐发,而不拘泥于某一部经典或原来的叙述程序,犹如后来说的“宗经论”(又称“集义论”)。但到后来,摩得勒伽中既有释经论,也有宗经论;阿毗达磨中既有宗经论,也有释经论,两者并无多大差别。南宋法云在《翻译名义集》卷四《论开八聚篇》将“摩得勒伽”分为十类:“一、略陈名数支,



即《百法论》；二、粗释体义支，即《五蕴论》，此二天亲所造；三、总包众义支，即《显扬论》；四、总摄大乘义支，即《摄大乘论》，皆无著造；五、分别名数支，即《杂集论》；六、离僻处中支，即《辩中边论》；七、摧破邪山支，即《二十唯识论》；八、高建法幢支，即《三十唯识论》；九、庄严体义支，即《大庄严论》；十、摄散归观支，即《瑜伽论》。”虽说举的例子都是大乘的论典，但其中的大多数分类也适用于小乘的论典。

部派佛教兴起后，论典作为各派思想自由发挥的阵地和各派理论体系的组织形式，因受到特别的重视而迅速发展起来。尽管这些论典往往含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主张，从内容和形式上来说与前期已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把自己看作是“佛说阿毗昙”的延续和发展，并且往往在书名上标以“阿毗达磨”的字样，阿毗达磨之名由此而大行，渐渐地成为各种论典的通称，而优波提舍、摩得勒伽、毗婆沙（意译广释）等成了论典的别称。因此，后人常常将论藏称为阿毗达磨藏。

一、大众部论典

小乘阿毗达磨按部派可以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两系。

大众部以大迦旃延的《毘婆沙》为根本论书。据传，这是佛在世时，大迦旃延根据佛陀平时对名相的解释編集而成的，并且呈佛印可（见《分别功德论》卷一）。虽然它出自大迦旃延之手，但其内容却是“佛说”的，因为又称《佛说阿毗昙》。《佛说阿毗昙》按戒、世间、因缘、界、同随得（即“随眠”）、名味句（即“慧”）、集定、集业、诸阴（即“诸蕴”），分为九分，每一分的标题都冠有“分别说”的字样（如《分别说戒分》、《分别说世间分》等），故习称《九分毗昙》。各分



均有六千颂,总计五万四千颂(见唐代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二引陈代真谛《部执异论》)。由于《蠓勒》的原本有三百二十万言,一般人无法记诵,因而在佛灭后,有人将它删削为三十八万四千言,在南印度一带颇为流行(见《大智度论》卷二)。现已失传。

二、上座部论典

与大众部僧众相比较,上座部僧众的文化层次相对来说要高些,因此,上座部的阿毗达磨也远较大众部发达,流传至今的小乘论典,除解释《增一阿含经》的《分别功德论》属大众部以外,其余的均出自上座部。

上座部以舍利弗的《舍利弗阿毗昙论》(又称《舍利弗阿毗昙》)为根本论书。此论于姚秦弘始十七年(415)由昙摩耶舍、昙摩崛多等译出,三十卷。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八册)本等。据研究,它为上座部分支犍子部的传本。全书分为问、非问、摄相应、绪四分。问分下立:《入》、《界》、《阴》、《四圣谛》、《根》、《七觉》、《不善根》、《善根》、《大》、《优婆塞》十品;非问分下立:《界》、《业》、《人》、《智》、《缘》、《念处》、《正勤》、《神足》、《禅》、《道》、《烦恼》十一品;摄相应分下立:《摄》、《相应》二品;绪分下立:《遍》、《因》、《名色》、《假结》、《行》、《触》、《假心》、《十不善业道》、《十善业道》、《定》十品。总计三十三品。由于摄相应分实际上包含摄分和相应分,故《舍利弗阿毗昙论》又称《五分毗昙》。

在上座部下属各派中,以《舍利弗阿毗昙论》为基点,发展小乘阿毗达磨,并把它推向鼎盛的是南方的分别说部和北方的说一切有部。



(一) 分别说部

分别说部,指的是佛灭后三百年间,统一的上座部中自从说一切有部分出以后,剩下的那部分“根本上座部”(略称“本上座部”),因主张对未尽的教理作分别论究而得名。一般认为,说一切有部和分别说部是上座部最初分裂时形成的两大支派。但古印度清辨《异部宗精传释》(藏译本)和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有汉译本)则将说一切有部、犍子部和分别说部看作是上座部下的三大支派,并认为化地部、饮光部、法藏部和传到斯里兰卡的铜牒部(又称“红衣部”)出自分别说部,是分别说部下面的四小部。由于分别说部主要是在斯里兰卡发扬光大的,故后世一般将传到斯里兰卡的那部分上座部佛教称为分别说部,又称“南传上座部”。传今的巴利文三藏就是南传上座部的经典。分别说部的论典有七部,略称“七论”。

1. 《法集论》 又称《法聚论》。本书之首列举善法、不善法、无记法以下一百二十二门的论本母(即论的主题)和漏法、无漏法以下四十二门的经本母(即经的主题)。正文分为四品(又称四章):《心生起品》、《色品》、《概说品》、《义释品》。对散见于《阿含经》中的术语,如五蕴(色、受、想、行、识)等加以组织、整理、定义和细致的辨析。在“七论”中,它是最早产生的、基础性的论书。书首所列的论母一百二十二门(即一百二十二个论本母)被《分别论》、《界论》、《双论》和《发趣论》所引用。日文版《南传大藏经》中的《法聚论》共有七册,近代范东寄将其中的第一册译成汉文,仍题名为《法聚论》,有《普慧大藏经》、《大藏经补编》本行世。它的全本由今人郭哲彰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四十八册。

2. 《分别论》 本书是《法聚论》的续作。全书分为十八品(又称“十八分别”)。依次为:《蕴》、《处》、《界》、《谛》、《根》、《缘行相》、



《念处》、《正勤》、《神足》、《觉支》、《道》、《禅定》、《无量》、《学处》、《无碍解》、《智》、《小事》、《法心》。其中前十五品(即《蕴品》至《无碍解品》)多由有经分别、对法(论)分别、问分三段组成;末三品(即《智品》、《小事品》、《法心品》)则由论母和广释二段组成。它的全本已由今人郭哲彰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四十九册、第五十册。

3. 《界论》 又称《界说论》。全书分为十四品,对蕴、处、界等法的摄与不摄,相应与不相应关系,特别是与心识、情感、善恶有关的各类名词术语,如五根(眼、耳、鼻、舌、身)、五尘(色、声、香、味、触)、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的定义、组合和关联展开了讨论。本论的内容与汉译《品类足论》卷三、卷八至卷十、卷十八,以及《众事分阿毗昙论》卷二、卷六、卷七、卷十二所述大体相近。有觉音的《界论注》加以注释。它的全本已由今人郭哲彰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五十册。

4. 《人施設论》 本书之首列举论母,将《阿含经》中有关“人施設”(即人我)的各种论述,按一法至十法的增支分类编排,正文则对这些论母(名词概念)进行具体的辨析和解说。本论的内容与汉译《舍利弗阿毗昙论》中的《人品》,以及《集异门论》十分接近。它的全本已由今人郭哲彰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五十册。

5. 《双论》 又称《双对论》。全书分为十品:《根本双论》、《蕴双论》、《处双论》、《界双论》、《谛双论》、《行双论》、《随眠双论》、《心双论》、《法双论》、《根双论》。其中第一品《根本双论》和第八品《心双论》只有施設分(包括总说和义释);第七品《随眠双论》分为七分:随增分、有随眠分、断分、遍知分、已断分、生分、界分;其余各品均分为三分:施設分、转分、遍知分。书中用问答的方式,对诸法(指佛教名词术语)的定义及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它的全本已由



今人郭哲彰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五十一册至第五十三册。

6.《发趣论》 又称《发趣大论》。通行本有台湾版《汉译南传大藏经》本等。本书之首为论母(包括设置分和缘分别分),正文由二十四发趣(即二十四品)组成。即先分为四会:顺发趣、逆发趣、顺逆发趣、逆顺发趣。每一会之下,又开展出六种发趣:三法发趣、二法发趣、二法三法发趣、三法二法发趣、三法三法发趣、二法二法发趣。从而构成二十四发趣。对事物兴起的各种因缘条件等有关的名词术语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7.《论事》 又称《论事说》。通行本有台湾版《汉译南传大藏经》本等。全书分为二十三品,每品下设论,共有二百十七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僧团中的各种论争作了记叙,批驳了大众部、说一切有部等所持的二百一十九种见解,同时阐明了分别说部的观点。如:过去、未来法无实体;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可以顿得现观,缘起无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无“中有”;阿罗汉无退(证得阿罗汉后不会退转);补特伽罗无我(即人无我);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修道不同等。有觉音的《论事注》为之注释。

在分别说部“七论”中,除《论事》一书,是阿育王时目犍连子帝须为记叙当时佛教僧团内部的纷争,确立自己一派的正统地位而编纂以外,其余六论都托称出自“佛说”。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以契经(《阿含经》)的材料为基础,加以自己的理解,重新组织的。有的还成立较晚,如《双论》。据对勘发现,《分别论》与说一切有部的《法蘊足论》,《界论》与有部的《界身足论》,《发趣论》与有部的《识身足论》在讨论的主题上有相似之处。

分别说部的上述“七论”,大概在公元前二世纪后叶已经存世,因为稍后形成的《弥兰陀王问经》已经提到“五尼柯耶”和“七论”的名称。此后,分别说部又撰作了一些论典,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两



部：一是公元二世纪斯里兰卡僧人优波底沙著的《解脱道论》，二是公元五世纪印度僧人觉音在斯里兰卡撰的《清净道论》。

1. 《解脱道论》 十二卷。梁僧伽婆罗译，天监十四年（515）译出。僧伽婆罗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本等。全书分为《因缘》、《分别戒》、《头陀》、《分别定》、《觅善知识》、《分别行》、《分别行处》、《行门》、《五神通》、《分别慧》、《五方便》、《分别谛》十二品，对佛教的“三学”——戒、定、慧进行了解说。

2. 《清净道论》 今人叶均译，通行本有中国佛教协会刊行本。本书是在《解脱道论》的基础上广作增订补充而成的。全书分为二十三品，前二品（《说戒》、《说头陀支品》）说戒；中间十一品（《说取业处》、《说地遍》、《说余遍》、《说不净业处》、《说六随念》、《说随念业处》、《说梵住》、《说无色》、《说定》、《说神变》、《说神通品》）说定；后十品（《说蕴》、《说处界》、《说根谛》、《说慧地》、《说见清净》、《说度疑清净》、《说道非道智见清净》、《说行道智见清净》、《说智见清净》、《说修慧之功德品》）说慧。对戒、定、慧的定义、种类、修持方法、福德等进行了详细完备的论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教理的集大成者。

（二）说一切有部

说一切有部约于佛灭后三百年之际，从上座部分出，以主张过去、现在、未来（合称“三世”）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一切法）均实有自体而得名。有部的基本论典是“一身六足”。“一身”，指的是有部大论师迦旃延（又译迦多衍尼子、迦旃延子，佛灭后三百年，北印度至那仆底国人。与《毘勒》的作者迦旃延非为同一人）著的《发智论》；“六足”，指的是相传为佛陀的大弟子目犍连（又译大目乾连）著的《法蕴足论》、舍利弗（又译舍利子）著的《集异门足论》、迦旃延



著的《施設论》、提婆设摩著的《识身足论》、世友著的《界身足论》和《品类足论》。这七部论书中,除《施設论》以外,其余的全称都冠有“阿毗达磨”,如《阿毗达磨发智论》、《阿毗达磨法蕴足论》等。而印度称友《俱舍论疏》则说,《法蕴足论》为舍利弗造,《集异门足论》为拘絺罗造,《施設论》为目犍连造,《识身足论》为提婆设摩(义译天护)造,《界身足论》为富楼那(义译圆满)造,《品类足论》为世友造。《施設论》原不署作者,据玄奘所传,后人定为迦旃延所作。

先说“六足论”:

1. 《法蕴足论》 十二卷。唐玄奘译,显庆四年(659)译出。玄奘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慧立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全书分为《学处》、《预流支》、《证净》、《沙门果》、《通行》、《圣种》、《正胜》、《神足》、《念住》、《圣谛》、《静虑》、《无量》、《无色》、《修定》、《觉支》、《杂事》、《根》、《处》、《蕴》、《多界》、《缘起》二十一品,分别对《阿含经》中提到的二十一种重要教说进行了解释。

2. 《集异门足论》 二十卷。唐玄奘译,龙朔三年(66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全书分为《缘起》、《一法》、《二法》、《三法》、《四法》、《五法》、《六法》、《七法》、《八法》、《九法》、《十法》、《赞劝》十二品,对《长阿含经》卷八《众集经》进行了解释。

3. 《施設论》 七卷。北宋法护译,景德三年(1006)至嘉祐元年(1056)译出。法护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本书是对《长阿含经》卷十八至卷二十二《世记经》(单行本名《楼炭经》、《起世经》、《起世因本经》)的解释。藏译本(指西藏文译本)由《世间施設》、《因施設》、《业施設》三门构成,而法护的译本中,只有《世间施設门》和《因施設门》,而且《世间施設门》有目无文(只有标题,没有本文),有实际内容的只有《因施設门》,因此,非为完帙。在汉文《大藏经》中,与



《施設论》内容相近的有陈代真谛译的《立世阿毗昙论》十卷。

4.《识身足论》 十六卷。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全书分为《目乾连蕴》、《补特伽罗蕴》、《因缘蕴》、《所缘缘蕴》、《杂蕴》、《成就蕴》,凡六蕴(相当于六犍度、六篇、六章)。以眼、耳、鼻、舌、身、意为六识(又称六识身)与境物的因缘关系为轴心,论述了“人空法有”的主张。人空(又称人无我),指人是由五蕴(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成的,没有独立的恒常的主体(我);法有,则承外部事物有真实的主体和自性。

5.《界身足论》 三卷。唐玄奘译,龙朔三年(66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全书分为《本事品》和《分别品》二品。《本事品》略举有部色法(物质现象)、心法(精神活动的主体)、心所法(由精神活动的主体产生的各种精神现象)、心不相应行法(既非精神又非物质的现象)、无为法(指前四类有为法之外的无生灭变化的事物和现象)等“五法”中,有关“心所法”的一些名词概念,如十大地法(受、想、思、触、作意、欲、胜解、念、三摩地、慧)、十大烦恼地法(不信、懈怠、失念、心乱、无明、不正知、非理作意、邪胜解、掉举、放逸)等;《分别品》下分十六门,对这些名词概念进行了辨析,据书末所附玄奘的弟子窥基的《后序》,《界身足论》的大本有六千颂,略本分别为九百颂和五百颂,玄奘所译的是九百颂中的八百三十颂。

6.《品类足论》 十八卷。唐玄奘译,显庆五年(660)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全书分为《辩五事》、《辩诸智》、《辩诸处》、《辩七事》、《辩随眠》、《辩摄等》、《辩千问》、《辩抉择》等八品,对“五法”以及“五法”以外的一些名词术语进行了解释。据《大智度论》卷二说,四品为世友作,四品为迦湿弥罗论师作。在“六足论”中,它是组织得较好的一部书。《品类足论》的异



译本有：刘宋求那跋陀罗、菩提耶舍译的《众事分阿毗昙论》十二卷。

再说“身论”，即《发智论》。

《发智论》，二十卷。唐玄奘译，显庆五年(660)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全书分为《杂蕴》、《结蕴》、《智蕴》、《业蕴》、《大种蕴》、《根蕴》、《定蕴》、《见蕴》，凡八蕴(又称八犍度)。每一蕴又分若干纳息(又译“跋渠”，相当于“章”下面的“节”)，总计四十四纳息。对佛教的义理和名相作了系统的阐述。由于与“六足论”相比较，它所说的法门(佛法之门)最广，故成了有部的代表作。《发智论》的异译本有：苻秦僧伽提婆、竺佛念译的《阿毗昙八犍度论》三十卷。

“一身六足”，大概是有部发展到中期，或者说在迦湿弥罗结集《大毗婆沙论》前后才出现的说法。如果从经典产生的历史顺序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身论”与“六足论”，既不是“身论”在先，“六足论”在后；也不是“六足论”在先，“身论”在后，或者说“一身六足”同时成立。其中的关系颇为复杂。

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一身六足”中，属于有部初期论典的是“六足论”中的《法蕴足论》和《集异门足论》。因为它们都是解释《阿含经》中的古经和古说的。原始论藏就是从释经开始，尔后逐渐进入独立构思的阶段，形成有独特体系的论书的。属于有部中期论典的，依次是：《施設论》、《识身足论》、《发智论》、《界身足论》、《品类足论》。因为《施設论》和《发智论》的作者迦旃延是佛灭后三百年时人，《施設论》所解释的《世记经》，在《阿含经》中也是较晚出现的。《识身足论》的作者提婆设摩，据《大唐西域记》卷五所说是佛灭后一百年时人，而从此论的本文来看，它广破“补特伽罗论师”有关肯定“补特伽罗”(义译我、人我)为实有的观点，显然是针对佛灭后三百年之间从有部分裂出来的犍子部而言的，因而必



在犍子部产生之后。至于《界身足论》和《品类足论》的作者世友，则是佛灭后四百年（一说五百年）时人。而且《品类足论》中的《辩千问品》是以《法蕴足论》为基础撰成的，《辩七事品》又取材于《界身足论》（也有的学者认为，《品类足论》在先，《界身足论》在后，《界身足论》是《品类足论·辩七事品》的节写本）。因此，“六足论”之中，有的成立于《发智论》之前，有的则成立于《发智论》之后。

“一身六足”之后，有部的论典仍有较大的发展。这在中期，主要有：世友等人（一说迦旃延弟子）编辑的《大毗婆沙论》（全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约撰于二世纪中叶）；在后期，主要有：法胜的《阿毗昙心论》（约撰于三世纪初）、法救的《杂阿毗昙心论》（约撰于四世纪初）、世亲的《俱舍论》（全称《阿毗达磨俱舍论》，约撰于四世纪末）。兹分述如下：

1. 《大毗婆沙论》二百卷。唐玄奘译，显庆四年（65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七册）本等。本书相传是在迦腻色迦王支持下举行的迦湿弥罗结集时编成的，但今本已有“昔键驮罗国迦腻色迦王”等语（见卷一百十四），说明在结集以后仍有增修。全书依照《发智论》的体系，分为《杂蕴》、《结蕴》、《智蕴》、《业蕴》、《大种蕴》、《根蕴》、《定蕴》、《见蕴》等八蕴，每一蕴又分若干纳息，对《发智论》的全文作了详细的解说。作者以有部迦湿弥罗师（即东方系，又称东方师，由迦旃延的弟子组成）的见解为正统，广泛搜集并评析了世友、法救（与《杂阿毗昙心论》的作者法救非同一人）、妙音、觉天四大论师以及与迦湿弥罗师相对的键陀罗师（即西方系，又称西方师、外国师、旧阿毗达磨师）的解释，并对正统有部以外的其他佛教派别（如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犍子部、大众部、分别说部、经部）和外道（数论、胜论、顺世论、耆那教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是有部教理的集大成者，也是东方系的代表作。《大毗婆沙论》的节译本有：苻秦僧伽跋澄译的《鞞婆沙论》（又名《杂阿毗昙毗婆



沙论》)十四卷,北凉浮陀跋摩、道泰等译的《阿毗昙毗婆沙论》六十卷。前者相当于《大毗婆沙论》第二编《结蕴》的部分内容;后者相当于《大毗婆沙论》第一编《杂蕴》、第二编《结蕴》、第三编《智蕴》的内容(内缺《智蕴·七圣纳息》的内容)。

2. 《阿毗昙心论》 四卷。东晋僧伽提婆、慧远译,太元九年(384)译出,僧伽提婆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慧远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八册)本等。全书分为《界》、《行》、《业》、《使》、《贤圣》、《智》、《定》、《契经》、《杂》、《论》十品,以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为纲,采用偈颂(间有长行作注)的形式,对有部的教理作了概述。为有部的纲要书,也是西方系的代表作。

3. 《杂阿毗昙心论》 十一卷。刘宋僧伽跋摩等译,元嘉十年(433)译出。僧伽跋摩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八册)本等。全书分为《界》、《行》、《业》、《使》、《贤圣》、《智》、《定》、《修多罗》(即契经)、《杂》、《择》、《论》十一品,撷取《大毗婆沙论》的观点,对《阿毗昙心论》进行增补和修订。与《阿毗昙心论》相比较,品目中增加了《择品》,以集中叙述有部特有的一些主张,如“阿罗汉有退”、“中阴有”、“三世有”、“四谛渐次现观”、“佛不在僧数”等;偈颂从原来的二百五十颂,增至五百九十六颂(一说六百颂);并且增加了大量的长行(散文,相对偈颂的韵文而言)注释。为沟通有部东方系和西方系宗义的著作。除《杂阿毗昙心论》以外,对《阿毗昙心论》作注的,还有高齐那连提耶舍译的《阿毗昙心论经》(又名《法胜阿毗昙心论》,优婆扇多造)六卷。

4. 《俱舍论》 三十卷。唐玄奘译,永徽五年(65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九册)本等。全书由本颂六百颂和长行注解八千颂组成,分为《分别界》、《分别根》、《分别世》、《分别业》、《分别随眠》、《分别贤圣》、《分别智》、《分别定》、《破执我》九品,以《杂



《阿毗昙心论》为基础,广泛吸取《大毗婆沙论》的要义,以及经量部(佛灭后四百年初从有部分出的部派)学说,对有部的教说作了新的归纳、整理、批判和组织。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阿毗达磨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三科”分类的做法,以及《品类足论》中的“五法”之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色法十一种、心法一种、心所法四十六种、心不相应法十四种、无为法三种)。为小乘佛学的教科书。《俱舍论》的异译本有:陈真谛译的《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俱舍论》本颂的单行本,有唐玄奘译的《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一卷。

有部的论书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尚有:瞿沙(意译妙音)的《阿毗昙甘露味论》二卷,曹魏失译。下分十六品,始《布施持戒》,终《杂》(有人说,法胜《阿毗昙心论》是以它为基础写的);尊婆须蜜的《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十卷,苻秦僧伽跋澄等译。下分十四犍度,始《聚》,终《偈》;法救的《五事毗婆沙论》二卷,唐玄奘译。下分《分别色》、《分别心》、《分别心所法》三品(明代智旭《阅藏知津》卷四十认为,“文来未尽”);塞建陀罗(意译悟入)的《入阿毗达磨论》二卷,唐玄奘译。解释五蕴、三无为等义;众贤的《阿毗达磨论顺正理论》(又称《俱舍雹论》、《顺正理论》)八十卷,唐玄奘译。下分八品,始《辩本事》,终《辩定》,为批判《俱舍论》而作;众贤的《阿毗达磨藏显宗论》(略称《显宗论》)四十卷,唐玄奘译。为《顺正理论》的节要本,等等。

(三) 贤胄部·正量部·经部

在上座部系统中,有论典传世的,尚有:贤胄部、正量部和经部。

贤胄部,佛灭后三百年中期从犍子部(有部的分支)分出,因创始人是世贤(音译婆素跋陀),而此部乃是世贤的后代而得名。传

今的论典有世贤的《三法度论》三卷。东晋僧伽提婆译,太元十六年(391)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五册)本等。全书分为三品:《德品》、《恶品》、《依品》。每一品又有三真度(即“健度”)。《德品》分为施、戒、修三真度,《恶品》分恶行、爱、无明三真度,《依品》分阴、界、入三真度,总计九真度。将“四阿含”的义理归纳为德(善)、恶、依(根据)三类,逐层进行了解说。《三法度论》的异译本有:苻秦鸠摩罗佛提等译的《四阿含暮钞》二卷。

正量部(音译三弥底部),约与贤胄部同期从犍子部分出,因自称其说正确无误而得名。传今的论典有《三弥底部论》三卷。三秦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本等。书中对罪福业报,特别是作为生死轮回主体的“补特伽罗”(即“人我”)作了肯定性的论证。

经部(又称经量部),佛灭后四百年初从有部分出,因专重《阿含经》而得名。在小乘十八部中,是最晚出现的一个部派。传今的论典有诃梨跋摩(意译师子铠)的《成实论》。诃梨跋摩是三世纪末叶中印度人,婆罗门种姓。出家后,师事有部论师鸠摩罗多(意译童受),研习《发智论》。因感到有部之学拘泥于名相,烦琐支离,乃自穷三藏,遍探诸部(其他部派的经典),考核比较,撰成了与经部前身“譬喻师”的学说相近的《成实论》十六卷。此论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由鸠摩罗什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本等。全书分为《发聚》、《苦谛聚》、《集谛聚》、《灭谛聚》、《道谛聚》等五聚(即五篇),每一聚又分若干品,总计二百零二品,对有部毗昙学的“人空法有”说进行了破斥,阐述了众生和外界事物都是施设的“假名”,并无独立的实体和确定的性质的“人法二空”的思想。是一部包含某些大乘思想成分的小乘佛学的入门书。



第四节 藏外典籍

藏外典籍,指的是未被正式编入经藏、律藏、论藏之内的一批佛教典籍。它们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当初编纂经律论三藏时就已存在的典籍,只是由于编纂者的疏漏或其他原因,未被编入;二是在三藏的初型确定以后,陆续撰作问世的新的佛教著作。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都有这样一批典籍。只是由于小乘三藏的框架确立较早,藏内和藏外的界限比较分明些,故续出的藏外典籍的数量也比较多;而大乘三藏的框架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确立,待到后来确定时,已经数百年过去了,于是将当时流传于世的大乘佛典,能纳入三藏的都编了进去,未编入大藏的很少。由于这一缘故,小乘佛教的藏外典籍远较大乘佛教的藏外典籍来得多。

南传上座部佛教中的藏外典籍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三藏注疏。收有觉音、法护、近军、佛授、大名等人撰写的律疏二种、经疏十九种、论疏三种,总计二十四种;另一类是纲要书和史传。收有《岛史》、《大史》、《弥兰陀王问经》、《清净道论》等二十五种。

北传佛教中的藏外典籍数目不定。在汉文《大藏经》中,藏外典籍是不按大小乘分类的,通称为“贤圣集传”。下分西土(也作西域)贤圣集传和东土贤圣集传两项。前者收录西域的佛教撰集,后者收录中国汉地的佛教撰集。与印度小乘佛教有关的主要是“西土贤圣集传”。其重要者有:

一、《佛所行赞》 又名《佛所行赞经》、《佛所行赞传》、《佛所行赞经传》、《佛本行赞》等,五卷。马鸣造,北凉昙无讖译,玄始三年(414)至玄始十五年(426)译出。昙无讖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



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册)本等。全书分为二十八品,始《生品》,终《分舍利品》,以五言偈颂的形式,赞述了释迦牟尼的一生。在佛教文学中,它的文辞最为优美。据考证,其思想观点是倾向于说一切有部的。

二、《出曜经》三十卷。法救造,苻秦竺佛念译,建元十九年(38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册)本等。全书分为三十三品,始《无常品》,终《梵志品》。由偈颂及其注释(长行)组成。书中用譬喻(即经名中说的“出曜”)故事的形式,论述人生无常,只有通过修持戒、定、慧,才能得到解脱的理论。《出曜经》的异译本有:吴维祇难等译的《法句经》二卷、西晋法炬和法立合译的《法句譬喻经》四卷、北宋天息灾译的《法集要颂经》四卷。

三、《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喻经》,四卷。僧伽斯那造,萧齐求那毗地(作者的弟子)译,永明十年(492)译出。求那毗地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册)本等。全书共收录佛教譬喻故事九十八则,始《愚人食盐喻》,终《小儿得大龟喻》。论述了善恶罪福、因果报应、道法邪正、戒律持犯等义。

四、《僧伽罗刹所集经》又名《僧伽罗刹所集佛行经》、《僧伽罗刹集经》,三卷。僧伽罗刹(意译众护)造,苻秦僧伽跋澄等译,建元二十年(384)译出。僧伽跋澄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册)本等。书中记叙了佛陀自降生至涅槃的各种事迹。其中,有关佛成道以后四十五年间安居处所的记载,为他书所无,在佛教中堪称珍贵。

五、《修行道地经》八卷。众护造,西晋竺法护译,太康五年(28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五册)本等。全书分为三十品,始《集散品》,终《菩萨品》。主要论述修习佛法的义门。其中,最后三品《弟子三品修行品》、《缘觉品》、《菩萨品》系根据《法华经》义旨而添作的,为先前的后汉安世高译的古本《道地经》(一卷)



所无。

六、《异部宗轮论》一卷。世友造，唐玄奘译，龙朔二年（66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九册）本等。书中以说一切有部的教义为基础，记载了佛灭后一百余年至四百年之间，印度小乘佛教二十部的产生经过，以及各部派教义的异同。为研究部派佛教的必读著作。《异部宗轮论》的异译本有：姚秦失译的《十八部论》一卷、陈真谛译的《部执异论》一卷、唐玄奘译的《异部宗轮论》。

除上述经典以外，传行于世的还有一些署名或不署名的典籍。

需要指出的是，对藏外典籍的界定是相对的、变迁的，并非绝对的、固定的。原先属于藏外典籍中的某些经典，在重新编定三藏时，可以根据它们的体裁和思想内容，新编入藏。这在汉文《大藏经》编纂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第三章 大乘经典的问世

大约在南传佛教所传斯里兰卡阿卢寺结集,与北传佛教所传的迦湿弥罗结集这两次大的结集之间,即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在案达罗王朝统治下的南印度一带(其时,北印度一带为贵霜王朝所统治),出现了新的佛教运动。

这场运动的最初发动者可能是一些不知名的在家的佛教居士(这是根据早期的大乘经常以在家居士为弘法的中心人物推测的)。他们对只追求个人解脱,以冀成为阿罗汉(略称罗汉,指通过修行已达至断尽一切烦恼,超越生死轮回的修行者)的学佛目的,以及说一切有部囿于“三十七道品”和其他名相的细碎训释的学佛方法极为不满,认为这种做法使佛教日趋经院化,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信众。他们憧憬释迦牟尼的崇高品行,并将他超人化、神格化,认为无论是出家的僧人还是在家的居士,首先要实践佛陀的人格,即救世度人的菩萨行(又称“菩萨道”,指释迦牟尼未成佛之前,身为菩萨而做的一切善行),要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救济万物,既要自利(个人获得解脱),更要利他(帮助他人获得解脱)。具体来说,就是实践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内容的“六度”。在积聚了长期的善行功德之后,最后从菩萨上升为佛。为此,不能像传统佛教倡导的那样消极厌世,独善其身,而应当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不离尘世证得菩提(智慧)。针对部派佛教,特别是有部对



佛法的执著,新的佛教运动还提出,不仅人是无自性实体的(即人空、人无我,这是部派佛教也承认的),而且世上的一切事物也是无自性实体的(即法空、法无我,这是部派佛教所不承认的)。佛教的义理和名词概念也是佛陀应机施教的方便法门,是“假名”,同样不能执著。

与此相应的是,小乘佛教(《阿含经》)中的菩萨,只有成佛之前的释迦牟尼和释迦牟尼的弟子弥勒两位。而弥勒在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已入灭,相传要经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才从兜率天宫下降人间,成为绍嗣释迦牟尼佛位的未来佛。而大乘经典中的菩萨和佛,其数犹如恒河中的沙子,多得不可胜数。

这场新的佛教运动,用它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乘”,即能运载无量众生到达彼岸世界(即“涅槃”境界)的大的舟乘,而先前的佛教(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则是“小乘”,即只能运载修行者个人到达彼岸世界的小的舟乘。

虽说“大乘”、“六度”等词在部派佛教所传的经典就已出现,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十五提到“大乘”,《增一阿含经》卷十九提到“六度”,但这只是偶尔使用的词汇罢了,并没有展开而成为完整的学说。研究结果表明,大乘乃是吸收了活动于南印度哥达瓦里河以南、吉斯特那河以北一带(时称“案达罗”)的大众部案达罗派(包括东山部、西山部、王山部、义成山部四部,见印度觉音《论事注》)的一些思想成分,并且博采异闻,融摄世学,加以组织和阐发而建立起来的。它起初流传在印度的南方,以后逐渐扩展到西方、北方,成为遍及印度全境的佛教运动(《大般若经》中的初会《难闻功德品》、第二会《东北方品》,都说大乘《般若经》产生于佛灭后五百年,始兴于东南方,流布于东北方)。这是佛教史上继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大乘佛教的理论载体的大乘经典,和小乘经典一样,也分



为经藏、律藏、论藏和藏外典籍(又称“杂藏”)四大类。

第一节 大乘经

如同大乘和小乘同是佛教学说,但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一样,大乘经和小乘经虽然同属契经,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同。

就经典产生的途径和方式而言,小乘经主要是通过公开结集的方式产生的,至少作为小乘佛教的根本经典的《阿含经》是如此;而大乘经则是通过一批有学识的大乘学者匿名编辑的方式产生的。虽说一些大乘经典也曾提到过大乘经典的结集,如《大智度论》卷一百说,佛灭度后,文殊、弥勒等菩萨,带阿难到铁围山结集摩诃衍(大乘)。《金刚仙论》卷一也说,在铁围山外、二界中间,结集大乘法藏,故大乘结集也称为“铁围山结集”。但这恐怕是出于与部派佛教发出的“大乘非佛说”的质难相抗衡的需要而托称的,如果从史实方面考察的话,可信的成分很少。

就说经的中心人物而言,小乘经中大多是释迦牟尼,有时是他的弟子;而大乘经中则是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诸佛和众菩萨,这中间既有释迦牟尼,也有阿閼佛(东方妙喜世界之佛)、药师佛(东方净琉璃世界之佛)、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之佛)、文殊菩萨(释迦牟尼的左侍者)、普贤菩萨(释迦牟尼的右侍者)、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的左侍者)、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侍者)、日光菩萨(药师佛的左侍者)、月光菩萨(药师佛的右侍者)、地藏菩萨(释迦牟尼入灭以后、弥勒佛下生之前,救度众生的菩萨)等等。

就经典的表述形式而言,小乘经多为释迦牟尼的言行实录,虽



然其中不无构饰的成分,但经中叙及释迦牟尼经行的地点、随从的弟子、接触的人物、说法的对象和经过,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当时发生的政治事变等等,大多是以事实为基础敷演的。语言朴质无华。一经之末也每每以听闻者“欢喜奉行”的语句自然结束;而大乘经多用浪漫的文学描写法,对说法的佛菩萨、与会的天人、盛大的法会场面等极力渲染铺张,情节奇谲,语言绮丽。经末往往有“嘱累品”(或“流通品”),专讲此经在佛教中的殊胜地位,以及受持、讽诵、述解、书写它的种种功德。还有一些大乘经虽然名为“经”,但却是按照论书的体裁组织的,通篇是义理的推演和名相的剖析。

至于大乘经与小乘经在思想内容上的差异就更大了,这在以下的介绍可以看到。

一、初期大乘经

由于古印度邦国林立,王朝迭起,统一的时间短而分裂的时间长,再加上传统观念是重思辨而轻历史,因此,王朝没有系谱,朝代缺乏年号,专门的史书寥若晨星。这种情况同样也影响到从不标署成书年月的佛教经典,特别是大乘经的成立年代的确定。在我国古代,佛教学者通常是通过“判教”的方法,即对佛教各类学说的性质、意义和地位作出判定的方法,对佛典成立的先后顺序作出判断的。例如,刘宋道场寺沙门慧观,曾把佛说的全部经教分为顿教和渐教两大类。顿教,指的是顿悟成佛的教法,即只为菩萨显示圆满教理的《华严经》。渐教,指的是渐悟成佛的教法,分为五时:(一)三乘别教,指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分别开示的教法,其中包括小乘的《阿含经》。(二)三乘通教,指为三乘通说的教法,即



《般若经》。(三)抑扬教,指赞扬大乘、压抑小乘的教法,即《维摩》、《思益》等经。(四)同归教,指将三乘导归于佛乘的教法,即《法华经》。(五)常住教,指演说涅槃境界常住不灭的教法,即《涅槃经》。此为“二教五时”说(参见隋吉藏《三论玄义》卷上)。南北朝时的佛教学派和隋唐时的佛教宗派也各有自己的判教,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三论宗的“二藏三法轮”说、法相宗的“三时教”说、律宗的“二教”说、华严宗的“五教十宗”说、净土宗的“二门”说。

近代学者则进一步从大乘佛教的第一个著名学者龙树(150—250)在《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中引用的一些大乘经的名称;中国早期译经(尤其是后汉支谶译经)所出的大乘经;大乘经中悬记的后代论师以及印度王臣的名字;大乘经中的引文、用语及内容等方面,去考察大乘经的成立年代。经研究,意见比较一致的初期大乘经,主要有:《般若经》(包括《小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金刚经》、《心经》等)、《宝积经》(包括《摩尼宝经》、《阿閼佛国经》、《无量寿经》)、《弥勒成佛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些经典在龙树以前就已具备初型,并且在龙树时代广为流传。

(一)《大般若经》 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唐玄奘译,显庆五年(660)到龙朔三年(66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册至第七册)本等。本经为般若类经典的丛书。“般若”为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六度”中最重要的一度,是一切大乘修行法门赖以滋生的本母。因此,在所有大乘经中,般若类经典成立的年代也最早,起初是一些单本(小经),如《小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以后才逐渐汇编成丛书,形成《大般若经》。因此,就《大般若经》本身而言,它成立于大乘佛教发展的中期,属于中期大乘经。但就它收录的经典而言,有些则为早期大乘经。为着叙述上的方便,故先叙大部(《大般若经》),后叙小经(《小品般若经》等)。



《大般若经》的梵本有二十万颂，汉译本分为十六会。其中，初会下分七十九品，第二会下分八十五品，第三会下分三十一品，第四会下分二十九品，第五会下分二十四品，第六会下分十七品，第七会为曼殊室利分，第八会为那伽室利分，第九会为能断金刚分，第十会为般若理趣分，第十一会为布施波罗蜜多分，第十二会为净戒波罗蜜多分，第十三会为安忍波罗蜜多分，第十四会为精进波罗蜜多分，第十五会为静虑波罗蜜多分，第十六会为般若波罗蜜多分。前五会为根本般若，有关《大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在这五会中都有了；后十一会为杂部般若，为基本思想的补充、阐发和推演，其中第十一会至第十六会是重述大乘“六度”，“波罗蜜多”即为“度”的音译。全经主要论述了一切事物和现象（一切法）性相（自性和相状）皆空的思想。认为，在“六波罗蜜多”中，“般若波罗蜜多”这一法门最胜最大，其他五种法门皆摄入此中。而般若法门的核心是“空”，即一切诸法如梦幻泡影，无有自性，不生不灭，不一不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虚幻不实（空）的。只有无取无舍，无执无著，一无所得，方能证得正觉。显然，这些都是针对小乘，特别是有部的“诸法实有”说而发的。经中有关对“大乘甚深经典非佛所说，亦非如来弟子所说”的议论的批驳（见初会《不退转品》、第二会《转不转品》、第五会《不退品》），也是当时大、小乘激烈争斗的一个反映。

（二）《小品般若经》又名《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小品经》，十卷（一作七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十年（408）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八册）本等。本经是成立最早的般若经之一。它的梵本有八千颂，故又称《八千颂般若》。其内容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四会。全经分为二十九品，始《初品》，终《嘱累品》。经中主要论述了“色”（事物）即是“空”（虚幻），“空”即是“色”的诸法实相观。它的异译本有：后汉支娄迦谶译的《道行般若经》十卷、吴支谦译的



《大明度经》六卷、苻秦昙摩蜚与竺佛念译的《摩诃般若钞经》五卷等。

(三)《大品般若经》又名《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经》，二十七卷(一作二十四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六年(40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八册)本等。《大品般若》的梵本有二万五千颂，故又称《二万五千颂般若》。其内容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二会。据考证，是以《小品般若》为基础增广而成的。全经分为九十品，始《序品》，终《嘱累品》。经中主要论述了般若空观以及信解般若的功德。它的异译本有：西晋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十卷、无罗叉等译的《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等。

(四)《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六年(40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八册)本等。《金刚经》的梵本有三百颂，其内容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九会。经中主要论述了诸法性空幻有的理论，是般若类经典中的纲要书。它的异译本有：北魏菩提流支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陈真谛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隋达摩笈多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唐玄奘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义净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

(五)《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八册)本等。本经在《大般若经》中没有相对应的会或品，但它却是根据《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所述的义理编成的，因而也是早期的般若经。全经共二百六十字，主要论述了诸法实相即是“空”相的理论，以及受持此经的功德。作为般若学最著名的命题“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语即出自本经。它的异译本有：姚秦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一卷、唐法月译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般若等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智慧轮译的《般若波罗



蜜多心经》一卷、法成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北宋施护译的《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等。

(六)《华严经》 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华严类经典的丛书。它的性质与《大般若经》相近，也是在汇集一些原先单独流传的大乘经，如《十地经》、《入法界品》等基础上，逐渐增广而成的，非一时一地之作。本经有新旧两译，经名相同。旧译为六十卷，世称《六十华严》、《晋译华严》，由东晋佛驮跋陀罗于义熙十四年(418)至刘宋永初二年(421)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九册)本等。它的梵本有三万六千偈(与“颂”同义)。全经按如来和普贤菩萨等在七处八会(七个地方的八次集会)上说法的内容组织，下分三十四品，始《世间净眼品》，终《入法界品》；新译为八十卷，世称《八十华严》、《唐译华严》。由唐实叉难陀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至圣历二年(699)译出。实叉难陀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册)本等。它的梵本有四万五千偈。全经分为七处九会(较旧译多《三重会普光法堂》一会)，凡三十九品：

1. 寂灭道场会。下分六品，始《世主妙严品》，终《毗卢遮那品》。
2. 普光法堂会。下分六品，始《如来名号品》，终《贤首品》。
3. 切利天宫会。下分六品，始《升须弥山顶品》，终《明法品》。
4. 夜摩天宫会。下分四品，始《升夜摩天宫品》，终《十无尽藏品》。
5. 兜率天宫会。下分三品，始《升兜率天宫品》，终《十回向品》。
6. 他化天宫会。只有《十地品》一品。
7. 重会普光法堂。下分十一品，始《十定品》，终《如来出现品》。
8. 三重会普光法堂。只有《离世间品》一品。
9. 逝多园林会。只有《入法界品》一品(《华严经》新旧译中的《入法界品》均有缺文，后由唐代法藏根据地婆诃罗所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中的文字加以增补)。经中主要论述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义理圆融无碍(“一人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理论，“三界所有，唯是一心”的净



心缘起观,以及按十个阶位(十信、十住、……)依次修行的成佛方法。

(七)《十地经》又名《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西晋竺法护译,元康七年(29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册)本等。本经是龙树《大智度论》中提及的早期大乘经之一,其内容相当于《八十华严》第六会“他化天官会”中的《十地品》。全经分为十品,始《初发意悦豫住品》,终《金刚藏问菩萨住品》,主要论述了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它的异译本有: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十住经》四卷、唐尸罗达摩译的《十地经》九卷。

(八)《入法界品》又名《罗摩伽经》,三卷。西秦圣坚译,太初(386—394)年间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册)本等。本经也是《华严经》中成立最古的成分之一,其内容相当于《八十华严》第九会“逝多园林会”中的《入法界品》。经中通过善财童子南行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有德行才学的人)的故事,论述了如何证入如来不可思议境界的问题。它的异译本有:唐地婆诃罗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一卷、般若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四十卷(又名《四十华严》,在《入法界品》的基础上作大幅度增广而成)。

(九)《兜沙经》一卷。后汉支娄迦谶,建和元年(147)至中平三年(18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册)本等。本经从翻译年代来推算,其形成的时间也是较早的。其内容相当于《八十华严》第二会“普光法堂会”中的《如来名号品》和《光明觉品》。主要论述了十方成佛的思想。

(十)《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七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八年(40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九册)本等。本经也是《大智度论》曾经引用过的经典,它的梵本近代在尼泊尔、克什米尔和我国新疆、西藏等地均有发现,数量达四十多种。梵本有六



千偈。全经分为二十八品,始《序品》,终《普贤菩萨劝发品》,主要论述了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同归于佛乘,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理论,以及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和受持此经的功德。它的异译本有:西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十卷、隋阇那崛多译的《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散品别译本有:西晋失译的《萨县分陀利经》一卷(内容相当于《法华经》中《见宝塔品》的一部分和《提婆达多品》)。

(十一)《维摩经》 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八年(40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四册)本等。全经分为十四品,始《佛国品》,终《嘱累品》,通过对毗耶离(即“吠舍离”)城维摩诘居士的言语行事的记叙,论述了空有不二的菩萨行。经中针对小乘佛教脱离世俗生活,闭门修行,以求解脱的偏向,提出,只要身处尘世而心超凡俗,居家也能成佛,涅槃境界就在世俗生活之中。展示了大乘佛教强调在家修行的理论特色。它的异译本有:孙吴支谦译的《维摩诘说不思议法门经》二卷、唐玄奘译的《佛说无垢称经》六卷。

(十二)《大宝积经》 一百二十卷。唐菩提流志译,神龙二年(706)至先天二年(713)译出。菩提流志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一册)本等。本经为早、中期大乘经的汇编,经名中的“宝积”,意为“法宝之聚积”。汉译本分为四十九会,始《三律仪会》,终《广博仙人会》。其中有二十三会用的是西晋至唐代作为独立的经典行世的旧经,只有二十六会是菩提流志新译的。而在属于新译的二十六会中,又有十五会是参考内容相同的旧经的单行本重译的,故真正属于初译的只有十一会。所收各会中,既有般若类经典、本生类经典、戒律类经典、净土类经典,也有秘密类经典,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大乘佛教的各种法门,论述了自利利他的菩萨行。英国渥德尔在《印度佛教史》中根据南传上座部的传说,认为《大宝积经》是案达罗的部派佛教编撰的,其



中《护国天王所问经》为东山住部的作品。而日本编的《大藏经索引·收录典籍解题》则认为,“包括四十九种经典的《大宝积经》之集大成,曾存在于印度之说是令人怀疑的了。”也就是说,在印度只有作为内容相当于《大宝积经》各会的单行经,而不一定有这部包罗四十九种经典的丛书的梵本。

(十三)《摩尼宝经》又名《佛说遗日摩尼宝经》、小本《宝积经》、古本《宝积经》,一卷。后汉支娄迦讖译,建和元年(147)至中平三年(18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二册)本等。本经是《大宝积经》中成立年代最古的一部经。龙树在《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引用的《宝顶经·迦叶品》,指的便是它。经中主要论述了非空非有的“中道实相正观”。它的异译本有:晋代失译的《摩诃衍宝严经》(又名《大宝积经》、小本《大宝积经》)一卷、北宋施护译的《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一卷。菩提流志对失译的那部小本《大宝积经》进行重译,取名为《普明菩萨会》,将它编为大本《大宝积经》第四十三会。

(十四)《阿閼佛国经》二卷。后汉支娄迦讖译,建和元年(14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一册)本等。本经也是《大宝积经》中成立年代较古的经典之一。全经分为五品:《发意受慧品》、《阿閼佛刹善快品》、《弟子学成品》、《诸菩萨学成品》、《佛般泥洹品》。主要记叙了阿閼佛的行愿功德,以及所居东方妙喜世界的种种庄严。后来,菩提流志对它进行了重译,编为《大宝积经》第六会《不动如来会》。所说的“不动如来”,即是阿閼佛。

(十五)《无量寿经》二卷。曹魏康僧铠译,嘉平四年(252)译出。康僧铠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二册)本等。本经系根据大乘佛教关于“十方佛土”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净土类经典,也是龙树《十住毗婆沙论》引用的早期大乘经之一。经中主要叙述了过去世法藏菩萨经过累劫修行而成为



无量寿佛(又译阿弥陀佛)的经过,以及所居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胜妙。后来,菩提流志对它进行了重译,编为《大宝积经》第五会《无量寿如来会》。与本经性质相同的经典有刘宋罽良耶舍于元嘉年间(424—442)译的《观无量寿佛经》一卷(主要论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六观门)、姚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的《阿弥陀经》一卷(主要论述持念阿弥陀佛名号以求往生的修行方法),后世将它们合称为“净土三经”。它的异译本有:孙吴支谦译的《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一卷、北宋法贤译的《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三卷。

(十六)《弥勒成佛经》又名《弥勒大成佛经》,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四年(40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四册)本等。经中主要记叙了弥勒菩萨出世的时代、所居的兜率天宫的情况,以及下降人间成佛的经过。它与晋代失译的《弥勒来时经》、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弥勒下生经》、唐义净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此三本均为同本异译)、刘宋沮渠京声译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宫经》各一卷,合称“弥勒五部经”(也有的将《增一阿含经》卷四十四的别生经、误题为“西晋竺法护译”的《弥勒下生经》一卷,连前合称“弥勒六部经”)。在这些弥勒类经典中,以本经的叙事为最完整。

(十七)《般舟三昧经》三卷。后汉支娄迦谿译,光和二年(17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三册)本等。经名中的“般舟”意为“佛立”,“三昧”意为“禅定”。小乘佛教中的禅定,为戒、定、慧三学中的“定学”。而大乘佛教中的禅定,则往往与般若空观、净土往生相联系。本经下分十六品,始《问事品》,终《佛印品》。经中主要论述了专心念佛,佛即能现于眼前的大乘禅法。它的异译本有:后汉失译的《拔陂菩萨经》一卷、隋阇那崛多等译的《大方等大集贤护经》五卷。

(十八)《首楞严三昧经》又名《首楞严经》。姚秦鸠摩罗什



译,弘始四年(402)至弘始十四年(41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五册)本等。经中主要论述了首楞严(意为“健行”)三昧在菩萨修行的十个阶次(十地)中的意义与作用。

二、中期大乘经

中期大乘经,指的是龙树以后、世亲(320—400)之前出现的大乘经。时间约当于公元三世纪中叶至四世纪末叶。在这一时期,初期大乘经经过理论的积累,有了进一步的增广,具体表现为出现了一些内容相近的同类经和对初期大乘经的某一方面(或观点)作深入阐述的派生经,以及将若干种小经按一定的次序编集成丛书的大部。同时,还涌现了一些宣传新教理(而这些教理与初期大乘经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地方甚至相反)的新经。虽说初期大乘经所论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如果要寻找名词概念的话,全部佛教术语的十之七八都已使用了,但就整体而言,乃是论证世间和出世间的、物质(色)的和精神(心)的、客体(境、所)和主体(识、能)的一切东西都是没有质的规定性(自性)的般若空观。因此,它们反对对一切事物和现象作肯定的理解,这中间也包括将人的意识、表达意识内容的语言文字以及与之相关的义理名相实在化。而中期大乘经中的一些经典,则认为反对部派佛教执著诸法实有的任务已经完成,因而把理论的重点,从“空”转向“有”,从以否定为主,转向在继续否定客体的基础上进而以肯定主体为主。从而形成了把人的心性和识体实在化的新学说。

体现中期大乘经新特质的契经,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如来藏系,二是阿赖耶识系。所说的“如来藏”,指一切众生都含有成为如来(佛)的清净本体,它与真如、佛性等同义。“阿赖耶识”,又译



“阿梨耶识”，意译藏识、种子识、异熟识等。在《解深密经》中为继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以后的第七识，与阿陀那识（意译“执持识”）同义；而在《楞伽经》中则立“末那识”为第七识，阿赖耶识为第八识。但在两经中，阿赖耶识均为制约整个意识活动并且变现外部事物的根本识体。属于如来藏系的经典主要有：《大方等如来藏经》、《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不增不减经》、《无上依经》、《胜鬘经》、《大般涅槃经》等；属于阿赖耶识系的经典主要有：《解深密经》、《楞伽经》、《大乘密严经》等。不属于这两个系统的，尚有《大集经》、《思益经》、《金光明经》等。

（一）如来藏系

1. 《大方等如来藏经》 又名《如来藏经》，一卷。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元熙二年（420）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经中通过九种譬喻：萎花中佛、岩树蜂蜜、桢中粳梁、不净处金、贫家宝藏、庵罗果种、弊物中金像、贫女贵胎、模中金像，论述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即佛的潜在体的理论。它的异译本有：唐不空译的《大方广如来藏经》一卷。

2. 《大法鼓经》 二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元嘉十二年（435）至元嘉三十年（453）译出。通行本《大正藏》（第九册）本等。经中主要论述了如来常住、一乘（佛乘）真实的理论。说如来在世时的境界即是“常乐我净”（指佛的法身常住不变、永处大乐、自在无碍、湛然清静）的理想境界，不必要到灭度（去世）以后方才如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此，没有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只有一乘（佛）。一切阐述般若空观的经典（空经）都是不彻底的有余说，唯有本经所明的道理，才是无上说（最完备的学说）。经中使用了《法华经》中的化城、穷子等譬喻，因而可以看作是在《法华经》的影响下产生的肯定“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为实有的“有经”。



3. 《央掘魔罗经》 四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元嘉十二年(435)至元嘉三十年(453)译出。通行本《大正藏》(第二册)本等。经名说的“央掘魔罗”是佛陀时代的凶贼。他受邪师摩尼跋陀罗的教唆,欲杀一千人,各取一指作鬘(串起来的花环),以成就婆罗门之道。在杀了九百九十九人之后,还想杀其母以成足数。在佛陀的劝化下,他改过忏悔,成为佛弟子。《杂阿含经》卷三十八、《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单行本则为西晋竺法护译的《鸯崛摩经》、法炬译的《鸯崛髻经》各一卷,以及巴利文《中部》第八十六经均载有此事。《央掘魔罗经》则是在小乘佛教中有关央掘魔罗事迹的基础上,增入大乘思想内容演化而成的。经中主要论述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女有佛藏,男亦如是”,解脱是不空的,如来也是不空的理论。有关本经的性质,日本《大正藏》认为属小乘阿含部;但我国古代以来,普遍视它为大乘经(见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二、北宋王古《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五、明智旭《阅藏知津》卷六等)。

4. 《不增不减经》 一卷。北魏菩提流支译,正光六年(525)译出。菩提流支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经中主要论述了在生死轮回中的众生的法界(亦即法性、众生界)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理论。认为,众生的心性本身是圆满清净的,不清净的只是粘附在心性上的客尘(烦恼、爱欲等),如来藏是不可思议的、无差别的。本经的上述观点后来在印度坚慧的《究竟一乘分别论》(一说弥勒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5. 《无上依经》 二卷。梁真谛译,永定元年(55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下分七品:《校量功德品》、《如来界品》、《菩提品》、《如来功德品》、《如来事品》、《赞叹品》、《嘱累品》。经中主要论述了如来的法界(亦即佛性、如来界),就是众生的法界(众生界),只要出离烦恼,洗除垢秽,众生便能成佛的理论。



它的异译本有：后汉失译的《未曾有经》一卷、唐玄奘译的《甚希有经》一卷。

6. 《胜鬘经》 全称《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经》，一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元嘉十三年（43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二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中印度拘萨罗国波斯匿王的女儿胜鬘，在父母的影响下，闻法见佛，皈依、受戒、发愿的经过，以及人人皆有如来藏，如来正是依据这一正因，而成为如来的理论。认为，“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因烦恼污染而显现的客尘是空的，而为客尘障蔽的“自性清净心”（即如来藏）则是不空的。本经后由唐菩提流志重译，编为《大宝积经》第四十八会《胜鬘夫人会》。

7. 《大般涅槃经》 略称《涅槃经》，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经中的《涅槃经》，有西晋白法祖译的《佛般泥洹经》二卷、东晋法显译的《大般涅槃经》（又名《方等泥洹经》）三卷、东晋失译的《般泥洹经》二卷，它们都是《长阿含经》卷二至卷四收录的《游行经》的异译。大乘经中的《涅槃经》，其汉译全本有南北二本。北本指的是北凉玄始十年（421）昙无讖译的《大般涅槃经》四十卷。昙无讖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二册）本等。此本下分十三品：《寿命品》、《金刚身品》、《名字功德品》、《如来性品》、《一切大众所问品》、《现病品》、《圣行品》、《梵行品》、《婴儿行品》、《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师子吼菩萨品》、《迦叶菩萨品》、《桥陈如品》。南本指的是刘宋元嘉（424—443）年间，慧严、慧观等人对照东晋法显和佛驮跋陀罗于义熙十三年（417）译的《大般泥洹经》六卷，对北本进行修订而改译成的《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二册）本等。此本下分二十五品，始《序品》，终《桥陈如品》。南北二本《涅槃经》虽然卷数、品目和文句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基本思想则是一致的。

小乘《涅槃经》和大乘《涅槃经》虽然都是以释迦牟尼佛八十岁



时入灭(涅槃、泥洹)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展开的。但小乘《涅槃经》着重于事实的记录,于中保存了释迦牟尼佛晚年活动和教说的许多珍贵的资料,而大乘《涅槃经》则偏重于理论的推演,着力于佛陀法身(以理法为本体的精神身)的永恒性和佛性的普遍性的阐述。北本《大般涅槃经》说,在娑罗双树中间示灭的释迦牟尼的身子乃是佛陀的应化身,而他的法身则是常住不灭的。一切众生都具有同一的佛性,因而都能成佛,即便是断绝了一切善根的人(“一阐提”)也不例外。大乘《涅槃经》的异译有:西晋竺法护译的《方等般泥洹经》二卷、东晋法显等译的《大般泥洹经》六卷、隋阇那崛多译的《四童子三昧经》三卷、唐若那跋陀罗译的《大般涅槃经后分》二卷(成立最晚)。

(二) 阿赖耶识系

1. 《解深密经》 五卷。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一年(64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下分八品:《序品》、《胜义谛相品》、《心意识相品》、《一切法相品》、《无自性相品》、《分别瑜伽品》、《地波罗蜜多品》、《如来成所作事品》。经中主要论述了阿赖耶识缘起。认为,阿赖耶识是生死轮回的主体,引发和显现一切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的终极原因和依据。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经中还提出了有名的“三性”(又称三相、三性相)说。认为一切存在的本性和形态(即性相),可以依据不同的认识,分为三种:(1)遍计所执性(又称虚妄分别相),指计执一切事物为各有自性差别的实体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相状。(2)依他起性(又称因缘相),指把一切事物看作是“缘合则生,缘尽则灭”的幻有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相状。(3)圆成实性(又称真实相),指在依他起性的基础上,把一切事物看作是由同一的平等的真实体性(真如)所派生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相状。“三性”归结到根本都离不开,阿



赖耶识就是“心”。此外，经中还广泛地讨论了三无性（相无性、生无性、胜义无性）、十波罗蜜多（在六度的基础上增加方便、愿、力、智而成）、三时教以及唯识止观（禅定）等问题。它的异译本有：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一卷、北魏菩提流支译的《深密解脱经》五卷、陈真谛译的《解节经》一卷。

2. 《楞伽经》 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元嘉二十年（44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经名中的“楞伽”，乃是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东南部的高山（见《大唐西域记》卷十一），“阿跋多罗”，意为“入”。经中通行佛陀在楞伽山答大慧菩萨所问的方式，论述了五法（相、名、妄想、如如、正智）、三自性（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八识、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四种禅（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如来禅）等义。经中对《解深密经》的主要之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同时，也吸取了属于如来藏系经典的《央掘魔罗》、《胜鬘》、《涅槃》等经的一些理论。认为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识”，两者是同一个实体。因而具有调和如来藏系与阿赖耶识系经典在学说上的歧异的倾向。它的异译本有：北魏菩提流支译的《入楞伽经》十卷、唐实叉难陀译的《大乘入楞伽经》七卷。

3. 《大乘密严经》 三卷。唐地婆诃罗译，仪凤元年（676）至垂拱四年（688）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全经分为八品：《密严会品》、《妙身生品》、《胎生品》、《显示自作品》、《分别观行品》、《阿赖耶建立品》、《自识境界品》、《阿赖耶微密品》。主要论述了诸法性空，从心而起，世间万有皆由阿赖耶识造作等理论。由于本经引用了《楞伽经》的一些观点，因此，它的成立要晚于《楞伽经》，并与《楞伽经》存在着学说上的继承关系。它的异译本有：唐不空译的《大乘密严经》三卷。

(三) 其他

1. 《大集经》 全称《大方等大集经》。原作三十卷,后作六十卷。北凉县无谶译,玄始十年(421)至玄始十五年(42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三册)本等。县无谶译的三十卷本下分十二品分:《瓔珞品》、《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宝女品》、《不昞菩萨品》、《海慧菩萨品》、《无言菩萨品》、《不可说菩萨品》、《虚空藏菩萨品》、《宝幢分》、《虚空目分》、《宝髻菩萨品》、《日密分》。经中主要论述了菩萨戒、三昧、六度、陀罗尼(咒语)等菩萨行法。传今的六十卷本系隋代僧就增补的。僧就将刘宋智严等译的《无尽意菩萨经》改名为《无尽意菩萨品》;将那连提耶舍在隋代译的《大乘大方等日藏经》改名为《日藏分》(相当于《日密分》的译本)、在高齐译的《大方等大集月藏经》改名为《月藏分》、同译的《大乘大集经大集须弥藏经》改名为《须弥藏分》;将后汉安世高译的《明度五十校计经》改名为《十方菩萨品》,编入县无谶译本之中,并将《无尽意菩萨品》编在《日密分》之前,从而构成了六十卷本,但仍题“县无谶译”。县无谶译的《大集经》三十卷,作为有十二品分的整部经典而言,约成于四世纪末,但收入其中的一些品分,作为独立的经典在印度、西域的流传则要早些。西晋竺法护译的《大哀经》八卷、《宝女所问经》四卷、《无言童子经》二卷,就是《大集经》中《瓔珞品》与《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二品、《宝女品》、《无言菩萨品》的异译;印度世亲造、东魏毗目智仙译的《宝髻菩萨四法经论》四卷,也是解释《大集经》中的《宝髻菩萨品》(此品原为单行经,后来既被编入《大集经》,又被编为《大宝积经》第四十七会《宝髻菩萨会》)的;另外,近世在新疆一带也发现了《大集经·宝幢分》的一些梵文片断。

2. 《思益经》 全名为《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四年(40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五册)本等。



下分十八品,始《序品》,终《嘱累品》,通过佛答思益梵天(又称思益菩萨)、网明菩萨等所问的方式,论述了大乘六度、涅槃性空等义。经中多处强调,“于毁于誉,心无增减”,“闻善闻恶,心无分别”,“闻三恶道,亦勿惊畏”,“一切法无说无示,无有护念”等,可以看作是针对当时外部环境对大乘佛教的压力而发的。印度世亲造、北魏菩提流支译的《胜思惟梵天所问经论》便是解释此经的前几品的。它的异译本有:西晋竺法护译的《持心梵天所问经》四卷、北魏菩提流支译的《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六卷。

3.《金光明经》 北凉昙无讖译,玄始十年(421)至玄始十五年(42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六册)本等。全经分为十八品,始《序品》,终《嘱累品》。主要论述了三身(佛陀的化身、应身、法身)、十地、忏法(又称金光明忏法)、净地陀罗尼、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护国功德等义。它的异译本有:唐义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等。此外,还有隋宝贵合昙无讖译的《合部金光明经》八卷。它是在昙无讖译的四卷本、北周耶舍崛多译的五卷本(已佚)、梁真谛译的七卷本(已佚)的基础上,新增《嘱累品》和《银主陀罗尼品》,汇编而成的综合本。

三、后期大乘经

后期大乘经,主要是密教经典。有关这一类经典的情况,将在下章中叙述。



第二节 大乘律

大乘律,又称大乘戒、菩萨戒,它与小乘律比较,无论在构成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小乘律是在小乘经之外别部独行的一类经典。这从第一次集结时诵出律藏,到以后形成各部派自己的律典,都是如此。而大乘律原是大乘经和大乘论的一部分,只是到了大乘佛教的中期,为了与小乘三藏相对应,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出家的与在家的大乘人的修持要求,才将大乘经和大乘论中有关大乘律仪(又称大乘戒行)方面的内容抽出,编集成单部的律典,这样的律典积聚多了,才形成律藏(见明智旭《阅藏知津》卷三十二)。

小乘律基本上都是按“五篇七聚”,即五等罪行的七项罪名编制的,在体例上与契经相异,因而在取名时,也清清楚楚地标以“律”的字样,而大乘律由于原来是经或论,故它是按经或论的体例组织的,书名也仍然以“经”相称。

另外,小乘三藏是在印度编集的,故汉文《大藏经》中的小乘三藏都有与之相应的巴利文三藏可参照,而大乘三藏中的单部经典虽然出自印度或西域,但将它们编为经、律、论三大类,则在中国(自隋代法经等编的《众经目录》而始)。故就经典的总汇而言,无论大乘经藏、论藏还是律藏,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梵文或巴利文的大乘三藏可对勘。

收入汉文《大藏经》中的大乘律因编集者对经典的理解不尽相同,故部卷总数有多有少,一般有二三十部,这与小乘律藏一般收有五六十部经典相比,要少了一半。大乘律中较有影响的经典是《梵网经》、《菩萨瓔珞本业经》、《菩萨戒本》和《优婆塞戒经》。虽



然,它们所述的重点都是菩萨戒(即大乘戒),但前二经中的菩萨戒,乃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受持的顿受戒,而不论原先是否受过七众戒(沙弥戒、沙弥尼戒、式叉摩那戒、比丘戒、比丘尼戒、优婆塞戒、优婆夷戒),而在后二经中的菩萨戒,乃是在受持七众戒中某一类戒之后,方能受持的渐次戒。这四部经典按所述的具体的戒法而分,可以归为三类:梵网类、瑜伽类和优婆塞类。

一、梵网类戒本

属于这一类的经典主要有《梵网经》、《菩萨瓔珞本业经》。

(一)《梵网经》 又名《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梵网菩萨戒本》、《梵网菩萨戒经》,二卷。旧题姚秦鸠摩罗什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四册)本等。相传《梵网经》的全本有一百二十卷六十一品,汉译本仅为全本中的序和第十品。本经卷上,说菩萨修道的阶位,凡有四十法门,即坚信忍中的十种发趣心、坚法忍中的十种长养心、坚修忍中的十种金刚心、坚圣忍中的十地(始“体性平等地”,终“入佛界地”);卷下,说菩萨的戒相(具体的戒律条文),凡有十重戒(又称十波罗提木叉)四十八轻戒。十重戒,指的是:1. 杀戒; 2. 盗戒; 3. 淫戒; 4. 妄语戒; 5. 酤酒(卖酒)戒; 6. 说四众过戒; 7. 自赞毁他戒; 8. 悭惜财法戒(又称悭惜加毁戒); 9. 瞋不受悔戒(又称瞋心不受悔戒); 10. 毁谤三宝戒(又称谤三宝戒)。四十八轻戒,指的是不敬师友戒,乃至自坏内法戒,据经文所云,是根据梵文的广本《梵网经》中的《六度品》、《灭罪品》、《制戒品》、《梵坛品》等所说概括的。

《梵网经》作为菩萨戒的主要经本,自隋代以来,在中国乃至日本极为流行,历代注疏见存的就有九十多种,已佚的更不知其数。



然而,由于此经的梵本一直没有发现,它的藏文是根据汉文本转译的;此经的上卷,文字艰奥,卒难明解,与鸠摩罗什译本的流畅的风格非为同类;未署名的《梵网经序》和托名“僧肇作”的《梵网经序》,也是根据未详作者的《菩萨波罗提木叉后记》(收入梁代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改写的。故隋法经等编的《众经目录》卷五曾将它列入“众律疑惑”类,称“诸家旧录多人疑品”。近世以来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同的观点。

但另外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此经非伪。他们说,此经下卷的内容与《菩萨波罗提木叉后记》所说的“菩萨十戒四十八轻”相符,可知是鸠摩罗什诵出,弟子抄录;上卷虽非鸠摩罗什所译,但它说的十发趣心、十长养心、十金刚心、十地等,与唐代不空译出《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略称《千钵经》)十卷中的第七卷后部分至第九卷,即《三贤菩萨入法位次第修行退向菩提品》的后部分和《十圣菩萨入地等妙二位修学进趣圣道成佛菩提品》的前部分义旨全同,可知《梵网经》的上卷也是有梵本的,并非杜撰的。

(二)《菩萨瓔珞本业经》 略称《菩萨瓔珞本业经》、《瓔珞经》,二卷。旧题姚秦竺佛念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四册)本等。全经分为八品:《集众品》、《贤圣名字品》、《贤圣学观品》、《释义品》、《佛母品》、《因果品》、《大众受学品》、《集散品》。经中主要阐述了菩萨十重戒(无四十八轻戒)的内容,以及受戒方法(此为《梵网经》所无)等。由于此经的义旨与《梵网经》大致相同,故也有人将这部在《梵网经》影响下产生的经典视为伪经的。此事尚无定论。



二、瑜伽类戒本

属于这一类的经典有《菩萨戒本》。

《菩萨戒本》的同本异译,今存的凡有四本,它们均出有《瑜伽师地论》中的《本地分·菩萨地·戒品》,故又称《瑜伽戒本》。不过,《瑜伽师地论》的梵文全本是唐代玄奘在印度取经时求获并带回国内译出的,在此之前,中国流传的均为《瑜伽师地论》部分内容的译本。其中,含有《菩萨戒本》的内容的,乃是北凉昙无讖译的《菩萨地持经》十卷和刘宋求那跋摩译的《菩萨善戒经》九卷。它们都是《瑜伽师地论》中《本地分·菩萨地》的异译。因此,今存的《菩萨戒本》,有的是根据《菩萨地持经》、《菩萨善戒经》录出的,也有的是根据《瑜伽师地论》录出的。由于各本依据的梵文原本各不相同,译者的理解和译法也不尽相同,故各本在详略、轻重以及某些语句的意思上略有出入。

(一)《菩萨戒本》又名《地持戒经》,一卷。北凉昙无讖译,玄始十年(421)至玄始十五年(42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四册)本等。本经系从《菩萨地持经》卷四、卷五的《戒品》录出,主要论述四重戒四十二轻戒(后详)。初有归敬颂,末说法功能、护持心要和护戒利益。是四个译本中,最适合布萨(每半月一次)时诵戒需要的一个本子,也就是说,是最具备说戒体裁的一个本子。

(二)《菩萨善戒经》又名《菩萨地善戒经》,一卷。刘宋求那跋摩译,元嘉八年(431)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册)本等。本经系从九卷本《菩萨善戒经》卷四的《戒品》录出,并更分细类而成。下分十品:《依止胜相品》(包括《众名品》、《相品》、《引证

品》、《差别品》四小品)、《应知胜相品》、《应知入胜相品》、《入因果胜相品》、《入因果修差别胜相品》、《依戒学胜相品》、《依心学胜相品》、《依慧学胜相品》、《学果寂灭胜相品》、《智差别胜相品》。主要论述八重戒(在菩萨四重戒的前面,加上小乘律典所说的“四波罗夷戒”,即大淫戒、大盗戒、大杀戒、大妄语戒而成)四十三轻戒。初有受戒法,为他本所无。

(三)《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一卷。刘宋求那跋摩译,元嘉八年(431)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四册)本等。本经是由《五戒经》和《威仪经》二经合成的。它的前半卷与昙无讖译的《菩萨戒本》大致相同(轻戒中小“轻慢说法”条),后半卷叙述礼佛、发愿、受绳床等威仪法,为昙无讖译本所无。本经也略具布萨诵本的形式。

(四)《菩萨戒本》一卷。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四册)本等。本经从《瑜伽师地论》卷四十至卷四十二的《本地分·菩萨地·戒品》录出,主要论述四重戒四十三轻戒。初首总明持戒,末尾总结劝学。佛教中的戒法,按其是否为佛陀特地制立而分为性戒和遮戒两类。性戒,是对世法和佛法都不允许的重罪(又称性罪,意为本质上的罪恶行为)的制止,如“五戒”中禁止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遮戒,是对世法允许而佛法不允许的轻罪的制止,如“五戒”中禁止的饮酒。其他三个译本都没有开性罪的条文,唯独玄奘译的这个本子允许在利益多数有情(即众生)的情况下,犯七支性罪(杀生、偷盗、邪淫、妄言、绮语、恶口、两舌)。

在上述四个译本中,昙无讖的译本最为流行,玄奘的译本文义周备,也较为流行。故这二本同为通行本。它们的共同之点,在于论述了三聚净戒、四重戒四十二轻戒(玄奘译本在轻戒中增立“为利他故七支性罪应开不开”条,成为“四十三轻戒”)等菩萨戒相。



三聚净戒,指的是:1. 摄律仪戒。指受持一切戒律,包括在家二众、出家五众所受的各种“别解脱戒”,如五戒(在家佛弟子平时受持)、八关斋戒(在家佛弟子在每月六斋日的一日一夜中受持)、十戒(沙弥、沙弥尼受持)、具足戒(比丘、比丘尼受持)等。2. 摄善法戒。指广修一切善法,特别是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内容的“六度”。3. 饶益有情戒(又称摄众生戒),指利乐一切有情,特别是施行以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为内容的“四摄”。

四重戒四十二轻戒中的四重戒(即四重罪戒,又称四他胜处),指的是:1. 贪求利养,为利养自赞或毁他。2. 他求财法,悭吝不施。3. 忿恼有情,不受谏谢。4. 谤大乘法,说相似说。四十二轻戒(即四十二轻罪戒,又称四十二恶作)可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条“不供养、颂赞、信念三宝”至第三十一条(玄奘译本因增立了“为利他故七支性罪应开不开”条,而计为第三十二条)“轻慢说法者”,属于摄善法戒;第三十二条“不为助伴”至第四十二条“不现神通引摄制伏”,属于饶益有情戒。

由于《菩萨戒本》所说的三聚净戒综括了持律仪、修善法、度众生三大门类的佛法,既坚决止恶,又积极兴善,因此,它既涵盖了小乘戒,又超越小乘戒,后来成为大乘戒行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三、优婆塞类戒本

属于这一类的经典有《优婆塞戒经》七卷。北凉昙无讖译,玄始十年(421)至玄始十五年(42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四册)本等。

本经是以小乘《长阿含经》卷十一《善生经》和《中阿含经》卷三十三《善生经》(其单行本为后汉安世高译的《尸迦罗越六方礼经》



一卷)为基础,采取佛为善生长者说法的方式敷演而成的,专门叙述在家佛弟子受持的大乘戒法的经典。经中论述了在家的佛弟子的受戒次第:先供养父母、师长、妻子、善知识、奴婢、出家道人,其次受持三归(归依佛、法、僧)、五戒、八戒等,然后才能受持以六重戒二十八轻戒(又称二十八失意)为内容的在家的菩萨戒。六重戒,指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虚说、不邪淫、不说四众过、不酤酒;二十八轻戒,指的是不供养师戒、饮酒戒、不看护病患戒等。从经中引用的《法华》、《大城》、《智印》、《鹿子》、《涅槃》等经来看,《优婆塞戒经》约成于大乘佛教的中期。

第三节 大乘论

大乘论是伴随着大乘经的历史发展而兴起的一类经典,它是大乘经的注释、解说、充实和发展,在推动大乘思想的演进方面起着与大乘经同等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大乘经多自称出自“佛说”或“菩萨说”,虽然它们的原本无疑也是由一个或一些佛门弟子编集的,但编集者的名字并不出现在经本上,因而是无署名的作品,而且以群体作品居多;而大乘论一般都是署名的个体作品,因作者姓名失落而未署名的为数很少。

大乘论中的绝大多数经典是由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这两大派别的僧人撰作的。因此,要弄清大乘论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先了解大乘佛教的这两大派系。

中观派,是在初期大乘经的影响下形成的宗派,因主张远离对立的二边偏执(如生灭、常断、一异、来去)而取中道的观察态度(中道观)而得名。又因主张般若性空,而别称“大乘空宗”。此派由龙树和他的弟子提婆(170—270)创立。传至僧护门下,分为以佛护



(470—540)为首的应成派(又称具缘派)和以清辨(490—570)为首的自续派(又称依自起派)。前者主张在论破异执时,只破不立,即找出对方立论的矛盾性,以证明其不能成立,而不必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后者主张用因明的论式(比量)对“空”作积极的表述,进而驳破对方。

瑜伽行派,是在中期大乘经的影响下形成的宗派,因主张调息摄心,使精神与正理相应的瑜伽行而得名。又因主张一切存在均为心识的变现,阿赖耶识(或如来藏)为万物之源,而别称“大乘有宗”。相传由弥勒(270—390)创立。此位弥勒乃是萨婆多部(即说一切有部)的一位学者和无著(310—390)的老师,不过佛典中又常常把他与在未来世中将绍嗣释迦牟尼佛位的,现居于兜率天宫的弥勒菩萨混为一谈,以致后人对这位弥勒究竟是历史上的人物,还是传说中的人物,一直存在着争论。因此,学术界一般把无著、世亲(又译天亲、婆薮槃豆,320—400)两兄弟看作是瑜伽行派的实际创始人。此派传至公元六世纪初,分为以德慧(420—500)、安慧(470—550)为首的无相唯识派,和以陈那(又译大域龙,400—480)、无性(450—530)为首的有相唯识派。无相唯识派认为,相分(境)没有实体,见分(心)也不会攀缘境物(即认识对象)时产生与之相似的行相;有相唯识派则肯定相分有实体,并认为见分会产生行相。

中观派和瑜伽派作为对立的两大派,是从六世纪中叶,奉习龙树、提婆之学的清辨,与奉习无著、世亲之学的护法(530—560),就“毕竟空”与“胜义有”展开争论而开始的。在此之前,虽然两派对“空”、“有”各有自己的看法,但并没有发生公开的冲突。无著为龙树的《中论》作过注释,世亲为提婆的《百论》作过注释,彼此涵融。在经历了清辨、护法及其后一个时期的对立之后,至七世纪末,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又趋融和,形成了以寂护(725—790)、莲华戒



(740—795)、解脱军、师子贤等为代表的中观瑜伽行派,最后归入密教。

大乘论便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陆续问世的。

对于大乘论的分类,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分为“释经论”和“集义论”两项,而明代智旭的《阅藏知津》则分为“释经论”、“宗经论”(相当于集义论)、“诸论释”三项。其中,释经论是对单部的大乘经所作的解释,其性质为注疏;集义论(或宗经论)是对大乘经所述的义理(即大乘教义)所作的归纳、整理、阐述和推演,其性质为论著;诸论释是对属于释经论和集义论的著作所作的解释,其性质也是注疏。重要的诸论释还有人为之作注作疏,这便是注疏的注疏了。为了研究上方便,本书将诸论释作为与之有主从关系的释经论和集义论的附件予以介绍,不单独立类。另外,考虑到集义论中的因明论(逻辑学著作),与一般讲述大乘义理的著作,无论在讨论的主题上,还是在体裁结构上都有很大的差殊,因而将大乘论区别为释经论、集义论、因明论三项,分别予以叙述。

一、释经论

属于这一类的大乘论典,在汉文《大藏经》中有二三十部。所释的经本有:《般若经》、《金刚经》、《法华经》、《无量寿经》、《华严经》、《宝积经》、《大集经》、《涅槃经》、《转法轮经》、《三具足经》、《胜思惟梵天所问经》、《文殊师利菩萨问菩提经》等。所释的方式,有摘录经文,随文出疏的;有只释偈颂,不释长行(散文)的;有不涉章句,只明经义的;也有只释经本中的名相事数(名词术语)的。其中,重要的释经论有:《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十地经论》、《妙法莲华经优婆提舍》、《无量寿经优婆提舍》、《佛地经论》等。



(一)《大智度论》略称《大论》、《释论》，一百卷。龙树造，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四年(402)至弘始七年(405)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五册)本等。本书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即《大品般若经》，相当于唐玄奘译的《大般若经》第二会)的释论，撰于龙树的晚年。相传，它的梵本有十万偈，如果全部译出，将有一千多卷。鸠摩罗什认为，华夏之士喜欢简洁，不习惯冗长繁琐的议论，因而只是将解释名相事数的《序品》依照梵本，全部译出，成三十四卷。自第二品《奉钵品》以下至第九十品《嘱累品》，择要节译，成六十六卷。这样就成了一百卷。论中对《大品般若经》中叙及的历史、地理、譬喻、教理、修持、人物、部派、经典以及其他概念术语作了详尽的解释，突出论述了以檀(布施)、尸罗(戒律)、羼提(忍辱)、毗梨耶(精进)、禅(禅定)、般若等“六波罗蜜”(又译六度)为纲领的大乘佛法。其中有关佛身观和法身观的论述，还成了密教思想的先驱。被后人誉为“佛教百科全书”。凡是要了解佛教名词术语的，莫不以本论和《大毗婆沙论》、《俱舍论》为读本。今存的解释《大品般若经》的著作，除龙树的《大智度论》以外，尚有弥勒的《现观庄严论》。此论现存于西藏文《大藏经》之中，近世由法尊译为汉文。全论分为八品：《一切相智性品》、《道智性品》、《一切智性品》、《一切相现等觉品》、《顶现观品》、《次第现观品》、《一刹那现观品》、《法身品》。主要论述了从凡夫循序修行，最后达到佛境的过程。

(二)《十住毗婆沙论》十七卷。龙树造，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四年(402)至弘始十四年(41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本书是《十地经》(即《华严经·十地品》，相当于旧译六十卷本中的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七、新译八十卷本中的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九)的释论。“十地”，指的是：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为大乘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鸠摩罗什译“十地”为“十住”，故题为《十住



毗婆沙论》。不过,论中并没有对这十地的每一地都进行解释,而只是对初地(即欢喜地)和第二地(即离垢地)之半作了诠释,所用的方式是归纳经义,再作申述。全论分为三十五品,第一品《序品》至第二十七品《略行品》为初地的注释。《序品》叙述菩萨、十地的意义及三乘的区别,自第二品《入初地品》以下叙述初地的内容及菩萨的理想(愿)、实践(行)和果报(果);第二十八品《分别二地业道品》至第三十五品《戒报品》为第二地的注释,主要论述十方便心、十善业道等。其中,提倡念十方佛、阿弥陀佛、过去七佛、未来弥勒佛、三世诸佛诸大菩萨的第九品《易行品》,后来成了净土宗所依的经论,甚受尊重。

(三)《十地经论》略称《十地论》,十二卷。天亲(即“世亲”)造,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译,永平元年(508)译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的生平事迹分别见《续高僧传》卷一、卷七。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本书也是《十地经》的解释。论中摘录经文,列举六相(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对十地的每一地都作了诠释,并且依阿赖耶识而说“三界唯心”之义。

(四)《妙法莲华经优婆提舍》又称《妙法莲华经论》、《法华经论》,二卷。婆藪槃豆(即“世亲”)造,北魏菩提流支、昙林等译,永平元年(508)至天平二年(535)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本书是《法华经》释论。论中对《法华经》的《序品》、《方便品》进行了详释,对《譬喻品》作了略释,并且依如来藏而说“一佛乘”之义。本书所释的《法华经》不是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其原本为中亚细亚流传的梵本),而是与今存的尼泊尔梵本(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所据之本)相似的本子。它的别译有北魏勒那摩提、僧朗译的《妙法莲华经论优婆提舍》(书名中多“论”字)一卷。其译语虽与二本卷本相同,但缺《归敬颂》,文字上也有详略等差异。

(五)《无量寿经优婆提舍》又称《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



偈》、《无量寿经论》、《净土论》、《往生论》，一卷。婆薮槃豆造，北魏菩提流支译，永安二年（52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本书是根据《无量寿经》而作的愿生偈。论中主要叙述了西方极乐净土的种种庄严，以及往生净土的五念门。这五念门是：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由于它是印度撰述的唯一的净土论，后来，中国的净土宗将它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合称为“三经一论”，作为本宗依据的根本经典。

（六）《佛地经论》 略称《佛地论》，七卷。亲光等造，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本等。本书是《佛地经》（唐玄奘译，一卷）的释论。论中用清净法界（即真如）、大圆镜智（由第八识转依而成）、平等性智（由第七识转依而成）、妙观察智（由第六识转依而成）、成所作智（由前五识转依而成）等五法，来解释佛身所依、所摄、所行的境界——佛地。并且将佛的三身与五法相配，自性身摄初二法，受用身摄次二法，变化身摄末一法，从而使对佛地的解释变得更为周详，后人誉之为“论释法相，最为详明”（见明智旭《阅藏知津》卷三十四）。

二、集义论

释经论和集义论虽然都是论师们为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而采用的体裁。但是，由于释经论受所释经本的内容、建构的制约较大，无法自由展开，或者说，自由议论的余地较小些；而集义论则不同，集义论的体系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解任意构筑的，不受任何限制。有通篇全是偈颂的，有通篇全是长行的，也有既有偈颂，又有长行的，品目的设置也较自由。因此，与释经论比较，它更能畅所欲言，自由发挥，也就更能反映和代表撰作者的独特的思想特色。



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两大派的根本论典和重要论书差不多都是集义论。

(一) 中观派

中观派的根本论典是“三论”，即《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三论”以外的中观派重要论典则有：《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入大乘论》、《大乘掌珍论》等。

1. 《中论》又名《中观论》、《正观论》，四卷。龙树造(偈颂部分)，青目释(长行部分)，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四年(40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册)本等。全书分为二十七品，始《观因缘品》，终《观邪见品》，共计收录龙树造的偈颂四百四十五首(一说五百颂)。据考证，此论是龙树从婆罗门教转向佛教，并接受大乘思想以后撰作的，为龙树的初期作品。论中主要阐述了“八不”中道和“空、假、中”相即的思想。前者见于论首的“归敬颂”：“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去)。”通常称之为“八不偈”；后者见于第二十四品《观四谛品》：“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通常称之为“三是偈”或“三谛偈”。龙树在这两首偈(也可称颂)中，用否定一切的方式，排遣了对宇宙万有所持的任何确定的看法，如生灭(存在与非存在)、常断(连续与中断)、一异(同一与差异)、来去(联系与分离)等。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依据因缘条件产生的，因而是“空”(无自性的)、“假”(假设的名称，即假名)的，如果作这样的观察，便是《中论》提倡的“中”(即中道观)。

有关《中论》的注释，在古印度有七十多家。鸠摩罗什认为青目的注释写得最好，故将龙树的偈颂连同青目的长行一并译出。今存的印度所作的《中论》注释，尚有：龙树的《无畏论》(藏译本，二千一百偈)、无著的《顺中论》(全称《顺中论义入大般若波罗蜜经初



品法门》)二卷(北魏般若流支译)、佛护的《根本中论注》(藏译本)、清辨的《般若灯论》十五卷(唐波罗颇蜜多罗译,另有藏译本)、安慧的《大乘中观释论》十八卷(北宋惟净等译)、月称的《入中观论》(又名《中论注》,有梵本、藏译本)等。

2. 《百论》 二卷。提婆造,婆藪槃豆(即世亲)释,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六年(40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册)本等。全书分为十品:《舍罪福品》、《破神品》、《破一品》、《破异品》、《破情品》、《破尘品》、《破因中有果品》、《破因中无果品》、《破常品》、《破空品》。每一品均有五首偈,每一首偈之后,附有提婆所作的短文(称为修妬路)和世亲所作的训释。提婆从大乘空观的立场出发,用“唯破不立”、“破邪即显正”的方法,破斥了古印度数论派和胜论派的异见。

据僧肇《百论序》说,此论原有二十品,每一品都有五偈,合计一百偈,故名。但罗什在翻译时,“以为后十品无益此土,故阙而不传”(也有的人对僧肇的这一说法表示怀疑,认为《百论》的梵文原本只有十品,并没有省略后十品不译之事。不过,据情理判断,僧肇的说法当是可信的。因为僧肇本人参与了《百论》的翻译,而他撰作《百论序》时,他的老师鸠摩罗什还活着,因此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当众说谎的)。《百论》乃是提婆撰作的一系列以“百”为题的论著中的一部。与之相关的尚有《四百论》、《广百论》(又称《广百论本》)、《百字论》。《四百论》有藏译本,全书分为十六品,凡四百颂。前八品,称为“说法百义”,主要论述断除常、乐、我、净“四执”的烦恼,以及修菩萨行的方法。后八品,称为“议论百义”,主要破斥常、我、时、见、根境、边执、有相无相等,最后重新结论空性与空义。而《百论》就是《四百论》的纲要书,其初品《舍罪福品》相当于《四百论》的前八品,第二品《破神品》至第十品《破空品》相当于《四百论》的后八品;《广百论》有唐玄奘的汉译本,作一卷(《广百论》的



注释有护法释的《广百论释》十卷,唐玄奘译)。下分八品,始《破常品》,终《教诫弟子品》,其内容相当于《四百论》的后八品,是对《百论》十品中的后九品的增广;《百字论》有汉、藏两译。北魏菩提流支的汉译本作一卷,藏译本则题为“龙树造”。相传,这是提婆遭外道暗刺,在临死前用血写的,其内容相当于《百论》第二品《破神品》以下诸品的梗概。

3. 《十二门论》 一卷。龙树造,姚秦鸠摩罗什译,弘始十一年(40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册)本等。全书为《中论》的纲要书,由二十六颂及注释组成。下分十二门:《观因缘门第一》、《观有果无果门第二》、《观缘门第三》、《观相门第四》、《观有相无相门第五》、《观一异门第六》、《观有无门第七》、《观性门第八》、《观因果门第九》、《观作者门第十》、《观三时门第十一》、《观生门第十二》。其中,有二颂引自作者的《空七十论》(有藏译本)、十七颂引自《中论》,其余的偈颂也与《中论》颇多相似。

4. 《菩提资粮论》 六卷。龙树造,隋达摩笈多译,大业五年(609)译出。达摩笈多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本等。书中主要论述了六度、四无量(慈、悲、喜、舍),以及方便、愿、力、智等成就菩提(智慧)的条件(资粮)。并附有自在比丘的注释。

5. 《宝行王正论》 一卷。陈真谛译,永定二年(558)至太建元年(56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本等。本书的汉译本未署作者,而藏译本则署为“龙树造”。全书分为五品:《安乐解脱品》、《杂品》、《菩提资粮品》、《正教王品》、《出家正行品》,全是偈颂。通过龙树对宝行王宣说为政之道的方式,阐述了佛教关于业力缘起,止恶修善,建寺、立塔、造像(佛像)的功德,王者之道,以及菩萨行的阶次(十地)等思想。

6. 《入大乘论》 二卷。坚意造,北凉道泰等译,玄始十六年



(427)至承和七年(439)译出。道泰的生平事迹见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本等。全书分为三品:《义品》、《议论空品》、《顺修诸行品》。针对大乘渐兴时期外界的种种毁誉,论述了诽谤大乘的罪过、大乘具足三藏、菩萨十地、佛的三身等观点,肯定大乘为佛说(部派佛教认为“大乘非佛说”)。

7.《大乘掌珍论》二卷。清辨造,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册)本等。书中运用因明的推论(比量),破斥了外道、小乘、大乘有宗的见解,阐述了以远离有无、分别的空智,去修证八正道、六度的观点。其中,所立的“真性有为空,如幻缘生故;无为无有实,不起似空华”的论式,即是有名的“掌珍比量”、“清辨比量”。

(二) 瑜伽行派

瑜伽行派的根本论典被称为“一本十支”。一本,指的是《瑜伽师地论》;十支,指的是《大乘百法明门论》、《大乘五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按照传统的说法,“十支论”乃是本论的辅翼,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支论都与《瑜伽师地论》有关,在有些提法上,支论与本论还存在着一些歧异。“一本十支”以外的瑜伽行派重要论典则有《法法性分别论》、《六门教授习定论》、《大乘成业论》、《究竟一乘宝性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观所缘缘论》等。

1.《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弥勒造,唐玄奘译。贞观二十年(646)至贞观二十二年(648)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册)本等。本书相传是弥勒菩萨于佛灭后九百年,在中印度阿逾陀国讲堂,对无著所说的五部大论(《瑜伽师地论》、《分别瑜伽论》、《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边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之一。



由无著记录成文。藏译本题为“无著造”。全书主要论述了三乘行者(即瑜伽师)所观的境、所修的行、所证的果(果位),以及阿赖耶识、三性三无性、唯识中道等义。下分五分:(1)《本地分》(卷一至卷五十)。此分主要论述瑜伽师在修行过程中须渐次经行的十七地(即境界),为全论的根本,书名中的“瑜伽师地”指的就是这十七地,其后的四分也是这《本地分》的阐释。所说的“十七地”,指的是: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此分中的第一地“五识身相应地”至第九地“无心地”,论述三乘境,包括境体(八识)、境相、境位。第十地“闻所成地”至第十五地“菩萨地”,论述三乘行,包括三慧(闻、思、修)、三乘的种姓、发心、修行、得果等。第十六地“有余依地”和第十七地“无余依地”,论述三乘的果,即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2)《摄决择分》(卷五十一至卷八十)。进一步阐发十七地的蕴义。(3)《摄释分》(卷八十一、卷八十二)。解释《阿含经》等经的仪则。(4)《摄异门分》(卷八十三、卷八十四)。略释《阿含经》等经中诸法的名义差别。(5)《摄事分》(卷八十五至卷一百)。论述三藏,特别是经藏中的《杂阿含经》的事义。论中保存了一些大乘经本的古释,如《本地分》中的“思所成地”引有《法句经》的本母释;《摄决择分》中的“菩萨地”引有《小品宝积经》和《解深密经》的本母释;《释异门分》有《阿含经》的释名;《摄事分》引有《杂阿含经》的本母释等。

有关《瑜伽师地论》的印度古注,今存的有:最胜子等造的《瑜伽师地论释》一卷(唐玄奘译)、德光的《菩萨地释》(藏译本)、《菩萨戒品释》(藏译本)等。最胜子等造的《瑜伽师地论释》卷首有归敬序,正文分为六门:《所为》、《所因》、《名义》、《宗要》、《藏摄》、《释文》,总释《瑜伽师地论》的大纲,其中释文门对十七地的名义作了



略释。相传此论的梵本若全部译出的话,有五百卷,因卷帙太多,玄奘只译出了初卷。《瑜伽师地论》的注疏以它为古。

2. 《大乘百法明门论》 略称《百法明门论》、《百法论》,一卷。世亲造,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二年(648)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本书系摘录《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的名数(名相),并予以系统的分类和说明而成。论中主要论述了“五位百法”和“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等义。“五位百法”将一切法(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分为五大类(五位)一百种(百法)。(1)心法(指认识的主体)。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八种。(2)心所有法(由识体引发的心理活动)。下分六小类:①遍行(无善恶之分的普遍现起于各场合的心理活动)。有作意、触、受、想、思五种。②别境(由特定的对象引起的心理活动)。有欲、胜解、念、三摩地(定)、慧五种。③善。有信、精进、惭、愧、无贪、无瞋、无痴、轻安、不放逸、行舍、不害十一种。④根本烦恼。有贪、瞋、慢、疑、不正见等六种。⑤随烦恼。有忿、恨、恼、覆、诳、谄、谄、害、嫉、悭等二十种。总计五十一种。⑥不定(自身无一定的善恶性格的心理活动)。有悔、睡眠、寻、伺四种。(3)色法(物质现象)。有眼、耳、鼻、舌、身等十一种。(4)心不相应行法(“五蕴”中行蕴所摄的现象和性质)。有得、命根、众同分等二十四种。(5)无为法(没有生灭变化的永恒的事物和现象)。有虚空、择灭、非择灭、不动、想受灭、真如六种。

上述五大类法中,除末一类以外,前四类均为有为法(有生灭变化的现象和事物)。作者认为,在有为法中,心法为殊胜,其余的都是由它引起的心理活动或变现的影像。无为法也需借助于前四类法才能断染成净。因此,百法皆不离识。

3. 《大乘五蕴论》 略称《五蕴论》,一卷。世亲造,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一年(64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



本书略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的境事。针对小乘佛教以蕴(五蕴)、处(十二处)、界(十八界)三科统摄一切,而着重阐明大乘的五蕴(色、受、想、行、识)法,同时兼及大乘的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根等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境)、十八界(六根、六境和六识。六识,指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论中认为,“五蕴”总摄“五位百法”中的前四大类九十四种法(均为有为法)。即:色蕴有五根、五境、无表色;受蕴有受心所;想蕴有想心所;行蕴有除受心所、想心所之外的一切心法和心不相应行法(总计六十七种);识蕴摄阿赖耶识等八识。在大乘经典中,此论对五蕴法的说明最为简明。

有关《大乘五蕴论》的印度古释,有安慧造的《大乘广五蕴论》一卷(唐地婆诃罗译)。

4.《显扬圣教论》二十卷。无著造,唐玄奘译,贞观十九年(645)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本书系错综《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有关十七地的论述而成,被视为《瑜伽师地论》的纲要书。全书分为十一品:《摄事品》、《摄净义品》、《成善巧品》、《成无常品》、《成苦品》、《成空品》、《成无性品》、《成现观品》、《成瑜伽品》、《成不思議品》、《摄胜抉择品》。对苦、空、无常、无性以及用智慧观察现前的境界的现观瑜伽(有四现观、七现观、六现观之分)等义作了详细的阐述。唐玄奘还将《显扬圣教论》中的摄颂摘出,另成《显扬圣教论颂》一卷。

5.《摄大乘论》略称《摄论》,无著造,汉译本有三种:(1)《摄大乘论》二卷。北魏佛陀扇多译,普泰元年(531)译出。佛陀扇多的生平事迹见《开元释教录》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此本不分品目。(2)《摄大乘论》,三卷。陈真谛译,天嘉四年(56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下分十品:《依止胜相品》(内含《众名品》、《相品》、《引证品》、《差别品》



四小品)、《应知胜相品》、《应知入胜相品》、《入因果胜相品》、《入因果修差别胜相品》、《依戒学胜相品》、《依心学胜相品》、《依慧学胜相品》、《学果寂灭胜相品》、《智差别胜相品》。(3)《摄大乘论本》，三卷。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二年(648)至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下分十一分：《总标纲要分》、《所知依分》、《所知相分》、《入所知相分》、《彼入因果分》、《彼修差别分》、《增上戒学分》、《增上心学分》、《增上慧学分》、《果断分》、《彼果断分》。

上述三本中，玄奘的译本综核名实，力求信达，译文最优；而真谛的译本社会影响最大。陈隋之际的摄论学派，就是以真谛的译本为典据建立起来的。《摄大乘论》，据佛陀扇多、真谛以及藏译本所传，是解释已经失传的《大乘阿毗达磨经》的。而据玄奘所传，则是解释该经的《摄大乘品》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十种胜相(即真谛译本所立的十品)统摄瑜伽行派的重要法门。其中前三相(依止胜相、应知胜相、应知入胜相)讲“境”，有阿梨耶识(即阿赖耶识)、三性(分别性、依他性、真实性)等；次五相(入因果胜相、入因果修差别胜相、依戒学胜相、依心学胜相、依慧学胜相)讲“行”，有六波罗蜜、十地、大乘三学(戒学、心学、慧学)等；末二相(学果寂灭胜相、智差别胜相)讲“果”，有六转依(转下劣为胜净的六种修行法，即损力益能转、通达转、修习转、果圆满转、下劣转、广大转)、三身(佛的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中提出了“九识”说，即在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梨耶识之外，增立了第九识阿摩罗识(意译无垢识)。认为，阿梨耶识为妄识(染分)，是一切法产生和发展的依据。但妄识中又有一分净识(净分)，净识即是第九识阿摩罗识，是转染为净的依据。只要通过修行，使妄识变为净识，证入阿摩罗识，就能成佛。阿摩罗识即是“真如”，宇宙的本体，圆



满无缺的象征。此外,作者还认为,在“三性”中,不仅应遮遣(否定)分别性(即遍计所执性),而且也应遮遣依他性(即依他起性),因为分别性是染性,依他性虽然处于三性的中间,可染可净,但总的来说,与染性联系较多,只有真实性(即圆成实性)才是净性。

《摄大乘论》的印度古注,今存的有:世亲的《摄大乘论释》和无性的《摄大乘论释》。世亲的《论释》有三个汉译本:陈真谛的译本作十五卷,隋达摩笈多的译本和唐玄奘的译本均作十卷。无性的《论释》为玄奘所译,作十卷。

6. 《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 略称《杂集论》,十六卷。安慧糅述,唐玄奘译,贞观二十年(64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本书系糅合无著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唐玄奘译,七卷)和无著的弟子觉师子对《集论》所作的解释而成。相传,无著为摄略《大乘阿毗达磨经》的义理,共撰写了两部论书:一部是从大乘的不共法相(即独有的义理)方面写的,这便是《摄大乘论》;另一部是从三乘(小乘中的声闻乘、缘觉乘和大乘中的菩萨乘)的共同法相(即同说的义理)方面写的,它就是《大乘阿毗达磨集论》。《集论》是按大乘阿毗达磨的四项要素,即对法(说趋向涅槃的圣道)、数法(说诸法的自相和共相)、伏法(说制伏异说的议论法门)、解法(说解释经义的诠释法门)组织起来的论典。它分为二分八品:(1)《本事分》。下分《三法品》、《摄品》、《相应品》、《成就品》四品。(2)《抉择分》。下分《谛品》、《法品》、《得品》、《论议品》四品。共收录偈颂约一千五百首。主要论述了五蕴(其中的“识蕴”叙及八识)、十二处、十八界、三成就(种子、自在、现行)、四谛、十二分教、声闻藏和菩萨藏、补特伽罗(意译“我”,指生死轮回的主体)假设、因明中五支作法(指由宗、因、喻、合、结五者组成的推理论式)等义。书成之后,有觉师子为之注(随文而注),对《集论》的义理多有补充。安慧的《杂集论》便是糅合无著的《集论》和师子觉的注释而



成的,故它的实际作者是无著和觉师子,藏译本则题为“最胜子造”。

7.《辩中边论》 又作《辨中边论》、《中边分别论》。世亲造。汉译本有二种:(1)《中边分别论》,二卷。陈真谛译,永定二年(558)至太建元年(56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下分七品:《相品》、《障品》、《真实品》、《对治修住品》、《修住品》、《得果品》、《无上乘品》。(2)《辩中边论》,三卷。唐玄奘译,龙朔元年(661)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下分七品:《辩相品》、《辩障品》、《辩真实品》、《辩修对治品》、《辩修分位品》、《辩得果品》、《辩无上乘品》。

通常以玄奘的译本为流通的正本。此论是弥勒《辩中边论颂》(唐玄奘译,一卷)的释论。内容主要是论述瑜伽行派的中道学说的。中观派的《中论》谈中道,主要是批判外道和小乘对“有”的执著的;而《辩中边论》谈中道,主要是批判“恶取空”,即大乘佛教中执著“空”的人。

有关《辩中边论》的印度古注,今存的有安慧的《辩中边论疏》(藏译本)。

8.《唯识二十论》 又名《二十唯识论》,一卷。世亲造,唐玄奘译,龙朔元年(661)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它的别译(即异译)有:北魏菩提流支译的《唯识论》(又名《大乘楞伽经唯识论》)一卷和陈真谛译的《大乘唯识论》一卷。菩提流支的译本,文(指长行)多颂少,由二十三颂组成;真谛的译本,文少颂多,有二十四颂;玄奘的译本,文颂大致均等,有二十一颂,故题名《唯识二十论》。论中主要论述了“识生似外境现”,即外境为内识的显现,唯识无境的理论,并就小乘、外道的问难作了答释。

有关《唯识二十论》的注释,在印度以世亲的弟子瞿波为首,共有十多家。今存的汉译本有护法的《成唯识宝生论》五卷(唐义



净译)。

9.《唯识三十论》又名《三十唯识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论颂》，一卷。世亲造，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二年(648)至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全论由三十颂六百言(即字)构成，无长行。初二十四颂，论唯识相，是对宇宙万有的现象(相)的说明；第二十五颂，论唯识性，是对一切法的本体(性)的说明；末五颂，论唯识位，是对修行证果的位别程序的说明。其中，以论唯识相为最重要。论中说，“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认为，宇宙万有都是由识的变现而显示的。而识分为八种(八识)，合为三大类(三能变)。第八阿赖耶识为“异熟能变”(此识能生起一切事物和现象，对“心所”即心理活动产生影响，同时“心所”也能影响此识，而成为此识的种子)，第七末那识为“思量能变”(将第八识计度为“我”，而生起痴、慢等见解)，前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为“了别能变”(能了知各自攀缘的境象，并与“心所”即心理活动相对应)。八识各能变现出自己的认识对象(境)，然后加以认识，其中最根本的识体是第八阿赖耶识。它含有一切法的种子，能生起根身(人身器官)和器世间(自然界及一切器用物品)。

由于《唯识三十论》是世亲在临终时撰作的，全是偈颂，而没有来得及作长行(解释)。因此，在世亲去世之后，有不少人为之作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十家：亲胜、火辨、难陀、德慧、安慧、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这十家注疏合起来有四千五百颂。后来，玄奘以护法的注本为主，糅合其他诸家，编译成《成唯识论》十卷。藏译本中，则有安慧的《唯识三十颂释》。其内容是：先叙造论的旨趣，次论各颂次第及字句意义，并援引《阿毗达磨经》、《入无分别陀罗尼》及其他偈颂，以广证其说。

10.《大乘庄严经论》又名《大乘庄严论》、《庄严经论》、《庄

严论》，十三卷。弥勒造颂（藏译本有此句，汉译本无），无著作释，唐波罗颇蜜多罗译，贞观四年（630）至贞观七年（633）译出。波罗颇蜜多罗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

据论中所述，作者是为了“庄严大乘”而造此论的，故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四认为，此论的确切译名当为《庄严大乘经论》。今名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一部名叫《大乘庄严经》的释论。全书分为二十四品，始《缘起品》，终《敬佛品》。其中一些品名以及它们的排列次序与《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菩萨地”所立的相同，因而可以看作是阐发《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思想的。内容主要是解说菩萨发心、修行以及应修习的各种法门的。论中援引了数十种佛典，有《十地经》、《无尽慧经》、《行清净经》等。此论的梵本于1988年在尼泊尔发现，未署作者，正文分为二十一品。它的藏译本署名“弥勒造”，下分颂、释两大部分，也立为二十一品。

11. 《分别瑜伽论》 弥勒造，没有传译。据考证，它的内容很可能是解释《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的，即讲瑜伽法门的。

对于上述瑜伽行派“十支论”（《大乘百法明门论》至《分别瑜伽论》）的纲旨，学界曾用以下的最简短的话语来概括，即：《大乘百法明门论》以一切法无我为宗；《大乘五蕴论》以无我唯法为宗；《显扬圣教论》以明教为宗；《摄大乘论》以简小（指小乘）入地（指佛地）为宗；《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以蕴、处、界三科为宗；《辩中边论》以中道为宗；《唯识二十论》以唯识无境为宗；《唯识三十论》以识外无别实有为宗；《大乘庄严经论》以庄严大乘为宗；《分别瑜伽论》以止观为宗（参见台湾《佛光大辞典》）。

12. 《法法性分别论》 弥勒造，有藏译本，无汉译本。论中联系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而讲法（事相）和法性（本体）。



13. 《六门教授习定论》 一卷。无著造颂(凡三十七首),世亲作释(长行),唐义净译,长安三年(703)译出。义净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全书分为六门:《师资圆满》、《所缘圆满》、《作意圆满》、《有寻有伺定》、《无寻唯伺定》、《无寻无伺定》,对唯识禅观作了论述。

14. 《大乘成业论》 略称《成业论》,一卷。世亲造,唐玄奘译,永徽二年(651)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作者从阿赖耶识与薰习、种子的关系,论述了唯识家关于身、口、意三业的看法,并破斥了说一切有部的“形色”说、正量部的“动色”说,以及日出论者的“非显非行”说等以心外之物为实有的观点。

15. 《究竟一乘宝性论》 又名《宝性分别一乘增上论》、《宝性论》,四卷。弥勒造颂,无著作释(此二句据藏译本,汉译本则称“坚慧造”),北魏勒那摩提译,正始五年(508)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下分十一品:《教化品》、《佛宝品》、《法宝品》、《僧宝品》、《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品》、《无量烦恼所缠品》、《为何义说品》、《身转清净成菩提品》、《如来功德品》、《自然不休息佛业品》、《较量信功德品》。卷初为偈颂,后为长行(释论),主要论述了如来藏自性清净的思想。于中保存了印度佛教中有关如来藏思想发展的许多宝贵的资料。

有关《究竟一乘宝性论》的解释,则有世亲造的《佛性论》四卷(陈真谛译)。

16.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 一卷。坚慧造,唐提云般若等译,天授二年(691)译出。提云般若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卷首为归敬颂,正文分为十二段。每段之首,先以五言颂总明大要,次释其义。主要论述了果、因、自性、异名、无差别、分位、无染、常恒、相应、不作义利、作义利、一性等“菩提心”十二义,以及法界无差别、平等一如等说。



17.《观所缘缘论》一卷。陈那造,唐玄奘译,显庆二年(65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等。本书是陈那“因明八支”之一。书中依据因明的三支作法(宗、因、喻),论述了一切有生灭变化的事物和现象赖以生起的四种条件,即因缘(直接产生自果的内在原因)、等无间缘(前念灭、后念起,使认识活动得以发生的条件)、所缘缘(心、心所攀缘的对象,即认识的对象)、增上缘(其他有助于现象发生的条件)等“四缘”中的“所缘缘”。认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五识”所认识的对象既不是极微(物质),也不是极微的积聚或者和合相,而是识体变现的外在事物。心外之所缘缘非有,而心内之所缘缘非无。

有关《观所缘缘论》的异译,有陈真谛译的《无相思尘论》一卷。它的注释,有唐玄奘译的《观所缘缘论释》一卷。

三、因 明 论

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它与声明(语言文字学)、工巧明(工艺历算学)、医方明(医学)、内明(各学派自己的学说,对佛教来说则指佛学)合称“五明”,为古印度的五门学科。因,指推理的根据、理由、原因。明,指显明、知识、学问。因明导源于古印度的辩论术。相传,上古时代的《奥义书》就已提到了因明。释迦牟尼幼时,也曾在老师的指导下学过五明(当时的“内明”系指婆罗门教的“四吠陀”),这中间包括了因明。不过,因明真正形成自己的独立的完整的体系,则是公元二世纪左右的事。当时婆罗门教内部出现了以《弥曼差经》为根本经典的弥曼差派、以《奥义书》为根本经典的吠檀多派、以《数论经》(又名《僧佉经》)为根本经典的数论派、以《瑜伽经》为根本经典的瑜伽派、以《胜论经》(又名《卫世师经》)



为根本经典的胜论派、以《正理经》(又名《尼夜耶经》)为根本经典的正理派等六个学派,合称“六派哲学”。其中正理派特别重视正理(相当于因明)的研究,古印度最早的因明学专著——《正理经》就是此派的创始人足目撰写的。

足目在这部著作中建立了因明学的纲要——十六句义(又称十六谛),即十六种认识及推理论证的方式:(一)量。指对事物的认识,有现量(知觉)、比量(推理)、声量(类比)、譬喻量(证言)四种。(二)所量。指认识的对象,有我、身、根、境、觉、意、作业、烦恼、彼有、果、苦、解脱十二种。(三)疑。指疑惑,对事物的性质尚未认清时的心理状态。(四)用。指对疑惑的消解,即认识的目的。(五)喻。指实例。(六)悉檀。指宗义,学派或个人的学说主张。(七)支分。指五支作法,即由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五个方面组成的推理形式。(八)思择。指归谬法推理,即通过指明假设的反题的悖谬而显示正题的正确。(九)决。指对事物性质的判定。(十)论议。指依据逻辑规则对论题展开的讨论。(十一)纷义。指为坚守自说所作的诡辩。(十二)坏义。指只在驳倒对方的立论而自己并不立论的辩论。(十三)似因。指似是而非的理由,有不定、相违、问题相似、所立相似、过时等五种。(十四)难难。指故意曲解对方的言论,再作驳难。(十五)诤论。指用错误的理由推出错误的结论去反对和破坏辩论中的敌方。(十六)堕负。指导致辩论失败的种种情况。自此以后,因明学在印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按照佛教的说法,因明分为内道因明和外道因明两种。由佛教发展起来的因明,称为“内道因明”;由其他学派发展起来的因明,称为“外道因明”。起初是外道因明的成果为多,内道因明的成果为少。到了后来,这种现象发生了逆转。内道因明的成果远远超出外道因明,成了古印度因明学的主要推进者,著名的因明大师



几乎全出自佛教。因明,也就由古印度一般的逻辑学的泛称,变成了佛教逻辑学的专名。

佛教因明,是从小乘说一切有部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据藏译本《大毗婆沙论》以及藏传佛教史书《青史》等所传,作为有部四大论师之一的法救,曾撰有《论说门论》一书,惜已不传。大乘中观派兴起以后,龙树著《回诤论》一卷(北魏毗目智仙等译)和《广破论》(藏译本),对正理派的因明学说进行了批判。前书主要破斥正理派的“量”(认识事物的标准、方法和结果)和“现量”(不含比知推度,仅以感官直觉进行的认识作用);后书总破正理派的“十六句义”。另有《方便心论》一卷(北魏吉迦夜译),宋、元、明藏本题为“龙树造”,但查检历代佛经目录以及早于宋藏本(南宋湖州思溪资福禅寺版《大藏经》)的高丽藏本,均未署作者,而且书中的内容与龙树破斥的《正理经》相同的地方很多,可知并非是龙树的真作,而是他人的作品被宋人误题为龙树的。龙树虽然没有正面论述自己有关因明学的主张的著作,但他在《中论》等著作中仍运用了一些因明学的法则,特别是假言推理(以一个假言判断为前提,而推出结论的演绎推理)。即先假设一个判断(论题),加以否定,然后再假设一个判断,再作否定。他的弟子提婆,在《百论》等著作中还大量运用二难推理(由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组合起来的推理),即同时假设两个判断,然后从两个方面(或者这个,或者那个)进行推理,得出都不能成立的结论。但提婆也没有自己的因明学专著。

对因明予以特别的重视,并精心加以总结、提高和发展的,主要是大乘瑜伽行派。弥勒《瑜伽师地论》卷十五、无著《显扬圣教论》卷十、世亲《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卷七都是讲因明论式的。世亲还著有《论轨》、《论式》、《论心》三书,唐玄奘在印度留学时曾看到过它们,然而未曾带回国内,今已失传。另有《如实论》一卷(陈真谛译),宋、元、明藏本题为“世亲造”,但历代佛经目录以及高丽藏



本均未署作者。此论下分三品:《无道理难品》、《道理难品》、《堕负处品》。用因明论式反驳外道的质难,论证自家所说的如实。相传,它的梵文全本有二千颂,而汉译本仅是全本中的《反质难品》,仅万余字。

公元五世纪,瑜伽行派论师陈那出世,对传统的因明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将由正理派创立并为后世沿用的,由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组成的“五支作法”,改为由宗、因、喻组成的“三支作法”,并对因三相(构成正确的立论理由的三种条件。即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后详)作了明确的说明,从而使因明体系变得更加严谨、整齐、简约。因此,唐人将陈那以前的因明,称为“古因明”,陈那改革以后的因明,称为“新因明”。

新因明著作主要是由陈那、商羯罗主(陈那的弟子)、法称(陈那的再传弟子,即护法、自在军的门人)撰述的。陈那的因明著作共有八部,称为“陈那因明八论”。它们是:《因明正理门论》(唐玄奘译)、《观所缘缘论》(唐玄奘译)、《观总相论》(唐义净译)、《取因假设论》(唐义净译)、《集量论》(藏译本)、《观三世论》(藏译本)、《因门论》(已佚)、《似因门论》(已佚);商羯罗主的因明著作是《因明入正理论》(唐玄奘译);法称的因明著作主要有七部,称为“法称因明七论”。它们是:《量评释论》(又译《释量论》)、《量决择论》、《正理一滴论》、《因一滴论》、《观相属论》(又名《相续观察论》)、《论议正理论》(又名《诤正理论》)、《成他相续论》(又名《他相续成就论》),除《释量论》有现代法尊的汉译本以外,其余六论全是藏译本。其中,最重要的要数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集量论》,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法称的《正理一滴论》。

(一)《因明正理门论》 又名《因明正理门论本》、《正理门论》,一卷。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



藏》(第三十二册)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本等。书名中的“因明”一词,在梵文本(近代在印度发现)上是没有,是玄奘为了点明此论的性质加上去的。本书是陈那前期因明理论的代表作。论中主要论述了能立(又称真能立)、似能立、现量(又称真现量)、比量(又称真比量)、似现量、似比量、能破(又称真能破)、似能破等八个方面的因明论法。这中间,能立、能破讲的是正确的立论与反驳;似能立、似能破讲的是错误的立论与反驳;现量、比量讲的是正确的认识方法;似现量、似比量讲的是错误的认识方法。

1. 能立。指正确的立论。包括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三部分(三支)。宗,由“有法”(主词、事物)和“能别”(宾词、属性)组成,“唯随自乐为所成性”(即要求成立与论敌不同的主张)。因,有“三相”(三种条件):遍是宗法性,要求论题的主词全部包含于理由之中,并且为立论者和辩难者所共许;同品定有性,要求同品(与论题的宾词同类)一定要有理由的属性;异品遍无性,要求所有异品(与论题的宾词异类)不具有理由的属性。喻,分为同喻(又称合作法)和异喻(又称离作法)两类。同喻,是“以因合宗”,即用与理由同类的例证从正面说明论题的宾词,其顺序是“先因后宗”;异喻,是“由宗离因”,即用与理由异类的例证从反面说明论题的宾词与理由无关,其顺序是“先宗后因”(三支作法的例子是:“声是无常,所作性故,见诸所作皆无常,譬如瓶等,诸常住皆非所作,譬如虚空。”其中,“声是无常”是宗,即论题,“声”是主词,“无常”是宾词;“所作性故”是因,即理由;“见诸所作皆无常,譬如瓶等,诸常住皆非所作,譬如虚空”是喻,即例证,前二句为同喻,后二句为异喻)。

2. 似能立。指似是而非的立论,即错误的立论。包括似宗(错误的论题)、似因(错误的理由)、似喻(错误的例证)。其中“似宗”有自语相违、自教相违、世间相违、现量相违、比量相违五种,称



为“似宗五过”；“似因”包括：四不成、六不定、四相违。陈那有“九句因”，即：同品有异品有、同品有异品非有、同品有异品有非有、同品非有异品有、同品非有异品非有、同品非有异品有非有、同品有非有异品有、同品有非有异品非有、同品有非有异品有非有，其中的七句为不定因和相违因，属于正确理由的是第二句“同品有异品非有”和第八句“同品有非有异品非有”；“似喻”下分似同喻（又称似同法喻）和“似异喻”（又称似异法喻），各五种。

3. 现量。指正确的知觉，用于认识事物的自相。

4. 比量。指正确的推理，用于认识事物的共相。

5. 似现量。指错误的知觉。

6. 似比量。指错误的推理。

7. 能破。指正确的反驳，主要指能正确地指出对方立论的过错，下分分量破（建立一个宗、因、喻三支具足的论式去驳斥对方）和显过破（通过找出对方论式的过去进行反驳，有支缺、宗过、因过不成、因过不定、因过相违、喻过六种）。

8. 似能破。指错误的反驳，凡有似宗过破、似缺因过破、似喻过破、似不成因破、似不定因破、似相违破等十四种，称为“十四过类”。

全论详于立破（能立、似能立、能破、似能破），而对现量和比量的论述较少。

（二）《集量论》 这是陈那后期因明理论的代表作。唐景云二年（711），义净曾将论译为汉文，作四卷，后佚。传今的藏译本有两种本子：一为生根绛称（意译狮幢）所译，只有偈颂而无长行（注释）；二为德巴协饶（意译信智）所译，由二百五十颂和陈那自注（长行）组成。通行本是后一种。此论是陈那根据自撰的《因明正理门论》等著作中有关“量”（对事物的认识论证）的论述组织整理而成的，是陈那量学的集大成者。全书分为六品：《现量品》、《为自比量



品》、《为他比量品》、《观喻似喻品》、《观离品》、《观过类品》。每一品先明本宗,然后破斥异说。所破的异说有正理派、胜论派、数论派、弥曼蹉派等。

作者认为,量按主客体和结果来分,可以区别为能量(认识的主体)、所量(认识的客体)和量果(认识的结果)。这三者分别相当于唯识学上说的见分、相分 and 自证分;按形式来分,又可以分为现量(知觉)和比量(推理)。在以往的因明学家所说的现量、比量、声量(又称圣教量)、譬喻量、义准量、无体量等“六类量”中,只有现量和比量才有意义,声量等四类不能独立,只可隶属于比量。现量和比量的区别在于:前者凭感官直觉以获取知识,后者通过概念从已知推知未知。而概念都不是从正面表示意义的,乃是通过否定一方以承认另一方的办法,即“遮诠”法构成的;又将比量区分为两种,即为自比量和为他比量。为自比量,是为自己了知事物所作的推理。为他比量,是为他人了知事物所作的推理。此外,作者还以“三支作法”为中心,论述了逻辑规则和逻辑错误。

(三)《因明入正理论》略称《入正理论》,一卷。唐玄奘译,贞观二十一年(64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二册)本等。本书是商羯罗主为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所造的释论。它既是《因明正理门论》的入门书,也是新因明的纲要书。书首有“能立与能破,及似(指似能立、似能破)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指似现量、似比量)唯自悟”一偈(大意是说,能立、能破、似能立、似能破四门,具有启悟他人的作用,现量、比量、似现量、似比量四门,具有使自己了悟的作用。后人将它归纳为“八门二悟”,又称“八门二益”),总括全书的纲旨。下分能立、似能立、现量、比量、似现量、似比量、能破、似能破八门(但不立标题),进行具体论述。其中,能立和似能立二门为重点,解说较详,其余六门则为略说。能立门,主要解说正确的逻辑规则,包括宗(论题)的定义、因(理由)的三种条



件(三相)、喻(例证)的同法和异法(即同喻和异喻)等。似能立门,主要列举各种逻辑错误,有似宗九过、似因十四过、似喻十过,总计“三十三过”。其中,“似宗九过”包括:①相违过五种(现量相违、比量相违、自教相违、世间相违、自语相违)。②不极成过三种(能别不极成、所别不极成、俱不极成)。③相符极成过一种。“似因十四过”包括:①不成过四种(两俱不成、随一不成、犹豫不成、所依不成)。②不定过六种(共、不共、同品一分转异品遍转、异品一分转同品遍转、俱品一分转、相违决定)。③相违过四种(法自相相违因、法差别相违因、有法自相相违因、有法差别相违因)。“似喻十过”包括:①似同法喻(即似同喻)过五种(能立法不成、所立法不成、俱不成、无合、倒合)。②似异法喻(即似异喻)过五种(所立不遣、能立不遣、俱不遣、不离、倒离)。对逻辑错误的这般详细的分析与研究,为前人所未有。对于陈那在《因明正理门论》中提到的“九句因”,商羯罗主因感到由“因三相”作概括就足够了,故删而不叙。由于《因明入正理论》的内容较《因明正理门论》来得简明,因而也更为流行,研习者也更多。

(四)《正理一滴论》又名《正理一滴》、《正理滴论》、《正理方隅》。有藏译本。这是法称因明学的纲要书。法称先前曾评注陈那的《集量论》,撰成《量评释论》(又名《释量论》)一书。下分四品:《成量品》、《现量品》、《为自比量品》、《为他比量品》,共收偈颂一千四百五十四首(另有半首),对陈那的量学进行了阐释、补充和修正。由于《量评释论》篇幅较大,而且都是偈颂,不易理解。于是,法称又摄取《量评释论》的精要,以论述现量(知觉)、为自比量(为自己了知事物所作的推理)、为他比量(为他人了知事物所作的推理)为主,兼及正确的立论(能立)应具备的要素以及错误的立论(似能立)的表现形式,用长行(散文)撰写了《正理一滴论》。

全书分为《现量品》、《为自比量品》、《为他比量品》三品。在继



承陈那、商羯罗主因明体系的主要方面的同时,又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作了改进,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创见。主要表现在:在“能立”中,按照不可得、自性、果三种情况,对“因三相”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改革“三支作法”的顺序,将宗、因、喻的次序,改为喻、因、宗的次序,使之适合于一般人的语言习惯。在“似能立”中,废除了“似宗”中自教相违(所立的论题有违于自己信奉的教说)、能别不极成(论题中的宾词不为对方所承认)、所别不极成(论题中主词不为对方所承认)、俱不成(论题中的主词和宾词均不为对方所承认)等四种过失,而只保留现量相违等五种过失;认为属于个人思维方法范围内的“为自比量”,和属于语言表达(用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人,或提出自己的主张加以论证)范围内的“为他比量”,应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思维正确而语言不正确,或者语言正确而思维不正确的情况,即陈那、商羯罗主所说的“不共不定”(除论题的主词以外,宾词的同类、异类都不具有理由)和“相违决定”(争论双方的理由都是正确的)“似因”(又称因过)。法称又按照“九句因”论述“因过”,认为“相违因”只有第四句“同无异有”和第六句“同无异俱”,这比商羯罗主用“四相违”,即法自相相违(理由与论题中的宾词相矛盾)、法差别相违(理由与隐于论题中的宾词的意义相矛盾)、有法自相相违(理由与论题中的主词相矛盾)、有法差别相违(理由与隐于论题中的主词的意义相矛盾),在逻辑上更为严密。又认为,法差别相违因与法自相相违因实质上是一种;还在“似喻”中,将“似同喻”和“似异喻”各从原来的五种,增至九种,构成“似喻十八过”。

瑜伽行派的上述因明论,后来在我国内地和西藏地区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对我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四节 藏外典籍

大乘佛教的经典,绝大多数编在经、律、论三藏之内,但也有少量是在三藏之外单独流行的。这主要是西域地区编制的一些佛教集传。

其中,除《马鸣菩萨传》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龙树菩萨传》一卷(同译)、《提婆菩萨传》一卷(同译)、《婆薮槃豆法师传》(即《世亲传》)一卷(陈真谛译)等四传较为有名以外,其余的都不甚流传。

第四章 密教经轨的成立

印度贵霜王朝时代(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至三世纪末),因佛教的勃兴而一度沉寂的婆罗门教,在与民间信仰的神祇、仪式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了活力,逐渐实现了从旧婆罗门教向新婆罗门教(又称“印度教”)的转变。在接踵而来的笈多王朝时代(公元四世纪初至公元六世纪初),以梵天(创造之神)、毗湿奴天(又称韦纽天、那罗延天,为维持之神)、湿婆天(又称大自在天,为破坏之神,但又兼具救护治疗的性格)为三大主神的印度教,又分化为以毗湿奴天为至上神的毗湿奴派和以湿婆天为至上神的湿婆派。前者流行于南印度,后者流行于北印度,以此为契机,婆罗门教出现了全面复兴的景象。

与此同时,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则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对各自奉习的教义作封闭式的研究上。特别是瑜伽行派,在本来已经繁多的佛教名相事数之外,又提出了一大堆新的深奥艰涩的唯识学名词,并加以种种的组合和研究,使本来面向社会,旨在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下层民众提供精神依托场所的佛教,变成了只有少数专门家才能弄懂的冷僻的学问。而且瑜伽行派提倡渐修成佛,认为一个人仅在今世修六度万行仍不够,还需累世修行,持之以恒,历经三大阿僧祇劫(又称“三无数大劫”,指无法用数字表述的极为长远的时间),宇宙成、住、坏、空往复循环无数次,才



能最后成佛。这又使一般人望而生畏。佛教面临着如同小乘佛教后期所经历过的那种信众减少的萎缩危机。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争取更多的信仰者,后期瑜伽行派的一些论师对传统的佛教教义和修持法门进行了重大的改造。他们将适合民间信仰口味的印度教中的神祇、祭礼、咒语(又称陀罗尼、真言)、法术和事轨,经整理加工,大量地引入佛教,并用大乘佛教的一些理论予以说明。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佛教体系——秘密佛教,略称密教,又称密宗、真言乘、持明乘、金刚乘、怛特罗佛教(怛特罗意为续)等,以别于先前的小乘教和大乘教(统称为显教)。

这样,印度佛教在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前四世纪末)、部派佛教时期(公元前四世纪末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大乘佛教时期(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之后,最后进入了密教时期。这个时期大体上从七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十三世纪初穆斯林侵入印度,佛教在印度本土被摧毁绝迹为止。

第一节 密典的思想渊源与分类

以神秘主义的咒语和法术为特征的密教,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是在七世纪中叶成立的,但它的一些思想成分却早已在佛教内部存在,前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密教的起源和发展

咒术原本是古印度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原始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善咒和恶咒两种。善咒,是用于治病防



身等目的咒语；恶咒，是咒诅他人，使之遭受灾祸的咒语。雅利安人征服土著部落以后，便将它们吸收进自己的圣典，成为婆罗门教《阿闍婆吠陀》中所说神咒的主要来源之一。

对于咒术，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的初期是严加禁绝的。曾明确规定，凡是佛教僧人都不应学习和使用任何形式的咒语，如鬼咒、病咒、水火咒、安宅咒、火烧解咒、鼠咬解咒等等，也不能从事占卜生死、解梦、相手、相面、占星象等活动（见《长阿含经》卷十四《梵动经》）。要想得到解脱，唯有修习戒、定、慧“三学”一途。但到了后来，随着大量婆罗门教的信徒改宗佛教，僧团中出身于“外道”的人日益增多，考虑到这些人的思想底子，释迦牟尼开始允许弟子们使用善咒来治疗宿食不消、毒蛇咬伤、牙痛、腹痛等（见《四分律》卷二十七、《十诵律》卷四十六），但仍然禁止他们使用恶咒，也不允许以咒术谋生。

逮至部派佛教时期，咒语的使用范围更加扩大了。它不仅被用于治病防身，而且被用来降伏外道恶魔，策使鬼神（见《杂阿含经》卷九所收的第二百五十二经）。

大乘佛教兴起以后，为了与外道相抗衡，更是把咒语作为弘法护教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陀罗尼（也就是通常说的“咒语”），有总持、能持、能遮等含义，它具有总摄忆持无量佛法而不至于忘失的功能。能够于一法之中，持一切法；于一文之中，持一切文；于一义之中，持一切义。摄持各种善法，而遮除各种恶法（见《大智度论》卷五、《佛地经论》卷五），因此，凡是大乘菩萨都必须掌握陀罗尼。

龙树在《大智度论》卷五、二十八还将陀罗尼分为四类：（一）闻持陀罗尼，它能使耳闻之事不忘。（二）分别知陀罗尼，它能区别一切邪正、好丑。（三）入音声陀罗尼，它能闻一切言语音声，欢喜而不瞋。（四）字入门陀罗尼，它能通过听闻悉昙四十二字门



(即梵语四十二个字母),体达诸法实相。弥勒的《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五举出“四陀罗尼”: (一) 法陀罗尼,能记忆经句不忘。(二) 义陀罗尼,能理解经义不忘。(三) 咒陀罗尼,依禅定力起咒术,能消除众生的灾厄。(四) 忍陀罗尼,能通达诸法的实相而不失。凡此种种,对陀罗尼现象进行了解释。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初期的大乘经,如《心经》、《法华经》等起初并无咒语,但到后来都增入了咒语(这从它们传入汉地时的初译和后来的重译所呈现的差异可以获悉)。至于中期大乘经中使用陀罗尼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大集经》、《宝积经》、《光明经》、《楞伽经》等显教要典中均有载录咒语的专章——陀罗尼品。其他典籍中叙及的陀罗尼片段就更多了。

然而,相对于后来的密教来说,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时期出现的陀罗尼法门,仍然是一种专重于事相(指修持实践,相对于宣说教理的“教相”而言)的作法,如明咒(与陀罗尼意思相通。也有的学者主张,将长的咒文称为陀罗尼,短的咒文称真言,只有一、二个字的咒文称为种子)、瑜伽(意为相应)、护摩(意为火祭、火供)等,尚无完整的教理体系,也没有在菩萨行中居于主导地位。那时,陀罗尼法门只是作为显教教法的辅助手段而存在,它从属于显教,是显教体系中的一个成分。

七世纪中叶,著名的密教经典《大日经》(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在西印度成立,稍后,《金刚顶经》(全称《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又在西南印度问世。以此为标志,宣告了独立的密教体系的确立。为此,人们将这两部大经以前出现的陀罗尼法门,称为前期密教,又称杂部密教、杂密、旧密。而将以两部大经为代表开始的密教,称为中期密教,又称纯正密教、瑜伽密教、纯密、新密。

具有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密教,与先前的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



(统称为显教)相比,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就教主和传教方式而言,显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应身佛),而密教的教主是大日如来(法身佛);显教是释迦牟尼针对不同根器的众生而说的,因而它是公开的、浅显的、随他意的。密教是大日如来自说内心证悟的真理,因而是秘密的、深奥的、随自意的;显教的教法,可以通过自学经典而获得,不一定要师资传授,也不必有一定的仪式。而密教的教法,则必须通过师资传授才能领受,从皈依到成为阿阇梨(导师)都要经历一系列的灌顶(用象征如来智慧的甘露水浇灌头顶)仪式:皈依佛门有结缘灌顶,欲学密法有学法灌顶(又称受明灌顶、弟子灌顶),受戒有受戒灌顶,升为阿阇梨有传法灌顶(又称付法灌顶、阿阇梨灌顶)。而传法灌顶之中,又分为印法灌顶(又称秘印灌顶、手印灌顶)、事业灌顶(又称作业灌顶、具支灌顶)、以心灌顶(又称心授灌顶、瑜祇灌顶)。及其修法,又有种种相应的规式。而所有的灌顶和修法仪式,又都必须在有相应布置的坛场内进行。

就教义和修法而言,显教中的小乘有四谛、十二因缘、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义,大乘有六度、十地等义,而密教则从本体、相状和作用(亦即实践)三方面,建立了由六大(此为体大,指周遍一切法界的本体)、四曼荼罗(此为相大)、三密(此为用大)组成的“三大”学说。

六大,又称六大缘起,指构成宇宙万有本体的六种基本元素,即地、水、火、风、空、识。前五者属于“色法”(物质),后者属于“心法”(精神)。而六大中的每一大又互具其他五大,此为异类无碍;构成甲物的六大和构成乙物的六大也互具互遍,此为同类无碍。因此,构成众生的六大和构成佛菩萨诸尊的六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众生和佛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为此,密教主张“生(众生)佛平等”。



四曼荼罗,又称四种曼荼罗。曼荼罗(又译曼陀罗)意为坛场、聚集,起初指修作密法时在地上划定的某一区域或建立的供佛菩萨之用的土坛,后来也指按密教经典所说绘制的作供养用的佛菩萨的集体图像。所说的四曼荼罗就是指表现佛菩萨诸尊相状的四种图像:大曼荼罗、三昧耶(意为本誓)曼荼罗、法曼荼罗、羯磨曼荼罗。大曼荼罗,又称尊形曼荼罗,指表现诸尊具足相好容貌的身形图像;三昧耶曼荼罗,指表现诸尊所持的刀剑、轮宝、金刚、莲花等物,以及用手指结成的印契的图像;法曼荼罗,又称种子曼荼罗,指表现诸尊自证法门的种子(象征神秘意义的梵文字母)和真言(陀罗尼,即咒语);羯磨曼荼罗,指表现诸尊的威仪、事业的图像。

三密,又称三种秘密,指密教的三种修行法门:身密、口密(又称语密)、意密。佛的三密体现在四曼荼罗之中。大曼荼罗为佛的身密,三昧耶曼荼罗为佛的意密,法曼荼罗为佛的语密,羯磨曼荼罗则为“三密”的业用,它包括绘、捏、铸造佛像等事业。对于修习密教的人来说,身密,指的是手结本尊的印契;口密,指的是口诵本尊的真言;意密,指的是内心观想本尊,心住三摩地(即进入禅定的境界)。

密教认为,既然众生和佛菩萨的本体是相同的,众生只要通过加持“三密”(又称三密加持),与佛菩萨的性德和境界相应,就能即身成佛,由父母所生的肉身,速疾地成就佛果,而无须像显教所说的那样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久远的时间。

“纯密”即正式的密教是在以曲女城(今印度勒克瑙)为都,建立了五印度大一统政权的戒日王(606—647在位)王朝解体之后出现的,并在以东印度孟加拉的奥里萨为基业发展起来的波罗王朝(600—1139)达到鼎盛。波罗王朝共有十八代。其中第一代瞿波罗(600—705)在摩揭陀建立了飞行寺(又名欧丹多补梨寺),第四代达磨波罗(766—829)建立了超戒寺(又名毗訖罗摩尸罗寺)。飞



行寺、超戒寺，连同戒日王时已存在的那烂陀寺，后来成了密教的三大寺院。

纯密分为胎藏部和金刚顶部两大系统。胎藏部以《大日经》为根本经典，因修习胎藏界法而得名。金刚顶部以《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因修习金刚界法而得名。

胎藏界和金刚界，本是纯密在以“六大”为法界的体性和大日如来的三昧耶身(进入禅定境界后的行相)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互相配合的两大教门。胎藏界，又称理性平等门、他受法乐门、理门、因门。它以莲花为标志，象征一切众生都平等地含有大日如来的理性种子，只要修持大悲万行，显现净心，自利利他，就能成就佛身。为此，依据大日如来的“三德”——大定、大智、大悲，而立佛、金刚、莲花三部，并依据《大日经》而绘制修法时必备的胎藏界曼荼罗；金刚界，又称智慧差别门、自受法乐门、智门、果门。它以金刚杵等武器为标志，象征大日如来内证的智德坚固无比，不为一切烦恼所动摇。为了使众生能够“即身成佛”，它提出，将有漏的“九识”转变为大日如来的“五智”，即转第九识阿摩罗识为法界体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以除障成身，自乐法乐。为此，金刚界据“五智”而立佛、金刚、宝、莲花、羯磨五部，并依据《金刚顶经》绘制金刚界曼荼罗。

据金、胎两部大法的共同受持者唐代净住寺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说，胎藏界法由大日如来付嘱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经数百年传给中印度那烂陀寺的达磨掬多阿闍梨(意为导师)，达磨掬多亲自传给善无畏，善无畏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传入中国；金刚界法由大日如来付嘱普贤金刚萨埵(密号真如金刚)，普贤付妙吉祥菩萨，妙吉祥经十二代传给龙猛菩萨(即通常说的龙树)，龙猛又经数百年传给龙智阿闍梨，龙智经百余年来亲自付嘱金刚智，



金刚智来华后传付不空,两人同弘此法。

如果撇开金、胎两部初期传授人物上的神话色彩,据史判断的话,那么,在胎藏部中,只有达磨掬多——善无畏——入华,在金刚顶部中,只有龙智——金刚智——入华,即纯密在唐代传入中国前后的这几代传承才是有确凿的史料可证的。

由于胎藏界教法被看作是从果向因下转的化他门,而金刚界法则从因向果上转的自证门,因此,在印度本土,虽然胎藏部的《大日经》先行问世,奠定了纯正密教的理论基础,但没有多久,它的首席地位便为继出的金刚顶部的《金刚顶经》所取代。流传于后世的纯密经典多与《金刚顶经》有关。

公元八世纪初,在印度教中湿婆派崇尚湿婆天和它的配偶杜尔嘉性力(生殖力)的影响下,印度密教发生了一些变化,转而进入了后期,近世学术界称之为“左道密教”。作为密教的别称“怛特罗佛教”一词,大概是在这个时期才流传开来的。

显教以释迦牟尼佛的诞生之地迦毗罗卫、成道之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之地鹿野苑、涅槃之地拘尸那迦,为“四圣地”;而怛特罗佛教则以郁地延那、普尔纳基里、迦摩基那、室利哈达为密教的“四圣地”(此据藏译本《成就法鬘》。若据梵本《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说密印品》,则为:扎奈达拉、郁地延那、保尔纳基里、迦摩缕波)。据学者考证,这密教的“四圣地”其时在西北印度,是怛特罗佛教兴盛的地区。其中,郁地延那为怛特罗佛教的最初发祥地。郁地延那便是《法显传》所说的“乌苌国”,《大唐西域记》卷三称之为“乌仗那国”,其地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一带。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在今印度北部的阿萨密。据藏传《八十四成就者传》说,郁地延那是拥有五十万人口都市的国家,由以因陀罗菩提为王的三婆罗国和以加拉因陀罗为王的楞伽普罗国两个小国组成。两国之间有联姻关系。因陀罗菩提的妹妹拉克修米迦罗为加拉因陀罗



之妻。

后期怛特罗佛教包括金刚乘和时轮乘。

金刚乘是由郁地延那的因陀罗菩提王(687—717 在位)创立的。他著有二十三部密典,其中最重要的是《智慧成就法》。而这部书的内容,在他妹妹拉克修米迦罗所著的《无二成就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日本佐佐木教悟等《印度佛教史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说,拉克修米迦罗的教义也称“俱生乘”,其徒被称为“萨哈阁”,至今在孟加拉仍能找到这种信仰的痕迹。因陀罗菩提王后来让国与子,专修密法。他的另一个儿子莲花生应藏王赤松德赞的邀请入藏传教,成为西藏密教的实际开创者。

金刚乘以散见于《金刚顶经》中的“大乐”说为立论的依据。它认为,密法的修证是通过智慧和方便两者的结合来实现的。智慧具有静的特性,犹如女性;方便具有动的特性,犹如男性。因而主张通过男女双身修法(又称男女双修)和谐阴阳,体悟空性,进入智慧与方便不二的“大乐”境界。

时轮乘是由金刚乘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它是金刚乘的支派。相传,十一世纪之初,香巴拉国第一代君主耶舍王为了抗御西亚突厥系伊斯兰教徒的入侵,将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组织起来,授与时轮大密法灌顶,并宣讲时轮教法。由此而形成时轮乘。关于香巴拉国的地址,有些学者认为,它出于密教的虚构,并非实有其地。也有的学者认为,它可能是注入阿拉尔海的雅库沙尔德斯北面的一个地方或印度境外的某一个地方。最早的《时轮经》三千颂便是由耶舍撰作的,他的儿子芬陀利王为之作注(一说《时轮经》及其注释,是1040年以后活跃于摩揭陀国的大时足、小时足两人合撰的)。时轮乘认为,现实的存在像时间的车轮(时轮)一样,倏忽即逝,只有信仰宇宙本原的“本初佛”,才能从由现在、过去、未来三世所限定的迷妄中解脱出来。



但特罗佛教在波罗王朝的护持下,一直很兴盛。十二世纪中叶,由于取代波罗王朝的斯那王朝改信印度教,但特罗佛教日趋衰颓。至十二世纪末,穆斯林袭灭了斯那王朝,并荡涤了一切佛寺,作为但特罗佛教的最大的据点超戒寺也被平毁,僧众四处逃散,密教因之而在印度本土消失。

二、密典的部类

密教经典,在印度统称为禁咒藏、持明咒、明咒藏、咒藏。据研究,叙列听法会众名氏的《长阿含经》卷十二《大会经》等便是此类经典的初型。在部派佛教时期,又形成了专门的类别。

上座部系统中的犍子部有“四藏”,即在经律论“三藏”之外,别立咒藏;法藏部有“五藏”,即在“三藏”之外,别立咒藏和菩萨藏;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别说部)的经藏和律藏中,有说护身等偈的经典,斯里兰卡等地的佛教徒将其编为《明护经》,至今仍有流传;大众部系统中的一说部也有“五藏”,不过它是在经律论之外,加上杂藏(收录叙说佛、菩萨、罗汉的本生因缘的经典)和咒藏(以上参见唐窥基《异部宗轮论述记》、《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二等)。

另据初唐时期去印度求法的义净介绍,“持明咒藏”的梵本有十万颂,如果译成汉文的话,可成三百卷。传说,它是龙树的弟子阿难编辑的,但流传到当时,已是“多失少全”(见《大唐求法高僧传》卷下《道琳传》)。至于这一持明咒藏究竟包括哪些经典,有没有子类细目,史书阙载。据分析,那时可能还没有发展到区分子类细目的程度。

密教经典自后汉陆续传入汉地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依附于显教经典而流传的,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门类。即使是唐代最著



名的佛经目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也没有密教经典的专类。汉地佛经目录中,将密教典籍作为一大门类,单独列出,是从元代庆吉祥等编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开始的。这部经录将大乘经分为“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两项,并在密教大乘经下分“大乘秘密陀罗尼经”和“大乘仪轨念诵”两目,将原先编在《开元释教录》“五大部外诸重译经”和“大乘经单译”中的密教经典抽出,续以新译,并以契经和仪轨相区分,从而形成了佛经目录中的密典系统。

至明代,寂晓编《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将所有的佛典分为八大部,其中第七部为“陀罗尼部”,专收密教经典。并根据经、仪轨、论、此方撰述以及译本的单重(即只有一次翻译,还是有几次翻译),将它们分为七目:重单译经单本;重译经单重本;重单译经仪轨单本;重译仪轨单本;单译集义论颂本;此方传集法本;此方释经疏记本。智旭编《阅藏知津》,将大乘经分为五大部,其中第二部为“方等部”,下分“显说”和“密咒”两小部,密咒部下分经和仪轨两项。

上述密典分类法,总的来说仍不免有些笼统,这也是由于汉地佛教的主流始终是显教大乘,而不是显教小乘或密教所致。密教只是在唐代盛行了一个时期,以后虽然也有一些传持者,但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效应。

而在西藏地区,无论是前弘期佛教(九世纪中叶藏王朗达玛毁佛以前的佛教)还是后弘期佛教(朗达玛毁佛以后的佛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密教。由于密教特别兴盛,因而对密典的研究和分类也较内地来得发达和细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布顿(1290—1364)在《佛教史大宝藏论》(又称《善逝教法史》、《布顿佛教史》)中提出的密典分类法。

布顿将密教典籍分为经和论两大类。经,按四部分类:(一)事部(又称事续部、作怛特罗部,“续”即为“怛特罗”的意译),下分



妙吉祥、观世音、金刚手(附“注释续”)、不动金刚、明母中的救度母、顶髻、一切续、各种小咒等类。收《文殊室利根本仪轨经》等；(二)行部(又称行续部、行怛特罗部)，收《大日经》等；(三)瑜伽部(又称瑜伽续部、瑜伽怛特罗部)，收《金刚顶经》等；(四)无上瑜伽部(又称大瑜伽部、无上瑜伽续部、无上瑜伽怛特罗部)，下分无上瑜伽方便、无上瑜伽智慧(包括呼金刚、胜乐金刚、大手印明点)、方便智慧无二三类，收《密集》、《时轮》等。论，下分“各种密经的释论”和“共通密经的释论”两项，并立子目。

布顿还将这一分类法直接运用于藏文《大藏经》，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藏传佛教最大的教派——格鲁派(又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在《秘密道次第广论》中所说的“四种怛特罗”(即四部)也是由此而来的。

密教于我国中唐时期由入唐求法僧最澄(767—822)、空海(774—835)等传入日本。其中，最澄在比睿山寺创立的天台宗系密教，被称为“台密”；空海在高野山东寺(即教王护国寺)创立的日本真言宗，被称为“东密”。以此为启端，密教经典在日本也广为流传。

日本学者对密典的分类，以日本平安时代安然(841—?)编的《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类总录》和近世集体编著的《大藏经索引·收录典籍解题》较为有名。前者把密典分为二十部：三灌顶、胎藏界、金刚界、苏悉地、诸如来、诸佛顶、诸佛母、诸经法、诸观音、诸菩萨、诸金刚、诸忿怒、诸世天、诸天供、诸护摩、诸礼赞、诸赞叹、诸悉昙、诸碑传、诸图像；后者将密典分为九类：大日经类、金刚顶经类、苏悉地经类、护摩轨类等、受戒法类、诸佛轨类、诸佛顶轨类、诸经轨类、陀罗尼类。其中，前八类是有一定的修道体系的有组织的密教经典，末一类是以庶民的祈祷与愿望为内容的未经组织的密教经典。

上述情况表明，经过历代佛教学者的潜心研究，密教典籍的分类正在日趋缜密和科学化。本书将密典分为早期密典、中期密典



和晚期密典三大类予以介绍,便是基于密典产生、发展的历史顺序,并依据它们的思想内容而确立的。

第二节 早期密典

早期密典,指的是以介绍陀罗尼、念诵、印契、护摩、观佛、诸尊供养等事相的作法(与说明教理的“教相”相对)为主的杂部密教的经典。大体上相当于藏传佛教所说的“事部”经典(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在“事部”中还收录了中、后期出现的属于杂咒性质的经典)。

早期密教经典叙述的修法极为广泛,归纳起来有六种:一、息灾法。指为消除自身和他人的种种病难恶事而修的密法。二、增益法。指为增益自身和他人的寿命、福德、智慧等而修的密法。三、敬爱法。指为自身和他人祈求得到佛菩萨的加被,或君王众人的爱护而修的密法。四、降伏法。指为自身和他人调伏恶人等事而修的密法。五、钩召法。指为召请密教本尊(佛、菩萨、金刚等)而修的密法。六、延命法。指为延年益寿而修的密法。由于钩召法摄于敬爱法之中,延命法也可看作是增益法分支,故密教的修法最根本的是前四种,通常称之为四成就法,又称四种护摩法、四种坛法。每一类修法又包括许多具体的法门,并要求有相应的护摩坛、时分、供物、念诵、坐法、灯油、烧香等。中、后期密教所修的种种事相,如孔雀王法、七佛药师法、不动明王法、大元帅法、大炽盛光法、大安镇法、护国法、请雨法、止雨法、佛顶法、佛眼法、圣观音法、大威德法、军荼利法、如意轮法、吉祥天法、普贤延命法、金刚夜叉法、一字金轮法、降三世法、大北斗法、准提法等等,就其性能和作用而言,实不超出四成就法的范围。就其渊源而言,有不少



是从早期密教的修行法门发展而来的。

早期密典的数量很多,而且内容十分散杂,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八吉祥神咒经》、《持句神咒经》、《华积陀罗尼神咒经》、《大孔雀神咒经》、《大灌顶神咒经》、《善法方便陀罗尼经》、《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大方等陀罗尼经》、《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大吉义神咒经》、《牟梨曼陀罗咒经》、《虚空藏菩萨问七佛陀罗尼经》、《陀罗尼杂集》、《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种种杂咒经》、《大云轮请雨经》、《十二佛名神咒较量功德除障灭罪经》、《不空罽索观世音心咒经》、《药师如来本愿经》、《陀罗尼集经》等。

(一)《八吉祥神咒经》 又名《八吉祥经》、《八吉祥咒经》、《吉祥经》,一卷。孙吴支谦译(一说失译),黄武二年(223)至建兴二年(25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四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佛在罗阇祇城耆闍崛山,应舍利弗之问,而说受持读诵东方八佛的名号,和八吉祥神咒的功德。所说的东方八佛是:难降伏世界的善说称功德如来、无障碍世界的因陀罗幢星如来、爱乐世界的普光明功德庄严如来、普入世界的善斗战难降伏超越如来、净聚世界的普功德明庄严如来、无毒主世界的无碍药树功德称如来、侧塞香满世界的步宝莲华如来、妙音明世界的宝莲华善住沙罗树王如来。它的异译本有:西晋竺法护译的《八阳神咒经》一卷、梁僧伽婆罗译的《八吉祥经》一卷、隋闍那崛多译的《八佛名号经》一卷。

(二)《持句神咒经》 又名《陀罗尼句经》,一卷。孙吴支谦译(一说失译),黄武二年(223)至建兴二年(25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佛在祇树给孤独园时,大光明、无量光明二菩萨奉东方众花国最胜灯王如来之命,前来说安宅陀罗尼咒的情况。它的异译本有:东汉失译的《安宅陀罗尼咒经》一卷、东晋竺昙无兰译的《陀邻尼钵经》一卷、隋闍那崛多译的



《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一卷、北宋施护译的《圣最上灯明如来陀罗经》一卷。

(三)《华积陀罗尼神咒经》又名《华积经》，一卷。孙吴支谦译(一说失译)。黄武二年(223)至建兴二年(25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佛在阿耨达池龙王宫，应师子威菩萨之问，而说佛和供养佛的功德，以及有关的咒语。它的异译本有：东晋失译的《师子奋迅菩萨所问经》一卷、《华聚陀罗尼咒经》一卷、北宋施护译的《华积楼阁陀罗尼经》一卷。

(四)《大孔雀王神咒经》又名《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孔雀王咒经》、《孔雀王经》等，一卷。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建武元年(317)至永昌元年(322)译出。帛尸梨蜜多罗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呈一面四臂之相，手持莲花(表敬爱)、俱缘果(表调伏)、吉祥果(表增益)、孔雀尾(表息灾)，跨乘金色孔雀的孔雀明王，具有息灾、请雨、止雨、消除病恼、安产等作用的大孔雀王心咒，以及弥勒菩萨、梵天、帝释天、龙王、药叉、罗刹、宿曜等名。为孔雀王经法的本经。而孔雀王经法与依《大云轮请雨经》而立的请雨经法、依《仁王般若经》(或《仁王念诵仪轨》)而立的仁王经法、依《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而立的守护经法，并称密教的“四大法”。《大孔雀王神咒经》的异译本有：二秦失译(一说帛尸梨蜜多罗译)的《大孔雀王杂神咒经》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一说失译)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梁僧伽婆罗译的《孔雀王咒经》二卷、唐义净译的《大孔雀咒王经》三卷、不空译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

(五)《大灌顶神咒经》又名《大灌顶经》、《灌顶经》，十二卷。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建武元年(317)至永昌元年(32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此经由十二部小经组成，依次为：《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十二万神王护比丘咒经》、《三



归五戒带佩护身咒经》(明藏本则将此经列为第一)、《百结神王护身咒经》、《咒宫宅神王守镇左右经》、《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伏魔封印大神咒经》、《摩尼亶大神咒经》、《召五方龙王摄疫毒神咒上品经》、《梵天神策经》、《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每一小经的经名之首均冠有“佛说灌顶”四字。各经所说的内容不一,大抵是说具有不同效应的各种神咒。对于此经,有的学者认为是伪经。也有的学者认为,末三卷为后人所集(见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六)《善法方便陀罗尼经》一卷。东晋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经中叙述了佛在菩提道场,应金刚手菩萨之请,而宣说的延寿神咒,以及金刚手菩萨、梵王、帝释、四天王、鬼子母、药叉、大自在天子、童子军将、月光天子、圣观自在、慈氏(弥勒)菩萨、雪山大乐叉、金刚商羯罗天女、金刚军、金刚使者等一一随喜宣说的延寿真言。它的异译本有:东晋失译的《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经》一卷、唐菩提流志译的《护命法门神咒经》一卷、北宋法贤译的《延寿妙门陀罗尼经》一卷。

(七)《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又名《请观世音经》、《请观世音消伏毒害陀罗尼经》,一卷。东晋竺难提译,元熙元年(419)译出。竺难提的生平事迹见《开元释教录》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观世音菩萨为了替毗舍离国人民解除疾病困厄,教他们称念三宝及观世音菩萨名号、十方诸佛救护众生神咒、破恶业障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等,以及佛继之而说的大吉祥六字章句救苦神咒、灌顶吉祥陀罗尼等。本经为天台宗请观世音菩萨,及忏悔时行观世音忏法所依用的重要经典。它的异译本有:东晋失译的《六字咒王经》一卷、梁代失译的《六字神咒王经》一卷。

(八)《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又名《七佛所说神



咒经》、《大陀罗尼神咒经》、《七佛八菩萨大陀罗尼神咒经广济诸众生》，四卷。东晋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七佛(维卫佛、式佛、随叶佛、拘留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八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虚空藏菩萨、观世音菩萨、救脱菩萨、跋陀和菩萨、大势至菩萨、得大势菩萨、坚勇菩萨)为广济众生所说的神咒。此经被认为是纯正密教的思想渊源之一。

(九)《大方等陀罗尼经》 又名《方等檀持陀罗尼经》、《檀持陀罗尼经》，四卷。北凉法众译，永安元年(401)至十一年(411)译出。法众的生平事迹见《开元释教录》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下分五分：《初分》、《授记分》、《梦行分》、《护戒分》、《不思议莲华分》。对修忏行道、灭罪增寿、善恶梦应等作了论述。其中以对菩萨的二十四重戒的论述最引人注目。明智旭《阅藏知津》卷十二说：“此经在《法华》后说，亦可收入法华部，但以坛法尊重，故归密部。”

(十)《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又名《药王药上经》，一卷。刘宋重良耶舍译，元嘉元年(424)至十九年(442)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药王、药上二菩萨的功德、观法、咒语，以及他们的往昔因缘(本生故事)。说，过去世，在琉璃光照如来世界，有星宿光长者和其弟电光明，因以醍醐良药供养日藏比丘和其他众僧，而成为以药广施众生的药王菩萨和药上菩萨，他们是药师佛的侍者。

(十一)《大吉义神咒经》 又名《大吉义咒经》，二卷。北魏昙曜译(一说失译)，和平三年(462)译出。昙曜的生平事迹见《开元释教录》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帝释与阿修罗作战，帝释战败，请教于佛，佛为说大结界咒等事。设立咒场的结界法和祈雨的成就法，是由这部经典首次提



出的(见日本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第十一章第五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十二)《牟梨曼陀罗咒经》一卷。梁代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在道场绘制大宝广博楼阁曼荼罗(又译曼陀罗),在曼荼罗前设大坛及护摩坛,供养释迦牟尼佛,诵咒、作手印,以灭罪和使亡者得到解脱的秘法。据研究,印契和护摩法是由此经首次传出的(见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它的异译本有:唐菩提流支译的《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三卷、不空译的《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三卷。

(十三)《虚空藏菩萨问七佛陀罗尼咒经》又名《虚空藏问七佛陀罗尼经》、《七佛神咒经》,一卷。梁代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佛在鸡罗莎山顶时,有一比丘为恶鬼所捉,另一比丘著于邪魅,痛苦不堪,佛应虚空藏菩萨之请,显神力,七佛显于空中,各说灭除疾苦、远离鬼魅的神咒的事情。它异译本有:隋阇那崛多译的《如来方便善巧咒经》一卷、北宋法天译的《圣虚空藏菩萨陀罗尼经》一卷。

(十四)《陀罗尼杂集》又名《杂咒集》,十卷。梁代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收录了《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咒土经》、《佛说咒六字神王经》、《摩尼罗亶咒经》、《神水咒经》、《集法悦舍苦陀罗尼经》、《观佛三昧经》、《日藏经》、《四天下咒经》等一百几十种经典中的二百三十九首陀罗尼,以及诸菩萨、天王、龙王的发愿说偈、咒应器锡杖坐具、五戒神名、三归神名、护僧伽蓝神名等。对于研究早期密教及经典具有重要的价值。

(十五)《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又名《十一面观世音咒并功德经》、《十一面神咒经》,一卷。北周耶舍崛多译,保定四年(564)至天和六年(571)译出。耶舍崛多的生平事迹见《开元释教录》卷



七。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的真言功德、修行仪轨、成就处和护摩仪轨。密教中有教化六道众生的“六观音”:化导饿鬼的千手观音、化导地狱的圣观音、化导畜生的马头观音、化导阿修罗的十一面观音、化导人间的不空罽索观音(或准胝观音)、化导天神的如意轮观音。本经所说的十一面观音即为“六观音”之一。其形像为十一面(前三面、左三面、右三面、后一面、顶一面)四臂(亦作二臂、八臂)。本经的异译本有:唐玄奘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一卷、不空译的《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三卷。

(十六)《种种杂咒经》一卷。北周阇那崛多译,保定四年(564)至天和六年(571)译出。阇那崛多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本经首列《法华经》内咒六首,次叙施塔灭罪陀罗尼、礼拜灭罪命终诸佛来迎咒、供养三宝咒、坐禅安稳咒、七俱胝佛神咒、六字陀罗尼咒等。

(十七)《大云轮请雨经》又名《大云轮经》、《请雨经》,二卷。隋那连提耶舍译,开皇五年(585)译出。那连提耶舍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经中叙述了佛在龙宫对龙王等说十种供养云海和降雨的利益、五十四佛名,以及请雨的咒法。它的异译本有:北周阇那崛多译的《大方等大云经·请雨品》、唐不空译的《大云轮请雨经》二卷。晚近在新疆吐鲁番还发掘出与此经相似的回鹘文佛经的残本。

(十八)《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灭罪经》又名《十二佛名神咒经》,一卷。隋阇那崛多译,开皇七年(58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叙述了东方二佛、四方(东、南、西、北)四佛、四维(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佛、上下二佛等十二佛的名号,以及持咒、忏悔、回向等除障灭罪的方法。它异译本有:唐义净译的《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一卷。



(十九)《不空罽索观世音心咒经》又名《不空罽索咒经》，一卷。隋阇那崛多译，开皇七年(587)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经中叙述了以慈悲之罽索(即绳索)爱护接引众生的不空罽索观世音菩萨(六观音之一)所说的“不空罽索心王母陀罗尼真言”，以及受持读诵它，能够得到的现世的二十种功德和临终的八种利益。它的异译本有：唐菩提流志译的《不空罽索咒心经》一卷、玄奘译的《不空罽索神咒心经》一卷。此二本均相当于菩提流志译的《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三十卷中的《母陀罗尼真言序品》。《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的经文与《大日经》相似之处很多，故有些学者认为它是《大日经》的先驱。

(二十)《药师如来本愿经》又名《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药师本愿经》，一卷。隋达摩笈多译，大业十一年(615)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四册)本等。经中叙述了东方净琉璃光世界的教主药师如来(又称药师佛、七佛药师等)，在过去世修菩萨行时，因发“众病逼切，无护无依者，闻我名，众患悉除”；“为饥渴所恼而造诸恶业者，若闻我名，我先以妙色香味食，饱足其身，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贪无衣服者，闻我名，我当施彼随用衣服，乃至庄严之具，皆令满足”等十二大愿，而得以成佛的故事。说，若能尽心供养药师佛，就能苏生续命，离苦得乐。它的异译本有：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的《大灌顶神咒经》中的《拔除罪过生死得度经》一卷、唐玄奘译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一卷、义净译的《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经》一卷。

(二十一)《陀罗尼集经》十二卷。唐阿地瞿多译，永徽四年(653)至永徽五年(654)译出。阿地瞿多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经中收录了佛顶、如来、观世音、金刚、诸天、杂部等坛法咒术，相传为印度密教经典的总集《持明咒藏》的抄译本，杂密的集大成者。日本《大藏经索



引·收录典籍解题》说：“《陀罗尼集经》以量而言，是密部最大的经典。此经是杂密的诸尊法轨，以说诸尊之印、真言为主，但在卷十二述说了诸佛集会之都曼荼罗与灌顶，共七日作法与灌顶之即身作佛义等，几乎胜过胎藏大法。同时亦说了不少纯正密教共同的印真言。”

早期密教的经典除上述二十一部以外，尚有：孙吴支谦译的《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也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显教经典）、东晋竺昙无兰译的《檀持罗麻油述神咒经》一卷、《咒时气病经》一卷、《咒齿经》一卷、《咒目经》一卷、《咒小儿经》一卷，东晋失译的《辟除贼毒害咒经》一卷，梁代失译的《大普贤陀罗尼经》一卷，等等。其内容都是讲述能产生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特殊神力的陀罗尼真言的。

第三节 中期密典

中期密典，指的是按一定的教理体系（教相）和修持法门（事相）组织起来的纯正密教的经典。大体上相当于汉传佛教中说的“胎藏部”和“金刚顶部”密典，或藏传佛教中说的“行部”和“瑜伽部”密典，以及与两部关系密切，自唐开始才见翻译流传的其他密典。

一般来说，早期的杂部密典偏重于“事相”，很少讲“教相”。而在讲“事相”时，虽然也有身密、口密、意密“三密相应”的说法，但更多的是讲“口密”，即陀罗尼（真言、咒语）。认为梵文中的每一个字母（四十二字母、五十字母）、每一个音节都有特定的意义，而所有神祇都有表征自身的声音文字，因而行者（修行者）只要念诵它们的声音文字（咒语），就能与诸神发生感应，产生相关的不可思议的神力。故杂部密典论述的中心不外乎是与某一供养对象（本尊）有



关的咒语、这番咒语的来历,以及念诵它所能产生的效应(功德)。如果将密教经典分为讲教理的“经”和讲具体的修持实践的“仪轨”的话,那么,杂部密典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仪轨”一类。

而中期的纯正密典则既讲“事相”,也讲“教相”,并且以教相统摄事相。就事相而言,它将曼荼罗(坛场、图像)、陀罗尼(咒语)、母陀罗(印契)、灌顶、护摩等与作为供养祈请对象的佛、菩萨、金刚、明王等复杂地组合起来,并作了详细的规定,从而继承并发展了杂部密教的修密行法。

就教相而言,它又形成了以下特点:一、以“六大”为宇宙的本初和密法的根源。认为密教中的胎藏界是由“六大”中的地、水、火、风、空构成的,而金刚界是由识构成的。二、以大日如来为最高本尊、觉界的总代表,金刚萨埵为理想的人像、迷界的总代表。并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将各方佛、菩萨、金刚等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三、将大乘中观学派的“般若性空”说和瑜伽行派的“转识成智”说吸收入自己的教说之中。四、提倡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的修行实践,既重视外在的密法修持仪式,更重视内在的瑜伽观行,如内护摩、内曼荼罗、四种念诵、字轮观等,以达到自我开发,即身成佛的目的。

这里说的“内护摩”,是指修行者从内心观想智火。以智火焚毁一切无明(烦恼),并观住于“我即大日如来”,以达到获得菩提心的目的;“内曼荼罗”,是指从内心观想诸佛、菩萨、金刚的秘密曼荼罗;“四种念诵”,有胎藏界和金刚界之分。胎藏界法的“四种念诵”,指的是:(一)心想念诵(又称意支念诵),即根据修行者所定的本尊,画月轮,在上面写右旋的本尊真言梵字,眼看字相,心想字义,顺逆无碍,以住于本尊三昧(禅定)。(二)先持诵念诵(又称先承事念诵、前治法念诵),即在“心想念诵”纯熟之后,按经轨上规定的真言及其数目、时限、效应要求(要修习至感相放光)进行念诵。



(三) 具支念诵,指修满前述念诵之后,备香华等供养本尊。(四) 作成就念诵,指最后修深秘的成就法,使所诵真言的功力,得以实现。金刚界法的“四种念诵”,指的是:(一) 音声念诵,即有声的念诵。(二) 金刚念诵,即不出声的默诵。(三) 三摩地念诵,即心住定境(禅定的境界)而观真言的字义字相的顺逆。(四) 真实念诵(又称实相念诵),即内心观想真言的字义字相,如实修行;“字轮观”,是指观想自己的心为圆明的月轮,并在心月轮上观想本尊的种子(表征本尊的梵文字母)或真言的字相与字义。

因此,在纯正密典中,经和仪轨是同时俱足的。经也不是只讲教理的,它也讲修法(又称行法、作法,即实践),仪轨则是对经中所述修法的阐释、补充和完善化。

纯正密典的代表作,历来有“五部秘经”、“三部秘经”、“五经二论”等不同的说法。“五部秘经”,指的是:《大日经》、《大毗卢遮那佛说要略念诵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也有的用《金刚顶瑜伽略出念诵经》代替《大毗卢遮那佛说要略念诵经》,而成五部)。“三部秘经”,指的是:《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五经二论”,指的是在《大日经》等五部秘经的基础上,加上《发菩提心论》、《释摩诃衍论》二论。此二论均题“龙树造”,由唐代不空和姚秦筏提摩多分别译出。不过,自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它们是唐代的托名之作。理由是:《发菩提心论》多处引用了《大日经》、《大日经供养法》和唐代一行撰的《大日经疏》中的文句,故当成于中唐;《释摩诃衍论》是《大乘起信论》的注释,而《大乘起信论》在隋代法经等编的《众经目录》中就被列为“疑伪论”。另外,此论在元代以前的佛经目录中均未见著录,一直到元代庆吉祥等编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才第一次予以收录。论中使用的一些用来书写咒语的奇异字,也与武则天时所造的文字颇为相似,不可能在姚秦时出现。尽管对二论的真伪



尚有争议,但二论的思想内容对中唐以后的密教,特别是日本真言宗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纯正密典主要属于胎藏部、金刚顶部、苏悉地部。也有一部分属于通过对中期密典的杂咒作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陀罗尼部。

一、胎藏部

胎藏部,收录的是以记述胎藏界教法为主的一类典籍。它的根本经典是《大日经》。

《大日经》,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又名《大毗卢遮那经》、《毗卢遮那成佛经》,七卷。唐善无畏译。其中,前六卷译于开元十二年(724),末一卷译于次年(725)。善无畏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相传,本经的梵文全本(又称大本、广本)有十万颂,善无畏译的是全本中的精要,合三千余颂,共分为三十六品。经中通过大日如来在金刚法界宫为金刚手秘密主等说法的形式,论述了一切众生本有的如实自知的清静菩提心,以及修证悟入的“三密”法门。

其中,前六卷三十一品为全经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说教相,即第一品《入真言门住心品》。此品为一经大意的概说,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三句为中心,对善心次第醇熟的八个阶段(八心)、凡夫由“我执”(主观偏执)生起的六十种虚妄分别的妄心(六十心,因缺第六十种心“猿猴心”,故实际叙述的是“五十九心”)、密教修行者(真言行者)发菩提心之后所能获得的六种功德(六无畏)、由因缘关系而产生的并无自性的十种现象(十缘生),以及三劫、十地等理论进行了阐述。(二)说事相,即第二品《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至第三十一品《嘱累品》。



此中对密教的各种仪轨和行法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择地造坛、灌顶护摩、念诵印契、供养诸尊、字轮观修、护持禁戒、无相三昧等，而要归于“阿”字门。认为，作为梵文五十个字母（悉昙五十字，一说悉昙四十二字）的第一个字母——念“阿”音的字母（略称“阿”字）具有“一切法本不生”的意义，它普摄世间、出世间的一切事物，也是一切真言（咒语）的本体（“一切真言心”）和至高无上的统帅（“真言王”），只要观想“阿”字的字形和字义，就能成就佛果。

末一卷五品，即《供养次第法中真言行学处品》、《增益守护清净行品》、《供养仪式品》、《持诵法则品》、《真言事业品》，主要是论述供养曼荼罗海会诸尊的仪式、行法以及应当受持的戒法。性质上属于为实际修行而编集的供养仪轨（或称供养法、成就法）。因此，在藏传佛教中，此卷被当作独立的经典，而与《大日经》分离，编在相当于“论疏部”的“丹珠尔部”之中，不属于《大日经》的组成部分。它的汉译单行本，便是“五部秘经”、“五经二论”中说的《大毗卢遮那佛说要略念诵经》一卷，由金刚智于唐开元十一年（723）至二十四年（736）之间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

《大日经》的义理用图像来表示，便是胎藏界曼荼罗。这是根据《大日经·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成立的（传今的图像也参照了《大日经疏》的解释）。全图以上方为东方，下方为西方，左边为北方，右边为南方，分为十三院。中间是“中台八叶院”，代表胎藏界曼荼罗的总体，四周环列十二院，代表胎藏界曼荼罗的某一方面的德性（别德）。

中台八叶院由五佛、四菩萨组成。中间（中台）是大日如来，他是主尊。四方分列无量寿佛、宝幢佛、开敷华佛、天鼓佛“四佛”，和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四菩萨”，他们分别居住在八瓣莲花中，以表示众生的八瓣肉团心，说明“阿”字本不生，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从中台八叶院往上数,依次为:遍知院(表示佛眼、佛母等遍知之德)、释迦院(表示释迦牟尼等方便摄化之德)、文殊院(表示文殊菩萨等以智德为主,兼具福德);往下数,依次为:持明院(表示般若菩萨等折伏、摄受二德)、虚空藏院(表示虚空藏菩萨等以福德为主,兼具智德)、苏悉地院(表示十一面观世音菩萨等成就自利、利他之德);往右数,依次为:金刚手院(表示虚空无垢轮持金刚等大智上求之德)、除盖障院(表示悲愍菩萨等以智门拔除众生盖障之德);往左数,依次为:观音院(表示大势至菩萨等大悲下化之德)、地藏院(表示地藏菩萨等以悲门拔救众生迷情之德)。围绕曼荼罗四周(即在文殊院、苏悉地院、除盖障院、地藏院的外围)的为外金刚部院(表示随类应化之德和凡圣不二之理)、四大护院(守护曼荼罗四门)。共计布列四百十四位本尊(不包括四大护院的守护神)。因此,如想真正读懂《大日经》,还须同时研究胎藏界曼荼罗。

《大日经》是“五部秘经”或“三部秘经”的首部,也是所有密教经典中最受人重视的一部经。仅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勘目目录》所列,它的注释就有一百四十八种之多,影响之大,在密典中无出其右。

胎藏部经典,除《大日经》以外,还有唐代不空译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略示七支念诵随修行法》一卷、《大日经略摄念诵随修行法》(又称《五支略念诵要行法》)一卷、《毗卢遮那五字真言修习仪轨》一卷等。

二、金刚顶部

金刚顶部,收录的是以记述金刚界教法为主的一类典籍。它的根本经典是《金刚顶经》。



《金刚顶经》，因譬喻大日如来的智德犹如金刚坚不可摧、常住不坏，犹如人身的头顶最胜无上而得名。相传，它的梵文全本（又称大本、广本）有十万颂，分为十八会：（一）《一切如来真实摄教王会》。（二）《一切如来秘密主瑜伽会》。（三）《一切教集瑜伽会》。（四）《降三世金刚瑜伽会》。（五）《世间出世间金刚瑜伽会》。（六）《大安乐不空三昧耶真实瑜伽会》。（七）《普贤瑜伽会》。（八）《胜初瑜伽会》。（九）《一切佛集会拏吉尼戒网瑜伽会》。（十）《大三昧耶瑜伽会》。（十一）《大乘现证瑜伽会》。（十二）《三昧耶最胜瑜伽会》。（十三）《大三昧耶真实瑜伽会》。（十四）《如来三昧耶真实瑜伽会》。（十五）《秘密集会瑜伽会》。（十六）《无二平等瑜伽会》。（十七）《如虚空瑜伽会》。（十八）《金刚宝冠瑜伽会》（以上见不空译的《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归》）。

《金刚顶经》的汉译本共有三种：

1. 《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 又名《金刚顶略出念诵经》、《略出念诵经》、《略出经》，四卷。唐金刚智译，开元十一年（723）译出。金刚智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系摘录《金刚顶经》全本的精要而成，是“五部秘经”之一。经中主要叙述了入坛灌顶的仪则、金刚界三十七尊、五相成身观、灌顶护摩法等。所说的“金刚界三十七尊”，指的是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供奉的三十七位本尊。包括：（1）五佛，即大日如来和四方四佛（阿閼佛、宝生佛、无量寿佛、不空成就佛）。（2）四波罗蜜菩萨，即金刚波罗蜜菩萨、宝波罗蜜菩萨、法波罗蜜菩萨、羯磨波罗蜜菩萨。它们是大日如来的四亲近（侍者）。（3）十六大菩萨，即四方四佛各有的四亲近，如阿閼佛有金刚萨埵、金刚王菩萨、金刚爱菩萨、金刚喜菩萨四亲近，其他佛也同样。（4）八供养菩萨，即由大日如来为供养四佛而流出的嬉、鬘、歌、舞“四内供养菩萨”，和四佛为供养大日如来而流出的香、华、灯、涂香



“四外供养菩萨”。(5) 四摄菩萨,即由大日如来心中流出的接引众生入曼荼罗的金刚钩、金刚索、金刚锁、金刚铃四菩萨。所说的“五相成身观”(又称五法成身),指的是修行者在自己身上作观,而完成本尊的佛行。包括:① 通达菩提心。② 修菩提心。③ 成金刚心。④ 证金刚身。⑤ 佛身圆满。它与“三密”(身密、口密、意密)观同为密教的重要观行。

2. 《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 又名《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王经》、《摄大乘现证经》、《金刚顶大教王经》、《金刚界大教王经》、《大教王经》、《金刚顶经》等,三卷。唐不空译,天宝十二年(75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也是“五部秘经”之一,它相当于《金刚顶经》全本的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教王会”二十六分中的第一分《金刚界大曼拏(荼)罗广大仪轨分》。经中主要叙述了断除一切烦恼的金刚三摩地(像金刚一般坚固的禅定)、金刚界三十七尊、四印(大印、三摩印、法印、羯磨印,即“四种曼荼罗”)、四种法身(自性、受用、变化、等流)、四种地位(胜解行地、普贤行愿地、大普贤地、普遍照辉地)、四种念诵(声、语、三摩地、胜义)、四种求愿法(息灾、增益、降伏、敬爱)等。

3. 《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 又名《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北宋施护等译,太平兴国五年(980)译出。施护的生平事迹见明代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为梵文全本初会的全译,有四千颂,译成二十六分。其中,第一分《金刚界大曼拏(荼)罗广大仪轨分》至第五分《现证三昧大仪轨分》,讲大乘现证三昧;第六分《降三世曼拏罗广大仪轨分》至第十四分《一切金刚部羯磨曼拏罗广大仪轨分》,讲金刚三昧;第十五分《调伏一切世间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至第十八分《大曼拏罗广大仪轨分》,讲法三昧;第十九分《一切义成就大曼拏广大仪轨分》至第二十二分《羯磨曼拏罗广大仪轨分》,



讲羯磨三昧；第二十三分《一切如来真实摄一切仪轨随应方便广大教理分》至第二十六分《一切如来真实摄一切仪轨胜上教理分》，讲诸部秘密教理。

上述三种译本中，以不空的译本影响最大，通常说的《金刚顶经》都是指不空译的三卷本而言的。

《金刚顶经》的义理用图像来表示，便是金刚界曼荼罗。全图以上方为西方，下方为东方，左边为南方，右边为北方，纵横各等分为三，由九个月轮曼荼罗图案组成，故又称“九会曼荼罗”。

(一) 成身会(又称羯磨会)。位于图的中央，为四种曼荼罗(略称四曼，又称四印)中的大曼荼罗。以五个圆轮排成一个十字，中央为大日如来，四周为阿閼如来(又名不动如来)、宝生如来、无量寿如来(又名观自在王如来)、不空成就如来。每一佛各有四亲近菩萨，此外还有四内供养菩萨、四外供养菩萨、四摄菩萨以及诸天、贤劫千佛等围绕。成身会是金刚界曼荼罗的总体和大日如来的成就相的代表，其他八会(从成身会往下，向左按顺时针方向运转)，则分别代表大日如来智性的一个方面。(二) 三昧耶会。为“四曼”中的三昧耶曼荼罗，表示诸佛、菩萨的本誓。(三) 微细会。为“四曼”中的法曼荼罗，表示诸尊各具五智等微细的智用。(四) 供养会。为“四曼”中的大曼荼罗，表示诸尊的相互供养。(五) 四印会。表示摄“四曼”于一会。(六) 一印会。表示大日如来五智圆满、法身独一。(七) 理趣会。表示大日如来现金刚萨埵之身而以正法化导众生。(八) 降三世羯磨会。表示大日如来现忿怒之身以降伏魔难。(九) 降三世三昧耶会。表示大日如来降伏大自在天的本誓。

其中，成身会、三昧耶会、微细会、供养会、四印会、一印会、理趣会(合称前七会)为金刚界品；降三世羯磨会、降三世三昧耶会为降三世品。全图共收一千四百六十一尊供养对象(本尊)，内有佛



一千零三十六尊、菩萨二百九十七尊、忿怒身四尊、执金刚神四尊、外金刚部诸神一百二十尊。

金刚顶部的重要经典,除《金刚顶经》以外,还有:《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金刚顶莲华部心念诵仪轨》、《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礼》、《金刚顶瑜伽护摩仪轨》、《受菩提心戒仪》、《发菩提心论》、《释摩诃衍论》(末二部经典因前面已经叙及,不再介绍)等。

(一)《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 又名《瑜伽瑜祇经》、《瑜祇经》,二卷。唐金刚智译,开元十一年(723)至二十四年(73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为“五部秘经”之一。下分十二品:《序品》、《一切如来金刚最胜王义利坚固染爱王心品》、《摄一切如来大阿闍梨位品》、《金刚萨埵胃地心品》、《爱染王品》、《瑜伽四行摄法品》、《一切如来大胜金刚心瑜伽成就品》、《一切如来大胜金刚顶最胜真实大三昧耶品》、《金刚吉祥大成就品》、《一切如来内护摩金刚轨仪品》、《金刚萨埵菩提心内作业灌顶悉地品》、《大金刚焰口降伏一切魔怨品》。经中主要叙述了金刚界的成就法。

(二)《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 又名《金刚顶三十七尊分别圣位法门》、《略述金刚顶修证法门》、《分别圣位经》、《圣位经》,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金刚界曼荼罗中的主会——成身会所供养的五佛、四波罗蜜菩萨(大日如来的四亲近)、十六大菩萨(东方阿閼佛、南方宝生佛、西方无量寿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各自的四亲近,经中将“阿閼佛”译作“不动佛”,“无量寿佛”译作“观自在王佛”,含义是一样的)、四摄菩萨、八供养菩萨(内外各四)等三十七尊的圣位及修证法门。另外,卷首还介绍了真言陀罗尼宗的宗名,比较了显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与密



教教主大日如来在教法、作用上的不同,以及大日如来的四种法身,即:理智法性自然具足的佛的真身“自性法身”;为十地菩萨所现示的法身“他受用法身”;为初地以前的菩萨、二乘(声闻、缘觉)、凡夫所现示的丈六真身“变化法身”;为九界(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即“十法界”中除“佛”以外的九法界)随类之身的“等流法身”等。

(三)《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么耶经》又名《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品》、《金刚顶瑜伽般若理趣经》、《理趣经》,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八册)本等。本经为《大般若经》第十会“般若理趣会”的异译,也是密教修法中于回向、诸愿成就、例行法会中常诵的经本。下分十七章,主要叙述了金刚萨埵内证法门的十七句,以及与之相配的金刚萨埵十七字真言和曼荼罗十七尊。所说的“十七句”,又称“十七清净句”,因十七句的每一句的末尾均有“清净句”三字而得名。它们是:妙适、欲箭、触、爱缚、一切自在主、见、适悦、爱、慢、庄严、意滋泽、光明、身乐、色、声、香、味清净句。其主旨是以男女异性的欲乐,表现“烦恼即菩提”的金刚萨埵内证的大乐法门。所说的“十七尊”,指金刚界曼荼罗会第七会“理趣会”中间供奉的金刚萨埵,四方安置的欲、触、爱、慢四金刚(“四亲近”),四隅安置的欲、触、爱、慢(一作意生、计里吉罗、爱乐、意气)四金刚女(此为“四外供养菩萨”)。外院安置的金刚钩、索、锁、铃四菩萨(“四摄菩萨”),和金刚嬉、鬘、歌、舞四菩萨(“四内供养菩萨”)。其内外供养菩萨的位置与其他诸会正相反,其用意在于表示内外圆融无碍。本经的异译本有:唐菩提流志译的《实相般若波罗蜜经》一卷、金刚智译的《金刚顶瑜伽理趣般若经》一卷、北宋施护译的《遍照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法贤译的《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



(四)《金刚顶莲华部心念诵仪轨》又名《莲华部心念诵仪轨》、《莲华部仪轨》、《莲华部心轨》，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金刚界曼荼罗诸尊的念诵供养法，成身会、三昧耶会、供养会等诸尊的印契真言。

(五)《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礼》又名《金刚顶经金刚界大道场毗卢遮那如来自受用身内证智眷属法身异名佛最上乘秘密三摩地礼忏文》，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是密教日常读诵的金刚界礼忏文。经中主要叙述了礼敬金刚界三十七尊的名号和忏悔发愿文。

(六)《金刚顶瑜伽护摩仪轨》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是金刚界护摩法的本轨。经中主要叙述了息灾、增益、降伏、钩召、敬爱五类护摩仪轨，以及在一座护摩终了的时候，祈念究竟成就的三摩波多护摩法(略称三波多法)等轨式。

(七)《受菩提心戒仪》又名《授灌顶金刚最上乘菩提心戒文》、《受菩提心戒》，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书为密教灌顶中三昧耶戒仪依用的本轨。三昧耶戒是以众生本有的清净菩提心为戒体，法界无量万德为行相的秘密真言戒。其戒相为不应舍弃正法、不舍离菩提心、不吝嗔一切法、莫不利众生行的“四重禁”。密法修行者必须先受此戒，方得入坛。由于它的戒体是菩提心，故又称“受菩提心戒”。书中主要叙述了密教受法弟子在受菩提心戒时遵用的威仪。内容包括：归命、供养、忏悔、三归(归依佛、法、僧)、受菩提心戒等五法，以及题为“普贤菩萨集”的《最上乘教受菩提心戒忏悔文》。



三、苏悉地部

苏悉地部,收录的是以诂说表征众生理性平等的胎藏界和智慧差殊的金刚界“两部不二”之旨的苏悉地法为主的一类典籍。苏悉地(意为妙成就)法以金、胎两部通修的十八道契印(又称十八契印、十八道法、十八道,指修习密法时两只手掌交叉组合的十八种形态)等为纲纪,主张通过修持“三密”,而达到与本尊的身、口、意三业相应,即身成佛。所修的十八道契印是:净三业印、佛部三昧耶印、莲华部三昧耶印、金刚部三昧耶印、被甲护身印(以上为护身法)、地结印、四方结印(以上为结界法)、道场观印、大虚空藏印(以上为道场法)、宝车辂印、请车辂印、迎请印(以上为劝请法)、部主印、虚空网印、火院印(以上为结护法)、阙伽印、莲座印、普供养印(以上为供养法)。每一道契印都有相应的真言。苏悉地法,就性质而言,乃是胎藏界中的成就法,胎藏界曼荼罗中就有苏悉地院。但也有些学者认为胎藏部、金刚顶部、苏悉地部是并列的三部密教大法。苏悉地部的主要经典是《苏悉地经》,其次则有《苏悉地羯磨供养法》、《苏婆呼童子请问经》等。

(一)《苏悉地经》 全称《苏悉地羯罗经》(罗又作啰),又名《妙成就法》、《妙成就作业经》,三卷。唐输波迦罗(即善无畏)译,开元十四年(72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为“五部秘经”或“三部秘经”之一。下分三十八品(据宋藏本。丽藏本因无《成就具支法品》而作三十七品),始《请问品》,终《成就具支法品》,对与佛部、莲华部、金刚部相配的三种成就法,即灭除惑障的息灾法、降伏怨敌的降伏法、满足乐愿的增益法,作了明细的叙述。内容包括:持诵、择处、持戒、供花、烧香、燃灯、献食、奉迎



本尊、灌顶、祈验、护摩、时分等等。

(二)《苏悉地羯磨供养法》又名《苏悉地供养法》，三卷。唐善无畏译，开元十五年(727)至开元二十三年(735)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书中主要阐述了《苏悉地经》中的供养法，内容包括：护身、洒身、涂地、除萎华(同花)、三摩(又作昧)耶灌顶、结发、献水、备五净(乳、酪、酥、黄牛未堕地的尿、粪)、念诵、观心、请火天等，并叙有关的真言和手印。

(三)《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又名《苏婆呼童子经》、《苏婆呼经》，三卷。唐输波迦罗译，开元十四年(726)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全经分为十二品：《律分品》、《分别处所分品》、《除障分品》、《分别金刚杵及药证验分品》、《分别成就相分品》、《念诵真言轨则观像印等梦证分品》、《悉地相分品》、《下钵私那分品》、《分别遮难分品》、《分别道分品》、《分别诸部分品》、《分别八法分品》。以执金刚菩萨大药叉将答苏婆呼童子之问的方式，阐述真言行者当受持的律仪。它的异译本有：北宋法天译的《妙臂菩萨所问经》四卷。

在纯正密典中，《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被视为三部大经，而《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则被视为律典，再加上《发菩提心论》、《释摩诃衍论》等论典，有的学者称之为密教的“三藏”。

四、陀罗尼部

陀罗尼部，收录的是除胎藏、金刚顶、苏悉地三大部类的经典(包括本经、同类经及其支分)以外的，以叙说各种密法仪轨为主的一类典籍。此类典籍的性质与杂部密典十分接近，因而，学界也将两者合为一类，统称为“杂咒部”的。本部所收的典籍，主要是依



据其有无受到纯正密教的影响以及翻译年代是否在唐代,大致确定的。当然,翻译年代晚的经典,不一定它的成立年代也晚;但翻译年代早的经典,却一定成立得早。

陀罗尼部典籍极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无量寿如来观行供养仪轨》、《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伽观智仪轨》、《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如意轮陀罗尼经》、《金刚顶瑜伽金刚萨埵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八大菩萨曼荼罗经》、《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金刚手光明灌顶经最胜立印无动尊者大威怒王念诵仪轨法品》等。

(一)《无量寿如来观行供养仪轨》 又名《无量寿如来念诵仪轨》、《修观行供养仪轨》、《无量寿仪轨》,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本经为阿弥陀法的本轨。书中主要叙述了以无量寿如来(即无量寿佛,又称阿弥陀佛)为本尊,建立曼荼罗(阿弥陀曼荼罗),依次修习“三密”,特别是持诵无量寿如来根本陀罗尼(又称阿弥陀大心咒、十甘露真言、甘露陀罗尼咒,凡十句),以消除罪障,求得现世安乐,死后往生净土的阿弥陀法。

(二)《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 又名《菩提场经》、《一字顶轮王经》,五卷。唐不空译,天宝十二年(75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本经为一字金轮法的本轨。全经分为十三品:《序品》、《示现真言大威德品》、《画像仪轨品》、《行品》、《仪轨品》、《分别秘密相品》、《末法成就品》、《密印品》、《诸成就法品》、《世成就品》、《无能胜加持品》、《证学法品》、《护摩品》。经中主要



叙述了以一字佛顶轮王(又称一字金轮佛顶王、金轮佛顶)、白伞盖顶轮王(又称白伞盖佛顶)、光聚顶轮王(又称光聚佛顶、放光佛顶)、高顶轮王(又称最胜佛顶、尊胜佛顶)、胜顶轮王(又称胜佛顶)等“五佛顶”(又称五顶轮王)为本尊,持诵他们各自的真言,以息灾增益的五佛顶法,特别是一字金轮法。认为,只用一个字为真言的“一字佛顶轮王咒”为一切咒语中的最胜者,具有大威德炽盛的神力。另外,还叙述了各种契印。它的异译本有:唐菩提流志译的《一字佛顶轮王经》五卷(一作六卷)。

(三)《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又名《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消灾吉祥经》,一卷。唐不空译(一说失译)。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本经为炽盛光佛顶法的本轨。金刚界曼荼罗根据从果向因的次第,建立了释迦佛的“三轮身”:以本地自性的佛体教化众生的“自性轮身”、显现菩萨身而以正法教化众生的“正法轮身”、为教化难以化度的众生而显现的大忿怒相的“教令轮身”。本经所说的“炽盛光佛顶”,即为释迦佛的“教令轮身”(一说,炽盛光佛顶与一字金轮佛顶王、光聚佛顶轮王为并列的轮王。也有的说,炽盛光佛顶就是一字金轮佛顶王)。经中主要叙述了以炽盛光佛顶为本尊,建立曼荼罗(炽盛光曼荼罗),持诵炽盛光陀罗尼,以祛除金、木、水、火、土等妖邪星宿的灾祸的炽盛光佛顶法。它的异译本有:唐代失译的《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一卷。

(四)《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又名《尊胜陀罗尼经》、《尊胜陀罗尼》,一卷。唐佛陀波利译,仪凤元年(676)译出。佛陀波利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本经为尊胜法的本轨。经中主要叙述了以尊胜佛顶为本尊,建立曼荼罗(尊胜曼荼罗),持诵尊胜陀罗尼(凡八十七句,为真言行者日常持诵的咒语之一,极为有名),以消除罪障,免生恶趣(畜生、饿



鬼、地狱)、延命增寿、往生极乐的尊胜法。它的异译本有：唐杜行颢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地婆诃罗译的《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一卷、《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一卷（此为前本的重译）、义净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北宋施护译的《尊胜大明王经》一卷、法天译的《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本经不仅为密教所特重，而且也为其他佛教徒所尊重。唐末五代，刻有本经的石幢遍天下。

（五）《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 又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道场念诵仪轨》、《仁王护国般若仪轨》、《仁王念诵仪轨》，一卷。唐不空译，宝应元年（762）至永泰元年（765）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本经是依据《仁王般若经》而建立的仁王护国法的仪轨。《仁王般若经》今存姚秦鸠摩罗什和唐不空的两个译本，均为八品（品名略有不同）二卷。但鸠摩罗什的译本，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编在“失译杂经录”之列；在隋法经等编的《众经目录》卷二，编在“疑惑录”之列；唐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卷十说，玄奘游印度时未闻有此经。据此，一些学者认为鸠摩罗什的译本是有疑问的。不空根据罗什的译本修订而成的新译本也被视为疑伪经。不过，《仁王般若经》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尊重而广泛流传。它与《法华经》、《金光明经》并称“护国三部经”。依它而建立的这部《仪轨》，下分五品：1. 《明五菩萨现威德》。有东方金刚手菩萨、南方金刚宝菩萨、西方金刚利菩萨、北方金刚药叉菩萨、中方金刚波罗蜜多菩萨。2. 《建立漫（曼）荼罗仪》。3. 《入道场仪轨》。包括佛部三昧耶印、诸菩萨部三昧耶印、金刚部三昧耶印、护身印、辟除印及金刚方隅宝界印、请圣众降坛印、献闍伽香水印、献宝座印、普供养印、般若波罗蜜多根本印。4. 《释陀罗尼文字观行法》。5. 《陀罗尼观想布字轮》。它主要解释了不空译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奉持品》的文句，



并且叙述了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除灾攘敌等所修的仁王护国法。

(六)《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又名《守护国界主经》，十卷。唐般若译，贞元六年(790)译出。般若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本经为守护法(用于满足众愿、延长寿命、祈雨、止雨、除鬼病、灭逆罪、济苦等)依用的经典。全经分为十一品：《序品》、《陀罗尼品》、《大悲胎藏出生品》、《入如来大悲不思议品》、《入如来不思议甚深事业品》、《菩萨璎珞庄严品》、《大光普照庄严品》、《般若根本事业庄严品》、《陀罗尼功德轨仪品》、《阿闍世王受记品》、《如来嘱累品》。主要论述了虚空性、心性、菩提心、陀罗尼性等义理，以及“唵”字义、坛法、金刚城大曼荼罗、念诵仪轨、祈雨止雨法、军荼利咒(修祈请息灾、增益、敬爱、钩召、降伏的军荼利明王法时念诵的咒语)等。所谈的法相义理，与《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大哀经》相同，可以视为同源源于一个梵本，但《大集》、《大哀》中并无坛法和陀罗尼等事。

(七)《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伽观智仪轨》又名《法华经观智仪轨》、《成就法华经仪轨》、《法华仪轨》，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本经是依据《法华经》而建立的仪轨。经中主要叙述了依《法华经》而成立的观行仪轨。内容包括：归命《法华》二十八品颂；成就法华观行应当具备的四个条件(即四缘，指亲近真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作坛法(择地、净地、涂地、加持供物、澡浴等)；入坛行法；入真如法性观法；五种供养(即五供养，指依胎藏界而成立的涂香、华鬘、烧香、饮食、灯明)；入实相三摩地(依金刚界而成立)等。

(八)《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又名《宝篋印陀罗尼经》、《宝篋经》，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



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九册)本等。本经为造宝篋印塔法的本轨。经中主要叙述了宝篋印陀罗尼(凡四十句)的来由,书写、读诵、造立纳藏此陀罗尼的方形七宝塔的功德。认为,造宝篋印塔,供养宝篋印陀罗尼,即是供养三世如来的全身舍利,具有消灭罪障,免于三途(畜生、饿鬼、地狱)之苦,并延长寿命的作用。它的异译本有:北宋施护译有《一切如来正法秘密篋印心陀罗尼经》一卷。

(九)《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又名《大悲总持经》、《千手观音大悲心陀罗尼经》、《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唐伽梵达摩译,永徽元年(650)至显庆五年(660)译出。伽梵达摩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二。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持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六观音之一)的大悲心陀罗尼(略称大悲咒,凡八十四句)所具有的功德,如能得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常生善国、常值好时、常逢善友、道心纯熟、不犯禁戒、所有财宝不受他人劫夺等十五种善生,不受饥饿困苦死、枷禁杖楚死、怨家仇对死、军阵相杀死、虎狼恶兽残害死、恶病缠身死等十五种恶死,以及作为千臂象征的持握器械或作手印的四十手的成就法和印契真言。它的异译本有:唐菩提流志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一卷、智通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一卷、金刚智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一卷等。

(十)《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又名《七俱胝佛母陀罗尼经》、《准提陀罗尼经》、《准提经》,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以七俱胝佛母(又称准提观音,为六观音之一)为本尊,持诵准提陀罗尼(又名准提咒),以灭灾、除障、延命、治病,祈求生世世离诸恶趣,速证无上菩提的准提法。异译本有:



唐地婆诃罗译的《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一卷、金刚智译的《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

(十一)《如意轮陀罗尼经》一卷。唐菩提流志译,景龙三年(709)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本经相传出自没有传译的《大莲花金刚三昧耶加持秘密无障碍经》。下分十品:《序品》、《破业障品》、《诵念法品》、《法印品》(有“大莲花三昧耶印”等三十种印法)、《坛法品》、《佩药品》、《含药品》、《眼药品》、《护摩品》、《嘱累品》。经中主要叙述了以如意轮观音(六观音之一)为本尊,建立曼荼罗(如意轮曼荼罗),念诵如意轮咒并结手印,以祈求福德增长、意愿满足、罪障消除、诸苦灭尽的如意轮法。它的异译本有:唐实叉难陀译的《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一卷、宝思惟译的《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一卷、义净译的《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咒经》一卷。

(十二)《金刚顶瑜伽金刚萨埵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又名《金刚菩萨五字秘密修行念诵仪轨》、《金刚顶瑜伽五秘密修行仪轨》、《五秘密仪轨》,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本经为五秘密法的本轨。经中主要叙述了以金刚界的金刚萨埵、欲金刚、触金刚、爱金刚、慢金刚等五秘密菩萨(五秘密)为本尊,建立曼荼罗(五秘密曼荼罗,相当于金刚界曼荼罗中的理趣会),转第八阿赖耶识中的一切有漏种子成“大圆镜智”(欲金刚),转第七识妄执成“平等性智”(触金刚),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爱金刚),转前五识成“成所作智”(慢金刚),合一切智德和悲德而成金刚萨埵的五种秘密法。

(十三)《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又名《施焰口饿鬼陀罗尼经》、《焰口饿鬼经》,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本经为放焰



口法(又称施饿鬼法)依用的经典。经中主要叙述了为施食饿鬼而举行的法事活动——放焰口的来历和做法。说,佛在尼拘律国时,阿难于林中习定(修习禅定),定中见一饿鬼(名焰口)形貌丑陋,身体枯瘦,头发蓬乱,爪甲长利,喉细如针,脸上喷火。阿难惊骇而问之。饿鬼答道,由于他生前吝啬,故死后堕入饿鬼道中。并预言,三日之后,阿难也将命尽,堕为饿鬼。阿难求佛救度,佛因之而说施饿鬼法。具体做法是:于一切时,取一净器,盛以净水,置少量饭面、饼食等,右手按器,诵咒七遍,并称多宝、妙色身、广博身、离怖畏等四如来的名号,然后弹指七遍,取食器,泻食于地上,即可救拔饿鬼,追荐亡灵,得到鬼神的护佑。它的异译本有:唐实叉难陀译的《救面然(燃)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一卷(但经中无“四如来”的名号)。

(十四)《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

又名《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千钵经》、《文殊大教王经》,十卷。唐不空译(一说金刚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全经分为九品:《一切如来金刚秘密根本圣教品》、《诸佛出现证修金刚菩提殊胜品》、《十方大菩萨出助证悟圣力品》、《一切贤圣入法见道显教修持品》、《秘密归止观照法性抉择心地品》、《一切菩萨修学如来三摩地圣性潜通加被品》、《不思议法界圣道如来真如法藏自在圣智品》、《三贤菩萨入法位次第修行回向善提品》、《十圣菩萨入地等妙二位修学进趣圣道成佛菩提品》。经中主要叙述了千臂千钵曼殊室利菩萨(长有千臂并持千钵的文殊菩萨)的金刚三摩地法。内容包括:毗卢遮那如来说的“阿”字观(表根本清净无生义)、阿閼如来说的“啰”字观(表圆成实相无动义)、宝生如来说的“跛”字观(表法界真如平等义)、观自在王如来(即无量寿佛)说的“左”字观(表妙观理趣净土义)、不空成就如来说的“曩”字观(表金刚菩萨解脱义,以上合称“五字文



殊咒”)。其中,第七、八品说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十地等义,与《梵网经》大致相同。可以看出《梵网经》对本经的影响。

(十五)《金刚手光明灌顶经最胜立印无动尊者大威怒王念诵仪轨法品》又名《圣无动尊大威忿怒王念诵法》、《圣无动威怒王立印仪轨》、《不动立印轨》等,一卷。唐不空译,天宝五年(746)至大历九年(774)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本经为不动法的本轨。密教有“五大明王”和“八大明王”之说。“五大明王”指的是:不动明王、降三世明王、军荼利明王、大威德明王、金刚夜叉明王(或乌枢瑟摩明王)。“八大明王”指的是:降三世明王、大威德明王、爱染明王、大轮明王、马头明王、无能胜明王、不动明王、步掷明王。而不动明王则为其中的主尊。本经主要叙述了以不动明王为本尊,建立曼荼罗(不动曼荼罗),为息灾增益而修的不动法。内容包括:通用于各种密法修行的“十八道契印”;观想不动明王十九种相好的“十九种相观”;结不动明王十四种契印的“十四根本契印”;观想不动明王的十九种真言分布于修密者全身各个部位的“十九布字观”等。

纯正密典中的陀罗尼部要典,除上述十五部以外,还有:唐代菩提流志译的《金刚光垢止风雨陀罗尼经》一卷(止雨法的本经)、阿质达霰译的《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三卷(乌枢瑟摩明王法的本经)、不空译的《金刚寿命陀罗尼念诵法》一卷(普贤延命法的本轨)、《甘露军荼利菩萨供养念诵成就仪轨》一卷(军荼利明王法的本轨)、《大圣天欢喜双身毗那夜迦法》一卷(大圣欢喜天法的本轨)、《不空罽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光明真言法的本轨)、《圣阎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验念诵法》一卷(阎曼德迦明王法的本轨)、《陀罗尼门诸部要目》一卷、《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一卷、唐代失译的《白伞盖大佛顶王最胜无比大威德金刚无碍大道场陀罗尼念诵法要》一卷(大白伞盖佛顶法的本轨)、北宋法天译的《无



能胜大明陀罗尼经》一卷(无能胜明王法的本经)等等。另外,日本编的《大藏经》(如《大正藏》、《卍续藏经》)中,还收有许多署名为善无畏译、金刚智译、不空译以及其他入译(或失译)的杂咒类经轨,由于它们未见于中国佛教的经录和史书的记载,故学术界也有对这些译著持怀疑态度的,认为它们是密教的撰述,而不是翻译作品。

第四节 晚期密典

晚期密典,指的是以“空乐双运”的男女双身修法和内证的瑜伽智观为主组织起来的,被称为“无上瑜伽部”(又称大瑜伽部等)的经典,同时,也包括对杂密和纯密的经轨作新的组织演绎而成的一些经典。

晚期密典多以呼金刚(又称呬嚩迦明王)、胜乐金刚(又称胜乐明王)、欢喜天(又称毗那夜迦、俄那钵底,相传为湿婆天之子)、大威德金刚(又称大威德明王、阎曼德迦明王,相传为文殊菩萨的化身)、空行母(又称荼吉尼、拏吉宁,相传为大黑神的配偶)、金刚亥母(胜乐金刚的明妃)等明王和明妃,为供养和修习的本尊。为表征降伏三世恶魔之义,其形象多为忿怒相。这些本尊的名号、真言、契印、功德以及供养法,在先前的纯密类经典,或更早一些的杂密类经典中已有或多或少的叙述,只是比较零散或地位不显眼而已。后期密典则将它们深密化、系统化,视之为殊胜的法门而特别予以尊重。

晚期密典虽然较多地叙述了男女双身修法,但这种修法并非是像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男女交合”,而是建筑在瑜伽观法基础之上的、有一定的修行次第和戒律仪轨的、旨在顺随众生本



能的情欲而将它们引入“大乐”即“空”的究竟境界的一种独特的修行方法。《密集》中说的金刚诵、心缘想、幻身、光明、双运等“五次第”；《呼金刚》中说的生起、圆满“二次第”；《大手印》中说的专注一境、远离戏论、心境一昧、不著相修等“四种瑜伽”；《时轮》中说的身远离、语远离、心远离、整持、随灭、静虑等“六加行”，都是讲修行次第和瑜伽观法的。

而且这种瑜伽观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讲修风脉（与气功颇为相似）。以被称为是“一切无上瑜伽续（即怛特罗）部中的精要之法”的大手印法为例，“首先应参证本心的体相，即于此上，专一而住，于是风息入、住、融入中脉。再依仗此力，脉秘密轮处拙火炽燃，由此引发溶乐。生起四喜（喜、极喜、殊胜喜、俱生喜），将本元心转成大乐体性。此大乐性缘空性境，成无分别，即此乐空无别妙智上，专一而住。依此经历四种瑜伽次第，则成最胜悉地。如是修习乐空双运，即方便胜慧双运的大手印。”（见清土观《土观宗派源流》第二章，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11 月版）因此，有些研究者把男女双身修法说成是“淫乐”、“杂交”，是不正确的。

晚期密典，依照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的分法，包括无上瑜伽方便部（又称父部）、无上瑜伽智慧部（又称母部）、方便智慧不二部（又称方便智慧不二部）三大部。方便部，以《密集》为根本经典；智慧部，以《胜乐》为根本经典；不二部，以《时轮》为根本经典。《密集》、《胜乐》、《时轮》三经，在藏传佛教后弘期之初，即由大译师仁钦桑布（958—1055）译成藏文。因仁钦桑布为后弘期重译密典的第一人，佛教史上将他以前翻译的密典称为“旧密”，而将他开始迄至后来的翻译的密典称为“新密”。以此推断，这三部晚期密教的重要经典至少在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前，就已流传于印度。

但在内地，当时的北宋朝廷明令禁译某些与传统的佛教修持和伦理纲常明显抵触的密教经典。即便是备受宋太宗、真宗尊重



的法天(后赐名“法贤”)翻译的《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四卷,也因其内容有“荤血之祀,颇读于真乘。厌沮之词,尤乖于妙理”,于真宗天禧元年(1017)被诏令“不得编入藏目”。并被告知:“自今传法院(即译经院)似此经文,无得翻译”(见《宋会要辑稿·道释》)。受此影响,无上瑜伽部的三部要典只有《密集》被译为汉文,《胜乐》、《时轮》均未见翻译。但汉文《大藏经》中仍保留了一些晚出的密教经典,这中间主要有:《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如意宝总持王经》、《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王经》、《圣多罗菩萨一百八名陀罗尼经》等。

(一)《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又名《金刚三业经》、《秘密大教王经》等,七卷。北宋施护等译,太平兴国五年(980)译出。施护的生平事迹见《补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为晚期密教金刚乘的最古老的文献,相当于《金刚顶经》第十五会。它的梵本名为《秘密集会》,分前后两编,前编十八章,约成于公元八世纪以前,后编三十五章,约成于九世纪。藏译本名为《密集根本续》,即通常说的“无上瑜伽方便部”的根本经典《密集》。全经分为十八分:《安住一切如来三摩地大曼拏(荼)罗分》、《菩提心分》、《金刚庄严三摩地分》、《一切如来心曼拏罗分》、《一切明句行分》、《身语心加持分》、《秘密精妙行分》、《甘露三昧分》、《最上清净真实三昧分》、《观察一切如来心分》、《一切如来真实三昧最上持明大士分》、《一切如来金刚相应三昧最上成就分》、《金刚相应庄严三昧真实观想正智三摩地分》、《身语心未曾有大明句召尾日林毗多王最胜三摩地分》、《一切心真实金刚出生三昧分》、《一切曼拏罗成就金刚现证菩提分》、《一切如来三昧法金刚加持王分》、《宣说一切秘密行金刚加持分》。经中主要



叙述了瑜伽行者顿速成佛的途径和方法。日本佐佐木教悟等编的《印度佛教史概说》认为,“秘密集会呬特罗”是为印度和中国西藏的金刚乘十分重视的呬特罗,它最先把男女两性和合的教义加以体系化,是以后左道教义的基础。”这里的呬特罗,即“怛特罗”,藏译本中的“续”字。

(二)《大悲空智金刚大教王仪轨经》又名《大悲空智金刚经》,五卷。北宋法护译,景德元年(1004)至嘉祐三年(1058)译出。法护的生平事迹见《补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本经系根据梵本《大怛特罗王大仪轨·三十二仪轨》摘译而成,相当于《金刚顶经》第九会。属“无上瑜伽智慧部”经典。藏译本名为《呼金刚根本续》(又名《喜金刚本续》),即通常说的《呼金刚》。全经分为二十品:《金刚部序品》、《拏吉尼炽盛威仪真言品》、《一切如来身语心圣贤品》、《贤圣灌顶品》、《大真实品》、《行品》、《说密印品》、《大相应轮品》、《清净品》、《灌顶品》、《金刚藏菩萨现证仪轨王品》、《炽盛拏吉尼所说成就品》、《说方便品》、《集一切仪轨部品》、《金刚王出现品》、《金刚空智炽盛拏吉尼画像仪式品》、《饮食品》、《教授品》、《持念品》、《俱生义品》。经中主要叙述了大悲空智金刚(即呼金刚、喜金刚)的三十二血脉相,以及与之配合的空行母法。

(三)《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又名《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文殊仪轨》,二十卷。北宋天息灾译,雍熙三年(986)译出。天息灾的生平事迹见《补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本经也是晚期密教金刚乘的古老文献,其原型约成于八世纪以前,至九世纪定型,而成传今的本子。全经分为二十八品,始《序品》,终《说印仪则品》。经中主要叙述了文殊师利菩萨供养法。内容包括:曼荼罗、灯像、净行观想、数珠、护摩、修行地位时节、契印等仪则,以及一字根本心真言、妙吉祥六



字心真言等。本经的梵本今存，译名为《圣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凡五十五品。藏译本名为《圣文殊根本续》，凡三十六品。天息灾的汉译本与梵本、藏译本比较，缺少甚多，特别是缺少梵本第五十三品《诸王受记品》，该品以悬记（预言）的形式，讲说了自释迦牟尼佛以前至波罗王朝初期，印度各地的王统，为印度佛教史的珍贵资料。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将本经编入“瑜伽部”，而日本佐佐木教悟等编的《印度佛教史概说》则认为，“《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中有很多母陀罗、陀罗尼、曼陀（荼）罗，它作为系统的咀特罗经典是最早出现的”。据研究，唐宝思惟译的《大方广菩萨藏经中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义净译的《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相当于本经中的第八品至第十一品（即《第一成就最上法品》至《第四净行观想护摩成就品》）。

（四）《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又名《频那夜迦天仪轨经》，四卷。北宋法贤（即法天）译，咸平四年（1001）译出。法贤的生平事迹见《补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欢喜天（即频那夜迦天）的功德和成就法。

（五）《如意宝总持王经》一卷。北宋施护译，太平兴国五年（980）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如意宝总持章句”（神咒名）的受持法及其功德。但经中没有载录神咒的本身。明代智旭《阅藏知津》卷十三说：“此经虽不说神咒，乃持神咒者之总诀也。”

（六）《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又名《秘密三昧经》，四卷。北宋施护等译，太平兴国五年（980）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十八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金刚手等菩萨所说的明咒和曼荼罗仪轨。

（七）《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经》又名《妙吉祥大教王经》，三



卷。北宋法贤译,咸平四年(1001)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等。全经分为十分:《焰鬘得迦忿怒明王成就仪轨分》、《焰鬘得迦必隶睹得羯吒曼拏罗成就仪轨分》、《忿怒明王必隶睹得羯吒曼拏罗大明成就仪轨分》、《忿怒明王必隶睹得羯吒宝杖印曼拏罗秘密供养仪轨分》、《忿怒明王必隶多曩毗宝杖印曼拏罗秘密供养仪轨分》、《吠多梨印成就句召仪轨分》、《焰鬘得迦吠多梨印修行仪轨分》、《焰鬘得迦明王本法仪轨分》、《焰鬘得迦明王最上仪轨分》、《妙吉祥化身焰鬘得迦明王仪轨略出分》。主要叙述了大威德明王(即焰鬘得迦忿怒明王)所说的秘密法。

(八)《圣多罗菩萨一百八名陀罗尼经》又名《圣多罗一百八名经》,一卷。北宋法天译,开宝六年(973)译出。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二十册)本等。经中主要叙述了多罗菩萨(又名多罗观世音、救度母,为观世音的化身)的一百八名,以及诵念其名的功德。有关多罗菩萨的信仰,在杂密类经典中已有,本经当是鸠集先前密典的有关内容组织而成的。它的异译本有:北宋天息灾译的《赞扬圣德多罗菩萨一百八名经》一卷、施护译的《圣多罗菩萨梵赞》一卷。

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的晚期密典数量极多,近一千种。这中间既有经轨,也有对经轨的解释。然而,它们大多没有传译为汉文。

第五章 佛典的传译与语种

释迦牟尼佛示寂后的二百十八年(前 268),由旃陀罗笈多王创立的孔雀王朝,经宾头沙罗王,传至孙子辈的阿育王。阿育王崇尚武力,他以华氏城为首都,用军事力量征服了那些不肯臣服的国家,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东到孟加拉湾,西到阿拉伯海,南到科摩林海角,北到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山,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

阿育王在位期间,常将自己的种种事业及训诰刻在岩壁或石柱上,以告喻天下。这些用普拉克里特语文字、伽罗斯底文字、婆罗迷(另作谜、密)文字、阿拉姆语文字等刻写的石柱,自 1356 年以后,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被陆续发现,人们称之为“阿育王法敕”。其中包括:一、大摩崖法敕九处,敕文一般为十四章,另有别刻法敕二章。刻于阿育王即位后第十二年至第十四年。二、小摩崖法敕十六处,敕文有一章的,也有二章的。三、大石柱法敕七处,敕文有六章或七章。刻于阿育王即位后第二十六年至第二十九年。四、小石柱法敕八处。五、洞院刻文一处。六、皇后法敕一处(以上据日本佐佐木教悟等《印度佛教史概说》)。在没有专门史书的古代印度,阿育王法敕不仅成为古印度历史上的唯一确凿的史料,而且也成了研究佛教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根据阿育王《小摩崖法敕》和《大摩崖法敕》第六章的记载,阿育王是在即位的第七年(前 261)皈依佛教的,次年受征服羯陵伽国时横尸遍野的杀戮惨状的触动,遂放弃武力,虔诚修道,以佛教仁慈爱物的思想为指导,治理天下。同时,对其他宗教,如婆罗门教、耆那教、邪命外道等也采取宽容保护的态度,这一做法被称为“正法”。印度佛教的对外传播,就是在阿育王的推动下实现的。

另据《大摩崖法敕》第十三章记载,阿育王于即位后的第十二年(前 256)派遣正法大官,到希腊国王安提奥卡库斯二世(前 261—前 246 在位)的所在地叙利亚、托勒密二世(前 285—前 246 在位)的所在地埃及、安提戈诺斯二世(前 276—前 239 在位)的所在地马其顿、麦伽斯王(前 300—前 250 在位)的所在地西勒尼(今利比亚北部)、亚历山大二世(前 272—前 255 在位)的所在地伊庇鲁斯(今希腊西北,以上为希腊系五王),南印度的科达、潘迪亚,以及唐巴帕尼(今斯里兰卡)等,互通友好,宣传佛法。

又据《善见律毗婆沙》卷二说,阿育王于即位后的第十七年(前 251)在华氏城举行了历时九个月的第三次结集。结集大会结束以后,他派遣了九支传教队伍到各地弘传佛教:末阐提至罽宾(又译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和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邻的阿富汗东部一带),说《譬喻经》;摩诃提婆至摩醯娑末陀罗(今印度南部的卖素尔等地),说《天使经》;勒弃多至婆那婆私(今印度南部),说《无始经》;昙无德至阿波兰多迦(今印度西部苏库尔以北一带),说《火聚譬经》;摩诃昙无德至摩诃刺(一作勒)陀(今印度南部的孟买),说《摩诃那罗陀迦叶本生经》;摩诃勒弃多至舆那世界(今阿富汗以西一带),说《迦罗摩罗经》;末示摩、迦叶、纯毗帝须至雪山边国(今尼泊尔一带),说《初转法轮经》;须那迦、郁多罗至金地国(今下缅甸的达通一带),说《梵网经》;摩晒陀、郁帝夜、参婆楼、拔陀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说《无始经》、《火聚譬经》。印度



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初期的一批重要经典,由此而向印度全境及邻国扩散并流传。

在上述九支传教队伍中,以摩哞陀一支和末阐提一支的影响为最大。它们分别成为印度佛教向南方传播和向北方传播的两条主要路线的开拓者。

这样,佛教便从恒河中下游一带,向印度境内的边远地区以及周边国家扩展,由区域性宗教转变为世界性宗教。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初期的一批重要经典,也随之从印度传至中亚、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不仅原有的佛教经典相继从一种语言转译为另一种语言,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区域的变迁,不同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以及弘传者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新的经典,形成各种不同的佛教文本。这中间,有属于佛教原始语系的梵文、巴利文佛典,也有属于佛教转译语系的西域文(胡文)、汉文、藏文、西夏文、蒙文、满文以及其他文字的佛典。

第一节 梵文佛典

印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集居的国家,民族和语言十分复杂。这在释迦牟尼时代,主要有扞达人、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以及因各民族相互通婚而形成的混血人种。扞达人,是印度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其后裔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制的残余习惯。他们主要居住在印度东部的森林里,使用的是南亚语系的扞达语;达罗毗荼人,是形成时间仅次于扞达人的印度土著民族,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主要居住在印度的南部和中部,古老的印度河文明(公元前三十世纪至公元前二十世纪)便是由他们创造的。雅利安人入侵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征服和



同化,一部分南迁,从而形成泰卢固人、泰米尔人、坎纳达人、马拉雅拉姆人、冈德人、布拉灰人、托达人等,使用的语言为达罗毗荼语系的泰卢固语、泰米尔语、坎纳达语、马拉雅拉姆语、冈德语、布拉灰语等(托达人无文字);雅利安人,是公元前十六世纪(另说公元前二十世纪、公元前十三世纪)从高加索和西土耳其斯坦草原进入印度的民族,后来成为印度的统治者,是印度人数最多的兴都斯坦(一译印度斯坦)人的祖先,主要居住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后来扩展到全印,其语言为印欧语系的梵语、巴利语、印地语等。

上述这些语言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俗语,为印度各地流行的方言,它主要用于口语,偶尔也用于书面语;二是雅语,即梵语,一般用于书面语。历史上,佛教经典有过多种书写语言,其中最初使用的是梵语和从俗语转化而来的巴利语。

梵语最初是雅利安人的吠陀经典使用的语言,故又称“吠陀梵语”。传至公元前四世纪,经语法学家波尔尼的组织整理而规范化,这种规范化的梵语便是“古典梵语”。印度古来相传,梵语是梵天创造的文字。但据近世学者考证,梵语的字母(梵字)源于由古埃及文字演变而来的闪族语(略称闪语,包括古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的字母——腓尼基字母。起初为二十二个字母,经雅利安人整理扩充,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始形成四十七个字母。梵字的书写,起初是由右向左横书的(有近世在印度中央邦萨迦尔出土的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货币为证),后来变成由左向右横写(有阿育王法敕为证)。其字体最初为婆罗谜字母。一世纪以后,印度北方渐用方形,南方渐用圆形。北方系梵字至七世纪形成天城体字母,行用至今。传入西域和我国的梵文佛典也都属于北方系;南方系梵字后来出现了各种变体,进一步演化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文等。

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并无用文字记载的方式形成的佛经。当



时所说的佛经,只不过是口头讽诵的佛语而已。由于在封疆自立的众多邦国中,摩揭陀国的地域最广,国力最强,故在各地流行的方言中,摩揭陀方言(普拉克里特语)流传最广。释迦牟尼传教时使用的也是摩揭陀方言,同时,他也允许各地弟子使用本地的方言进行传诵。

部派佛教时期,各部派都用所在地区的方言诵持佛经。例如,以西北印度为活动中心的说一切有部,使用的是梵语或近似梵语的俗语(称为佉卢虱底语,其字母称为佉卢字母、驴唇文字母),以修拉赛那为中心而得到普及的正量部,使用的是阿帕普兰赛语,以阿品第为中心而兴盛的上座部,使用的是佩沙切语,以南方马哈拉修特拉为活动中心的大众部,使用的是马哈拉修特拉语(见日本佐佐木教悟等《印度佛教史概说》)。从阿育王时代起,佛教僧人也渐渐地用文字来记录口口相传的佛经,出现了若干种佛经的单本。但它们使用的不是标准的古典梵语,而是由古典梵语和摩揭陀方言混合而成的“混成梵语”(又称佛教梵语)。约在一世纪以后,部派佛教才渐次用混成梵语将本部派所传的口语三藏记录下来。二世纪初在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支持下举行的迦湿弥罗结集所勘定的三藏及其注释,可能也是用混成梵语写成的。

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普遍采用较为纯正的梵语以写录自己的经典。

梵文佛典起初是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故又称“贝叶经”。它的制作是这样的:将贝多罗树(形似棕榈树)的叶子摘下,晒干,截成宽约六厘米,长约六分米的叶面,左右各穿一个或二个小孔。先用针、刀锥或铁笔尖物戳刻叶面,然后用煤烟等制成的墨汁流染其上,待拭净后,便显出字迹。写毕,再用丝线将它们穿起来,用与贝叶同样大小的两片木板前后夹住,并以绳缚结,便成了经夹。书写在贝叶经的文字除梵文以外,还有后出的回鹘文、吐火罗文等。



由于贝叶经上书写的文字为梵文,故贝叶经又称“梵夹”。另外也有将梵文书写在桦树皮、白氈、纸、铜片上。流传至今的梵文佛典有五百多种。它们是近代以来在尼泊尔、克什米尔、于阗故地(今新疆和田)、龟兹故地(今新疆库车)、高昌故地(今新疆吐鲁蕃)、敦煌(今属甘肃)、西藏等地陆续发现的。其中以尼泊尔发现的梵本数量为最多,有三百二十多部。

据苏慧澄《关于尼泊尔梵本佛经的发现》一文说,今存的梵本佛经中,有三百八十一捆、二百多种是由英人何德逊利用 1819 年至 1843 年任英国驻尼泊尔政治专员、尼泊尔邮政长官、法官等职的机会,搜集并偷运到国外的。这批佛典分别藏于英国、法国和印度。1881 年,英国学者匈特尔编制了由何德逊偷运出来的全部梵文佛经的总目录。1882 年,印度学者密多罗编制了孟加拉亚洲学会所藏的梵文佛经的目录。内容包括:每种写本的书名、页数、行数、颂数、字体、颜色、估计年代、纸本或贝叶本、长行和重颂是否都有、语言是否合乎梵语语法、有无汉藏译本。此外,还有每种写本的内容简介、前序和后跋等。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一些重要的经论写本被梵文学者校勘出版。另外,尼泊尔国内也收藏了为数不少的后来发现的梵文佛经(见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六十册《佛典译述及著述考略》,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 年 6 月版)。

在今存的梵文佛典中,较为完整的经典有:《天譬喻》、《宝鬘譬喻》、《大事》、《方广大庄严经》、《佛所行赞》(马鸣著)、《十万颂般若》、《二万五千颂般若》、《八千颂般若》、《金刚般若》、《七百颂般若》、《十地经》、《入法界品》、《法华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大集经》(月藏分、宝幢分、日藏分、贤护分等)、《普明菩萨会》、《悲华经》、《金光明经》、《月灯三昧经》、《入楞伽经》、《俱舍论》、《中论》(龙树著)、《回诤论》(同上)、《宝行王正论》(同上)、《四百观论》(提



婆著)、《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现观庄严论》、《究竟一乘宝性论》、《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中论注净明句》(月称著)、《大乘集菩萨学论》(寂天著)、《入菩提行经》(同上)、《摄真实论》(寂护著)、《量评释》(法称著)、《正理一滴》(同上),以及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一些律典、论书和密教的陀罗尼、仪轨、成就法;仅为残片的有:《阿含经》(《中阿含经·优婆利经》)、《大般涅槃经》等。这些佛典尚未组织成为经律论具足、有内在的体系结构的佛教大丛书——大藏经。

第二节 巴利文佛典

据语言学家考证,巴利语晚于古典梵语,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形成。它原是摩揭陀方言(也有的说是南印度邬阇衍那一带的方言),后来,通过对古典梵语的改造,使音声和语法更加简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巴利语。这种语言随着佛教的流传而不断向南扩展,也成了印度南方邻国的一种语言。在斯里兰卡,则形成了巴利文佛典。

如前所述,斯里兰卡的佛教是由摩哂陀传入的。摩哂陀是阿育王的儿子,也是主持华氏城结集的目犍连子帝须的大弟子。他奉命率领使团到斯里兰卡传教后,先后对国王天爱帝须讲述了《象迹喻小品经》、《天宫事》、《饿鬼事》、《天使经》等经典,劝国王止恶修善,广积福德,赢得了国王以及朝臣百姓的皈信。天爱帝须为摩哂陀建立的大寺,不仅成了斯里兰卡佛教的根据地,后来也成为整个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据《大史》等说,摩哂陀在世的时候,曾在安放佛陀顶骨和佛钵的塔寺举行过一次结集,所用的语言为巴利语。但当时可能只是用这种语言进行会诵,未必有文字记录。



确凿可靠的用巴利文写录佛典,当是公元前一世纪末叶在阿卢寺举行的第四次结集时的事。由于巴利文佛典具有完整的经律论体系,故通常称之为巴利文三藏、巴利文《大藏经》、南传《大藏经》。

巴利文《大藏经》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律藏。收:(一)《经分别》(戒律条文),下分《大分别》(比丘戒)和《比丘尼分别》(比丘尼戒)两项。(二)《犍度》(僧团制度),下分《大品》(十犍度)和《小品》(十二犍度)。(三)《附随》(又称《附录》),凡十九章。二、经藏。收:(一)《长部》,凡三十四经。(二)《中部》,凡一百五十二经。(三)《相应部》,凡二千八百七十五经。(四)《增支部》,凡二千一百九十八经。(五)《小部》,凡十五经。依次为《小诵》(九篇)、《法句》(二十六品四百二十三偈)、《自说》(八品八十经)、《如是语》(又名《本事》,四集一百十二经)、《经集》(五品七十二经)、《天宫事》(七品八十五经)、《饿鬼事》(四品五十一经)、《长老偈》(二十一集一千二百九十一偈)、《长老尼偈》(十六集五百二十一偈)、《本生》(五百四十七篇)、《义释》(对《经集》中《八颂经》等的注释,分《大义释》、《小义释》两项)、《无碍解道》(三品三十论)、《譬喻》(五十九品五百八十七篇)、《佛种姓》(二十八品)、《所行藏》(三十五篇)。三、论藏。收:(一)《法集论》(又名《法聚论》)。(二)《分别论》。(三)《界论》(又名《界说论》)。(四)《人施設论》。(五)《论事》。(六)《双论》(又名《双对论》)。(七)《发趣论》。以后,又有一些新的佛典相继编入,形成三藏之外的另一类典籍,即“藏外典籍”。起初编入的有《指导论》、《藏释》、《弥兰陀王问经》、《岛史》等;接着编入的有三藏注疏、《大史》等;稍晚编入的有三藏注疏的注疏、《小史》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传今的巴利文《大藏经》是用僧伽罗文字母写定的,1881年成立於英国伦敦的巴利圣典协会用拉丁文字母转写后陆续刊行。近代,日本学者将它译为日文。现代,我国台湾的学者又将日文版《南传大藏经》转译为汉文,出版



了《汉译南传大藏经》。

另外,巴利文《大藏经》于五世纪中叶以后,又从斯里兰卡流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以及我国云南傣族居住区。形成了用缅文、泰文、老挝文、高棉文、傣文转写的巴利文《大藏经》。学术界将它们统称为巴利语系《大藏经》。

第三节 西域文佛典

西域文佛典,指的是用古代西域各国文字写录的佛教经典。这里所说的“西域”,泛指我国甘肃玉门关(敦煌西北)以西地区。自汉代以来,这里出现过几十个国家,时合时分,它们的名称与疆域也随着时代的转换而叠经变迁。其中,与佛教关系密切的,主要有:犍陀罗、迦湿弥罗、吐火罗(又作睹货罗、睹货逻,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奥克萨斯河上游)、大月氏(阿姆河上、中游)、安息(伊朗高原一带)、康居(又作康国,撒马尔罕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一带)、于阗、龟兹、高昌等。这里的佛教最初是由末闍提率领的佛教使团传入的。起初是在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以后扩展到其他国家。

在这一流布过程中,原先用梵文书写的佛典的一部分,被转译为这些国家使用的语言,从而形成西域文佛典,也就是梁代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的“胡本”。不过,“胡本”一词起初也包括梵本在内,因为印度也属于西域国家。后来,为了与梵本相区别,才将“胡本”限定为除梵本以外的西域文本。用西域文字写成的佛教经典,见存的主要有: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和回鹘文。



一、吐火罗文佛典

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它分为焉耆和龟兹两种方言,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吐火罗语的文字(即吐火罗文)为婆罗谜字母的斜体。因此,一般被看作是梵文的变种。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佛典,是十九世纪末叶在龟兹的沙漠古城的遗址中发现的,故吐火罗文佛典又称“龟兹文佛典”。它们是被抄写在桦皮上的,其中有:《大般涅槃经》、《法句经》、《譬喻经》、《悲华经》、《孔雀王咒经》、《十诵比丘戒本》,以及说一切有部的一些典籍,但都是残片。

二、于阗文佛典

于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用于阗文书写的佛典是近代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其中有:《金刚般若经》、《金光明经》、《大乘无量寿经》、《一百五十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等。

三、粟特文佛典

粟特语属伊朗语族的东支。用粟特文书写的佛典也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其中有:《莲华如意珠陀罗尼经》、《青颈陀罗尼经》、《维摩诘所说经》、《长爪梵志请问经》、《善恶因果经》等。



四、回鹘文佛典

回鹘语也就是古代的维吾尔语。据考证,它是从粟特语变化而来的,约成于公元八世纪。用回鹘文写成的佛典是近代在吐鲁蕃盆地和甘肃境内发现的。据吴震《发现回鹘文、吐火罗文佛典》一文说,1959年8月,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东疆文物工作组在哈密县文化馆征集到一批回鹘文佛经,共608页,其中完整无缺的有41页,大体完好的有184页,另有一部分过于碎小的残片还未计算在内。它们是1959年4月在一处古房废址的小洞中发现的。“经过初步处理,发现这批写经可分两种,大约属于两部,都是用褐黄麻纸写的,纸质厚硬,墨色鲜明,字体工整。文字写法都是自上而下直书,由左向右分行。每页左边有注明页数的回鹘文小字,与正文平行。”(见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六十册《佛典译述及著述考略》)经专家初步鉴定,它们是宋代写的。其中有:《金光明经》、《法华经·普门品》、《弥勒下生经》、《尊胜陀罗尼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从经典前后的序跋题记来看,它们分别译自吐蕃文(藏文)和汉文。而后面提到的蒙文、满文佛典使用的字母,又是从回鹘文演变而来的。

上述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和回鹘文四类佛典,虽然品种不少,但未成系列。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该语种的《大藏经》。

第四节 汉文佛典

印度佛典是通过陆地和海上两条交通路线传入中国的。



陆路的开辟时间较早。自从西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自长安,经河西走廊,沿昆仑山脉和天山山脉,到西域各国直至地中海东岸的通道以来,原先因地理环境隔断的古代亚洲两大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之间的交流开始了。此后,从中国内地到印度西北部,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条通道。南北二道都在天山南麓。南道自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南侧,经鄯善、于阗、莎车,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又经大月氏、安息、罽宾等国而抵达印度;北道自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北侧,经伊吾(哈密)、高昌、焉耆、龟兹、疏勒等,越葱岭,西南行至罽宾而达印度。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长安,曾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即佛经),佛教入华以此而始(见《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由于大月氏是南道所经的国家,以此推断,佛教最初是从南道传入中国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我国四川的文物考古挖掘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汉末的佛教造像,如乐山柿子湾崖墓浮雕佛像、乐山麻浩1号崖墓浮雕佛像、彭山崖墓摇钱树座一佛二侍像、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铜摇钱树多尊佛像、忠县蜀汉墓摇钱树干一佛二菩萨像、宜宾汉墓佛像、什邡汉墓画像砖上的佛塔、西昌汉墓砖上梵文朱书的佛号等。从乐山麻浩1号崖墓附近的形制相同的崖墓中,发现有汉顺帝“永和”(136—141)和汉恒帝“延熹”(158—167)的年号;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附近的形制相同的崖墓中,发现有顺帝“永和六年”(141)的年号来判断,它们均出于东汉末年。学术界对四川的佛教究竟是从哪里传入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是从云南传入的,因为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可达印度;也有的认为是从青海传入的,因为,从四川,经青海,可达西域诸国中的鄯善(今新疆)。从史料上分析,云南之有佛教,始于唐代。故四川佛教也当是佛教取南道传入的。



海路的开辟大约是在东汉末年。当时,有些印度商人取海路,辗转斯里兰卡、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等而抵达中国的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北)、广州。由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本国时已是佛教的信仰者,来华后也带来了佛教的一些经典和思想。我国南方佛教的最初传播者三国时的康僧会就是随父取海路来华的。

从陆地传入的主要是梵文佛典和西域文佛典,从海路传入的除梵文佛典以外,也有一些巴利文佛典。从总体上来说,汉译佛典的原本以梵本为多。

一、佛典汉译的开展

佛典的汉译始于东汉。古来相传,东汉初年明帝感梦求法,迦叶摩腾和竺叔兰来华译经,他们译出的《四十二章经》为佛典汉译之始。但近世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学术界由此而展开了争论。

梁启超认为,“《四十二章经》纯属魏晋以后的文体,……大体上是晋人的伪托无疑”(《四十二章经辨伪》)。吕澂认为,《四十二章经》是一种“经抄”,“就内容看,是抄自《法句经》,我们对出来的有二十八章,占全经的三分之二。这还只是此经相当于《法句经》的偈颂部分,《法句经》还有缘起,是长行,此经也抄了几段。所以它是抄录的,但做了一些修辞功夫。现存的《法句经》是三国时支谦译的,据支谦本序文来看,在他之前还有一个译本,所以在汉末时《法句经》就有。《四十二章经》应该是抄的那个旧本而加以润色的”;“我们认定此经是东晋初抄出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讲)。但汤用彤认为,“东晋时郗景兴撰《奉法要》、三国时《法句经·序》,已引本经。汉末牟子作《理惑论》,似亦曾援用。是汉晋间固



有经四十二章,为佛学界所得诵读。而最早引用本经者,则为后汉之襄楷,襄楷延熹九年(166)上书恒帝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此中‘不三宿桑下’,即本经‘树下一宿’之言。‘革囊盛血’云云,系引经‘革囊众秽’一章。则后汉时已有此经,实无可疑”(《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三章)。

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并有确凿的史实可证的佛典翻译,当从东汉末年恒帝时来华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讖为始。

安世高,名清,以字(世高)行,安息国太子。传称:“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其父死后,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以后周游西域各国,于汉桓帝建和初年(147)辗转来到洛阳,不久通晓汉语,开始译经。他从建和二年(148)至建宁三年(172),先后翻译了三十五部四十一卷佛经(见《出三藏记集》卷二)。这中间,绝大多数为小乘经典。有属于阿含类的《人本欲生经》、《十报经》、《善法义经》、《四谛经》、《七处三观经》、《八正道经》、《转法轮经》等;属于禅法类的《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禅行法想经》、《大道地经》等;属于阿毗昙类的《阿毗昙五法经》、《阿毗昙九十八结经》等。此外,也有个别的属大乘经典,如《五十校计经》(又名《明度五十校计经》,后被隋代僧就编为《大方等大集经·十方菩萨品》)。

支娄迦讖,略称支讖,月氏国人。禀持戒法,以精勤著称。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以后着手译经,至灵帝中平(184—189)年间,共译出十四部二十七卷佛经。其中,《阿闍世王经》二卷,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引东晋道安之语,谓出自《长阿含经》,而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一考证,此经与“《普超三昧经》等



同本”，是大乘经。因此，支谶翻译的经典全是大乘经典。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宝积经》、《阿闍佛国经》、《兜沙经》等。

自安世高、支娄迦谶以下，佛经翻译事业便在中国逐渐发达起来。据唐代智升在《开元释教录》中统计，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的六百六十四年间，共有一百七十六人，传译了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四十六卷佛典。情况如下：

后汉：安世高、支娄迦谶、支曜、康孟祥等十二人，出经二百九十二部三百九十五卷。

曹魏：昙柯迦罗、康僧铠、白延等五人，出经十二部十八卷。

孙吴：维祇难、支谦、康僧会等五人，出经一百八十九部四百七十七卷。

西晋：竺法护、安法钦、白法祖、法炬、聂道真等十二人，出经三百三十三部五百九十卷。

东晋：帛尸梨蜜多罗、竺昙无兰、僧伽提婆、佛陀跋陀罗、法显、祇多蜜等十六人，出经一百六十八部四百六十八卷。

苻秦：昙摩持、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六人，出经十五部一百九十七卷。

姚秦：鸠摩罗什、弗若多罗、佛陀耶舍等五人，出经九十四部六百二十四卷。

前凉：支施仑一人，出经四部六卷。

北凉：道龚、昙无讖、道泰等九人，出经八十二部三百十一卷。

刘宋：佛陀什、重良耶舍、昙摩蜜多、智严、求那跋摩、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二十二人，出经四百六十五部七百七十七卷。

萧齐：僧伽跋陀罗、求那毗地等七人，出经十二部三十三卷。

萧梁：曼陀罗仙、僧伽婆罗、波罗末陀（即真谛）等八人，出经四十六部二百零一卷。



元魏:勒那摩提、菩提留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十二人,出经八十三部二百七十四卷。

高齐:那连提黎耶舍、万天懿二人,出经八部五十二卷。

北周:闍那耶舍、耶舍崛多等四人,出经十四部二十九卷。

陈:真谛等三人,出经四十部一百三十三卷。

隋:闍那崛多、达摩笈多等九人,出经六十四部三百零一卷。

唐:玄奘、智通、阿地瞿多、那提、地婆诃罗、杜行颢、提云般若、实叉难陀、阿弥真那、义净、菩提流志、金刚智、善无畏等三十七人,出经三百零一部二千一百七十卷。

智升的上述统计数只是一个概数,而非确数。因为在传译者中间,既有居多数的佛经翻译家,也有居少数的佛典著述家。而且由于作者将有些跨越不同朝代的人,在先后两个朝代中各计算一次(如萧梁和陈代中都有真谛,北周和隋代都有闍那崛多等),故实际从事译经的没有统计数所说的那么多;另外,在每一个朝代所出的经典中,佛经翻译家所出的是根据梵本或胡本翻译的佛经,佛典著述家所出的是西域和汉地的佛教撰述,再加上有些佛经是重译,有些佛经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故汉译佛经的实际卷也远远低于统计数所说的出经数目。

唐代的译经,在《开元释教录》之后仍在进行。据唐代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统计,有阿质达霰、法月、不空、般若、尸罗达摩等十一人,出经一百六十九部三百五十三卷(这个数字是将《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所载减去《开元释教录》所载得出的)。

此后的译经情况,据今人的统计,是:

宋:法天、天息灾、施护、惟净、慈贤、智吉祥、日称、慧询、绍德、金总持等十一人,出经二百八十六部八百二十八卷。

元:八思巴、沙啰巴、莎南吃罗、管主八等八人,出经十六部二十卷。



明：智光一人，出经九部九卷。

清：工布查布、阿旺扎什、琢璩三路瓚等五人，出经九部九卷（以上见《周叔迦佛学论著选集》下册《宋元明清译经图纪》一文，中华书局 1991 年 1 月版）。

即使在近现代，也仍然有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其方式有：

（一）将藏文译为汉文 如法尊译的《七十空性论》（龙树造）、《广破论》（同上）、《入中论》（月称造）、《释量论》（法称造）、《辩法法性论》（弥勒造）、《现观庄严论释》（弥勒造颂、师子贤等作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宗喀巴造，下同）、《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入中论释》、《辩不了义论》、《菩萨戒释论》，吕澂译的《因轮论》（陈那造）、《集量论》（同上）、《三十唯识释》（安慧造）等。

（二）将巴利文译为汉文 如法舫译的《阿毗达磨摄义论》、了参译的《法句经》、叶均译的《摄阿毗达摩义论》、《清净道论》、邓殿臣译的《长老偈》、《长老尼偈》、郭良鏊译的《经集》、巴宙译的《南传弥兰王问经》等。

（三）将日文译成汉文 主要是将日文版的《南传大藏经》译成汉文。起初译出的是散本，如《普慧大藏经》中收录的《长部》、《中部》、《本生经》、《发趣论》；最近译出的是全藏，如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

（四）将汉文译为藏文 如法尊译的《大毗婆沙论》（见续明《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界之译绩》等，《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三十八册《佛典翻译史论》）。

但就古代由朝廷组织的有规模的译经而言，实际上至元初已告结束。自此以后的译经，不但数量很少，而且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引起大的反响。特别是在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印度佛教被外来势力所摧毁，佛教原典的编撰而随之中止。此后传至



汉地而被译出的少量梵经,都是印度佛教在本土绝迹前的旧经。因此,在佛教史上,自汉至元,一般都有专章讲叙当时的译经情况,从明代起就不讲了。由元代庆吉祥等人编纂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便是记叙我国古代译经名目的最后一部经录。

在后汉至元代的一百几十位译师中,译经多、影响大的要数姚秦的鸠摩罗什、梁代的真谛、唐代的玄奘和不空,世称“四大译经家”。鸠摩罗什是大乘中观派教典的主要翻译者,真谛和玄奘是大乘瑜伽行派教典的主要翻译者,不空是密宗教典的主要翻译者。他们翻译的经典,对东晋南北朝的般若学派、成实学派、摄论学派、俱舍学派和隋唐时期的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法相宗、密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也有人将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称为“四大译经家”,而义净所译以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律典为最有名。

二、译经制度

汉地译经,在东晋以前可以说是私人的事业。那时,从事佛经翻译的基本上都是西域来华的僧人,或者是迁居汉地的西域胡人的后裔。翻译所据的原本,有靠译主通过师承传得的口语佛经,也有用胡文记录的书面佛经。将胡文转译为汉文,有一个人独自完成的,也有与一、二个汉人合作,由译主口诵,合作者笔受(记录成文),共同完成的。由于规模较小,财力有限,所翻译的经本也大多数为卷帙较少的小本。

东晋以后,随着法显、法勇、法领、智猛、宝云等汉地僧人西行求法运动的展开,一批又一批梵僧赍经来华,佛教的势力日益扩张,再加上帝王对佛教的护持和奖挹,译经事业日见发达,规模也越来越大。后秦君主姚兴在长安逍遥园建立西明阁,请译经大师



主持译事,国立译场由此而始。此后,虽然私人译经仍然持续不断,但作为译经主角的则是由朝廷资助组织的国立译场。这类译场有:北凉的姑臧闲豫宫;东晋的建业道场寺;刘宋的建业祇洹寺、荆州辛寺;梁代的建业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北魏的洛阳永安寺;北齐的邺城天平寺;隋代的长安大兴善寺、洛阳上林园;唐代的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大荐福寺、大兴善寺、洛阳佛授记寺;北宋的汴梁太平兴国寺等。有些译场还明确冠以“翻经馆”、“翻经院”、“译经院”的衔称,如隋炀帝为彦琮建立的洛阳上林园翻经院;唐太宗为玄奘建立的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唐中宗为义净建立的大荐福寺翻经院;宋太宗为天息灾、施护等建立的太平兴国寺翻经院(后改名“传法院”)。译场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

随着译经事业由私人主办向官方主办的转变,各地各寺的优秀翻译人才被征召到一起,按照译经的程序,并照顾到各自的特长分工组合,从而使译场的规制日趋完善。这种译经制度在唐代已十分完备,至宋代则更进一层。

北宋赞宁在《宋高僧传》卷三《译经篇》论中,曾详细地稽考了历代译场、翻经院的组织体制,并对宋代译场的人员、职司、规模作了记载。从中可以获悉,唐代以及唐以前的译场、翻经院的设置大致是这样的:

(一)译主 主持译事。一般由携带梵本来华的三藏法师担任。

(二)笔受 又称缀文。将梵语的意思转写为汉文。一般由言通华梵,学综空(空宗)有(有宗)的人担任。

(三)度语 又称译语、传语。在译主不懂汉语时,将译主诵出的梵语翻译为汉语。

(四)证梵本 检查译文的语句是否符合梵文的原意。



(五) 润文 对译文作润色加工。

(六) 证文 检查译文所表达的义理是否有错。

(七) 梵呗 在译经开始时,用一定的曲调唱赞叹文,以整肃威仪,启发善心。

(八) 校勘 对照梵本,对译文进行复校。

(九) 监护大使 监督译事,审读新经。通常由朝廷委派的大臣担任。

此外,还有不是经常设立的证禅义和证字。证禅义,主要检查译文中所说的禅法是否符合梵本的原意;证字,主要检查梵语音译名词的发音是否与梵音相符。

当然,赞宁说的只是一个大致的情形,并非是每个国立译场都有这些职事的。至于宋代的译场组织,按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三所载,也有九种译经职位:

(一) 译主 正坐面外,宣读梵文。

(二) 证义 坐在译主的左边,与译主一起评量梵文。

(三) 证文 坐在译主的右边,听译主朗读梵文,查验有无错误。

(四) 书字梵学僧。听受梵语,写出同音的汉字。

(五) 笔受 将梵音改译为汉语。

(六) 缀文 将梵语连缀成通顺的汉语。

(七) 参译 比较梵汉文句的异同,避免差错。

(八) 刊定 刊削冗长,厘定句子。

(九) 润文 润色经文。一般由朝廷委派的善于文辞的官吏担任。

国立译场的建立,造就了译经的诸多优势。例如,经本齐全,人才荟萃,资财雄厚,译经的速度快、数量多、质量高,一些私人译经时因受财力的限制,无法翻译的大本巨帙赖此而得以译出。



三、译经规则

汉译佛经的质量,与译师对梵汉两国文字的娴熟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宋高僧传·译经篇论》曾将汉地的译经事业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规面难通。”相当于东汉译经初开时的情况;“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矣。”相当于三国、西晋和东晋初、中期译经渐盛时的情况;“后则猛(智猛)、显(法显)亲往,奘(玄奘)、空(不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内竖对文王之间,扬雄得绝对之文,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相当于东晋末年至唐代,译事大盛,译经僧往往华梵皆通,文(文辞)理(教理)俱精时的情况。

与此同时,译师们为了提高译经的质量,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陆续创立了一些译经规则。这主要有: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说、隋代彦琮的“八备十条”说、唐代玄奘的“五种不翻”说、北宋赞宁的“六例”说。

(一)“五失本三不易”说

“五失本三不易”是东晋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来的(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它是中国佛教最早的翻译理论。“五失本”,指的是在译经时碰到的五种改变原经文句的译法:

1. “胡语尽倒,而使从秦(指汉语,当时道安身处苻秦的治域内,故作此称),一失本也。”西域各国的语言都是倒装句,将这些倒装句转译成合乎汉人习惯的顺句,就难免失去它的本来面貌。

2. “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用胡文写成的佛经,语言简洁质朴,而汉地讲究辞藻文采,译经时一经修饰,就难免失真。

3. “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胡经中重复的语句和段落很多,特别是内容与长行(散文)相同的偈颂。如果在翻译时,将它们都删去,则与原貌不符。

4. “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胡经中有总结一经或一品要旨的“义记”,其性质类似于汉地辞赋之末的“乱曰”(乱辞),但在翻译时,一般将它们删去了。

5. “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胡经在一事叙述完后,常常覆牒前辞,如将它们都删去,也要失去原貌。

“三不易”,指的是译经时碰到的三种不容易把握的情况:

1. “《般若经》三达(指通达三世)之心,覆面(指释迦牟尼)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佛经为释迦牟尼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所说,而时俗已经发生了变化,要使经文所表述的古代思想适合当今的社会环境,是不容易的。

2. “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佛陀的智慧与一般百姓的思想相隔悬殊,要使佛教的思想为世人所接受,也是不容易的。

3. “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指具备六种神通的五百罗汉)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当初,迦叶主持第一次结集,阿难诵出佛经,五百罗汉加以审定,尚且小心谨慎,今天从事翻译的人要以自己的领会转达佛意,就更不容易。



自佛典汉译以来,在翻译的风格上,是讲究质朴(质),采取直译好呢?还是讲究修辞(文),采取意译好?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道安是主张直译的,认为只有直译才能保持佛经的原貌,不致于走样。他所说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提出来的。后世的译师往往以此为鉴,既注意忠实于原著,又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讲究语句的通畅易晓,从而形成了新的直译法。

(二)“八备十条”说

“八备十条”,是隋代彦琮在《辩正论》中提出来的。《辩正论》是一部专门论述翻译规式的著作,后佚。但是,唐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中辑引了它的主要内容,于中可以窥知大旨。

“八备”,指的是佛经翻译者在品质和学术上应当具备的八种条件:

1.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译者要虔信佛法,立志救世度人,有长年累月献身译经事业的心理准备。

2.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在踏入译场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已经严守戒律,有没有染上会招致世人非议的恶习。

3. “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要通晓经律论三藏和大小乘教理,做到没有不明白的地方。

4. “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除精通佛法以外,还要旁涉世俗的典籍,善于文辞,以避免译文的粗陋笨拙。

5. “襟抱平恕,器重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要胸襟开朗,尊重并吸取他人的意见,不武断固执。

6. “沈(沉)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銜,其备六也。”要潜心治学,淡泊名利,无炫耀自己之心。

7. “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要精通梵语,



掌握正确的译法,不拘泥于梵语的句式。

8. “薄阅《苍》、《雅》,精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要阅读《苍颉》、《尔雅》等字书(语言文字工具书),了解篆书、隶书等不同字体的写法,熟练灵活地驾驭汉语的表达方式。

“十条”,指的是译经时需要注意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它们是:

1. 字声、2. 句韵、3. 问答、4. 名义、5. 经论、6. 歌颂、7. 咒功、8. 品题、9. 专业、10. 异本。彦琮原先对这“十条”中的每一条都有详细的解释,可惜的是这些解释都没有保存下来,故不得其详。

(三)“五种不翻”说

“五种不翻”,是唐代玄奘在翻译时对弟子说的一番话,今存于南宋周敦义的《翻译名义集序》之中。所谓“不翻”,指的是翻译时,由于某种原因,只译梵语的音而不译梵语的义的情况。其原因凡有五种:

1. “秘密故,如陀罗尼。”由于秘密的缘故而不翻,如密教的咒语(陀罗尼)。

2. “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由于一词多义的缘故而不翻。如“薄伽梵”具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等六种含义,如果选择其中的一种含义作为译名,便会以偏盖全,故也只译其音。

3. “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由于汉地没有此物的缘故而不翻,如阎浮树。

4. “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由于顺从古译的缘故而不翻,如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不是不能翻,只是由于自佛经汉译以来常常是译音而不译义的,故也就沿用这一译名了。

5. “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由于译音能产生更好的



效果的缘故而不翻,如“般若”是梵语的音译,而“智慧”是梵语的义译,它们是同一个单词的两种译名。前者比较深奥,容易使人产生恭敬之心,后者比较浅显,容易使人产生轻视之心,为此,取前者而不取后者。

(四)“六例四句”说

六例四句,是北宋赞宁在《宋高僧传》卷三《译经篇》论中提出来的。指的是译经时碰到的六大类情况(六例)以及每一大类情况的四种处理方法(四句):

1.“译字译音为一例” 下分: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四句。

2.“胡语梵言为一例” “胡语”,是指雪山以北诸国使用的语言;“梵言”,是指五印度使用的语言。下分:是梵非胡、是胡非梵、亦胡亦梵、二非句(指在胡语、梵言之外尚有华言)四句。

3.“重译直译为一例” 重译,是指将梵本译为胡言;直译,是指从五印度携带梵本来华,直接译成汉文。下分:直译、重译、亦直亦重、二非句(指携带梵本来华的僧人虽然兼通胡语,但没有从事译经工作)四句。

4.“粗言细语为一例” 粗言,是指言音不分明而讹僻的语言,即古印度的俗语;细语,是指言音分明而典雅的语言,即梵语。下分:是粗非细、唯细非粗、亦粗亦细、二非句(内容阙)四句。

5.“华言雅俗为一例” 讨论华言(汉文)中的雅俗问题。雅,是指经籍上的词汇;俗,是指日常谈吐时的用语。下分:是雅非俗、是俗非雅、亦雅亦俗、二非句(内容阙)四句。

6.“直语密语为一例” 直语,是指用世俗的语言来表述;密语,是指用佛教的术语来表述。下分:是直非密、是密非直、二亦句(指亦直亦密)、二非句(指非直非密)四句。



虽说赞宁将每一例均分为四句来解释,过于呆板,而且有的连作者本人也讲不出,故在“二非句”下注以“阙”字(内容阙),但对这些与翻译有关的问题进行归纳和探讨,本身又是很有意义的。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也触及了不少前人没有弄清的问题,例如胡语、梵言的区别等等。

由于历代佛经翻译家在译经活动中不断探索、总结和提高,因此,虽然就单个译经家而言,其翻译水准参差不齐,有高有低,但从总的趋势来说,佛经的翻译质量是不断提高的,尤其是隋、唐时期。汉译佛经不仅给我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意境,而且也为文学界带来了新的词汇、语法形式以及文体。

在词汇上,汉译佛经通过对单个汉字进行不同的缀合,赋予其新的含义,从而创造了成千上万的佛经翻译名词。这中间,有一部分为梵语的义译名词,如真如、真谛、无明、法界、极乐、如来、众生、声闻、缘觉、因缘等;另一部分为梵语的音译名词,如涅槃、瑜伽、禅那、刹那、菩提、由旬等。这些翻译名词随着佛教的流布,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逐渐演变为古代以至现代社会中常用的词汇,成为汉语词汇库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在语法上,由于梵语的语法与汉语的语法大不相同。因此,汉译佛经中的语法,也与我国传统的儒家经籍中的语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儒家经籍中使用倒装句较少,而汉译佛经中则使用倒装句较多;儒家经籍中使用“之乎者也”“矣焉哉耳”等虚词较多,而汉译佛经中则使用较少。另外,我国东汉以后,逐渐使用的反切注音,即用两个字拼合(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取后一个字的韵母与声调,然后相拼)的方式注出另一个字的读音,相传,也是在佛经传入之后,受梵文拼音的影响产生的(见李子白《印度梵文对中国声韵学的影响》,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书店1987年10月影印本)。



在文体上,我国汉魏南北朝的文学作品,好用骈体文,作文章讲究句式、韵律以及典故,而且散文与诗颂大多单独成篇,很少混合使用。而在汉译佛经中,偈颂只要朗朗上口就行,不受格律的限制。另外,在同一篇经文中,散文与偈颂交错使用的现象极为普遍(见日本加地哲定著、刘卫星译《中国佛教文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凡此种种,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目录和版本

汉文佛典的数量极多,仅就被收入历代《大藏经》并流传至今的藏经而言,有四千二百多种,至于未被收编入藏的更不知其数。有关汉文佛典的目录,自西晋至当代不下一百种,其分类法则和所收的部卷也各不相同,大体说来,以记载汉译佛典为主,兼及此土的佛教撰述。而在汉译佛典中,或先分乘(大乘和小乘),后分藏(经律论三藏),依次为:大乘经、大乘律、大乘论、小乘经、小乘律、小乘论;或先分藏,后分乘,依次为:大乘经、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汉文佛典在唐末以前,一般是以抄本(又称写本)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即用墨(偶尔也用金泥、银泥)将经文抄写在纸或帛上。

抄本的装帧形式有:

(一)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卷子本。即在一卷经文的末尾缚粘一根轴子,用以展开和收拢,经卷的首页通常粘有佛陀说法的图像,作为封面。

(二) 经折装 又称折子装、折叠装、梵夹装。即将长幅的卷子折叠成相连的一页一页的书。



(三) 方册装 即将长幅的卷子裁成同样大小的单页,书写经文以后,再用线穿起来,流传至今的线装本就是方册装。

佛经的写本多取卷轴装和经折装,方册装也有,如敦煌石室中就发现采用方册装的《坛经》,但总的来说,数量较少。在木刻的历代汉文《大藏经》中,取方册装也只有明代的《嘉兴藏》。

另外,佛经也有镌刻在石板上,这称之为“石经”。北齐时在山东徂徕山映佛岩刻的《大般若经》,泰山经石峪刻的《金刚经》,在山西太原风峪刻的《华严经》,在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刻的《维摩经》《胜鬘经》、《字经》、《弥勒成佛经》等,便属这一类。最为著名的石经是《房山石经》,由隋末幽州大房山云居寺(今属北京房山县)沙门静琬创刻,以后历经增刻,一直持续到清康熙三十年(1691)。共有大小经板一万四千五百一十块,刻佛经一千一百二十五部,三千四百八十卷。以唐、辽、金时期所刻的数量为最多,分别藏于石经山九个石洞及云居寺西南的地穴之中。《房山石经》现已由中国佛教协会加以整理,影印出版。

唐末,汉文佛典已出现了少量的木刻本。今存最早的木刻本佛经是唐咸通九年(868)王阶出资刻印的卷子本《金刚经》(扉页刻有释迦牟尼佛说法图)。自北宋开宝五年(972)起,汉文佛典的流通方式从手抄为主转向木刻为主,在木刻单本佛经之外,还出现了木刻的《大藏经》,将汉文佛典编制成一个完备的系列,雕印后向社会推出。

据统计,截止于清末,官私雕刻的《大藏经》版本有十四种之多。近现代则出现了用活字排印或电脑排印的《大藏经》,并持续至今。汉文《大藏经》为各种文本的《大藏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文本。它不仅为中国所使用,也为朝鲜和日本翻刻和使用。有关汉文《大藏经》各种版本的情况,详见本书第八章。



第五节 藏文佛典

我国的西藏,古称“吐蕃”,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公元七世纪开始的。七世纪前半叶,以松赞干布(约617—650)为赞普(首领)的雅隆(今西藏山南地区)农牧部落联盟,兼并了苏毗、羊同等部,定都逻些(今拉萨),从而在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国。相传,在松赞干布以前,藏族部落的文化十分落后,靠结绳齿木(在木头上划记号)记事(见《新唐书·吐蕃传》)。立国以后,为适应制定法律、建立官制和军制,以及对外交往等需要,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扎(又译图弥桑布札)等十七人,到天竺学习“声明学”(语言文字学),并参照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带)流行的文字,创立了三十个辅音字母、四个元音符号,并制定了相应的语法。从此,西藏地区有了统一的文字——藏文。

一、佛典藏译的开展

印度佛教是在什么时候传入西藏的?据元代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说,在松赞干布前五代的脱脱日涅赞(又译拉托托日涅赞、拉托多聂赞等)六十岁时,有宝篋从他居住的容布拉岗宫的天上落下,开篋一看,里面有《大乘庄严宝王经》、《百拜忏悔经》和金塔一座,“从此佛教圣法正式建立”。但书中同时又以脱脱日涅赞在梦中得到授记(预言)的方式说:“王朝再传五代的时候,将有知道此篋中经典的人。”可见布顿也认为,当时尚没有知道佛经内容的人。因此,确凿可信的事实是:印度佛教是随着吞米桑布扎等人入印求



学归来,而传入西藏的。另外,松赞干布又先后娶尼泊尔国王鸯输伐摩(又译光胄)的女儿尺尊(又译墀尊、赤准、泊姆赤准)公主和唐宗室文成公主为妃。两位公主都是佛教信仰者,她们在入藏时,也带去了一批佛像、法物、经典,以及替她们供佛的若干名僧人,各自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两所佛寺。其中尺尊公主命尼泊尔匠人营造了大昭寺,文成公主命我国内地匠人营造了小昭寺,以供奉各自带去的佛像(到松赞干布的第三代赤德祖赞时,唐宗室的金城公主进藏联婚,她将两寺供奉的佛像作了对调。此后,大昭寺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佛像,而小昭寺供奉的是尺尊公主带去的佛像)。这样,尼泊尔佛教和我国内地佛教也相继传入西藏。在两位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本人也在拉萨周围建造了十二所寺庙,用来供奉佛像。不过,它们的规模都很小,而且由于那时藏地还没有本地的出家人,因而也没有形成僧伽组织。在社会思想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藏地的原始宗教——苯教(又译本教、笨教)。

佛典的传译,相传也是从松赞干布时代开始的。当时参加译经的,有印度僧人古萨惹、婆罗门香嘎惹(又译商羯罗)、尼泊尔僧人西那曼殊(又译尸罗曼殊)、汉地僧人大寿(又称大天寿和尚),以及藏人吞米桑布扎和他的助手达摩廓霞(又译达摩阁侠)、拉隆多杰(又译拉垅金刚祥)。译出的经典有:《宝篋庄严经》、《百拜忏悔经》、《宝云经》、《观音六字明咒》、《阎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法》、《集宝顶经》、《观音经续》、《白莲华经》、《月灯经》等(以上见元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明索南坚赞《西藏王统纪》、明郭循努白《青史》)。然而,由于这些佛经无一传世,而且有关的记载也是在相隔了数百年以后才出现的。故近世也有一些学者对当时是否译过这些佛教经典持审慎态度。

西藏佛教以 841 年藏王朗达玛(838—842 在位)灭佛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 前弘期(松赞干布时代至热巴巾时代)

在这一时期,对佛教的初兴和盛弘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的,是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又译墀松德赞,742—797在位)、热巴巾(又译赤热巴布、墀惹巴仅、惹巴瑾,815—838在位)三位藏王,特别是赤松德赞和热巴巾,西藏佛教的基础就是在他们任位时奠定的。

赤松德赞的弘法事迹主要表现在:派巴赛囊到尼泊尔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又译静命)、莲花生入藏传教;请印度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十二位律师为西藏第一批自愿出家的巴赛囊等七人(后世称之为“七觉士”)剃度授戒;依仿摩揭陀的欧丹达菩黎寺(又译飞行寺)的式样,在拉萨的东南建造了西藏第一所供僧众集居修道的寺院——桑耶寺;派人到印度学法等等。当时,有印度僧人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师子、西藏僧人意希旺波(巴赛囊出家后的法名)、贝扬、遍照护(又译毗卢遮那)、仁钦乔、法明、虚空、宝军、无分别、释迦光等人从事译经,译出了大批显密经典,并编纂了最早的综合性的佛经目录。

热巴巾更是把佛教推向前弘期的顶峰。鉴于前代所译出的佛经,有根据梵文翻译的,也有根据汉文、于阗文等翻译的,对同一个名词术语及人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译法,从而给学人阅读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他命胜友、戒帝觉、施戒、天帝觉(又译天王菩提)等对这些经典重新进行润色修订,使译名达到统一。并为此编纂了著名的《翻译名义大集》以及它的略释《声明总义》。规定:如今后要设立新的译名,须将该译名的本义以及定名的理由,呈报译经院、讲经院,由藏王批准后,方可编入译名目录之中。今存的西藏文《大藏经》中的显教经典,大半是在热巴巾时代译出的。在译出的显密经典中,凡属律典,卷首均题有“敬礼一切智”的礼敬文;凡属契经,均题有“敬礼一切佛菩萨”;凡属论典,均题有“敬礼



曼殊室利童子”，以示区别。对于戒律，只允许弘传说一切有部的律典，以免多种部派律典同时流传而容易引发的争端。并规定，凡是先前已经翻译过的佛经，原则上不再翻译；密乘中属于无上瑜伽部的典籍，须报藏王同意方可翻译，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译（见法尊《西藏前弘期佛教》，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一辑，知识出版社 1980 年 4 月版）。

（二）后弘期（额达赤巴时代至清代）

前弘期的末叶，热巴巾在藏地全面实施佛教化。他化费巨资整修了前代王臣建立的一千零八所寺庙，并兴建了扎喜格培寺；下令每七户属民供养一个僧人。凡以手指指点僧人的，断指。以恶言睥睨僧人的，剜目；每逢斋僧法会，把自己用来系头发的丝带铺在地上，让僧众践踏，然后戴在头上，以示尊重；大小朝政皆委托僧人班第钦波贝吉云丹掌管；政令法制，均以佛教经律为准则；连社会上使用的度量衡器，也依照经论上所说的印度古制而加以更改。这就在臣民中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因此，在他三十六岁那年，反对佛教的亲近大臣趁热巴巾酒醉的时候，将他扼死，然后立他的弟弟朗达玛（本名达磨）为藏王。

朗达玛即位以后，全面实施禁毁佛教的运动。他下令毁坏译经院，停止佛经的翻译；断绝对僧人的供养，迫使他们还俗；对不肯还俗的僧人发给弓箭，强迫他们去打猎杀生，违者杀戮无赦；封闭寺庙，并在墙上画僧人饮酒作乐的图像，加以诋毁；沙埋佛像，毁弃经书。朗达玛的毁佛活动，激起了僧人的愤恨。次年（842），一个名叫伯季多杰的僧人从耶巴的拉领波山，潜往拉萨，在《唐蕃会盟碑》前用弓箭射死了正在阅读碑文的朗达玛，然后换装逃走（见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

朗达玛死后，吐蕃王室围绕谁来继承赞普的位子，分裂成两大



派。一派拥立长妃的养子永丹，一派拥立次妃的儿子欧松（又译斡松），互相混战。一直到十世纪中叶，永丹的后裔才逐渐确立了在卫藏（前藏和后藏）地区的统治，欧松的后裔则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从朗达玛毁佛开始，有一百三十七年的时间，卫藏地区全无佛法。这一时间是据《青史》中关于西藏杰拉康（又译贾拉康）寺的创建者尚那囊·多吉旺秋的生平纪事推定的。而《佛教史大宝藏论》则说，前后藏全无佛法的时间，“约七十年”，一说“一百零八年”。

978年，受卫藏统治者额达赤巴的父亲意希坚赞的派遣，从多康地区丹底（今西宁循化县以北）的佛教大师喇钦·贡巴饶赛（又译穆苏赛拔）出家学法的卢梅·楚臣喜饶等十人，回到藏地，宣告了佛教由此从多康传回卫藏。因此，佛教界也将这一年作为后弘期之始；在同一时期，古格王朝的柯热（又译柯日，后出家改名为意希沃）派仁钦桑布（985—1055）、玛·雷必喜饶等人到迦湿弥罗学法归来，佛教又在阿里地区得到了恢复，并传入卫藏。前者称为“下路传法”，后者称为“上路传法”。这样，因朗达玛灭佛和战乱而被破坏殆尽的藏地佛教，又重新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形成了各种教派，传译了大量的印度佛教经典，其影响与规模远远超出前弘期。

特别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富汗突厥系伽色尼王朝，在马默德即位期间，从1001年至1027年，前后十七次远征北印度，破坏寺庙，残杀僧尼；继之兴起的廓尔王朝，又由王弟西哈布·乌德·丁·穆罕默德率领军队，自1175年后几次出征印度的旁遮普、古吉拉特，击败了印军，在北印度确立了穆斯林的统治，1202年又将势力扩展到孟加拉湾；1206年，西哈布·乌德·丁死后，他的部将库特布·乌德·丁·艾伯克，自立为王，建都于普里拉毗拉辛（即德里，相对以后建立的新德里，又称旧德里），印度从一个佛教国家变为穆斯林国家以后，大批印度僧侣携带经书（包括超岩寺珍藏本）逃往西藏，



密教的中心也随之从印度转移到西藏。

西藏后弘期佛教的佛经翻译极为兴盛,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的显教类经典主要是在前弘期译出的,而密教类经典则主要是在后弘期译出的。而后一类经典的数量远远超过前一类,构成了藏文《大藏经》的主体。后弘期参加译经的人很多。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中曾列举了到他撰书时为止的一百九十二位译师的名字,其中,属于前弘期的,有五十五人,始吞米桑布扎(又译图弥桑补扎),终朗喀迺(又译南喀迺);属于后弘期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始仁钦桑布(意译宝贤),终勒比洛卓。翻译所依据的原本以梵文为主,也有汉文和西域文字的。

后弘期的最著名的译师,有:仁钦桑布(958—1055)、释迦洛卓(又译卓弥释迦智,994—1078)、玛巴(1012—1097)、廓枯巴拉则,合称“四大译师”。特别是仁钦桑布,他翻译了十七种显教经、三十七种显教论和一百零八种密典,对于般若学和无上瑜伽部密法在藏地的流传,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藏传佛教史上,将他以前翻译的密典,称为“旧密咒”,而将自他开始而翻译的密典,称为“新密咒”。

二、目录和版本

藏文佛典的目录,始编于前弘期赤松德赞(热巴巾之父)在位时。当时,柱德积(又译嘎哇贝寨)等人根据颇章东塘登迺(又译登噶尔玛、敦嘎、丹噶)寺(一说宫)收藏的佛经,编成了《登迺目录》。以后又根据桑耶(又译桑野)钦浦(又译钦朴、青朴)寺(一说宫)收藏的佛经,编成了《钦浦目录》;根据旁塘(又译庞塘、澎塘)无柱寺(又译嘎麦寺)收藏的佛经,编成了《旁塘目录》。热巴巾在位时,又



对这三部佛经目录加以增修,续入了一批新译。元末以后,《钦浦目录》、《旁塘目录》湮没不传,唯有《登迦目录》被编在藏文《大藏经》之中,流传至今。

《登迦目录》共分为十九大类:(一)大乘经(下分六小类)。(二)小乘经。(三)秘密怛特罗(又译密咒续,收事部和行部密典)。(四)陀罗尼。(五)名号。(六)赞颂。(七)愿文。(八)吉祥颂。(九)律藏(收说一切有部律典及注释)。(十)大乘经注释。(十一)中观论。(十二)禅修书(又名禅定书)。(十三)唯识论。(十四)大乘论集(又名大乘论)。(十五)小乘论。(十六)因明论。(十七)藏土撰述(收藏王等人的撰述)。(十八)已译未校的典籍。(十九)未译完的典籍。总计收典六百九十一一种(以上据法尊《西藏后弘期佛教》。吕澂《西藏佛学原论》将第三类和第四类合为一类,名“秘密怛特罗”;将第十八类和第十九类合为一类,名“待考”。故他认为《登迦目录》是“依三藏次第,分十七类,罗列群书”。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1991年7月版)。

后弘期的佛经目录,有卢梅·楚臣喜饶等编的《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元初,迥丹热赤(又译世尊剑)等人根据奈塘(又译那塘、纳塘)寺藏经编的《奈塘目录》(又名《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详指》);蔡巴·贡噶多杰根据贡塘(又名恭塘)寺藏经编的《蔡巴目录》(又名《甘珠尔目录》);布顿在《奈塘目录》、《蔡巴目录》等基础之上,校订增补而编成的《布顿目录》(又名《西藏所译出的佛经和论典目录》、《佛教法典分类目录》)。

其中,收典齐全、分类细致、影响深远的是《布顿目录》。它见于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作者自己介绍说:“本著作是以显密经典及其释论为根据;是以印度、克什米尔、金洲、楞伽洲、邬仗那、萨霍尔、尼泊尔、黎域、汉地、西藏等地的大善巧人士们所作的各种论著和所译的诸经论为根据;是以《颇章东塘敦嘎目录》和其

后出的《桑野青朴目录》、《澎塘嘎麦目录》、后期出的《纳塘丹珠尔译本目录》、大译师所译和著作的目录为根据；是以鲁麦（即卢梅·楚臣喜饶）等人所著的《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为根据，并在此基础上，再补充后期出的译本，又增补各寺院所见典籍中凡未被列入目录，而又符合正量的诸教典，最后编成本书中的目录。”

《布顿目录》的内容是：将全部藏文佛典分为显教和密教两大类。显教和密教中又各按经藏和论藏分类。经藏在藏语中称为“甘珠尔”，意为教说翻译，又称正藏、佛部、教说部，专收契经和律典；论藏在藏语中称为“丹珠尔”，意为论著翻译，又称副藏、祖部、论疏部，专收翻译的论典和藏土撰述。

显教“经”（即甘珠尔）分为：（一）初转四谛法轮类经典（《律本事》等四种律典和《正法念处经》等小乘经）。（二）中转无相法轮类经典（《般若经》）。（三）末转抉择胜义法轮类经典（《华严》、《宝积》、《贤劫》、《解深密》、《法华》、《涅槃》等经）。（四）其他（回向、发愿、吉祥颂赞类经典）。

显教“论”（即丹珠尔）分为：（一）佛经个别密意的论典。下分：1. 初转四谛法轮类经释。2. 中转无相法轮类经释（包括般若类经释、现观庄严类论著、中观类论著、入菩萨行类论著）。3. 末抉择胜义法轮类经释（包括唯识类论著、入菩提道类论著、杂撰、书翰、修习次第及禅定书、佛本生类著述、因缘杂记类著述、赞颂、愿文、吉祥颂等）。（二）佛经总密意的论典（收陈那、法称、月官以及其他阿闍黎撰述的内明类、声明类、诗歌类著作）。（三）其他（收医方明、工巧明、星算占卜、其他术数类著作）。

密教“经”（即甘珠尔）分为：（一）事续部。（二）行续部。（三）瑜伽续部。（四）无上瑜伽续部（又名大瑜伽续部）。各类之下又立子目（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密教“论”（即丹珠尔）分：（一）各种密经的释论。（二）共通



密经的释论(收曼荼罗仪轨等)。各类之下又立子目(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史大宝藏论》汉译本所译的佛典分类目录的名称,不够清晰齐整,尚需进一步斟酌,在以上的叙述中,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汉译本的个别文字作了修改)。

及至清代,则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敕编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又名《蕃藏目录》),它是甘珠尔的总目录。

藏文佛典在最初的六、七百年间,都是以手抄的单本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元仁宗(1312—1320在位)时,奈塘寺(位于日喀则西南)上师迥丹热赤在其弟子恰格巴拨希(又译软语隐福)于内地募得巨款的资助下,将前、后藏和阿里地区流传的藏文佛典全部搜集起来,置于奈塘寺,校刊、分类、编目,从而完成了藏文佛典的编集工作,形成了最早的藏文《大藏经》。与此同时,迥丹热赤还将这些经籍刊版流通,木刻的藏文《大藏经》也以此为始,世称“奈塘古版”。奈塘古版在流传过程中遭到损坏,今已不存。此后问世的藏文《大藏经》刻本,主要有:

(一) 永乐版 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命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根据奈塘古版复刻。刻出了全部的甘珠尔(经藏),又翻刻了丹珠尔中的六部论典(《般若论》、《中论》、《律论》、《对论》、二种《比量论》)作为附录,一并流行,共一百零八帙。每一帙均有明成祖作的《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今存两部:一部藏于布达拉宫,一百零六帙,为明成祖赐给萨迦派祖师贡噶扎西之物;一部藏于色拉寺,一百零三帙,为明成祖赐给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治矢之物。印本用朱砂或云砂印刷,故又称“赤字版”。

(二) 万历版 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根据永乐版翻刻,以黑字印行。今存少量残本。

(三) 理塘版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六



世活佛曲吉旺秋(又译释迦也赞)应云南丽江府土司木增(纳西族)之请,于丽江刻成(此据周润年、李双剑《藏文〈大藏经〉概述》,见中国佛教协会《法音》1988年第12期)。《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藏文大藏经”条则称:里(理)塘版是“明崇祯年间(1628—1644)由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土司木增赞助,据其家藏写本刻制”的)。仅有甘珠尔。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被蒙古和硕特部首领达尔杰搬运到四川理塘寺存放。光绪三十四年(1908)毁于兵火。

(四)北京版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根据西藏色拉寺(一说夏鲁寺)藏本,于北京嵩祝寺刊刻。先刻出甘珠尔,至雍正二年(1724),续刻了丹珠尔。甘珠尔分为一百零七函,收典一千零五十五部;丹珠尔分为二百二十四函,收典三千五百二十二部(此据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十册《大藏经研究汇编》)。《佛光大辞典》“西藏大藏经”条则说:北京版,“其大部分虽由梵文原典翻译,犹有小部分由巴利文圣典译成,另有从汉译等佛典之重译。总计甘珠尔部分收一〇六函一〇〇〇部,一说一〇五五部;丹珠尔则收二二四函五一〇〇余部,一说三九六二部”。经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入侵的八国联军所毁。印本仅存两部:一部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一部藏于日本京都大谷大学。1955年至1961年,日本将大谷大学藏本编为一百五十册,影印流通。其中,甘珠尔四十三册,丹珠尔一百零七册,另有目录一册,索引十七册。大谷大学图书馆还将北京版中的甘珠尔部分,与现存的梵本、汉译本对勘,编成了《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勘同目录》四卷,内分秘密、般若、宝积、华严、诸经、戒律六大部。

(五)卓尼版 清康熙六十年(1721)至雍正九年(1731),由甘肃临潭县卓尼寺第十一世土司莫索贡保刻出甘珠尔;乾隆十八年(1753)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第十四世土司丹尚材让刻出丹珠尔。经版于1928年被河州马仲英所毁。



(六) 德格版 清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九年(1744),由四川德格县德格寺第四十二世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创刻(所刻为甘珠尔全部和丹珠尔中的七函),其子贡噶·次乃嘉措续完(所刻为丹珠尔中的一百零六函)。其中,甘珠尔系根据理塘版刊刻,分为一百函,收典七百余部;丹珠尔系根据色拉寺(一说夏鲁寺)藏本并增补《布顿目录》中所收典籍刊刻,分为二百十三函,收典三千四百余部(此据《佛光大辞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则说:“德格版《甘珠尔》计一一一四部,《丹珠尔》计三五五九部,共计四六七三部。”周润年、李双剑《藏文〈大藏经〉概述》说:德格版,“全书共三二六部,有四五六九个编号”。其中,《甘珠尔》一一〇八个编号,《丹珠尔》三四六一个编号。其经版至今完好。1934年,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将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对勘,编成《西藏大藏经总目录》二册。全书分为佛说部(甘珠尔)和论疏部(丹珠尔)两大部类。佛说部,下分:律部、般若部、华严部、宝积部、经部、怛特罗部(包括十万怛特罗、古怛特罗、时轮经疏、陀罗尼集)六部;论疏部,下分:礼赞部、怛特罗部、般若部、中观部、经疏部、唯识部、阿毗达磨部、律部、本生部、书翰部、因明部、声明部、医明部、工巧明部、修身部、杂部、阿底沙(即阿底峡)小集部、目录部十八部。总计收典四千五百六十九部。日本学者金仓圆照等还编有《西藏撰述佛典目录》一册。全书分为二百三十帙,共收录西藏地区佛教撰述二千零八十三部,有各祖师的全书、丛书、文集、论著、传记、诗论、历书、戏剧等。与《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同为研究藏文佛典的目录学著作。

(七) 奈塘新版 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命颇罗乃·索南多杰主持刊刻。以奈塘古版为底本,参考《蔡巴目录》和《布顿目录》加以增补。清雍正九年(1731)至雍正十年(1732),刻出甘珠尔,分为一百函,收典八百部;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七



年(1742),刻出丹珠尔,分为二百二十四函,收典三千三百七十五部(此据吕澂《西藏佛学原论》)。经版原藏于奈塘寺,“文革”中被毁。日本大正大学、大谷大学等图书馆藏有它的印本。

(八) 拉加版 清嘉庆十九年(1814),由青海玛沁县拉加寺第一世住持罗桑达杰刊刻,为德格版甘珠尔的复刻本。

(九) 拉萨版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命喜饶嘉措刊刻。以奈塘新版为底本,同时参校了德格版等版本。仅有甘珠尔。经版尚存,藏于拉萨布达拉印经院。

藏文《大藏经》除了上述九种版本以外,尚有塔尔寺(青海境内)版、昌都寺(西藏境内)版、拉卜楞寺(甘肃境内)版、杰昆彭寺(甘肃境内)版、却姆陀寺版等。所刻的均为甘珠尔。

藏文《大藏经》的国外版,有:1908年于蒙古乌兰巴托刻的库伦版和近代于不丹普那卡(又译布那克)刻的普那卡版。前者是以永乐版甘珠尔为底本刊刻的,凡一百零五帙;后者也仅有甘珠尔,其经版至今仍存。

在所有的藏文《大藏经》各版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是上面介绍过的北京版、德格版和奈塘新版。

三、藏文佛典的特色

由于佛教传入汉地之时,正是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之时;佛教传入藏地之时,恰当印度密教兴起之时。因此,随之而传入的佛典也各有侧重。总的说来,在藏文《大藏经》中,显教经典不如汉文译本来得齐全;而在汉文《大藏经》中,密教经典(特别是无上瑜伽部密典)不如藏文译本来得周备。

但藏文《大藏经》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显教经典(主要是中晚期



大乘经典)是没有汉译本的。以奈塘新版为例,在甘珠尔中,无汉译本的戒律类典籍有十二部,经集类典籍有一百零九部,咒乘类典籍有三百三十一部;在丹珠尔中,无汉译本的般若类典籍有三十六部,中观类典籍有一百三十一部,经疏类典籍有三十六部,瑜伽类典籍有三十九部,小乘类典籍有五十二部,本生类典籍有五部,杂撰类典籍有四十部,因明类典籍有六十三部,声明、医明类典籍有三十五部,工巧明类典籍有二十四部,世论类典籍有十二部,补遗(其他)类典籍有一百二十二部。总计有五百九十五部。

吕澂《西藏佛学原论》说,在甘珠尔中,“至于密部,汉译零落殊甚”。“以四部本典言,作密四根本咒经,《一切曼荼罗秘密咒经》(汉译缺)、《苏悉地经》(唐输迦颇罗译本同)、《苏婆呼童子经》(唐善无畏译本,又宋法天译本均同)、《禅定外编秘经》(汉译缺),汉译仅得其半;修密三根本咒经,《大日经》(唐善无畏译本同),又《外编》及《金刚手灌顶咒经》(汉译均缺);瑜伽密根本咒经,《摄真实秘经》(宋施护译本同),又《外篇》(汉译缺);无上瑜伽父部三类,《密集》(宋施护译本同),《赤黑夜摩金刚怖畏》及《金刚大阿啰梨咒经》(汉译均缺)。母部三类,《胜乐》(汉译缺)、《喜金刚》(宋法护译本同)、《时轮》(汉译缺)。总计汉译才得三之一耳。盖密乘之学降至晚宋始见完备,其无汉译者,率皆时代限之也。”在丹珠尔中,“西藏之显教大乘推崇龙树、无著二家,龙树本论《七十空性》和《中观》并重,汉译仅存《中论》,而其注疏佛护、月称之作,汉均不传。无著所宗慈氏五部,汉译亦缺其二,陈那绍世亲之业,法称益推衍之,而于汉译一无闻焉。”“其显乘论典作者约有二百家,汉土所传仅二十七人而已。”

因此,研究中后期大乘,不使用藏文资料是不行的。可惜的是,这些藏文佛典绝大多数没有译成汉文。而且,即使是在迄今为止翻译出版的少量的藏文佛典的汉译本中,译名五花八门,同一个



藏文名词(如人名、地名、寺名、宗派名、书名、术语等等)有五、六种译法,使读者如坠云雾之中,莫知适从。有关叙述藏传佛教历史的书籍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藏文佛典的普及和使用。这些需在藏译的翻译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第六节 其他语种的佛典

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除了相对完整、自成系统的巴利文、汉文、藏文《大藏经》,以及业已残缺的梵文、西域文佛典以外,还有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字写成的各种佛典。这在我国,主要有西夏文、蒙文、满文以及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傣文佛典;在国外,主要有日文、欧美文佛典。这中间,既有以含有经律论译本和本土的佛教撰述的《大藏经》形式传行于世的佛典,也有以小丛书或单本的形式流通的佛典。

一、西夏文佛典

西夏,本名大夏,是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即位的党项族(羌族的分支)部落首领赵元昊,于景祐四年(1037)正式宣布成立的一个国家。建都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据有二十二州,今宁夏、陕西、甘肃的西北部、青海的东北部和内蒙的一部分地区均为它所控制。西夏地处宋朝的边陲,先后与宋、辽、金对峙鼎立,历经一百九十年,而于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为蒙古所灭。西夏文,便是赵元昊于即位以后,命野利仁荣等模仿汉字而创立的一种文字,呈方形,共有六千余字。其文在元代中叶仍流行于甘肃、宁夏



一带,到明代中叶还有少量使用者。

北宋景祐元年(1034),赵元旻文派人入宋,求得于宋太宗开宝四年(971)雕刻的《大藏经》(即《开宝藏》)一部,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予以收藏,并请回鹘人将其译为西夏文,始西夏天授礼法延祐元年(1038),终天祐民安元年(1090),共译出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七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此后,还将一批藏文佛典转译为西夏文。不过,当时的西夏文佛典都是写本。元大德六年(1302),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在杭州大万寿寺以河西字(即西夏文)雕刻了一副《大藏经》经版,并印刷了三十余部,分送到宁夏等地寺院收藏,自此便有了木刻的西夏文《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总计收典三千六百二十卷,于元武宗(1307—1311在位)、仁宗(1311—1320在位)时还被印刷过两次,共一百部。

今存的西夏文《大藏经》已非完帙,而且散落于各处。其中,1909年被俄人科兹洛夫等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发见并偷运回国的有三百多种二千多卷;1914年被英人斯坦因于同地获取运走的有数百卷(多为残卷);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发现,现见藏于北京图书馆和甘肃等地的有数十种。这些经典有:《过去庄严千佛名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般若经》、《华严经》、《金光明经》、《悲华经》、《宝雨经》、《大孔雀明王经》、《顺正理论》、《经律异相》、《梁皇忏》、《华严经海印道场礼忏仪》、《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等。

二、蒙文佛典

蒙文,是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在位时,命帝师八思巴(1239—1280)创制的一种文字,至元六年(1269)作为国字颁诏推



1632)达海对此作了改进,在字母旁边加点加圈,并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了一些新字母,使之成为圈点文字。前者称为“老满文”,后者称为“新满文”,后世流传的都是新满文。新满文有六个元音字母,十八个辅音字母,另外还有专为拼写汉语借词(即外来词)用的十个字母。其行款也是从左往右的竖写,字母出现在词首、词中和词末时都有不同的写法。

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满族居住地已经流传喇嘛教。入关以后,满族又广泛地接触了汉地佛教。这样,为适应满族中的佛教信仰者的需要,一些藏文、汉文佛典陆续地被转译为满文。雍正(1723—1735)初年,北京喇嘛教(其时喇嘛教已变为以黄教为主)土观呼图克图一世奉敕翻译并雕印满、蒙、藏三种文字对照的甘珠尔;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硕庄亲王允禄又奉命选择通习梵音的学者,将《大藏经》中的诸咒详加订译,编成《满、汉、蒙古、西蕃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八卷,附《同文韵统》六卷、《字母读法》一卷、《读咒法》一卷,总计九十六卷,雕印后颁送京城直省各大丛林(寺院)(近代,商务印书馆曾以北京观音寺的收藏本为底本,影印流通);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敕命将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此项工程一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告结束,诞生了满文《大藏经》,共计一百零八函,合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见《卫藏通志》卷首刊载的乾隆帝《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上海书店1989年8月影印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等)。但满文《大藏经》并非是汉文《大藏经》的全译。汉文《大藏经》中的大乘律、大乘论和小乘论没有被译出。近人也有将满文《大藏经》说成是根据藏文《大藏经》翻译的,这是不正确的。满文《大藏经》今存一部,见藏于日本。



四、日文佛典

日本佛教为北传佛教的一支,它是由中国佛教经朝鲜(韩国)传入日本而形成的。因此,在讲日本佛教的源始时,必须先了解朝鲜佛教。

古时,朝鲜半岛定居着马韩、辰韩、弁韩、高句丽等多个种族部落。这些部落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约在我国东晋初叶,形成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这便是朝鲜史书上说的“三国”。三国时代持续了三百多年,一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668),新罗国在唐朝军队的帮助下,先后征灭了百济和高句丽,才建立了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佛教就是在三国的初期,传到朝鲜的。

据高丽僧人一然写的《三国遗事》卷三和觉训写的《海东高僧传》卷一《释顺道传》记载,在高句丽国的小兽林王即位的第二年,即东晋咸安二年(372),前秦的苻坚曾派使者和僧人顺道送佛像与经书给高句丽。过了两年,前秦僧人阿道也来到高句丽。小兽林王为顺道修建了肖门寺,为阿道修建了伊弗兰寺。高句丽之有佛教自此而始。

另据《三国遗事》卷三说,在百济枕(一作沈)流王即位的那一年,即东晋太元九年(384),西域僧人摩罗难陀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取海路来到百济,被枕流王迎入宫中,厚礼相待。翌年,在国都江山城为摩罗难陀修建了寺庙,并度僧十人。这样,百济也有了佛教。约在我国南北朝时,高句丽僧人又将佛教带到了新罗。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高句丽、新罗佛教受我国北朝佛教的影响较大些,而百济佛教受南朝佛教的影响较大些。

日本佛教是佛教传入朝鲜一百八十年(即高句丽有佛教之始)



之后,从百济传入的。据《日本书纪》卷十九说,在日本钦明天皇即位的第十三年(552)十月,百济的圣明王派使者到日本,进献金铜释迦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物,并上表赞颂弘布佛法的功德。钦明天皇将佛像等物赐给大臣苏我宿祢稻目,稻目施舍安置,供奉礼拜。传统上将它看作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开始(见日本村上专精著《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版;日本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6月版)。然而,日本《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和《元兴寺伽蓝缘起》则记载百济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的时间为钦明天皇七年(538)。近年以来,日本史学界一般倾向于后说。

再说日文,古代的日本,只有口头使用的语言,而没有书面使用的文字(见陈信德《现代日语实用语法》。商务印书馆1964年1月新1版)。推古天皇初年(593),圣德太子摄政,崇奉佛教,推古天皇十五年(607)七月,圣德太子派大礼小野妹子为使者到隋朝互通友好,求取经论,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由此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圣德太子先后派遣了四次遣隋使(见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并派了一批留学生和学问僧随使入隋学习,汉文典籍因此而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流布,汉文也成了日本的一种书面文字。圣德太子就用汉文撰写了《胜鬘》、《维摩》、《法华》三经的注疏。从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宇多天皇八年(894),日本又派遣了十七次遣唐使。其中,有一次是为迎接遣唐使回国而派的,有三次是为送唐朝使节回国而派的。这就源源不断地将唐代文化带回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相传,日文就是唐开元四年(716)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的吉备真备等人回国后,以汉字为基础创立的。

日文由假名和汉字组成。现代日语中的假名共有七十一个,分为清音(表示清音的假名,按发音规则排成的表,称为“五十音



图”)、浊音、半浊音和拨音四种。每一个假名都有两种字体:一种叫做平假名,是参照汉字的草书创立的,为一般的书写、印刷体;另一种叫做片假名,是参照汉字的楷书创立的,一般用来记载非汉语的外来语或某些特殊的词汇(如似声词等)。日文中的汉字有1万多个(包括日本创造的独特的汉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政府选定一千八百五十个基本字为“当用汉字”,即最常用的汉字。每个汉字都有两种读法。一种是“音读”,它来自古汉语的发音;另一种是“训读”,是根据日语词义的读法。假名和汉字按一定的语法结构组合起来,这便形成了日语的口语和书面语。

日本佛教使用的佛典在很长时期内是汉文佛典,以后渐渐出现了用日文写的日本佛教撰述,近代以后才开始将汉文、巴利文《大藏经》迻译为日文,编纂了各种版本的日文《大藏经》。故汉文《大藏经》始终是日本佛教界最为流行的佛教文本。由日本刊印的《天海藏》、《黄檗藏》、《缩刷藏》、《卍正藏》、《卍续藏》、《大正藏》等都是汉文《大藏经》。有关这些《大藏经》的情况,见本书第八章。

根据巴利文《大藏经》翻译而成的日文《大藏经》有:高楠顺次楠监修的《南传大藏经》七十卷(另有《索引》、《目录》各一卷)。

根据汉文《大藏经》翻译,并增入日本佛教撰述的日文《大藏经》有:国译一切经刊行会编的《国译一切经》二百五十五卷(其中,《印度撰述部》一百五十五卷,《和汉撰述部》一百卷。另外,各有《索引》一卷);国民文库刊行会编的《国译大藏经》三十一卷。

日本佛教宗派的丛书有:天台宗典刊行会编的《天台宗全书》二十六卷;天台宗典编纂所编的《续天台宗全书》第一期十五卷;高岗隆心等编的《真言宗全书》四十二卷;新编真宗全书刊行会编的《新编真宗全书》三十卷;国译禅宗丛书刊行会编的《国译禅宗丛书》二十二卷(第一辑十二卷、第二辑十卷);日莲教学研究所编的《日莲宗学全书》二十三卷等。



总收日本佛教撰述的丛书有：佛书刊行会编的《大日本佛教全书》一百五十五卷（另有《目录》一卷）。

解说佛教经典的辞书有：小野玄妙等编的《佛书解说大辞典》十三卷（另有《佛教经典总论》一卷）；三井晶史编的《佛像佛典解说事典》一卷；水野弘元等编的《佛典解题事典》一卷等。

此外，还有用日文撰述的各种佛教辞典、事典、年表、索引、目录、专著、史料、法话、全集、丛书等。仅据日本佛教书总目录刊行会编的《佛教书总目录》（2000）所列，当年日本出版的佛典近五千七百种，出版佛书的出版社有一百九十三家。日文佛典已成为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佛教文本。

五、欧美文佛典

佛教在很长时间里，主要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流行。十九世纪以后，才在欧美一些国家传开，出现了用英文、德文、俄文、法文、意大利文、比利时文等欧美文字刊行的佛典，内容涉及佛教的历史、教理、经典、人物等，其中也包括了对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的移译和介绍。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形成规模和系列，其影响力也不如其他宗教来得大。

第六章 中国佛教义理类典籍

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经西域正式传入中国以后,起初只是在西域来华的使团和商贾中流传,中土之士信奉的很少(见《魏书·释老志》)。没有多久,王莽托古改制,南方爆发绿林军起义,东方爆发赤眉军起义,北方爆发铜马等部起义,天下大乱。刘秀借农民起义之机,窃取政权,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之初,刘秀把主要精力化在巩固豪族统治,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发展社会经济上,在思想意识领域里,则主要是倡导谶纬神学,以便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因而对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未闻有任何褒扬之举。

到了东汉王朝的第二代,即汉明帝执政时,由于天下大定,思想界也渐渐地活跃起来,故开始对佛教表示出一定的兴趣,佛教以西域使臣为媒介,传入朝廷,在王室和贵族中流传开来。明帝的异母弟弟楚王刘英,是王室中最早信奉佛教的一个人,他把佛陀当作神祇来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仁祠”(见《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并且依照佛教的教义,于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三长斋月)的初一至十五日,修持居士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期得到道家 and 佛教两系神祇的庇佑,获取现世利益,以至长生不老。刘英于永平十三年(70)因谋反事而被废,次年于遣送途中于丹阳自杀。可能是由于此案的牵



连,佛教遭到冷落,在此后的六、七年间寂没无闻,在史书和文物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一直到汉桓帝于延熹九年(166),以皇帝身份,在洛阳西北的皇宫——濯龙宫,设华盖,仿效祭天的仪式,同时祭祀“浮图”(佛陀)、黄老,佛教才重新活跃起来,民间奉佛的人也日益增多(见《后汉书》卷七《桓帝纪》、卷三十《襄楷传》)。汉献帝时,丹阳人笮融利用掌握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漕的财力,大起佛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他还铸造了镀金的铜佛像,举行浴佛法会,“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见《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这表明佛教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知名度。

不过,东汉末年佛教的流布还是散点式的,非全方位的。流传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四个区域:洛阳(东汉的京城)、江淮流域(丹阳、彭城、广陵等地)、四川、交趾(广州一带),而以洛阳为中心。东汉时期的译经几乎都是在洛阳进行的。由于当时一般人对佛教的义理不甚了了,再加上最初的传道者为了便于世人的理解和接受,或多或少地给佛教添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把佛陀当作是祈求必应的神祇来宣传。因此,无论是王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大多是把佛教当作是与神仙道术、社祀相似的一种宗教或方术来接受的。他们所理解的佛教教义,一是善恶报应,二是生死轮回。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故生时须省欲去奢,好生恶杀,多行布施(见东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因精灵不灭,轮回转生,故又常常在死者的墓室里雕刻佛像。近世以来,四川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最早的佛教造像,大多出现在墓室的石壁和随葬品之中。例如,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的坐佛像是刻在墓内前室东壁门楣石上,与佛像平行雕刻的图像是一个赤足的垂钓者(见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第二期)。绵阳何家山一号东汉崖墓发现的



五尊铜佛像和忠县涂井蜀汉墓发现的一佛二菩萨像都位于摇钱树主干上(见绵阳博物馆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三期;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像及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五期)。

在中国佛教经典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是先有翻译经典,然后才有依据翻译经典的义理构筑起来的撰述经典。

东汉时期的佛教翻译经典,主要是桓帝、灵帝时代,从安息、大月氏、天竺、康居等国来华的西域僧根据胡本(西域文本)翻译的。为华夏提供第一批汉译佛经的是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来华的安息国沙门安世高。安世高在译经的同时,还讲经说法。渐渐地在周围聚集起一批信众,其中有一个名叫严浮调(后改名严佛调)。严浮调是临淮(今江苏宿迁县西北)人,当时正值少年,颖敏好学,他在聆听了安世高的讲经之后,敬信佛法,于是决然落发出家,成了汉地第一个出家人。但由于当时佛教的律仪尚未入中国,严浮调当时只是以剃除须发,身着袈裟为出家的标志,而没有履行受戒的仪式。中国第一个登坛受戒的沙门是魏晋时的朱士行。严浮调在安世高的指导下,逐渐熟悉并掌握了胡语。安世高翻译的一些佛经,就是由安世高口头宣诵,他笔受成文的。此外,他还曾和安息国来华经商的优婆塞(居士)安玄合作,共同翻译了讲述大乘戒行的《法镜经》一卷。“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见梁慧皎《高僧传》卷一)。

在安世高的译籍中,有一部题为《安般守意经》(一卷)的小乘禅法类经典,其中提到“十黠”(严浮调称为十慧),即数息、相随、止、观、还、静、苦、集、灭、道,为出家少年(沙弥)必须修持的重要法门。然而安世高未遑诠释。安世高卒后,严浮调发愤忘食,因闲历思,撰写了《沙弥十慧章句》一卷(已佚,仅有作者写的自序《沙弥十慧章句序》见存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之中)。从而诞生了中



国佛教的第一部撰述经典。中国佛教撰述史,就是以此为开端,从无到有,从少到众,从单一品种到各种体裁,全方位发展起来的,并以其数千部的惊人数量和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驰名于中国古代文化之林的。

中国佛教撰述经典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类:一类是论述佛教教理以及在教理指导下的修持实践为主的典籍,称为义理类典籍;一类是以记叙佛教史迹和特定事项为主的典籍,称为文史类典籍。前者为佛教的理论著作,后者为佛教的文学著作和史学著作。

佛教义理类典籍的名目繁多,常见的有:章句、文句、句解、注释、注解、笺释、详解、略解、直解、要解、会解、集注、注、疏、大疏、略疏、文疏、义疏、科疏、科文、文义、疏钞、义钞、大意、游意、纲目、指归、枢要、演秘、料简、心要、玄谈、发隐、指掌、纶贯、策林、义章、探玄记、搜玄记、资持记、发挥记、开宗记、精解评林、论、约论、合论、全集、别集、法集等等。

但归纳起来,佛教义理类典籍不外乎注疏、论著、纂集三大板块。注疏中包括随文释义的注解和撮举大意的义疏两类;论著中,有综述佛法大义的通论,也有专就某一主题展开议论的专论;纂集中,有将佛经中的文句分类汇编的类书,也有将同一时代或历代的各种佛教著作汇集在一起的丛书,还有按宗派、个人或专题纂录的文集。

当然,有关中国佛教义理类典籍和文史类典籍的界定是相对的。有些佛教义理类典籍,如论著中涉及佛、儒、道三教关系的著作,纂集中解释佛典事数名相(名词术语)的辞书,涉猎许多佛教史实的类书,以及对佛教宗派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集等,在研究时,也可作为文史类典籍来看待。另外,佛经的义疏和论著的界定也是相对的,不能望文生义,须视书中所述内容的侧重点而定。



第一节 前宗派时期的义学著作

中国佛教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东汉三国的初传期;二是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期;三是隋唐的鼎盛期;四是五代宋元明清的衰弱期。本节所说的“前宗派时期”,指的是自东汉末年佛教大量传入,至隋唐佛教宗派形成之前这一期间。所说的“义学著作”,指的是研究佛教义理的著作,即义理类典籍。具有中国特质的佛教哲理和修持体系是由这些典籍逐渐建构的。兹以朝代为序,概述如下。

东汉:东汉的佛教义学著作,除前面提到的严浮调的《沙弥十慧章句》之外,还有牟子的《理惑论》。牟子早先修习经传诸子,博学多识。汉灵帝以后,天下大乱,因而避世于交州(治所在今广州)。以“方世扰攘,非显己之秋”(见梁僧祐《弘明集》卷一《理惑论》),而锐志于佛教。当时,佛教属异质文化。佛教有关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教说,落发出家、不婚不娶、乞食为生的制度,以及起居、衣着、礼仪等方面的规范,都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习俗迥然异趣,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诧和议论,特别是儒家礼教恪守者的反感和指责。为了消除世人的疑窦,调和佛教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的矛盾,说明佛教究竟是怎么回事,牟子撰写了《理惑论》。全论由序言、正文和后语三部分组成。序言叙述说了牟子的生世以及撰论的缘由;正文分为三十七条(又称章),用宾主问答的方式写就。有佛陀生平的介绍,佛教戒斋和义旨的阐述,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对原始道教神仙方术的批判等;后语解释了为何要取“三十七条”之数的原因,并且描述了“惑人”听闻这一席话以后,拜伏皈信的结局。尽管有关《理惑论》的形成年代,学术界尚存在



着一些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三国以后的作品,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它形成于东汉末年。因此,如果说在中国佛教撰述经典中,严浮调的《沙弥十慧章句》为佛经注疏之祖的话,那么,牟子的《理惑论》则为佛教论著之祖。

三国:三国时期的佛教,主要是在魏国和吴国得到流传和发展的。魏都洛阳为北方佛教中心,吴都建业(今南京)为南方佛教中心。而地处西隅的蜀国有无佛教,虽然文献阙载,但从近世的考古发现来看,也曾有佛教的流传,只是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和声势而已。魏、吴两国都出现了一批翻译佛经,但就佛教义学著作而言,则基本上出自吴地。其体裁有两种:一为经序,一为经注。经序为翻译佛经的序言,经注为翻译佛经的注解。由于经序一般来说,文字较为简短,它通常是附在翻译佛经之首流传的,并不构成单本,故能作单本流通的实际上是经注。其间出现的义学著作有:支谦《了本生死经注》;康僧会《安般守意经注》、《法镜经注》、《道树经注》、《阴持入经注》(见梁慧皎《高僧传》卷一)。

西晋:西晋时,由于受魏正始年间(240—249)兴起的、以崇尚老庄自然无为思想为标志的玄学的影响,因主张一切诸法(事物和现象)本性空寂的《般若经》受到了学人的关注。《般若经》有《小品般若》(其译本有西晋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无罗叉等译的《放光般若经》、姚秦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大品般若》(其译本有后汉支谶译的《道行般若经》、吴支谦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之分。其中,《小品般若》的注疏已在西晋出现。另外,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势力的日益扩张,它与道教之间的矛盾也凸现出来,佛家也撰写了与《理惑论》性质相同的、针对外界非难的护教作品。其间出现的义学著作有:帛法祖《首楞严经注》;帛法祚《放光般若经注》、《显宗论》(见梁慧皎《高僧传》卷一)。

东晋:东晋末年,由于“八王之乱”,短暂统一的西晋王朝归于覆灭。时在南方的晋郡王司马睿(晋元帝)在建康(今南京)重建王朝,史称东晋,据有长江流域。而在北方,则相继出现了由匈奴、氐、羯、羌、鲜卑、汉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国。此期的佛教,主要是在南方的东晋和北方的前秦(又称苻秦)、后秦(又称姚秦),以及西秦(又称乞伏秦)、前凉、北凉得到发展的。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之风,而以《般若经》的讲习和疏论为中心,形成了般若学,并且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佛教学派——般若学派。不过,这里所说的佛教学派,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的是研究同一经典或课题的一批佛教学者。作为佛教学派中的个人,有些有师资授受关系,有些则没有,他们大多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活动的,没有一脉相承的传授系统,也没有统一的理论见解。而且他们往往博通经藏,对其他佛经也有颇为深入的研究,只是相比之下,尤擅某一经典而已。因此,所谓的般若学派,也就是指致力于《般若经》的研习、弘传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一批学者,它是一个松散型的研究者集合体。

般若学派有“六家七宗”之别。

“六家”,指的是:一、本无宗。认为,“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于末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见唐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引)也就是说,一切事物的本性是“无”、“空”,只有确立了这一观念,才能消除世人对外物的执著追求,平息种种“异想”。其代表人物为道安、竺法汰(道安的同学);二、即色宗。认为,“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见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也就是说,事物(色)的性质,并不是本来就有的。也不是先有了事物的性质,然后才有这一事物。事物是凭藉各种因缘条件产生的。因此,名义上是事物,实际上并非事物,它的本质是“空”(“虽色而空”)的。“空”不是独立于“色”之外的东西,而是寓于“色”之中的。“空”即是“色”,“色”即是



“空”。其代表人物为支遁。“即色”两字也因他的《即色游玄论》而得名；三、识含宗。认为，“三界为长夜之宅，心识为大梦之主。今之所见群有，皆于梦中所见。其于大梦既觉，长夜获晓，即倒惑识灭，三界都空”（见唐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引）。也就是说，森罗万象的外部事物，均为梦中显现的境界，它们是虚幻不实的。而“心识”则是这些外部事物的发动者和主宰，只有灭却了种种颠倒的、迷惑的“心识”，才能位登佛地。其代表人物为于法开；四、幻化宗。认为，“一切诸法，皆同幻化，同幻化故名世谛。心神犹真不空，是第一义”（见日本安澄《中论疏记》引）。也就是说，一切事物皆为“幻化”，只有“心神”真实不空。其代表人物为道壹（竺法汰的弟子）；五、心无宗。认为，“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见东晋僧肇《肇论》引）也就是说，所谓的“心无”，指的是“心”不要为万物所牵制，但万物是客观存在的，它们不是虚无的。其代表人物支愨度、竺法蕴（竺法深的弟子）、道恒；六、缘会宗。认为，“缘会故有，名为世谛。缘散即无，称第一义谛”（见唐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引）。也就是说，万物因因缘条件的聚合而产生，此为世俗的真理观（世谛），万物因因缘条件的离散而消亡，此为超俗的真理观（真谛）。只要将事物分解为因缘条件，就可以得知这“缘会”的事物实际上是“空”的。其代表人物为于道邃。

“七宗”，指的是在上述六家以外，加上本无宗的支派——本无异宗。此宗认为，“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见唐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引）。万物从“无”而生，而“无”指的是“壑然无形”，即虚空、空间。其代表人物是竺道潜（字法深）。

在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带动下，东晋佛教义学全面上扬，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一批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一经译出，便迅速地在社会上得到流布，随后就产生了它们的注疏。在大乘经中，除《般若经》以外，《法华经》、《维摩经》、



《胜鬘经》(北凉昙无讫译本)、《十住经》等也成为注疏的热点。此期,不仅契经有注疏,律本(如《十诵律》)和论典(如《毗昙》、《中论》)也开始有了注疏。另外,通过对实相、三乘、佛性、心神、六识、报验、神通等佛学问题的阐发,以及对外界非难的辩驳,形成了各种主题的佛教论著。

据梁慧皎《高僧传》、僧祐《出三藏记集》、《弘明集》、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道宣《广弘明集》、《大唐内典录》诸书的记载,其间问世的佛教义学著作主要有:鸠摩罗什《实相论》、《大乘大义章》;康法畅《人物始义论》;支遁《即色游玄论》、《道行旨归》、《本业经注》、《四禅经注》、《辩佛性义》;竺法崇《法华义疏》;竺僧度《毗昙指归》;竺慧超《胜鬘经注》;道安《光赞折中解》、《放光般若折疑准》、《道行经集异注》、大小《十二门经注》、《密迹金刚经·持心梵天经甄解》、《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经解》、《十法句义》、《大道地经注》、《实相义》;竺法汰《放光般若经义疏》;竺僧敷《神无形论》、《维摩诘经注》、《穷通论》;僧卫《十住经注》;昙徽《立本论》、《六识旨归》;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明报应论》、《法性论》、《三乘统要》、《辩心识论》(又名《辩心意识》)、《大智度论要略》;道融《法华义疏》、《小品般若经义疏》、《金光明经义疏》、《十地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昙影《法华义疏》、《中论注》;道恒《释驳论》;僧肇《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维摩经注》;慧猷《十诵律义疏》;谢敷《识三本论》;谢灵运《辩宗论》;郗超《奉法要》、《通神咒》、《明感论》;孙绰《喻道论》等。

南北朝:南北朝时,我国南方自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称帝以后,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北方于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实现了统一。初为北魏,以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前后经历了五个朝代,史称北朝。



南朝诸帝一般都崇奉佛教，他们鼓励译经，修筑寺庙，营造佛像，请高僧讲经说法，组织大型佛教类书、丛书、佛经目录等著作的编写，有的还亲自为佛经作注作疏，撰写佛教论著，甚至舍身佛寺，甘为寺奴，由群臣奉钱赎请，方才还宫（如梁武帝、陈武帝、陈后主），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和风气，使佛教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和各个领域，至梁武帝时，南朝佛教达到了全盛。

北朝诸帝对佛教的态度各不相同，有崇信的，也有不信的，还有若即若离的。因而北朝佛教的发展不像南朝佛教那样一直走势坚挺，而是历经波折的。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即位期间，由于这两位皇帝偏向于道教，并出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虑，曾两次在全国范围内禁毁佛教。他们下诏平毁寺庙，禁除经像，没收寺产，限令僧尼还俗，甚至坑杀沙门。致使佛教从合法的存在变为非法的存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佛教史上将这两次灭佛，以及后来唐武宗、后周世宗分别发动的灭佛运动，称为“三武一宗灭佛”，其中前三次尤为苛厉，故又称“三武灭佛”、“三武法难”。但由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毁佛后没几年都死了，嗣位的新皇帝并没有继承他们的毁佛政策，相反，一即位就宣布改弦易辙，重兴佛教，因此，佛教迅速反弹，很快恢复了禁毁前的状况，并快速推进，超出了禁毁前的规模。再加上北朝的多数皇帝是笃好佛教的，因而在北朝，虽说佛教遭受过短时期内的严重打击，但就其发展势头而言，仍然是一波接一波推进向前的。驰名海内外的佛教雕塑群——北魏的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郊十六公里的武周山南麓）、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市南郊十三公里伊河入口处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市东南四十五公里的麦积山）、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邯郸市西南的南、北响堂山），就是在其间开凿的。

南北朝时，佛教义学十分发达。其中，因对某些经典进行专门



的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佛教学派。这主要有:涅槃学派、成实学派、毗昙学派、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

涅槃学派:因研习《大般涅槃经》而得名。《大般涅槃经》是一部论述如来常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经典,有几个本子。此派最初研习的是东晋义熙十三年(417)由法显、佛陀跋陀罗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又称《六卷泥洹》)。待北凉玄始十年(421)昙无讖译出《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又称大本《涅槃经》、北本《涅槃经》),宋文帝又令慧严、慧观等人,参酌法显的译本,对昙无讖译本加以删订,另成《大般涅槃经》三十六卷(又称《南本涅槃经》)以后,北朝学者以研究《北本涅槃经》为主,南朝学者以研究《南本涅槃经》为主。此派的代表人物有:刘宋的竺道生、慧观、宝林、慧静、法瑶、僧宗、齐代的法安、梁代的宝亮、北周的宝象、昙延等。其中,竺道生立顿悟成佛义,为顿悟派首领;慧观立渐悟成佛义,为渐悟派首领。

成实学派:因研习《成实论》而得名。《成实论》有十六卷,是印度河梨跋摩为批判小乘说一切有部理论,论述小乘空观而写的一部著作,内容中也有一些大乘的见解。姚秦弘始十四年(412)由鸠摩罗什译出。此派的代表人物有:刘宋的僧导、齐代的僧柔、慧次、梁代的法云、僧旻、智藏,陈代的宝琼、洪偃、智颢,北魏的僧嵩、昙度、北齐的灵询等。其中,刘宋的僧导为南方寿春系的开创者,北魏的僧嵩为北方彭城系的开创者。

毗昙学派:因研习《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而得名。《阿毗昙心论》有四卷,是印度法胜为阐释小乘佛教的基本概念(名数)而写的一部著作,东晋太元十六年(391)由僧伽提婆译出;《杂阿毗昙心论》有十一卷,是印度法救为解释《阿毗昙心论》而写的著作,刘宋元嘉十年(433)由僧伽跋摩译出。它们都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书。此派的代表人物有:刘宋的僧镜、齐代的智林、梁代的慧集、北齐的慧嵩等。



地论学派:因研习《十地经论》而得名。《十地经论》有十二卷,是印度世亲为解释《十地经》(相当于《华严经·十地品》)而写的一部著作,其内容主要是讲菩萨修行的阶次以及“如来藏缘起”说的。北魏永平元年(508),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地论学派分为两派:一为南道派,因住在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进洛阳的南道而得名。一说此派源于勒那摩提,而勒那摩提在译《十地经论》时住在洛阳御道街的南面,故得名“南道”。此派主张佛性本有,第八识(阿梨耶识)为净识。创始人是北魏的慧光(勒那摩提的弟子),传承者有北齐的法上、僧范、惠顺,北周的慧远、灵裕等;二为北道派,因住在相州进洛阳的北道而得名。一说此派源于菩提流支,而菩提流支在译《十地经论》时住在洛阳御道街的北面,故得名“北道”。此派主张第八识为妄识,第九识(庵摩罗识)才是净识。创始人是北魏的道宠(菩提流支的弟子),传承者有北魏的志念等。至南北朝末年,北道派因在教义上与摄论学派相近而合并,唯南道派独步当时。

摄论学派:因研习《摄大乘论》而得名。《摄大乘论》有三卷,是印度无著为解释《大乘阿毗达磨经·释大乘品》而写的一部著作。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大乘瑜伽行派的关于所知依、所知相、入所知相、彼入因果、彼因果修差别、修差别中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彼果断、彼果智等“十种殊胜”义的。其中,第一、二种殊胜为“境”,第三至八种殊胜为“行”,第九、十种殊胜为“果”。陈天嘉四年(563),由真谛译出。此派的代表人物有:梁代的慧恺(一作智恺),陈代的法泰、靖嵩、僧宗、昙迁等。

上述五个佛教学派中,就其成立的年代而言,依次为:涅槃学派、成实学派、毗昙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这与这些学派崇奉的经论的译出年代不完全一致;就其学说的流播方向而言,《涅槃》、《成实》、《毗昙》、《摄论》之学初盛于南朝,尔后才传入北朝,只



有《地论》之学是北朝的产物,并一直流传于北朝,在南朝研习《地论》的人几希;就其所据经典的性质而言,《涅槃》、《地论》、《摄论》均为印度大乘有宗的经典,《毗昙》为小乘有宗的经典,《成实》为小乘空宗的经典。

南北朝佛教学派和佛教学派以外的其他学者撰写的佛教义学著作,根据佛教史传和经录上的记载,主要有:

刘宋:竺道生《二谛论》、《佛无净土论》、《善不受报论》、《顿悟成佛论》;宝林《涅槃记》、《异宗论》;法宝《金刚后心论》;慧观《内禁轻重》、《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慧义《会通论》;僧馥《胜鬘经注》;慧静《维摩经注》、《思益经注》、《涅槃略记》、《大品旨归》、《达命论》;昙无成《实相论》、《明渐论》、《申无生论》;僧舍《神不灭论》、《法身论》、《业报论》、《法华宗论》;道舍《释异十论》;昙谛《会通论》;僧导《成实论义疏》、《三论义疏》、《空有二谛论》;法愍《显验论》、《大道地经注》;僧宗《法性论》(又名《始元论》)、《觉性论》(又名《佛性论》);道亮《成实论义疏》、《泥洹经义疏》、《毗昙玄论》;法珍《涅槃经义疏》、《法华经义疏》、《大品经义疏》、《胜鬘经义疏》;道猷《胜鬘经注》;慧通《大品义疏》、《胜鬘义疏》、《杂心论义疏》、《毗昙义疏》、《驳夷夏论》、《显证论》、《法性论》;僧璩《戒众论》、《胜鬘文旨》、《述竺道生善不受报义》、《僧尼要事》(又名《十诵僧尼要事羯磨》);颜延之《杂识观》等。

齐:道盛《生死本无源论》;弘充《文殊问菩提经注》、《首楞严经注》;智林《二谛论》、《毗昙杂心论》、《十二门论注》、《中论注》;法瑗《胜鬘经注》、《微密持经注》;僧柔《七玄论》;慧基《法华义疏》、《遗教经注》;法安《净名义疏》、《十地义疏》;道俨《决正四部毗尼论》;超度《律例》;法颖《十诵律比丘戒本》、《十诵律比丘尼戒本》、《十诵律羯磨杂事》;智称《十诵义记》;周颙《三宗论》;萧子良《净住子》、《法集》、《僧制》、《清信士女法制》、《注遗教经》、《注优婆塞戒



经》、《杂义记》；刘虬《注法华经》、《注无量义经》等。

梁：宝亮《涅槃义疏》；慧集《毗昙大义疏》；僧旻《众经要钞》、《般若经注》；僧朗（另作法朗、慧朗）《大般涅槃经注》；僧祐《出三藏记集》、《弘明集》、《释迦谱》、《法苑集》、《十诵义记》、《世界记》；宝唱《续法论》（为续刘宋陆澄《法论》之作）、《法集》、《经律异相》、《出要律仪》；法云《成实论疏》；智藏《大品义疏》、《小品义疏》、《涅槃义疏》、《法华义疏》、《十地义疏》、《金光明义疏》、《成实论义疏》、《百论义疏》、《阿毗昙心论义疏》、《义林》；僧盛《教诫比丘尼法》；慧皎《涅槃义疏》、《梵网义疏》；梁武帝《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梁简文帝《法宝联璧》；虞孝敬《内典博要》等。

陈：真谛《明了论疏》、《摄论疏》、《俱舍论疏》；宝琼《成实玄义》、《成实文疏》、《涅槃疏》、《大品疏》、《大乘义》、《法华疏》、《维摩疏》；昙瑗《十诵疏》、《戒本羯磨疏》、《僧家书仪》等。

北魏：昙度《成实论大义疏》；昙显《菩萨藏众经要》、《百二十法门》；昙鸾《安乐集》；道辩《维摩注》、《胜鬘注》、《金刚般若经注》、《小乘义章》、《大乘义》；道宠《十地论疏》；昙无最《大乘义章》等。

北齐：僧范《华严疏》、《十地疏》、《地持疏》、《维摩疏》、《胜鬘疏》；慧顺《十地疏》、《地持疏》、《华严疏》、《维摩疏》；灵询《维摩疏记》；法上《十地疏》、《地持疏》、《楞伽疏》、《涅槃疏》、《佛性论》、《大乘义章》、《增一法数》；僧稠《止观法》；慧光《华严疏》、《涅槃疏》、《维摩疏》、《十地疏》、《四分律疏》、《玄宗论》、《大乘义律章》、《僧制》、《地持疏》、《胜鬘注》、《遗教经注》、《温室经注》、《仁王般若经注》；道纪《金藏论》等。

北周：释亡名《至道论》、《淳德论》、《遣执论》、《去是非论》、《影喻论》、《修空论》、《不杀论》；僧琨《论场》；慧善《散华论》；宝象《涅槃疏》、《法华疏》；静霄《三宝集》；道安《二教论》；慧影《伤学论》、《存废论》、《厌修论》；僧勔《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等。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虽说南北朝佛教义学总的特点是大小乘并弘,经律论同传,但大乘学说及其经典在研究与传播上,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这种情形不仅在东晋南北朝时已凸现出来,而且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延续和增强,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与特色。大乘经典中的《大品》、《小品》、《金刚》、《涅槃》、《维摩》、《思益》、《法华》、《胜鬘》、《华严》、《十地》、《楞楞严》、《楞伽》、《微密持》、《金光明》、《遗教》、《无量义》等经,《地持》、《梵网》、《优婆塞戒》等律,《摄论》、《地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尤受学人的青睐,有关的注疏也最多。即使是一些小乘经典,如南朝流行的《十诵律》、北朝流行的《四分律》,以及成实、毗昙学派崇奉的《成实论》、《阿毗昙心论》、《杂阿毗昙心论》等,由于研究者中有不少是大乘学者,他们是把小乘学说当作是大乘学说的初阶、小乘经典为学习佛教基本知识的入门书来看待的,因而在研究理会时,往往融入了一些大乘思想的成份。因此,同样是十诵律学、四分律学、成实学、毗昙学,在印度和在中国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是不同的。在印度,它们是纯粹的小乘学,而在中国,它们是在大乘学(犹如高级研究班)指导下的小乘学(犹如初级研究班),或者是大乘学的一部分(如十诵律学、四分律学)。

从体裁来看,在南北朝佛教义学著作的三大板块中,除佛经注疏大量增加,而且相对集中于三、四十部热门经典上以外,佛教论著的比例急剧上升。这些论著主题鲜明,论议纵横,融中印思想文化为一炉,具有较为严密的逻辑性,表明中国佛学日趋成熟。同时,佛教纂集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些纂集,有的对佛教资料进行搜索整理,编为总集(如《弘明集》等);有的摘录佛教经律论上的重要论述,分类排纂,编为类书(如《内典博要》、《法宝联璧》、《经律异相》等);有的撮举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纲要义门,对其中所涉的重要术语进行阐释,编为义章(如《大乘义章》、《小乘义章》等)。所



有这些,对隋唐佛学的进一步繁荣和佛教宗派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前宗派时期的佛教义学著作,由于年代久远,其间变故迭起,因此,前面在叙述佛教义学著作的发展史中提到的众多典籍,绝大多数已经散佚。今存者有:三国孙吴陈慧《阴持入经注》二卷;东晋僧肇《肇论》一卷、《注维摩诘经》十卷、道安《人本欲生经注》一卷、鸠摩罗什《大乘大义章》三卷;刘宋竺道生《妙法莲华经疏》一卷、僧璩《十诵羯磨比丘要用》一卷;梁僧祐《释迦谱》五卷、《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弘明集》十四卷、宝唱《经律异相》五十卷、宝云《法华经义记》八卷、宝亮等《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一卷、梁武帝(一说梁代诸大师)《慈悲道场忏法》一卷;陈惠达《肇论疏》三卷、慧思《诸法无净三昧法门》二卷、《法华经安乐行义》一卷、《立誓愿文》一卷、《随自意三昧》一卷、《授菩萨戒仪》一卷;北魏昙鸾《往生论注》二卷、《略论安乐净土义》一卷、《赞阿弥陀佛偈》一卷、灵辩《华严经论》一卷、慧光《华严经义记》一卷;北周慧远《大乘义章》二十六卷、《无量寿经义疏》二卷、《观无量寿经义疏》二卷、《大般涅槃经义记》十卷、《地持论义记》十卷、《十地论义记》八卷、《维摩经义记》八卷、《温室经义记》一卷;北齐灵裕《华严经文义记》一卷等。

另外,还有一些传今的著作,虽然署名前宗派时期的僧人,但近代学者根据历史上的记载,以及这些著作的结构内容来分析,认为它们是后代伪托的作品,其真实性是有疑问的。属于这一类著作有:一、《宝藏论》。一卷。署名东晋(或称姚秦,后秦)僧肇撰。但其内容却引用了唐代长安四年(704)由实义难陀翻译的《入楞伽经》的经文,可以推定为中唐时的作品。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一卷。署名东晋僧肇撰。但其内容十之七八与天台宗智顛的《金刚经疏》相同,颇疑是后人删节智顛疏而成。三、《大乘止观法门》。二卷。署名陈代慧思撰。但其内容是根据被列为“疑伪



论”的《大乘起信论》构建的。四、《少室六门集》二卷(内收《心经颂》、《破相论》〔又名《观心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六种)、《达摩和尚绝观论》一卷(敦煌本)、《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一卷(又名《大乘法论》,敦煌本)。署名梁代菩提达摩撰。但据史传上记载,达摩并没有撰过这些著作。五、《金刚经颂》。一卷。署名梁代傅翕撰。但其颂处处引用遍计、依他、圆成等名,而这些译名乃出自唐代玄奘译的《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经典,故当是中唐以后他人所作。六、《妙法莲华经义记》。二十二卷。署名梁代法云撰。但其内容多与隋代智颢《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吉藏《法华疏》等书中所引“光宅(法云)云”不同,疑为隋唐间他人之作。

因此,根据真实性和重要性两条原则判别,见存的前宗派时期的佛教义学著作,以姚秦僧肇的《肇论》、《注维摩诘经》、梁代僧祐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宝唱的《经律异相》、宝亮等《大般涅槃经集解》、北魏昙鸾《往生论注》、《略论安乐净土义》、北周慧远《十地论义记》、《大乘义章》等为重要。由于僧祐、宝唱的作品也可列为文史类典籍,本书第七章将作介绍;昙鸾为净土宗的祖师,本章第九节中将作介绍,故以下介绍的是《肇论》、《注维摩诘经》、《大般涅槃经集解》、《十地论义记》、《大乘义章》五部要典。

一、《肇论》 一卷。姚秦僧肇撰。僧肇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等。本论原为几篇独立行世的论文,南朝梁、陈之间,经无名氏汇编成集,并以僧肇的“肇”字命名,题为《肇论》。全书由《宗本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五篇文章组成,主要论述了般若义旨,为东晋般若学的名作,影响至为深远。

(一)《宗本义》。主要阐述了本无、实相、法性、性空、缘会等名相虽异,而义理实一的理论。认为只有把“性空”看作是“诸法实



相”，才是般若正观。由于此篇的文体似名相解释，与其他诸篇的论式风格殊异，故近代也有人认为它是后人所作。（二）《物不迁论》。主要针对把万物看作是迁徙变易的“常情”而作。作者认为，事物本无“来”，也无“去”，表面上看事物在运动，实际上并没有运动。但万物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动即静，静即动，动静一如不异。（三）《不真空论》。主要针对般若学派中心无、即色、本无三派谈“空”时的偏颇而作。认为，说“有”，并不是指有真实的物体，说“无”，也不是指绝对虚无，一无所有。“空”并不是离开具体事物独立自存的东西，而是寓于万物之中（“立处即真”），与万物相即而不相离的。（四）《般若无知论》。主要针对因以般若为有知，而有所取的观点而作的。认为，“知”是由相引起的，有生灭的相状，才有通过“言象”得到的知。而般若所要认识的是反映事物本体、实质的“真谛”，真谛是没有相状的，也就不可能产生知。而且有所知，必然有所不知。只有无所知，才能无所不知。论末附有《刘遗民问》、《答刘遗民书》。（五）《涅槃无名论》。为答秦主姚兴而作。前有《上秦王表》（又名《表上秦主姚兴》）。本论按“九折十演”组织。九折十演中的“九折”，托为“有名曰”，有：核体、征出、搜玄、难差、责异、诘渐、讥动、穷源、考得。“十演”，托为“无名曰”，有：开宗、位体、超境、妙存、辨差、会异、明渐、动寂、通古、考得。主要是说，涅槃之道，寂寞虚旷，微妙无相，既不可能通过言象来表述，也不可能由心感知。近人对本论的真伪有争论。有的从体裁、文笔、史实和思想诸方面分析，认为此篇的内容不像是僧肇写的，但也有人肯定它是僧肇的真作。

有关《肇论》的注疏极多。现存的有：陈代惠达《肇论疏》二卷（原三卷）、唐代元康《肇论疏》三卷、惠澄《肇论疏》三卷、宋代遵式《肇论疏科》一卷、《注肇论疏》六卷、晓月《夹科肇论序注》一卷、净源《肇论中吴集解》三卷、《肇论集解令模钞》二卷、悟初等《梦广和



尚释肇论》一卷、元代文才《肇论新疏》三卷、《肇论新疏游刃》三卷、明代德清《肇论略疏》六卷等。

二、《注维摩诘经》 又名《维摩诘所说经注》、《维摩诘经注》、《注维摩经》、《净名集解》。十卷。姚秦僧肇撰。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八册)本等。初,鸠摩罗什于弘始八年(406)翻译《维摩经》,僧肇作为弟子,参预了译事。罗什在翻译时,曾对经文作了阐释,这些阐释为僧肇所记录。于是,约在次年,僧肇根据其师的讲解以及自己的研究心得,撰成了这部注书,为《维摩经》注疏之祖。书首有僧肇《序》,以“本”、“迹”为论题,融会《法华经》等经所说的教理,揭示了《维摩经》的本义。书中依照经文的次序,对其中的义理作了解释。据僧传记载,在僧肇注之外,竺道生、僧睿也曾为《维摩经》作过注。今本《注维摩经》除了合罗什、僧肇注之外,也融合了竺道生、僧睿之说,而以僧肇注为全书的主轴。与《肇论》不同,僧肇的这部注书很少采用老庄的文辞。

三、《大般涅槃经集解》 又名《大般涅槃经义疏》、《大般涅槃经疏》、《涅槃经集解》。七十一卷。梁代宝亮等撰。宝亮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八。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七册)本等。梁天监八年(509),宝亮奉敕撰《涅槃经义疏》十万余言,梁武帝亲自为之序。但传今的《大般涅槃经集解》卷首的《叙经题》中,除列有梁武帝的序言以外,还提到了道生、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宝亮、智秀、法智、法安、昙准等十法师的序言,其内容包括:释名、辨体、叙本有、谈绝名、释大宗、解经字、核教意、判科段。另外,在正文中还引作了昙爱、昙谏、道慧、慧朗、慧诞、智藏、明骏、法莲、敬遗等师的解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引用上述众家(明骏除外)的学说,都分别用某某“叙曰”、“述曰”、“曰”的方式表述,而在引用明骏的言论时,独称“明骏案”。故《集解》的实际编纂者是明骏。另据《续高僧传·法朗传》记载,法朗(又称僧朗),还有宝唱也参加了本书的



编注。因此,今本《集解》乃是明骏等人综合了宝亮《涅槃经义疏》以及梁代诸师的学说而成的。它是现存最古的《涅槃经》注疏,也是南朝涅槃学说的集大成者。由于本书成于梁天监初年,故梁代三大法师中,只有智藏之说被引用了一则,僧旻、法云二师都未曾提及。《大般涅槃经》有南北两本,《集解》所解释的是南本《涅槃经》,方式为随文释义,而引证之文较少。解释北本《涅槃经》的有北周慧远的《大般涅槃经义记》二十卷(今存)。

四、《十地论义记》 又名《十地义记》、《十地论疏》。原为十四卷,今存八卷。北周慧远撰。由于慧远活到隋开皇十二年(592),故也题“隋慧远撰”。成于北周末年、隋代初年。慧远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八。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七十一册)本等。本书为世亲《十地经论》的注释。书中着重论述了《十地经论》中所说的“心意识”问题。认为,阿梨耶识(这一术语在《十地经论》中并没有提到)与心意识不同,阿梨耶识为真识,心意识为妄识。所谓的“真如缘起”,就是阿梨耶识缘起。它是研究地论学派的重要的思想资料,并对后来华严宗的“六相圆融”义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大乘义章》 二十卷。北周慧远撰。约成于北周之末、隋代之初。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四册)本等。慧远是地论南道派的传人,其师法上曾撰有同名的《大乘义章》六卷、《增一法数》四十卷(均佚),采用按所含数字的大小依次排列佛教术语(名相),然后予以解释的体例编就。慧远的这部著作便是继承其师的编法撰成的。全书原为十四卷,分为五聚,凡二百四十九门,传今的本子分为二十卷,只有四聚二百二十门。原书的结构是:(一)教法聚。下分《众经教迹义》、《三藏义》、《十二部经义》三门。(二)义法聚。下分《佛性义》、《假名义》、《入不二门义》、《二谛义》、《二无我义》等二十六门。(三)染法聚。下分三类,总计六十门。其中,



“烦恼义”有《二障义》、《三障义》等三十门，“诸业义”有《身等三业义》、《三性业义》等十六门，“苦报义”有《二种生死义》、《四生义》等十四门。（四）净法聚。下分两类，总计一百三十三门。其中“因法”有《发菩提心义》、《回向义》、《金刚三昧义》等一百十五门，“果法”有《大般涅槃义》、《无上菩提义》、《净土义》等十八门。（五）杂法聚。下分三十九门，今佚。本书解释了当时流行的各种重要的经论中的名相，一般是先陈小乘（《毗昙》、《成实》）之说，后申大乘（《涅槃》、《地论》、《摄论》、《三论》等）之旨，纲目井然，辨析详尽，南北朝诸学派的许多思想学说赖此而得见一斑。

由于书中对《成实论》颇多肯定，故也有些学者认为，《大乘义章》所分的五聚，得受于《成实论》所分五聚（发谛聚、苦谛聚、集谛聚、灭谛聚、道谛聚）的启发。另外，本书还多处引用《大乘起信论》，它与慧远的另一部著作《大乘起信论义疏》四卷、梁智恺《一心二门大意》一卷、北周昙延《大乘起信论义记》二卷，同为有关《起信论》的最古文献。一些学者根据这些著作的撰成年代与梁代真谛的译经时间相距很近，从而肯定《大乘起信论》为真谛所译，但也有些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

第二节 天台宗教典

天台宗是我国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教。在叙述此宗的教典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佛教宗派形成的历史背景。

南北朝末年，北周武帝于建德六年（577）消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次年，武帝死去，朝政大权便落入了外戚杨坚之手。又经过几年，杨坚消灭了北周诸藩王和地方总管的反叛势力，于大定元年（581）迫使静帝在“禅位”的名义下退位，由他继承帝位。他改国号



为隋,改年号为开皇,定都长安,由此而成了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开皇八年(588),隋文帝派晋王杨广统率五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攻打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陈朝。次年,攻下了陈朝的京城建康(今南京),虏获了陈后主。至此,长期分裂的局面宣告结束,中国又重新获得统一。

北周武帝在位时,曾两度灭佛。第一次在建德三年(574),“敕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于王公”(见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八《周灭佛法集道俗议事》)。也就是说,将北周境内的佛教全部废除了。第二次在建德六年(577),当时周武帝平灭了北齐,又下令全毁齐境佛教,“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刮佛像,焚毁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见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拒事》)这样,北方佛教都给他毁了。独剩南方佛教因周武帝鞭长莫及,依然在发展。

而隋文帝杨坚恰与北周武帝相反,他奉行的是崇佛政策。杨坚生于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般若尼寺,他的父亲割宅为寺,将他委托给尼姑智仙养育,一直到十三岁,方始还家。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等尼姑就藏匿在他家里。由于他从小接受佛教的熏陶,因此当北周武帝在齐境毁佛的次年一死,掌握实权的杨坚便鼓动继位的宣帝下诏复兴佛教。及至杨坚登基做皇帝,更是大力奖掖扶持佛教。“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铜檀香夹纒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许躯”(见唐法琳《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篇》)。隋文帝的佛教政策,在隋炀帝时代得到了延续。虽说隋朝是一个短促的朝代,共历二帝



三十八年,但它却使遭受北周武帝毁灭性打击的佛教得以复苏和发展。南朝重义理的思辨性佛教,与北朝重净土、戒律、禅定的实践性佛教,在天下一统的环境里,得到了交融。佛教进入了自南朝梁代以后的又一个兴盛期。

及至隋亡唐兴,由于唐朝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李唐帝室尊重并扶持佛教;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从印度传来的新的佛教经典及其义理,为中国原有的佛教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本土佛教人才辈出;寺院经济日见发达;佛教文化及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拥有上至王公贵戚,下至黎民百姓的众多的信仰者和支持者,佛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有各自独特的教理体系和修行方式;有对佛教各类教说及其经典性质、意义和地位的判别(判教);有传法定祖的法统;有相对固定的传法道场,并由此而形成的祖庭的中国佛教宗派,便是在上述隋唐时期的历史条件产生的。其中,创于隋朝的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创于唐朝的有: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教;此外,还有创立于西藏佛教后弘期,时间约当于北宋中叶的藏传佛教宗派。以下分别介绍各宗派的代表作,本节要介绍的是天台宗。

天台宗,陈隋之际的智顓实际创立,因住地(包括后来荣尊的祖庭国清寺)在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又因为此宗以《法华经》为依据的根本经典,别称“法华宗”。天台宗在中唐时确立的传法系统(即祖统)为九祖:高祖龙树,二祖慧文(又称北齐尊者),三祖慧思(又称南岳尊者),四祖智顓(又称智者大师),五祖灌顶(又称章安尊者),六祖智威(又称法华尊者),七祖慧威(又称天宫尊者),八祖玄朗(又称左溪尊者),九祖湛然(又称荆溪尊者)。这中间,龙树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南印度人,慧文是六世纪中叶人的北齐人,两人之间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只是因为慧文的思想受启于龙树的



《大智度论》，出于理论上的推溯，天台宗才尊龙树为东土高祖（即初祖）。自慧文以下的各祖之间都是师徒，他们个人的活动以及相互间的学术传承，构成了天台宗自北齐至中唐，从思想酝酿（慧文、慧思），到创立教派（智顓），进而展延光大（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的历史过程。

天台宗的主要教理有：

一、五时八教 此为天台宗的判教学说。五时，是将释迦牟尼佛一代教化分为华严时（说《华严经》）、鹿苑时（说《阿含经》）、方等时（说《维摩经》、《金光明经》、《楞伽经》等）、般若时（说《般若经》）、法华涅槃时（说《法华经》、《涅槃经》）等五个时期。八教，是将上述五时中所说的教法，按形式分为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等“化仪四教”，按内容分为藏教、通教、别教、圆教等“化法四教”。

“五时八教”这个词是在天台宗九祖湛然的著作中才出现的，《法华经玄义释签》、《法华经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决》中各使用过一次。但它的思想根源于智顓《法华经玄义》卷十所说的“五味”、《法华经玄义》卷一和《维摩经玄疏》卷六所说的四教（顿、渐、不定、秘密）、《四教义》所说的四教（藏、通、别、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日本天台宗学者曾就“五时八教是否为天台大师智顓亲自所说”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但肯定“五时八教”为天台宗的重要理论之一，乃是中日学术界的共识（详见日本岩城英规《五时八教争论考》，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天台山文化专号》第二辑）。

二、三谛圆融（又称圆融三谛） 这是天台宗根据《中论》“三是偈”建立的诸法实相说（事物的本体论和真理论）。三谛，指在事物的空、假、中（中道）三种性质的基础上确立的三种真理，即空谛、假谛、中谛。这三谛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具互融的。从空谛的立场看则三谛皆空，从假谛的立场看则三谛皆假，从中谛的立场看



则三谛皆中。用三谛反观事物,又形成空观、假观、中观三种观察法,而这三种观察法又是一切众生的每一念中同时具足的。这便是“一心三观”(见《法华经玄义》卷一、卷二、《摩诃止观》卷一、卷三、卷五)。

三、一念三千 这是根据《华严经》和《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十法界、《法华经》中所说的十如是、《大智度论》中所说的三种世间建立起来的学说,主要用来说明心与物之间的关系。十法界,指的是众生的十种类别,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以上称为六凡)、声闻、缘觉、菩萨、佛(以上称为四圣)。十如是,指的是构成事物的十个方面,即如是相(相状)、如是性(本性)、如是体(体质)、如是力(功能)、如是作(活动)、如是因(主要条件)、如是缘(辅助条件)、如是果(结果)、如是报(报应)、如是本末究竟(总体)，“如是”是“就是这样”的意思,表示强调。三种世间,指的是世俗的三种世界,即五阴世间(构成众生个体的五种要素,即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众生世界(众生的群体)、国土世界(众生的生存环境)。每一法界中蕴含着十法界,十法界各各互具而构成“百法界”;百法界中的每一界又各具十如是,演成“千如是”;千如是中的每一项又都离不开三种世间,从而变成“三千种世间”。这三千世间是众生的一念之中就能具足的,这便是“一念三千”(见《摩诃止观》卷五、《法华经玄义》卷二、《法华经文句》卷二)。

天台宗的主要教典有:《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以上称为天台三大部)、《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音玄义》、《观音义疏》、《观无量寿佛经疏》(以上称之为天台五小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大乘止观法门》、《国清百录》、《止观大意》、《十不二门》、《金刚铎》、《天台四教仪》、《四明十义书》等。

(一)《法华经玄义》 又名《妙法莲华经玄义》、《法华玄义》,十卷(因每卷各分上下,故又作二十卷)。隋代智顛说,灌顶记。智



颢的生平事迹见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灌顶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十九。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三册)本等。智颢开讲姚秦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七卷(一作八卷)的义旨有两次：第一次是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在金陵瓦官寺，第二次是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在荆州当阳县玉泉寺。今本《法华经玄义》是根据第二次讲说的内容记录整理的，成于仁寿二年(602)。

本书为《法华经》经题(经名)和教相(义旨)的详细解说。智颢独创的释经方式为“五重玄义”，即不论是哪一部佛经，都从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五个方面对佛经进行剖析。本书即是以“五重玄义”为轴心展开的。先为通解(又称七番共解)，以标章、引证、生起、开合、料简、观心、会异七科，总释五重玄义；后为别释，对五重玄义的每一重各各进行解释。其中，在第一重玄义“释名”中，对《法华经》全称中的“法”、“妙”、“莲华”、“经”等字的意义分别予以诠释。在对“妙”字的解释中，提出了“迹门十妙”和“本门十妙”。迹门十妙，指的是境妙、智妙、行妙、位妙、三法妙、感应妙、神通妙、说法妙、眷属妙、利益妙。本门十妙，指的是本因妙、本果妙、本国土妙、本感应妙、本神通妙、本说法妙、本眷属妙、本涅槃妙、本寿命妙、本利益妙。在五重玄义“判教”中，先批判了“南三北七”的旧说，次立自家的“五时八教”说。所说的“南三北七”，指的是南北朝南方三师和北方七师的教相判释。南方三师的判教是：1. 虎丘山笈法师的三时教，即有相、无相、常住教。2. 宗爱、僧旻的四时教，即有相、无相、同皈、常住教。3. 定林寺僧柔、慧次、道场寺慧观的五时教，即有相、无相、褒贬抑扬、同皈、常住教。北方七师的判教是：1. 武都山刘虬的五教，即人天、有相、无相、同皈、常住教。2. 菩提流支的二教，即半字、满字教。3. 慧光的四宗，即因缘、假名、诳相、常宗。4. 护身寺自轨的五宗，即因缘、假名、诳相、常、法



界宗。5. 耆闍寺安廩的六宗,即因缘、假名、诳相、常、真、圆宗。6. 某禅师的两种大乘教。即有相、无相。7. 菩提流支(一说鸠摩罗什)的一音教(见《法华经玄义》卷十)。这些均为珍贵的佛教史资料。

有关《法华经玄义》的注疏有:唐代湛然《法华经玄义释签》二十卷、《法华经玄义科文》五卷、宋代法照《法华经玄义读教记》五卷、从义《法华玄义补注》三卷、善月《法华大部妙玄格言》二卷、有严《法华经玄签备检》四卷、智诠《法华经玄签证释》十卷、清代灵耀《法华经释签缘起序指明》一卷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湛然的《法华经玄义释签》。《法华经玄义》的节略本有:明代传灯《法华经玄义辑略》一卷、智旭《法华经玄义节要》二卷。

(二)《法华经文句》又名《妙法莲华经文句》、《法华文句》,十卷(因每卷各分上下,故又作二十卷)。隋代智颢说,灌顶记。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四册)本等。智颢于陈后主祯明元年(587),在金陵光宅寺开讲《法华经》的经文,时有灌顶作了记录。在相隔了四十二年之后,到了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灌顶对原先的记录作了修治,使之成书。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文句有些窜乱,及至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对照经文的次序对传本作作了排比整理,传今的本子即是玄朗的整理本。其中,有数十处与隋代吉藏《法华玄论》同文,可能是灌顶或玄朗在整理时,为弥补原先未曾讲及的缺漏而补进去的。

本书是对《法华经》结构和字句的详细解说。书中将全经分为二门:前十四品(始《序品》,终《安乐行品》)为迹门,是如来(释迦牟尼)应化垂迹时开方便的权门,示真实的妙理(开权显实)所说的教法。后十四品(始《从地涌出品》,终《普贤菩萨劝发品》)为本门,是如来开菩提伽耶觉悟成道的近迹,显久远以前就已成佛的本地(开迹显本)所说的教法。本、迹二门中,又各有序分、正说分、流通分



三分。其中,本门正说分以第二品《方便品》为主,迹门正说分以第十六品《如来寿量品》为主。作者独创了四种释例(又称天台四释、四释)来解说经文:1. 因缘释,以四种悉檀为因缘,解释教法的兴起。这四种悉檀是:引众生乐欲的“世界悉檀”,使众生信信的“各各为人悉檀”,破除外道恶执的“对治悉檀”,使众生入于实相的“第一义悉檀”。2. 约教释,将如来一代教化分为藏、通、别、圆四教,就此四教,由浅至深,解释经文。3. 本迹释,从本地、垂迹二门,解释如来和弟子的事迹。4. 观心释,将如来所说的法义,作为观心的对境来解释经文。另外,作者还在书中破斥了南北朝一些法师的见解,如在《序品》中,就《法华经》的科分,破斥了道凭等七师之说,就“说无量义”,破斥了道生等五师之说;在《方便品》中,就“十如实相”,破斥了光宅(法云)等四师之说;在《法师品》中,就“示真实相”,破斥了道生等十一师之说。特别是对梁代光宅寺法云的见解,论破尤多。

有关《法华经文句》的注疏有:唐代湛然《法华经文句记》三十卷、《法华经文句科文》六卷、道暹《法华经文句辅正记》十卷、智云《妙经文句私志诸品要义》二卷、《妙经文句私志记》十四卷、宋代法照《法华经文句读教记》七卷、从义《法华经文句补注》四卷、有严《法华经文句记笺难》四卷、善月《法华经文句格言》三卷、清代道需《法华经文句纂要》七卷。其中,以湛然的《法华经文句记》为最重要。

(三)《摩诃止观》又名《圆顿止观》,十卷(因每卷各分上下,故又作二十卷)。隋代智顛说,灌顶记。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等。智顛自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四月二十六日起,在荆州玉泉寺开讲圆顿止观法门,每天早晚各讲一次,历时九十天,这次讲说的内容经灌顶的记录整理,便成了本书。据唐代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一记载,本书原名《圆顿止观》,有三种本子流



传于世。

第一种为十卷,第二种为二十卷本,第三种为十卷本,但每卷各分上下。时人称第二种本子为广本,第三种本子为略本,其实第三种本子乃是第二种本子的再治本,湛然将第三种本子改题为《摩诃止观》,传今的即是这后一种本子。智颢生前说南岳慧思所传三种止观:1. 渐次止观。指初浅后深,如阶梯一样,需依次修习,最后才能达到对真理(实相)的体证的止观。2. 不定止观。指修习的次第可以随机变更的止观。3. 圆顿止观。指一开始便能顿悟真理(实相)的止观。《摩诃止观》所述的是圆顿止观。

本书的书首有灌顶所写的缘起,正文由“五略”和“十广”组成。五略,指的是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即正文第一章《大意》所分的五节,这五节概述全书各章的大意。十广,指的是大意、释名、体相、摄法、偏圆、方便、正观、果报、起教、旨归,即正文所分的十章。但智颢只讲到第七章《正观》(内缺十境中的末三境,即上慢境、二乘境、菩萨境),第八章《果报》、第九章《起教》、第十章《旨归》没有讲,这后三章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五略”中的感大果、裂大网、归大处三节的介绍得知的。所述的七章中,第一章《大意》,概述全书的内容。第二章《释名》,解释止观的含义。第三章《体相》,解释止观的质体和性能。第四章《摄法》,说止观为统摄一切事理的法门。第五章《偏圆》,分析止观的偏浅方面和圆深方面。第六章《方便》,说修习止观之前的二十五种加行(预备阶段的修行)。第七章《正观》,详细介绍正式修习止观的方法。下分十境和十重观法,为全书的重点。所说的十境,指正修止观所观察思维的十种境界。它们是:阴界入、烦恼、病患、业相、魔事、禅定、诸见、增上慢、二乘、菩萨。十重观法,又称十乘观法、十种观法、十法成乘、观心十法门,指正修止观的十种方法。它们是:观不可思议境、起慈悲心(又名真正发菩提心)、巧安止观(又名善巧安心)、破法遍、



识通塞、修道品(又名道品调适)、对治助开、知位次、能安忍、无法爱(又名离法爱)。其中,“观不可思议境”又为天台宗十重观法的根本。

有关《摩诃止观》的注疏有:唐代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四十卷、《摩诃止观辅行搜要记》十卷、《摩诃止观科文》五卷、佚名《摩诃止观科节》一卷、道邃《摩诃止观记中异义》一卷、宋代从义《摩诃止观辅行补注》四卷、《摩诃止观义例纂要》六卷、法照《摩诃止观辅行读教记》六卷、有严《摩诃止观辅行助览》四卷、遵式《摩诃止观义题》一卷、处元《摩诃止观义例随释》六卷、清代受登《摩诃止观贯义科》二卷等。其中,以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为最重要。其他研究性著作有:唐代湛然《止观义例》二卷、《止观大意》一卷等。其节本有:唐代梁肃《删定止观》三卷。

(四)《金光明经玄义》 又名《金光明玄义》、《光明玄》,二卷。隋代智颢说,灌顶记。约成于隋开皇三年(583)至开皇十七年(597)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九册)本等。本书为《金光明经》经名和义旨的详细解说。《金光明经》的译本共有五种:北凉昙无讖译的四卷本、陈代真谛译的七卷本(已佚,仅有经序及正文第一卷见存于日本《圣语藏》之中)、北周阇那崛多译的五卷本(已佚)、隋代宝贵合前三本而成的八卷本、唐代义净译的十卷本。本书所解说的对象是北凉昙无讖的译本。全书分为五章:1.《释名》、2.《出体》、3.《明宗》、4.《论用》、5.《教相》。合称“五重玄义”。其中,《释名》章占四分之三篇幅。该章分为通别、翻译、譬喻、附文、当体五节,用三道(惑、业、苦道)、三识(庵摩罗识、阿梨耶识、阿陀罗识)、三佛性(正因、了因、缘因佛性)、三般若(实相、观照、文字般若)、三菩提(实相、实智、方便菩提)、三大乘(理、随、得乘)、三身(法、报、应身)、三涅槃(性净、圆净、方便净涅槃)、三宝(佛、法、僧宝)、三德(法身、般若、解脱)等“十种三法”(略称十法),



来说明因果的始终。以无明为本,其序为从“三道”到“三德”,称为“顺说”;以法性为本,其序为从“三德”到“三道”,称为“逆说”。

《金光明经玄义》自唐末五代之后,传有两种本子。一种为广本,即在《释名》章“当体”一节之后,有“十法观心”之文(即观心释,又称观行释),认为从“三道”至“三德”的十种三法存在于众生的心行之中。一念之心,具显金光明法性。而略本则无之。宋代天台宗因争论广本和略本的真伪,分裂为“山家”和“山外”两派。山家派以知礼为代表,认为广本为智颢的真作;山外派以志因、晤恩、源清、洪敏、庆昭、智圆等为代表,认为广本为伪作,略本为真作。有关《金光明经玄义》广、略两本真伪之争的实质,是主张“妄心观”还是主张“真心观”。山家派主张“妄心观”,认为观心的目的是为了将“凡心”转变成“理心”,故观察的对象应当是日常起灭的刹那心,即无明妄心。山外派主张“真心观”,认为只有理解圆融三谛的妙理(妙解),才能产生一心三观的妙行,故观察的对象不是“妄心”,而是能灵知自性的“真心”(即理心)。由于山外派数传后绝嗣,后世流传的天台宗均出自山家派,故传今的《金光明经玄义》也是广本。

有关《金光明经玄义》的注疏有:宋代知礼《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六卷、智圆《金光明经玄义表微记》一卷等。

(五)《金光明经文句》又名《金光明文句》、《光明文句》,六卷。隋代智颢说,灌顶记。约成于隋开皇三年(583)至开皇十七年(597)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九册)本等。

本书是对北凉昙无讖译的《金光明经》四卷的结构和字句的详细解说。书中将《金光明经》大别为三分:第一品《序品》至第二品《寿量品》中“天龙集信相菩萨室”的一品半为序分(又称序段)。第二品《寿量品》中自“尔时四佛告说”以下至第五品《空品》的三品半为正说分(又称正说段)。第六品《四天王品》至第十八品《赞佛品》



的十三品为流通分(略称流通段)。并且重点解释了前二分。内容叙及金光明忏悔法(略称金光明忏法)、二空(人空、法空)观、四教(藏、通、别、圆)说等。

有关《金光明经文句》的注疏有:宋代知礼《金光明经文句记》十二卷、从义《金光明经文句新记》七卷、明得《金光明经文句科》一卷。

(六)《观音玄义》又名《观音经玄义》、《普门品玄义》、《观音玄》，二卷。隋代智颢说，灌顶记。约作于隋开皇十四年(594)至大业十三年(617)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四册)本等。

《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以第二品《方便品》、第十四品《安乐行品》、第十六品《如来寿量品》和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最重要。本书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品名和大旨的详细解说,也是现存最古的《普门品》注释。书中采用《法华经玄义》所立的五重玄义来释经,而以“释名”为重点(分人法、慈悲、福慧、真应、药珠、冥显、权实、本迹、缘了、智断十义)。其特色在于阐述了天台宗的“性具”说。认为十界(六凡四圣)众生都具备三千迷悟之法。佛陀断尽修恶而唯存性恶,一阐提断尽修善而唯存性善。性善、性恶,永不丧失。佛不断性恶,故能受慈善根力的薰习,下至阿鼻地狱教化众生;一阐提不断性善,故能遇缘而得发善。宋代天台宗人强调的“性恶”说就是以此为依据展开的。但由于《智者大师别传》、《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未曾著录《观音玄义》、《观音义疏》、《观无量寿佛经疏》,而《观音玄义》、《观音义疏》在内容上是以《法华玄义》为指导展开的,并采用与隋代吉藏“十双”(即前面讲到的人法、慈悲、福慧等十义)相似的解释法,故近世也有人怀疑这两书可能是灌顶之作。

有关《观音玄义》的注疏有:宋代知礼《观音玄义记》四卷。

(七)《观音义疏》又名《观音经义疏》、《普门品义疏》,二卷。



隋代智顓说,灌顶记。约成于隋开皇十四年(594)至大业十三年(617)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四册)本等。

本书是对《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字句的详细解说。书中用四教、三观等教法,破斥“他师”、“旧解”等诸说,从口机感应、意机感应、身机感应等方面,阐明了观世音菩萨闻音救苦的功德。它与《观音玄义》同为天台宗性恶学说的重要典据。

有关《观音义疏》的注疏有:宋代知礼《观音义疏记》四卷。

(八)《观无量寿佛经疏》 又名《观无量寿经疏》、《观经疏》,一卷。隋代智顓述。撰时不详。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七册)本等。

本书为刘宋熏良耶舍翻译的《观无量寿佛经》一卷的注释。书中初立五重玄义,以阐释经名;次判《观经》以心观为宗,以实相为体,以生善灭恶为用,属菩萨藏中的顿教;后随文作释,并以日想、水想、地想、宝树、宝池、宝楼、华座、像、真身、观音、势至、普、杂想、上辈、中辈、下辈等十六种观法(十六观)为定善。本书在唐宋时代流通甚广,讲说者甚多。但近代有些学者从内容上考证,怀疑它为后人的伪作,理由是智顓释经,是按名、体、宗、用、教相(五重玄义)的次第展开的,而本书则是先“宗”后“体”,另外,在随文解释中,有摘自北周慧远《观无量寿佛经疏》的内容。

有关《观无量寿佛经疏》的注疏有:唐代法聪《观无量寿佛经记》一卷、宋代知礼《观无量寿佛经融心解》一卷。

(九)《修习止观坐禅法要》 又名《坐禅法要》、《童蒙止观》、《小止观》,一卷。隋代智顓撰。约成于隋开皇十四年(594)至开皇十七年(597)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中华书局1988年9月版李安《童蒙止观校释》本等。智顓有关“止观”的著作凡有四种:一是讲圆顿止观的《摩诃止观》,灌顶记为十卷;二是讲渐次止观的《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法慎记为三十卷,灌顶再治



时作十卷；三是讲不定止观的《六妙门》，一卷，为智顛应陈代尚书令毛喜之请而出；四是讲小止观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是智顛为俗兄陈鍼所撰。

本书为节略《摩诃止观》和《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内容而成。全书分为十章：《具缘》、《诃欲》、《弃盖》、《调和》、《方便》（又名方便行）、《正修》（又名正修行）、《善发》（又名善根发）、《觉魔》（又名觉知魔事）、《治病》、《证果》。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在《摩诃止观》中为第六章《方便》，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为第六章《方便》，主要论述在修习止观之前应修持的二十五种方便法门。内容包括：具五缘（持戒清净、衣食具足、得闲居静处、息诸缘务、近善知识）、诃五欲（色、声、香、味、触）、弃五盖（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调五事（食、睡眠、身、息、心）、具五法（欲、精进、念、巧慧、一心分明）；第六章至第九章在《摩诃止观》中为第七章《止观》，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为第七章《修证》，主要论述正式修习止观的各种方法。内容包括：正修二种（于坐中修、历缘对境修）、善根发相二种（外善根发相、内善根发相）、觉知魔事四种（烦恼、阴入界、死、鬼神）、明治病法二意（病发相、治病方法）；第十章在《摩诃止观》和《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没有相应的章节。本书为修持止观的入门书，流行颇广。日本《大藏经索引·收录典籍解题》说：“此天台《小止观》被认为是佛教史上最初而最恳切地集大成的坐禅仪，其后在佛教史上出现的坐禅仪类，无一例外地皆承袭依用此天台《小止观》而来。这是特别要注目的。”

（十）《大乘止观法门》四卷。原题“陈慧思说”。慧思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等。据北宋遵式说，它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日僧寂照来华时，从日本重新传入中国的。但据近世有些学者考证，它是用《大乘起信论》的思想建构的，怀疑系他人所作。

本书分为《止观依止》、《止观境界》、《止观体状》、《止观断得》、《止观作用》五节,以如来藏缘起为基础,以心意识中真妄和合的本识为中心,阐述了大乘止观法门,尤以性具染净两种性质的“性具”说引人注目。

有关《大乘止观法门》的注疏有:宋代了然《大乘止观法门宗圆记》五卷、遵式《大乘止观法门释要》四卷等。

(十一)《国清百录》 四卷。隋代灌顶纂,成于隋大业元年(605)。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等。

本书为天台宗早期文献的汇编。全书共收文书一百零四件,始《立制法》,终《智者遗书与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内容包括:智顓所撰的制法、礼法、训示、书答、发愿文和遗书,陈隋两朝皇室以及臣僚僧俗致智顓(包括他的弟子)的敕文书疏,以及为智顓和他所建的玉泉寺所撰的碑文等。

(十二)《止观大意》 又名《摩诃止观大意》、《圆顿止观大意》,一卷。唐代湛然撰。约成于唐天宝七年(748)至建中三年(782)之间。湛然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等。

本书为作者应李华之请而作,它与作者的《止观义例》二卷,同为论述智顓《摩诃止观》的大意与纲要的著作。《止观义例》用所传部别例、所依正教例、文义消释例、大章总别例、解行相资例、心境释疑例、喻疑显正例等七例概括《摩诃止观》中的要旨。而本书则先叙祖承,次叙教观。撮取《摩诃止观》中的五略十广、四种三昧、二十五方便、十乘观法等纲目而加以解说。所说的四种三昧,指的是:1. 常坐三昧。以九十日为一期,独居静室,结跏正坐,专念法界,相续不断。2. 常行三昧。以九十日为一期,身常旋行不息,口常唱阿弥陀佛,心常念阿弥陀佛。3. 半行半坐三昧。或依《大方等陀罗尼经》,以七日为一期,持咒旋绕一百二十匝(周),却坐思



惟,更起更坐,周而复始。或依《法华经》,以三七日(即二十一日)为一期,或行或坐,读诵《法华经》,行仪包括:严清道场、净身、三业供养、请佛、礼佛、六根忏悔、绕旋、诵经、坐禅、证相等。4. 非行非坐三昧。也称随自意三昧。指在一切时中,一切事上,随意修习止观。不拘泥于身体行仪上的行、住、坐、卧以及期限,念起即觉,意起即修三昧,为四种三昧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为研究天台宗止观学说的入门书。

(十三)《十不二门》 又名《法华十妙不二门》、《法华本迹十不二门》、《法华玄记十不二门》等,一卷。唐代湛然撰。约成于唐天宝七年(748)至建中三年(782)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等。

本书为湛然《法华玄义释签》卷十四中有关“本迹十妙”一节的单行本。《法华玄义释签》是智颚《法华经玄义》的注释书,《法华经玄义》在解释《法华经》全名《妙法莲华经》中的“妙”字时提出了“迹门十妙”和“本门十妙”的说法,本书即是对它们的讲解。书中从色心不二、内外不二、修性不二、因果不二、染净不二、依正不二、自他不二、三业(佛陀的三业与众生的三业)不二、权实不二、受润不二等十门,论述了构成每一门的对立项(色与心、内与外、修与性、因与果等等)相互圆融,一体不分的关系(不二法门)。

有关《十不二门》的注疏见存的有四、五十种,其中大半为日本僧人所作,中国僧人所著的有:唐代道邃《十不二门义》一卷、宋代源清《法华十妙不二门示珠指》二卷、宗翌《注法华本迹十不二门》二卷、仁岳《十不二门文心解》一卷、处谦《法华玄记十不二门显妙》一卷、了然《十不二门枢要》二卷、可度《十不二门指要钞详解》四卷等。

(十四)《金刚铍》 又名《金刚铍论》、《金铍》,一卷。唐代湛然撰。约成于唐天宝七年(748)至建中三年(782)之间。通行本有



《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等。

本书相传是针对华严宗澄观的异义而作的。书中用自设宾主的方法,论述了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以及众生心性的“真如”(又称佛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认为,真如具有“不变”和“随缘”两种性质,就它的体性而言,是不变的,就它的势用而言,是“随缘”的。不仅有情感的生命体有佛性,即使是无情感的自然物,如草木砖石也有佛性。这就是有名的“无情有性”说,也是天台宗的佛性论。

有关《金刚铎》的注疏有:唐代明旷《金刚铎论私记》二卷、宋代仁岳《金刚铎科》一卷、智圆《金刚铎科》一卷、《金刚铎显性录》四卷、可观《金刚铎论义》一卷、善月《金刚铎论义解》一卷、时举《金刚铎论释文》三卷等。

(十五)《天台四教仪》又名《四教仪》,一卷。高丽谛观撰。约成于北宋建隆元年(960)至开宝二年(969)之间。谛观的生平事迹见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十。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等。初,隋代智颢应晋王杨广之请而作《维摩经玄义》。《维摩经玄义》有广、略两本。略本为六卷,流传至今。广本的卷数不详,它的前半部分曾分别以《四教义》六卷、《四悉檀》二卷(已佚)、《三观义》二卷刊行于世。唐代,天台宗人曾对《四教义》加以节略,而成《天台八教大意》一卷。《天台八教大意》的作者,历来相传是灌顶。但据卷末的题记,当是灌顶的弟子、天童寺明旷。及至北宋之初,谛观应吴越王钱俶之请,携带天台宗教典从高丽来到中国,投于义寂(此据北宋赞宁《宋高僧传》,而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则作羲寂)门下,十年后示寂。同门在他的故篋中发现了他生前撰著的一部书,这便是《天台四教仪》(为区别智颢的《四教义》,故在书名中用“仪”字)。

本书系删补《天台八教大意》而成,书中对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和化法四教(藏、通、别、圆)的大纲,以及所涉的名词概念



作了解释,它是了解天台宗判教学说的入门书,在宋元明清时代和日本极为流行。

有关《天台四教仪》的注疏今存的有六、七十种,其中多数是日本僧人所作,属中国僧人撰作的有:宋代从义《四教仪集解》三卷、元代元粹《四教仪备释》二卷、蒙润《四教仪集注》三卷、《四教仪集注科》一卷、清代灵耀《四教仪集注节义》一卷、性权《四教仪注汇补辅宏记》二十卷等。明代智旭鉴于《天台四教仪》内容较为简略,另作《教观纲宗》一卷加以补充。

(十六)《四明十义书》 又名《十义书》,二卷。北宋知礼撰。约成于北宋景德四年(1007)至大中祥符五年(1012)之间。知礼的生平事迹见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八。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六册)本等。

本书为北宋咸平三年(1000)至景德三年(1006)七年间,天台宗山家派和山外派就《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中“十法观心”说的真伪展开的五次大争论中,双方往返书信及所述观点的记叙。作者站在山家派的立场上,以不解能观之法、不识所观之心、不分内外二境、不辨事理二造、不晓观法之功、不体心法之难、不知观心之位、不会观心之意、不善销文、不闲究理等“十义”,对山外派观点进行了批驳,阐明了自己对观境真伪问题的看法。书中引证了今已失传的山外派庆昭的《辨讹书》(与智圆合著)、《答疑书》、《五义书》、《释难书》以及知礼的《问难书》、《诘难书》、《释难抉宗》、《覆问书》等。它与山家派继忠编辑的《法智遗编观心二百问》一卷,同为宋初天台宗的重要文献。

有关《四明十义书》的注疏有:宋代继忠《四明十义书科》一卷、日僧光谦《四明十义录》二卷、《四明十义讲要》一卷等。



第三节 三论宗教典

三论宗,隋代吉藏创立,因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的《百论》为依据的根本经典而得名。此宗的传承系谱,据日本佛教史学家凝然于文永五年(1268)撰的《八宗纲要》、应长元年(1299)撰的《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等书的载录,为鸠摩罗什—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朗—吉藏。后人将鸠摩罗什至道朗之间的传习称为“古三论”(又称旧三论、关河旧说),将僧诠至吉藏之间的传习称为“新三论”。但据学者考证,古三论应指鸠摩罗什(三论的翻译者)及其弟子僧肇、昙影、道融、僧导(均有研究三论的著述)所传的学说,新三论应指僧朗(辽东人、高丽僧,僧诠之师)—僧诠—法朗—吉藏所传的学说。因为原先编在三论宗系谱中的道生(即竺道生)是涅槃学者,并无研究三论的著述;昙济与道生之间没有师承关系;道朗为河西人,曾协助昙无讖翻译《涅槃经》,他是昙济的前辈,而非是昙济的后辈,而且道朗与僧诠之间也没有师承关系。三论宗在中国流传的时间并不长,唐贞观以后,由于法相宗的兴起,此宗即告式微,吉藏以后的传承可考的只有二代:吉藏传硕法师、智拔、慧远、乌凯(又名智凯)、智命、智实等;硕法师传元康。但三论宗的思想却传到海外。吉藏的弟子、高丽僧慧灌于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将三论学传到日本,在那里建立了日本佛教的第一个宗派——三论宗。

三论宗的主要教理有:

一、八不中道 这是三论宗根据《中论》卷首说的“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一偈而建立起来的宇宙本体论。又称“八不缘起”、“无得正

观”等。三论宗认为,世人对事物的看法,不外乎生(事物的存在)、灭(非存在)、常(事物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断(间断性)、一(事物的同一性)、异(差异性)、来(事物从外缘产生)、出(事物从内部产生)八种,它们一一成对,分别构成生与灭、常与断、一与异、来与出四对范畴。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灭这对范畴,其余三对范畴都是从它们派生出来的。而在生灭这对范畴中,“生”又是最重要的。假如没有生,也就没有灭。没有生灭,也就没有常断、一异、来出。而宇宙万有皆是随因缘条件的聚散而漂忽不定的东西,“以无自性,是故不生”(见吉藏《中论·因缘品疏》)。因而,对它们所作的任何确定性的判断都是不正确的“戏论”,只有用“不”字一一加以否定。这种从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八不)等八个方面来说明事物的性质与相状的看法,便是远离对立的两边的中道实相观。

二、四重二谛 这是三论宗的真理论。二谛指的是俗谛(又称世谛、世俗谛)和真谛(又称胜义谛、第一义谛)。前者是世俗人关于事物是真实的看法,即关于“有”的真理;后者是出世人(佛教)关于事物的本性是空寂的看法,即关于空的真理。三论宗认为,二谛都是佛陀为引导众生,悟入实相而进行的教说,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于教二谛”。于教二谛,就是指于谛和教谛。于谛,众生于情而言的真理,包括于俗谛和于真谛。前者是凡夫关于事物为实有的看法,后者是圣贤关于事物为空寂的看法;教谛,佛陀针对众生的不同情况而宣说的真理,包括教俗谛和教真谛。前者说真空妙有之教,后者说言忘虑绝之理(见吉藏《二谛义》卷上)。二谛之说,凡有四重。第一重,以“有”为俗谛,“空”为真谛,主要用于破凡夫与毗昙师的见解;第二重,以“有空”(有与空二者)为俗谛,“非有非空”为真谛,主要用于破二乘(声闻、缘觉)和成实师的见解;第三重,以“空有”(二)与“非空非有”(不二)为俗谛,“非空非有”(非二)

与“非非空非有”(非不二)为真谛,主要用于破“有所得”大乘的见解;第四重,“以一切言说为世谛,言忘虑绝为第一义谛”(见吉藏《中论·因缘品疏》),也就是说,以前三重为俗谛,以断绝一切言语和思虑活动为真谛。据吉藏《法华玄论》卷四和《二谛义》卷上说,摄岭三论师(即僧朗、僧诠、法朗)相传的二谛是三重二谛。这说明,第四重二谛是吉藏发明的。

三、破邪显正 这是三论宗的方法论。三论宗认为,佛教的理论不外乎“破邪”与“显正”两门。破邪是破斥一切外道异说,显正是树立和阐发自己的正确的观点。多数的佛教流派是在破邪之外别有所立(显正),即有破有立。而三论宗则唯破不立,认为,只要破除一切情见偏执,就能自然地显现无得正观,因此,在否定一切偏执的同时不应肯定任何东西。任何对自己的理论所作的肯定性表述,都是“有所得”,是与无得正观所要求的“无所得”相背离的(见吉藏《三论玄义》卷上)。

四、二藏三法轮 这是三论宗的判教说。二藏是把佛陀的教说分为声闻藏和菩萨藏二类,前者为小乘,后者为大乘。三法轮,指的是:(一)根本法轮。佛初成道时,在华严会上对菩萨所说的一因一果法门(一乘教、一佛乘),其经典为《华严经》。(二)枝末法轮。佛从华严会之后到法华会之前,对声闻、缘觉、菩萨分别说的三乘教。其经典为佛在行化的四十余年所说的一切小乘经(如《阿含经》等)和大乘经(如《般若经》等)。(三)摄末归本法轮。佛在法华会上所说的将三乘摄归于一乘(一佛乘)的法门,其经典为《法华经》(见吉藏《法华游意》。有关三论宗的基本理论,详见拙作《论吉藏的佛学思想》,《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

三论宗的主要教典有:《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三论玄义》、《大乘玄论》、《二谛义》等。

1. 《中论疏》 又名《中观论疏》,十卷(因每卷各分本末,故又



作二十卷)。隋代吉藏撰,成于隋大业四年(608)。吉藏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二册)本等。

本书为姚秦鸠摩罗什译的《中论》四卷的注疏。所释包括龙树作的《中论》偈颂以及青目的原注。书中先释刊于《中论》汉译本之首的、由姚秦僧睿作的《中论·序》,随后对《中论》的义旨、组织结构以及二十七品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其中,《因缘品疏》为全疏的重点。作者在疏中着重阐明了对中道实相的看法,提出了“三谛中道”(世谛中道、真谛中道、非真非俗中道)等观点。所引用的南北朝时的众家师说甚多,资料颇为珍贵。

有关《中论疏》的注疏有:日本安澄《中论疏记》八卷。

2. 《百论疏》 上中下三卷(因每卷又分上、中、下,故又作九卷)。隋代吉藏撰,成于隋大业四年(608)。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二册)本等。

本书为姚秦鸠摩罗什译的《百论》二卷的注疏。所释包括提婆作的《百论》偈颂以及世亲的原注。书中先释由姚秦僧肇作的《百论·序》,随后对《百论》的义旨,结构以及十品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其中,《破空品》为全疏的重点。作者在疏中,对古印度的顺世论派、胜论派、数论派、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外道以及南北朝活跃的众家异说进行了破斥,特别是辨析了北方摄论师、十地论师、地持论师这三种论师所持的“三无性”等唯识义,与三论宗主张的性空说之间的异同。此外,还保存了道凭、瑶公(法瑶)、河东微等人所著《百论疏》的佚文。

3. 《十二门论疏》 三卷(因每卷各分本、末,故又作六卷)。隋代吉藏撰,成于隋大业四年(608)。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二册)本等。

本书为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十二门论》一卷的注疏。书中先释



由姚秦僧睿作的《十二门论·序》，随后对《十二门论》的义旨、结构以及十二门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有关《十二门论疏》的注疏有：日本藏海《十二门论疏闻思记》一卷。

4. 《三论玄义》 二卷。隋代吉藏撰，成于隋大业（605—617）末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韩廷杰《三论玄义校释》本等。

本书是一部论述《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宗旨大意的著作，也是三论宗的纲要书。全书分通序大归、别释众品二门。《通序大归》下分破邪、显正二章。《破邪》章又分摧外道、折毗昙、排成实、呵大执四节，《显正》章又分明人正、显法正二节，从总体上论述三论的宗趣；《别释众品》下分明造论缘起、明诸部通别义、明众论立名不同门、明众论旨归门、明四论（三论加上《大智度论》）破申不同门、明别释三论、论三论通别门、明四论用假不同门、明四论对缘不同门、明三论所破之缘有利钝不同门、别释《中论》名题门等十一章（由于吉藏没有在正文中标明《别释众品》的起首，故今人也有以卷数为界，将整个卷下划为《别释众品》，即始于“次明经论相贯”一段。此为日本佛学界所不取），分别论述了与三论有关的一些问题。全书以“破邪显正”的方式，通过破斥外道、毗昙、成实、大执（与三论宗见解不同的一些大乘论师和派别）的观点，阐明了三论宗“非有非空”的中道正观。

有关《三论玄义》的注疏，今存的有二十五种，均为日本僧人所作。其中有：珍海《玄疏文义要》十卷、赖超《玄疏问题》三卷、真空《捡幽集》七卷、尊祐《科注》七卷、贞海《柱宫钞》三卷、如实《拔出记》八卷、慧云《悬谈》一卷、常明《讲录》四卷等。

5. 《大乘玄论》 又名《大乘玄章》、《大乘玄》等，五卷。隋代吉藏撰，成于隋大业（605—617）末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



五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以三论学义旨为中心,阐明大乘佛法的一些重要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八章:《二谛义》(下分十科)、《八不义》(下分六科)、《佛性义》(下分十科)、《一乘义》(下分三科)、《涅槃义》(下分三科)、《二智义》(下分十二科)、《教迹义》(下分三科)、《论迹义》(下分五科),综合《涅槃》、《维摩》、《大品般若》、《华严》、《法华》、《金刚》、《阿含》等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大毗婆沙论》等论,以及鸠摩罗什、僧肇、道生等人的见解,对二谛、八不、佛性、涅槃、二智(权智、实智)等理论作了阐发和论评。其中,第六章《二智义》的内容,与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净名玄论》(又名《维摩经玄论》)中的相关论述相近,第八章《论迹义》的内容,与他的《三论玄义》卷下所说《大智度论》和“三论”的大要相近。故也有日本学者猜测它是后人将吉藏的有关讲说归纳而成的。

有关《大乘玄论》的注疏有:日本藏海《闻思记》十卷、珍海《问答》十二卷等。

6. 《二谛义》 又名《二谛章》,三卷。隋代吉藏撰,成于隋大业(605—617)末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详细论述三论学的重要主题——“二谛义”的著作。全书分为大意、释名、相即义、物体、绝名、摄法义、同异七科,对三论宗创立的“于教二谛”说(于谛和教谛,于谛中包括于俗谛、于真谛,教谛中包括教俗谛、教真谛)说作了详细的阐述,并对古来关于“二谛之体”的十四家异说作了评析。日本《大藏经索引·收录典籍解题》指出,《二谛义》为“详述三论教义中最重要的二谛义之书,但与《大乘玄论》、《四论玄义》之立十科不同。”

第四节 三阶教教典

三阶教,又名三阶宗、普法宗,隋代信行创立,因将佛法判为三个阶次(三阶),并倡导在第三阶时施修“普法”而得名。此宗兴于隋文帝开皇(581—604)初年,终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前后历时约四百年。其间曾四次遭到朝廷的限禁:第一次为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被敕令禁止传行;第二次为武周证圣元年(695),其教典作为“伪杂符录”而遭致收缴;第三次为武周圣历二年(699),其教法除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以外,禁止施行;第四次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5),三阶教在各寺设立的三阶院限令与大院打通,其徒与一般僧人同住,不得别居,其教典也被禁止流通。由于这一缘故,三阶教没有严密的传法系谱,在中国佛教史上,它属于非正统的佛教支派,但在隋初至唐末的民间社会,却一直享有很好的声誉和很强的影响力。

三阶教的主要教理是“三阶佛法”。

三阶教将全部佛法分为时、处、机三类,每一类又各分三阶。第一阶,“时”为正法时期(佛灭后第一个五百年),“处”为净土,“机”为最利根的一乘菩萨(包括持戒正见和破戒不破见两种根机)。第二阶,“时”为像法时期(佛灭后第二个五百年),“处”为秽土(又称五浊诸恶世界),“根”为利根的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包括戒见俱不破和破戒不破见两种根机)。第三阶,“时”为末法时期(佛灭一千年以后),“处”为秽土,“根”为恶众生(属戒见俱破的根机)。其中,第一阶修持的大乘法和第二阶修持的大、小乘法为根据圣凡的不同根机有区别的修持的“别法”;第三阶修持的佛法(“生盲众生佛法”)为不别根机、一切普修的“普法”。三阶教据此



认为,隋代佛教已进入末法时期,“处”、“机”同为第三阶。因而,一切众生只有于法(佛法)不分大(大乘)小(小乘),于人不辨圣凡,一概普信普敬,才能得到解脱。具体的行法是:苦行忍辱,从事劳役;乞食为生,一日一食;废具足戒;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不拜佛像,仅礼佛塔;路见众生,一概礼拜;经营“无尽藏”,济贫、修寺、供僧;昼夜六时,七阶礼忏;死后林葬,供鸟兽食用等。三阶教的传承,第一代为信行,第二代为本济、僧邕、善智、慧如等,第三代为道训、道树等,其后系谱不详。

三阶教的教典,据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记载,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由于屡遭禁毁,大多湮没不传。今存的代表作为《三阶佛法》。

《三阶佛法》,又名《三阶集录》、《三阶别集》、《三阶集》,四卷。隋代信行撰,约成于隋开皇三年(583)至开皇十四年(594)之间。信行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本等。本书在唐德宗时曾被圆照编入《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入藏流通,但到五代又被删除。今存的四卷本为近代从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的,另外,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了它的残卷(卷二、卷三的一部分)。

本书主要论述了三阶的根机,对根起行的方法及其损益情况,并且援引《涅槃经》、《十轮经》、《大集经》等经典中的末法思想作为佐证。

三阶教的残典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尚有:《信行遗文》、《三阶佛法密记》上卷、《对根起行法》、《无尽藏略说》、《大乘法界无尽藏法释》、《七阶佛名》、《信行口集真如实观起序》卷一、《普法四佛》、《如来身藏论》、《人集录都目》等。



第五节 法相宗教典

法相宗,又名唯识宗,唐代玄奘创立,因着重于对一切事物的相状(法相)及其义舍作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并主张宇宙万有皆为心识的变现(唯识)而得名。又因玄奘长期居住在长安的大慈恩寺,故别称“慈恩宗”。此宗所依据的根本经典是《成唯识论》所引的六经十一论。六经指的是:《华严经》、《解深密经》、《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大乘阿毗达磨经》、《楞伽经》、《大乘密严经》(又名《厚严经》)。十一论指的是:《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观所缘缘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二十唯识论》、《辨中边论》、《分别瑜伽论》。其中,《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大乘阿毗达磨经》、《分别瑜伽论》在中国没有传译,实际所据的经典是《解深密经》和《成唯识论》。法相宗的传承,第一代为玄奘,第二代为窥基、神昉、嘉尚、普光、法宝、神泰、圆测等,第三代为慧沼、道证、胜庄、遁伦等,第四代为智周、义忠、道邑、道献等,其后系谱不详。

法相宗的主要教理有:

一、阿赖耶识缘起 这是法相宗的宇宙发生论。法相宗认为,宇宙万有都是心识的变现。心识共有八种,每一种都有“能变”和“所变”两种意义。能变,指识的自体,按其特性可以分为三类,称为“三能变”。一是异熟识,即第八识“阿赖耶识”;二是思量识,即第七识“末那识”;三是了别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合称“六识”,相对第七、八识,又称“前六识”。所变,指识的功能或作用,凡有四种,称为“四分”。一是相分,指由识体变现并攀缘的外部境物(影像),即认识的对象;二是见分,指能变现并



攀缘外境的识体,即认识的主体;三是自证分,指能证知“见分”的认识作用,即认识的结果;四是证自证分,指能证知“自证分”的作用,即对认识结果的照观。在印度,安慧持一分说(仅立自证分);难陀持二分说(立见、相二分);陈那持三分说(立见、相、自证三分);护法持四分说。法相宗所取的即是护法的主张。另外,对于“相分”,法相宗还根据护法的见解,将它分为三类,称之为“三类境”。(一)性境。由不同的种子产生的真实的境物。(二)独影境。由同一种子产生的虚幻的境物。(三)带质境。由同、别两类种子合成产生的带有一定的本质的境物。

在三类能变的识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第八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又称藏识、种子识,它含藏着能产生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现象的功能,即“种子”。种子,按其来源来说,可分为“本有”种子和“熏习”种子两类。本有种子,是自无始以来,就存在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是先天就有的;新熏种子是由“七转识”(末那识和前六识)对阿赖耶识进行持续不断的熏染而产生的,是后天才有的。种子,按其性质来说,又可分为“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两种。漏,为“烦恼”的异译,泛指有生灭变化的现象。有漏种子,能生起一切世间法(染法),即世俗世界的一切现象。无漏种子,能生起一切出世间法(净法),即趋向和进入涅槃境界的一切现象。而有漏种子按其作用来区分,又可分为名言种子和业种子两类。名言种子能生起与种子同类的现象,业种子以善恶不同的业力帮助名言种子产生结果。名言种子,又分共相种子和不共相种子两类。共相种子为众生共同的业力作用的结果,它能产生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等自然界。不共相种子为众生个体各别的业力作用的结果,它能产生个别的人身器官。所有这一切,都摄藏于阿赖耶识之中。

地论学派视阿赖耶识为“净识”,与“如来藏”相同;摄论学派视阿赖耶识为“妄识”,是一切烦恼之本;而法相宗则认为,阿赖耶识



为“真妄和合”之识，染、净两种境界均发源于阿赖耶识，它是宇宙万有的本原。

二、三性 这是法相宗依据《解深密经》建立的认识论和真理论。把一切事物看作是各有自性差别的真实的存在的认识，是“遍计所执性”；把事物看作是由因缘条件的聚合而产生的暂时的、不确定的、非本质的现象的认识，是“依他起性”；把宇宙万物看作是由同一的平等的真实体性（真如）所派生的产物的认识，是“圆成实性”。为了将众生的见识，从遍计所执性提高到圆成实性，法相宗（窥基）还综合经论上的说法，提出了自浅至深、从粗到细的五重唯识观。（一）遣虚存实识。舍遣遍计所执性，保存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二）舍滥留纯识。舍弃作为识体变现出来的影像（滥境）的“相分”，保留作为识体的“见分”和识体作用的“自证分”。（三）摄末归本识。将相分、见分统归于自证分。（四）隐劣显胜识。隐去作为由识体引发的种种生理活动的“心所”，显现作为识体自身的“心王”。（五）遣相证性识。遣舍“心王”中表现为相用（事）的依他性起性，证得反映性体（理）的圆成实性。这“五重唯识观”是法相宗独有的观法（见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末）。

三、五种姓 又作五种性、五乘种性、五种乘性。这是法相宗依据“本有种子”说而建立起来的佛性论。法相宗认为，每一众生的第八识“阿赖耶识”所含藏的无数的种子，都能生起“现行”，即变现出相应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种子为原因，现行为结果。反过来，结果也能影响原因，在“现行”的作用下，形成在“本有种子”之外的“新熏种子”。众生能否成佛，就根性（种姓、种子）而言，凡有五种不同：具有听闻诸佛说法而悟道的无漏种子，将来能够成就阿罗汉（又称罗汉）果位的，为“声闻种姓”（又称声闻乘定性）；具有不须听闻佛说也能悟道的无漏种子，将来能够成就辟支佛（又称独觉、缘觉）果位的，为“缘觉种姓”（又称缘觉乘定性）；具有如来（又



称佛)无漏种子,将来能够成就佛果的,为“佛种姓”(又称如来乘定性、菩萨乘定性);具有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中二类或三类无漏种子,成就的果位不确定的,为“不定种姓”(又称三乘不定性);没有三乘无漏种子,只有修习世间善法,将来成就人天果位的有漏种子的,为“无种姓”(又称无有出世功德种姓、人天乘性)。上述“五种姓”中,声闻种姓、缘觉种性、无种姓三者没有成佛的种子,因此也就不能通过修行而成佛。只有佛种姓和不定种姓中具有佛果的种姓,将来才能成佛。

中国佛教自从东晋竺道生首创“一阐提”(断绝一切善根的人)也能成佛之说,并在后来传入的北本《大般涅槃经》中得到印证以来,一般都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都存在着成佛的可能性。而法相宗的“五种姓”实际上否定了“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说法,这在各宗派中是唯一的。然而,法相宗的“五种姓”说,如果从“新熏种子”这方面考察的话,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即便是不具备成佛的无漏种子的众生,也可以通过修行,而形成作佛的新熏种子。而新熏种子也会生起“现行”,产生成佛的结果。相传,玄奘在印度游学时,也曾倾向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并打算在回国传译时,将《瑜伽师地论》中有关“无出世功德种姓”的说法删去,但遭到了其师戒贤的呵斥(见唐代遁伦《瑜伽论记》卷二十四),他因而改变初衷,回国后将“五种姓”之说传给窥基(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窥基传》)。而窥基出身名门望族,门第意识很强,故对此说特别赞赏,著文光大。但“五种姓”说将成佛定为少数人的事,严重损伤了一般众生学修成佛的愿望,连同法相宗的整体,遭到了社会冷落。法相宗数传而衰,倡导“五种姓”说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四、三时教 这是法相宗根据《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而建立的判教学说。(一)第一时有教。佛初成道时,于鹿野苑说“我空法有”之旨,其经典为小乘《阿含经》。(二)第二时空教。佛在



灵鹫山等处说“诸法皆空”之旨,其经典为大乘《般若经》。(三)第三时中道教。佛于解深密等会说“识有境空”之旨,其经典为大乘《解深密经》、《华严经》等。

法相宗的主要教典有:《成唯识论》、《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成唯识论演秘》、《大乘法苑义林章》、《解深密经疏》、《因明入正理论疏》、《俱舍论记》。

一、《成唯识论》又名《唯识论》,十卷。唐代玄奘译述,成于唐显庆四年(659)。玄奘的生平事迹见唐慧立、彦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林国良《成唯识论直解》本等。

本书为世亲《唯识三十论颂》的注释书,也是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的唯识学经典。初,世亲作《唯识三十论颂》,于世广传。在他去世以后的一百年间,先后有二十八位论师相继为之作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亲胜、火辨、难陀、德慧、安慧、净月、护法、胜友、胜子、智月等十家,他们各有十卷注疏。玄奘在印度求学期间,搜集了这十家的疏本,尤其是护法的疏本在当时仅存孤本,也为他求获了。回国后,玄奘本打算将它们一一译出,但他的弟子窥基对此表示异议。认为这样会在社会上造成见解歧异,学人莫知适从的后果,不如选择地编译(糅译)成一本,以作定解。于是,玄奘以护法的疏本为主,旁涉众家,甄权取舍,编译了这部《成唯识论》。近代也有学者将《成唯识论》与今存的安慧《唯识三十颂释》梵文本对勘,发现除少部分有歧异以外,大部分的旨趣极为一致,因而认为《成唯识论》吸取安慧的思想亦当不少。因此,就《成唯识论》的原始资料而言,来源于印度十大论师;就《成唯识论》的思想观点而言,则是依据玄奘的理解和倾向组织的。

本书依据《唯识三十论颂》的本文,分为三个层次:卷一至卷



八,释《唯识三十论颂》的第一颂至第二十四颂,论“识相”(心识的相状),主要内容为:破斥外道和小乘对实我(真实存在的人身主宰)、实法(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执著;分别论述“三能变”中异熟能变(阿赖耶识)、思量能变(末那识)、了别境识能变(前六识)的相状与意义;说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三无性(相无性、生无性、胜义无性)。卷九前部分,释《唯识三十论颂》第二十五颂,论“识性”(心识的体性),指出一切事物的真实的体性就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即是“真如”,亦即是“唯识实性”(唯识学所讲的真实常住的识性)。卷九后部分至卷十,释《唯识三十论颂》第二十六颂至第三十颂,论“识位”(修习唯识学要经历的阶位),主要内容为五位(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究竟位)。

有关《成识唯论》的注疏极多,今存的就有一百五十多种(详见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主要有:唐代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四卷、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十三卷、智周《成唯识论演秘》十四卷、明代通润《成唯识论集解》十卷、新罗太贤《成唯识论学记》八卷、日本普寂《成唯识论略疏》六卷等。

二、《成唯识论述记》又名《成唯识论疏》、《唯识论述记》、《唯识述记》,二十卷。唐代窥基撰,成于唐显庆四年(659)之后、永淳元年(682)之前。窥基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三册)本等。

本书与唐代慧沼的《成唯识论了义灯》、智周的《成唯识论演秘》,合成“唯识三疏”,为仅次于《成唯识论述记》的三部重要著作之一。书中初述《成唯识论》成立、传华、糅译的经过,次释它的题目及传化的根机,尔后对《成唯识论》的本文予以解释。它的特点是,对《成唯识论述记》未尽之处进行了补充和说明,特别是对《唯识三十论颂》的科段(结构段落)以及五种姓、三类境等义作了详解。

有关《成唯识论掌中枢要》的注疏有:唐代智周《成唯识论掌中



枢要记》二卷等。

三、《成唯识论了义灯》 又名《唯识论了义灯》、《唯识了义灯》、《了义灯》，十三卷。唐代慧沼撰，约成于唐永淳元年(682)之后，开元二年(714)之前。慧沼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三册)本等。

本书为解释玄奘《成唯识论》和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之作。初叙《成唯识论》的论起所因、论主、三时教判、藏乘归在等，次释要文。作者以窥基之说为正义，对圆测、圆义、普光、慧观、道证等异说一一加以评斥。书中所说的“有说”指窥基，“有释”、“西明云”指圆测，“有人云”指普光，“有解”指慧观，“有云”指玄范，“未详决”指义寂。所引的圆测《成唯识论疏》、道证《成唯识论要集》等均为今已散佚的著作。

有关《成唯识论了义灯》的注疏有：唐代智周《成唯识论了义灯记》二卷。

四、《成唯识论演秘》 又名《唯识演秘》，十四卷(一作七卷)，唐代智周撰，约成于唐代长安元年(701)之后，开元四年(716)之前。智周的生平事迹见日本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中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三册)本等。

本书也是解释玄奘《成唯识论》和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之作。书中对《述记》中的难解之文一一加以诠释，语句平易，古来被视为阅读《述记》不可或缺的辅导读本。

有关《成唯识论演秘》的注疏有：唐代如理《成唯识论演秘释》一卷。

五、《大乘法苑义林章》 又名《法苑义林章》、《义林章》，七卷。唐代窥基撰，撰时不详。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基于唯识学的立场，对大乘佛学的一些重要问题



予以专题论述的著作。全书分为二十九章(据日本中村元等编的《佛典解題事典》说,另有一种本子为八卷,分为三十三章,其构成是在二十九章之外,增列得非得章、诸空章、十二观章、三根章等四章)。卷一:总料简章、五心章、唯识义林、诸乘义林,凡四章。卷二:诸藏章、十二分章、断障章、二谛义,凡四章。卷三:大种造色章、五根章、表无表色章,凡三章。卷四:归敬章、四食章、六十二见章、八解脱章、二执章,凡五章。卷五:二十七贤圣章、大乘蕴界处义、极微章、胜定果色章、十因章、五果义、法处色义林,凡七章。卷六:三宝义林、破魔罗义林、三慧义林、三轮义林,凡四章。卷七:三身义林、佛土章,凡二章。内容叙及教相判释(判教)、唯识义理、修持法门、果位(依法修行后可达到的境界和获得的成果)。其中,卷一之初的《总料简章》,下分教益有殊门、时利差别门、论宗各异门、体性不同门、得名悬隔门等五门,叙述了我国历来的判教说和法相宗的三时教判,古来各宗的不同宗旨,外道、小乘、大乘的不同教体(教理的主体)和法相宗的“四重出体”说,解释梵语的“六合释”等,为全书的重点。

所说的“六合释”,又称“六离合释”,为解释梵语(二语或二语以上的合成语)的六种方法,因其作法为先将复合词加以分别解释(离释),然后再总合解释(合释)其义而得名。(一)依主释。指复合词中前语与后语的关系为主属关系,如“山寺”为“山之寺”之意,“王臣”为“王之臣”之意。(二)相违释。指复合词中前语与后语的关系为对等关系,如“山川草木”为“山、川、草、木”之意。(三)持业释(又称同依释)。指复合词中前语与后语的关系为形容词与名词、副词与形容词的关系,如“高山”为“很高的山”、“极远”为“非常远”之意。(四)带数释。指复合词中前语与后语的关系为数词与名词的关系。以上四种是关于复合词中名词的修饰语的。(五)邻近释。指复合词中前语为副词,后语为名词,如“如法”为“法

如”、“从法”的意思。(六)有财释。指复合词以整个词的形式而不是单个字或词的形式作形容词,如“长袖”为“长袖的”之意。

有关《大乘法苑林义章》的注疏,今存的有六十种之多,其中大多数为日本僧人所作。属于中国僧人所作的有:唐代慧沼《大乘法苑义林章补阙》三卷、智周《决择记》四卷、守千《表无表章择玩记》一卷等。

六、《解深密经疏》十卷。新罗(朝鲜)圆测撰,约成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至证圣元年(695)之间。圆测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通行本有《卍续藏》(第三十四册、第三十五册)本(原缺卷十,后由日人稻叶正就根据藏文本还译补齐)、金陵刻经处本(四十卷,其中卷三十五以后诸卷系今人观空法师根据藏文本还译补齐)等。

本书为唐代玄奘译的《解深密经》五卷的注释,也是有关《解深密经》的注疏中唯一传今的著作。全书分为四门:(一)教兴题目。(二)辨经宗体。(三)显所依为。(四)依文正释。对《解深密经》的经名、宗旨、思想内容、在佛藏中的地位,以及文句进行了阐释。圆测虽然与窥基同出玄奘门下,但他的思想受真谛所传的旧唯识学(摄论学)影响很深,因而与窥基一系的主张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本书多处援引了真谛《解节经记》等今已失传的著作,对于研究摄论学派以及圆测本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七、《因明入正理论疏》又名《因明论大疏》、《因明大疏》,三卷(又作六卷、八卷)。唐代窥基撰,约成于唐乾封元年(666)之后、永淳元年(682)之前。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四册)本等。自唐玄奘译出陈那的弟子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一卷之后,门人各录所闻,竞相作注,可考的有文轨、文备、神泰、玄范、靖迈、净眼、明觉、玄应、利涉、灵隼、元晓、圆测、顺璟、胜庄、窥基等十五家,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窥基的这部《因明入正理论疏》。



本书分为四门：(一)叙所因。叙述因明的起源、发展、作用，以及商羯罗主造论的缘由。(二)释题目。解释本论(《因明入正理论》)的题义。(三)明妨难。说明为何要称因明，而不称宗明、喻明或果明的理由。(四)释本文。对本论的正文一一予以诠释。内容包括因明的术语、规则、运用中的问题，以及作者的简择评判。但窥基并没有将本论全部释完。卷下“能立法不成”以下，是由窥基的弟子慧沼(一作“惠沼”)补注的。慧沼补注的这部分内容涉及十种喻过、真似二量、真似能破等，这些内容后来另成《因明入正理论续疏》一卷，有单行本行世。

有关《因明入正理论疏》的注疏有：唐慧沼《义纂要》三卷、《义断》三卷、《二量章》一卷，智周《略记》一卷、《前记》三卷等。

九、《俱舍论记》三十卷。唐代普光撰，成于唐麟德元年(664)。普光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一册)本等。

本书为唐玄奘译的《俱舍论》三十卷的注释。《俱舍论》虽然是小乘论书，但它的作者世亲后来转奉大乘，成为大乘有宗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此论将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区别为“五位七十五法”(色法十一种、心法一种、心所有法四十六种、心不相应行法十四种、无为法三种)，精细而有条理，后来又被引入唯识学，因此，《俱舍论》也成为玄奘门人研习的一部重要经典。其中，比较著名的疏本有神泰撰的《俱舍论疏》三十卷(今存卷一、卷二、卷四至卷七、卷十七)、法宝撰的《俱舍论疏》三十卷和普光撰的本书，合称“俱舍三大疏”。神泰《疏》出世最早，系用随文直释的方法写成，解释时援引众家之说，不加评判，文词较为简洁明了；法宝《疏》撰作最晚，分为五门：初转法轮时、学行次第、教起因缘、部执先后、依文解释。解释时，时常批斥神泰《疏》、普光《记》，独立己解。由于法宝学宗《涅槃》，故又忌憚“五种姓”说；普光的这部书，撰时在前两

疏之间,在解释时采用了与神泰《疏》相同的解法,尊重传承,并列众家,被认为是最有权威的《俱舍论》疏本。唐代圆晖去繁取要,撰《俱舍论颂疏》三十卷,以解释《俱舍论》六百行颂文,就是以普光的《俱舍论记》为主要参考书编成的。

第六节 华严宗教典

华严宗,初唐时法藏实际创立,因以《华严经》为依据的根本经典而得名。又因此宗以“法界缘起”为主要教说,法藏字贤首(此据新罗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北宋赞宁《宋高僧传》,而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九则称“贤首”为武则天赐予法藏的号),别称法界宗、贤首宗。华严宗在晚唐确立的传法世系为五祖:初祖杜顺(又名法顺);二祖智俨;三祖法藏;四祖澄观;五祖宗密,都是唐代人。这中间,杜顺与智俨、智俨与法藏、澄观与宗密之间有师承关系,法藏与澄观之间没有师承关系。

另外,从学术上讲,杜顺教人以读诵《华严经》为主,修普贤观行,所传的是禅法。相传为他所作有《华严五教止观》、《华严法界观门》是否真为他的手笔,也存在着疑问。因为这两书均未见法藏《华严经传记》著录。其中,《华严五教止观》中多处使用了杜顺卒后,由玄奘翻译的《大乘庄严经论》的用语,并出现了杜顺在时并没有的寺名,据学者考证,它实际上是法藏《华严游心法界记》的初稿;《华严法界观门》的本文原是法藏《华严发菩提心章》的一部分,只是到了澄观,才说这部分内容为杜顺所作(它没有单行本,存于澄观《华严法界玄观》、宗密《注华严法界观门》之中)。智俨虽然在十二岁时从杜顺出家,但直接向他传授《华严经》义理的,乃是至相寺智正。他得益最大的则是北齐慧光的《华严经疏》四卷(已佚)。



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即使在法藏撰写的叙述《华严经》传习源流的《华严经传记》中,也无杜顺的传记。再则,智俨虽然提出了华严宗的一些教理,但真正建成体系的是法藏。因此,华严宗的祖统说与真正的学术传承关系并非是完全一致的。

华严宗的主要教理有:

一、十玄门 华严宗的基本理论是“法界缘起”。它认为宇宙间,一事物为他事物生起之缘(条件),他事物为一事物生起之缘,万物相资相用,圆融无碍,共同构成现象生起的根源。它与小乘主张的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由众生的善恶行为引起的“业感缘起”、大乘主张的真如为宇宙万有之源的“真如缘起”、以及阿赖耶识为宇宙万有之源的“阿赖耶识缘起”,合称佛教的“四种缘起”说。而构成“法界缘起”说的则是十玄门、六相圆融、四法界三大学说。十玄门,是华严宗关于一切事物的性质的学说,重点在于说明宇宙万象相即(融合)相入(渗透),一(一事物)即多(其他的众多事物),多即一,圆融无碍,重重无尽之理。十玄门,最初是由智俨提出的,后由法藏发展完备。它有“古十玄”和“新十玄”之分。“古十玄”以智俨在《华严一乘十玄门》中所说的十玄门为代表,同时也包括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和《华严经金狮子章》中两次变更十玄门的排列次序,但各门的名称及内容一如智俨所说的十玄门。“新十玄”指的是法藏在《华严探玄记》中根据《华严经金狮子章》的十玄门的次序,将原来的第二门“诸藏纯杂具德门”,改为“广狭自在无碍门”;将第五门“秘密隐显俱成门”,改为“隐密显了俱成门”;将第十门“唯心回转善成门”,改为“主伴圆明具德门”,而确定的新的十玄门。

“新十玄”指的是:(一)同时具足相应门。指一切事物同时具备各自生起的条件(同时具足),相依相资(相应),共成一大缘起。(二)广狭自在无碍门。指各个事物虽然在空间上有广狭之分(广



狭),但都能自立互具(自在无碍)。(三)一多相容不同门。指一事物(一)包含在其他事物(多)之中,其他事物也包含在一事物之中。此物与彼物既互相摄容,又各各不同(相容不同)。(四)诸法相即自在门。指事物与事物(诸法)之间,既互相渗透而融为一体(相即),又独立自存而呈现个性(自在)。(五)隐密显了俱成门。指事物有时隐没(隐密),有时显现(显了),两种情形是同时实现的(俱成)。(六)微细相容安立门。指任何一种细小的事物(微细),都可以包容其他事物(相容),并且相安无碍(安立)。(七)因陀罗网境界门。指一切事物像帝释(因陀罗)宫殿里悬张的珠网(网)那样,交相映现,重重无尽。(八)托事显法生解门。指随意依托一事一缘(托事),都能显示一切事物内在的本质(显法),从而使人领悟到事物由因缘而生,相即相入的道理(生解)。(九)十世隔法异成门。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每一世中,又各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九世又为一念所摄,合称十世。十世虽有时间上的间隔区分(隔法),但又同时具足显现(异成)。(十)主伴圆明具德门。指任意列举哪一事物,以它为主,其他事物便自然为伴(主伴),反之亦然。事物与事物之间互为主伴,每一事物都圆满自足,具备其他一切事物的性质(圆明具德)。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附录《华严宗》说:“十玄门的意义,可借用《华严经疏》所举的譬喻作为说明。第一同时,好像一滴海水便具备百川的滋味。第二广狭,好像一尺镜子里见到千里的景致。第三一多,好像一间屋内千盏灯光的交涉。第四诸法,好像金黄的颜色离不开金子。第五秘密,好像片月点缀天空有明也有暗。第六微细,好像琉璃瓶子透露出所盛的芥子。第七帝网,好像两面镜子对照着重重影现。第八托事,好像造像塑臂处处见得合式。第九十世,好像一夜的梦便仿佛自在地过了百年。第十主伴,好像北极星的所在被众星围绕着。”十玄门,和下面要叙及的四法界和



六相圆融又是互相联系交叉的。十玄门相当于四法界中的“事事无碍法界”。其中,第一门又相当于六相圆融中所说的“总相”,第二门至第十门相当于“别相”。

二、六相圆融 这是华严宗根据《华严经·十地品》和《十地经论》卷一所说的菩萨初地十大愿的第四愿,而建立起来的关于事物的相状(重点在于分析全体与部分的关系)的学说。它也是由智俨最早提出,由法藏发展完备的。六相,指的是:(一)总相。指事物的全体。(二)别相。指事物的各个成份。(三)同相。指多种成份相依相待,共同成就事物的全体。(四)异相。指多种成份虽然同处一事物之中,但各各互异。(五)成相。指事物的生成,依赖于各种成份的聚合。(六)坏相。指事物的坏灭,根源于各个成份的离散独立。“六相圆融”,就是说每一事物都具有上述六种相状,而这六种相状交融一体。

法藏在《华严经金狮子章》曾用师子(即狮子,古代佛经都将狮子称为师子)譬喻“六相”。说,师子的金体,称“总相”;师子的眼、耳、鼻、舌、身“五根”,称“别相”;五根同时缘起,构成师子,称“同相”;五根各不相同,称“异相”;五根和合而后有师子的全体,称“成相”;五根离散不合,各住自位,称“坏相”。

三、四法界 这是华严宗对“法界”所作的分类,也是“法界缘起”说的总结。它是由澄观根据散见于法藏著作中的观点组织确立的。(一)事法界。指有着千差万别的事物的现象(事)界。(二)理法界。指反映一切事物的共同的无差别的体性的本体(理)界。(三)理事无碍法界。指反映事物的本体(理)与现象(事)之间圆融交渗,互不阻碍(无碍)关系的境界。(四)事事无碍法界。指反映事物的现象(事)与现象(事)之间圆融交渗,互不阻碍(无碍),而且重重无尽关系的境界。与四法界相应的观察方法(观门),便是“四法界观”:将一切事物的本体看作是缘生(由因缘



条件产生)的、有差别的“事法界观”;将一切事物的本体看作是平等的、无差别的“理法界观”;将事物的现象和本体看作互依互融、同一不二的“事理无碍法界观”;将现象界的一切看作是一多相即、大小互容、圆满自在、重重无尽的“事事无碍法界观”。

四、五教十宗 这华严宗的判教学说。五教,指的是:(一)小乘教。指《阿含经》等所说的四谛、十二因缘等义;(二)大乘始教。包括两种:1. 空始教。指《般若经》等所说的一切本空等义。2. 相始教。指《解深密经》等所说的五种姓、阿赖耶识缘起等义。3. 大乘终教。指《楞伽经》、《胜鬘经》等所说真如缘起等义。4. 大乘顿教。指《维摩经》等所说顿修顿悟等义。5. 一乘圆教。包括两种:(1) 别教一乘。指《华严经》异于三乘教,而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圆融无碍之旨。(2) 同教一乘。指《法华经》会同三乘教,而说一乘无尽之旨。

十宗,指的是:(一) 我法俱有宗。指人天教(原始佛教时期的教说)和小乘部派佛教中犍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等所立“我”(众生生死轮回的主体)和“法”(事物)俱有实体的学说;(二) 法有我无宗。指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雪山部、多闻部、化地部等所立的“法”有实体、而“我”无实体的学说;(三) 法无去来宗。指大众部、鸡胤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法藏部、饮光部等所立的“法”在现在世有实体,而在过去世、未来世没有实体的学说;(四) 现通假实宗。指说假部、经部、《成实论》等所立的在“现在法”(现在世的事物)中,除五蕴(色、受、想、行、识)以外,其余均为假有的学说;(五) 俗妄真实宗。指说出世部等所立的世俗的一切事物皆为虚妄,唯有佛法为真实的学说;(六) 诸法但名宗。指一说部所立的一切事物仅为假名,并无实体的学说。(七) 一切皆空宗。指大乘始教中的空始教所立的“万法皆空”等义;(八) 真德不空宗。指大乘终教所立的宇宙万有的本体“真如”



真实不空等义；(九) 相想俱绝宗。指大乘顿教所立的物(相)我(想)俱灭,顿悟证理等义；(十) 圆明具德宗。指一乘圆教所立的一切诸法圆融无碍、具足一切功德等义。“十宗”中的前六宗,相当于“五教”中的初教“小乘教”,而后四宗则分别相当于“五教”的末四教。其中,前六宗原为法相宗窥基所立,法藏用之。

华严宗还将“四法界”与“五教”相配。认为,小乘教属事法界;大乘始教中的相始教属事法界,空始教属理法界;大乘终教属事理无碍法界;大乘顿教属理法界;一乘圆教属事事无碍法界。

华严宗的主要教典有:《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经金狮子章》、《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大乘起信论义记》、《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原人论》等。

一、《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 又名《华严经孔目章》、《华严孔目章》、《孔目章》,四卷。唐代智俨撰。原书未署撰时。从书中引用了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华严五十要问答》,而《华严五十要问答》又引用了《成唯识论》来推测,约成于显庆四年(659)至总章元年(668)之间,为智俨的晚年之作。智俨的生平事迹见唐代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等。

本书为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华严经》六十卷的义旨的撮解。全书依晋译《华严经》(其时尚无唐译)的七处八会设立一百四十二章:第一会七章;第二会十九章;第三会十九章;第四会七章;第五会十三章;第六会六十四章;第七会九章;第八会四章。别有总说性质的叙述六章,连前总计一百四十八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释初会的《天王赞佛说偈初首显教分齐义》、《卢舍那佛品中云集文末普贤文中立一乘三乘义章》、《普庄严童子处立因果章》;释第二会的《明难品初立唯识章》、《众人问文殊处明入佛境界章》、《贤首品初立发菩提心章》;释第五会的《第八回向真如同异差别章》、《一乘



法海章》；释第六会的《初明十地品十地章》、《请分中转依章》、《行校量慈悲内缘起章》、《寿命品内明往生义》、《性起品明性起章》；释第八会的《入法界品初辨回心章》；以及总说中的《融会一乘义》。书中将佛陀一代说教大别为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和一乘（佛乘）二种，而以《法华经》会三归一之说为“同教一乘”，《华严经》一多无尽之说为“别教一乘”，从而构成了华严宗独特的“同别二教”说。近世有的佛教学者认为，《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后来成为智俨撰《华严经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和法藏撰《华严经探玄记》的基础。但从法藏《华严经传记》的记载来看，《华严经搜玄记》是智俨二十七岁时所撰，比《孔目章》早成书三十多年，故不能说后出的《孔目章》是早出的《搜玄记》的基础。

有关《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的注疏有：南宋师会《明宗记》一卷、日本凝然《发悟记》十八卷、贤道《十地章略笺》一卷、经历《唯识章辨义》一卷、幻成《讲义》十卷等。

二、《华严经探玄记》 又名《华严探玄记》、《探玄记》，二十卷。唐代法藏撰，约成于唐咸亨元年（670）至圣历二年（699）之间。法藏的生平事迹见新罗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五册）本等。先前，法藏的老师智俨曾撰《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又名《华严经搜玄记》）十卷，以释晋译《华严经》。智俨之书，初记《华严经》的传译，次立五门以释经义：（一）叹圣临机，德量由致。（二）明藏摄之分齐。（三）辨教下所诠之宗趣，及能诠之教体。（四）释经题目。（五）分文解释。其中，前四门为《华严经》纲旨的论述，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玄谈”。末一门为《华严经》三十四品（始《世间净眼品》，终《入法界品》）的解释，对每一品的解释均设辨名、来意、宗趣、释文四科，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文义”。智俨的华严学大要，尤其是他对南北朝时地论南道派慧光之学的继承



和光大,在书中得到了显示。然而,由于智俨的这部《搜玄记》文辞极为简约,故在理解上较为艰难。于是,法藏依仿其师《搜玄记》的体例更作《探玄记》。

本书初为《归敬序》和《总序》,次以十门分判文义:(一)教起所由。(二)藏部所摄。(三)立教差别。(四)教所被机。(五)能诠教体。(六)所诠宗趣。(七)释经题目。(八)部类传译。(九)文义分齐。(十)随文解释。其中,前九门为《华严经》纲旨的阐述(载于卷一),内容叙及《华严经》的地位、翻译、注释、科分,古德(菩提流支、真谛、光统、大衍、护身、慧思、智颢、元晓、吉藏、法云、印法师、敏法师)的判教,华严宗的判教(五教十宗)，“法界缘起”说,十玄门(为新十玄)等;末一门为《华严经》三十四品的详细解释,对每一品的解释各分释名、来意、宗趣、释文四科。为研究华严宗必读的著作。

有关《华严经探玄记》的注疏有:日本尊玄《探玄记钞》、凝然《探玄记洞幽钞》、普寂《探玄记发挥钞》等。

三、《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名《华严经中一乘五教分齐义》、《华严一乘教分记》、《华严五教章》、《五教章》,四卷。唐代法藏撰,约成于唐咸亨元年(670)至圣历二年(699)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主要阐述华严宗的教判学说,并及其他宗义的著作。全书分为十章:(一)建立一乘。论同教一乘(《法华经》)和别教一乘(《华严经》);(二)教义摄益。论一乘与三乘的教义及其利益;(三)古今立教。叙列北魏菩提流支至唐代玄奘等古今十师的判教;(四)分教开宗。建立“五教十宗”;(五)乘教开合。论“五教”之间的相互关系;(六)起教前后。论佛教各经典的成立次第;(七)抉择其意。论经教成立次第的理由;(八)施设异相。论一乘与三乘的相异点;(九)所诠差别。评判华严宗在佛教学中的地



位；(十)义理分齐。阐述三性同异、十玄缘起、六相圆融等义。

有关《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疏极多，仅据日本《大正藏勘同目录》所列就有六十九种，其中多数为日本僧人所作。属于中国僧人的作品有：南宋道亭《义苑疏》十卷、师会《焚薪》二卷、《科》一卷、《复古记》六卷（与善熹合著）、希迪《评复古记》一卷、《集成记》一卷（以上今存）。另外，南宋观复曾著有《折薪记》一卷（已佚）。后人将道亭、师会、希迪、观复称为宋代华严宗的四家。

四、《华严经金师子章》 又名《华严金师子章》、《金师子章》，一卷。唐代法藏撰，成于圣历二年（699）。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中华书局 1983 年 9 月版方立天《华严经金师子章校释》本等。

本书是一部以金师子（“师子”即“狮子”）为喻，通俗讲解华严宗义理的著作。有关此书的来历，据《宋高僧传》卷五的记载是这样的：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十月，由于闾沙门实叉难陀主译、法藏等人笔受证义的新本《华严经》八十卷译成。为庆贺此事，武则天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为众人开讲新经，尔后又在长生殿亲自召见法藏，听他讲经。然而《华严经》奥涩难懂，当法藏讲到天帝网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时，武后茫然不解。于是，法藏乃以殿前的金狮子为譬喻，对《华严经》的主要义理论作了解说。这次讲说的内容，经集录整理，便成了《华严经金师子章》。全书分为十门：明缘起、辨色空、约三性、显无相、说无性、论五教、勒十玄、括六相、成菩提、入涅槃。叙及的内容有：缘起性空（色空、无相、无生等）、三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五教（愚法声闻教、大乘始教、终教、顿教、一乘圆教）、十玄门（为古十玄）、六相（总、别、同、异、成、坏相）、菩提、涅槃等。为华严宗教义的通俗读本和入门书。

有关《华严经金师子章》的注疏有：北宋承迁《华严经金师子章



注》一卷、净源《金师子章云间类解》一卷、日本景雅《金师子章勘文》一卷、高辨《光显钞》一卷、潮音《放光记》一卷、照遍《冠注》一卷、天尊《讲义》一卷等。

五、《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 又名《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妄尽还源观》、《还源观》，一卷。唐代法藏撰。原书未署撰时，从书中屡次引用唐译《华严经》（唐实叉难陀译的八十卷本）来看，约成于唐圣历二年（699）至先天元年（712）之间。宋时，佛教界曾就本书的作者发生争论。天台宗山外派智圆依据唐中书舍人高郢的《北塔铭序》，认为本书为杜顺所作。而华严宗“中兴教主”净源依据唐丞相裴休的《妙觉塔记》，肯定本书为法藏所作。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以《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为依据，论述华严宗的妄尽还源观（去除众生的虚妄分别之念，恢复本来具有的自性清净之心的观察法）的著作。全书分为六门：（一）显一体。说自性清净圆明的心体为一切众生本来具有的、平等无二的心体。（二）起二用。说自性清净圆明心体具有的两种作用：海印森罗常住用（又名海印三昧，指此心湛然澄清，至明至静，能映现一切事物，犹如大海，风息水澄，万象齐观）、法界圆明自在用（又名华严三昧，指此心能起六度万行，契理证果，犹如华能结果）。（三）示三遍。依自性清净圆明心的两种作用，而说周遍法界的三种意义：一尘普周法界遍（于一一微尘中，皆见法界）、一尘出世无尽遍（一尘能生万法，无有穷尽）、一尘合容空有遍（一尘为性空与幻有的结合体）。（四）行四德。依一尘周遍法界之理，而说应修的四种德行：随缘妙用无方德（随顺机缘，施化群生）、威仪住持有则德（行住坐卧，堪为轨范）、柔和质直摄生德（慈悲纯朴，摄受众生）、普代众生受苦德（自趣恶途，救度众生）。（五）入五止。依应修的四种德行，而说应修的五种止法（又称定法）：照法清虚离缘止（真俗不二，



智境双亡)、观人寂泊绝欲止(寂然淡泊,诸欲皆尽)、性起繁兴法尔止(任运常然,古今不变)、定光显现无念止(内外洞彻,无思无虑)、理事玄通非相止(理事圆融,性相俱泯)。(六)起六观。依应修的五种止法,而说应修的六种观法:摄境归心真空观(三界唯心,无有实体)、从心现境妙有观(从心修行,成就佛果)、心境秘密圆融观(法身净土,圆融无碍)、智身影现众缘观(智体唯一,显照众缘)、多身入一镜像观(佛身变化,一多互入)、主伴互现帝网观(主伴互置,映现无穷)。在上述五门中,最后的“起六观”一门为全书论述的重点与归宿。

有关《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的注疏有:北宋净源《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一卷、《妄尽还源观科》一卷、日本凝然《妄尽还源观科文》一卷、湛猷《纂释》五卷、芳英《癸亥录》三卷等十三种。

六、《大乘起信论义记》又名《起信论义记》、《大乘起信论疏》、《起信论疏》,五卷。唐代法藏撰,约成于唐咸亨元年(670)至长安四年(704)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四册)本等。本书为旧题印度马鸣造、梁代真谛译的《大乘起信论》一卷的注疏。《大乘起信论》分为五分:《因缘分》、《立义分》、《解释分》、《修行信心分》、《劝修利益分》。主要论述了如来藏(又名真如)缘起以及大乘修行法门。内容包括:一心(众生心,亦即真如、如来藏)、二门(心真如门、心生灭门)、三大(体大、相大、用大)、四信(信根本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五行(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但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自隋代以来就存在着争议。隋法经等编的《众经目录》卷五说:“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唐代惠均《四论玄义》卷五说:“《起信》是虜鲁人作,借马鸣菩萨名。”卷十又说:“《起信论》一卷,人云马鸣菩萨造,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论,昔日地论师造论藉菩萨名目之,故寻觅翻经论目录中无有也,未知定是否?”(以上两段为日本珍海《三论玄疏文要》



卷二、贤宝《宝册钞》卷八、湛叡《起信论决疑钞》所转引,但今存《四论玄义》无之)近代,有些日本学者认为《起信论》为中国人撰述。理由是:从译文体例上断定不是真谛的译笔。例如真谛翻译“三身”的后二身,在其他处都作应身、化身,或受用身、变化身,没有像《起信论》中翻作报身、应身的。论中的“烦恼碍、智碍”,在真谛的其他译籍中为烦恼障、智障,都不作“碍”字。另外,《起信论》中引用了《仁王经》、《瓔珞经》、《遗教经》等伪经的义理。对于唐代实叉难陀再译《大乘起信论》一事,也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因为早在玄奘在印度时,印土就不见有《起信论》的梵本,“奘(玄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因此,实叉难陀的梵本可能就是玄奘根据汉文翻译的梵本。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详见吕澂《大乘起信论考证》,载《吕澂佛学论著作选集》第一册)。虽说《大乘起信论》是真是伪,尚在争论之中。但此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史影响却是巨大的,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人都吸收过它的思想,用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关它的注疏也极多,今存的就有二百一、二十种之多(包括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学者的撰作),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隋代慧远的《大乘起信论疏》四卷、新罗元晓的《起信论疏》二卷和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五卷。合称“《起信论》三大疏”。而在“三大疏”中,又以法藏的这部《义记》为最重要。

本书分为十门:教起所因、诸藏所摄、显教分齐、教所被机、能诠教体、所诠宗趣、释论题目、造论时节、翻译年代、随文解释。其中,在“显教分齐”门中,初述自日照三藏传至戒贤、智光的“三时”教判,次将传入中国的佛经总判为四宗:(一)随相法执宗。指小乘经律论。(二)真空无相宗。指《般若经》、《中观论》等。(三)唯识法相宗。指《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四)如来藏缘起宗。指《楞伽经》、《密严经》、《宝性论》、《起信论》等,而不用华严宗



的“五教”说；认为《起信论》中提到的“阿黎耶识”即是唯识家所说的“阿赖耶识”，并用唯识学中的自体分、见分、相分来说明“阿黎耶识”九相（业相、能见相、境界相等“三细”，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業相、业系苦相等“六粗”）中的“三细”，从而表明本书在基于华严宗的立场注释《起信论》的同时，也汲取了玄奘所传的唯识学的一些思想成份。

有关《大乘起信论义记》的注疏有：唐代宗密《起信论疏注》四卷、北宋子濬《起信论疏笔削记》二十卷、日本湛叟《教理钞》十九卷、凤潭《虎幻录》三卷、秀存《显正录》五卷等。法藏另著有《大乘起信论别记》一卷，近代有学者怀疑非法藏作，但早在唐代，新罗崔致远的《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已著录了《别记》一书，因此，怀疑之说尚缺乏证据。

七、《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又名《华严大疏钞》、《演义钞》，九十卷。唐代澄观撰，约成于唐贞元四年（788）。澄观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六册）本等。华严宗法藏生前所撰的有关《华严经》方面的著述很多，由于他最初研习的是晋译《华严经》（六十卷），唐译《华严经》（八十卷）是后来才译出看到的，故这些著述所用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晋译本，换言之，大多是晋译本的注疏。晚年，法藏开始作唐译本的注疏，但他写的《新华严经略疏》才至第十九卷便告入灭。弟子慧苑继承遗业，作《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又名《华严略疏刊定记》、《华严经刊定记》）十五卷。但由于《刊定记》并没有恪守师说，所述往往与法藏异趣。例如法藏说“五教”，而《刊定记》则依《究竟一乘宝性论》而立“四教”（迷真异执、真一分半、真一分满、真具分满）。法藏说“十玄门”，而《刊定记》则立十种德相（同时具足相应德、相即德、相在德、隐显德、主伴德、同体成即德、具足无尽德、纯杂德、微细德、如因陀罗网德）、十种业用（同时具足相应用、相即用、相在



用、相入用、相作用、纯杂用、隐显用、主伴用、微细用、如因陀罗网用),而成两重“十玄”。为此,澄观于五台山大华严寺历时四年而作《华严经疏》(略称《大疏》)六十卷,以法藏的思想为主导,融入天台、禅、三论、律宗等教义,对唐译《华严经》重新作了解释。

澄观的《华严经疏》分为十门:教起因缘、藏教所摄、义理分齐、教所被机、教体浅深、宗趣通局、部类品会、传译感通、总释经题、别解文义。其中,前九门为“玄谈”,主要论述唐译本的大纲,末一门为唐译《华严经》七处九会合计三十九品(始《世主妙产品》,终《入法界品》)的解说。书中对慧苑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在《华严经》注疏中,法藏的《探玄记》与澄观的《大疏》并称为双璧。疏成之后,澄观在大华严寺、崇福寺多次作了开讲,随后又为弟子僧睿等作了《大疏》的注释,即这部《演义钞》。

本书分为四门:(一)总序名意。解释《大疏》的自序。(二)归敬请加。解释《大疏》的《归敬偈》。(三)开章释文。解释《大疏》所立的十门。(四)谦赞回向。解释《大疏》之末的《回向偈》。上述四门中,第三门《开章释文》为全书的主干和重点。和《大疏》一样,《演义钞》也赞同禅宗关于众生的心性本来清净的主张,并对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说与本宗所持“真如”缘起说之间的差异作了调和。

《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和《华严经疏》起初是作二本别行的。北宋净源将《华严经》的经文录入《疏》中,编成《华严经疏注》一百二十卷(今缺卷二十一至卷七十、卷九十一至卷一百)。至明代,妙明又厘疏入钞,编成《华严疏钞会本》。另外,《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的前九卷(即“玄谈”部分)曾单独印行。它的注疏有:辽代鲜演《华严经玄谈决择》六卷(今缺卷一)、元代普瑞《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频伽藏》中收录的署名“唐澄观撰集”的《华严经疏演义钞》三十卷(书名中无“随”字,正文二十九卷,附科文一卷)也是“玄谈”部



分的会本。

八、《原人论》又名《华严原人论》，一卷。唐代宗密撰，约成于唐太和二年(828)至开成五年(840)之间。宗密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以《华严经》思想为依据，推究人的本源的著作。全书由作者的自序和正文四篇组成。自序主要叙述了作者撰作此论的缘由。正文四篇为：(一)斥迷执。破斥儒道二教关于人和其他物体皆是禀气而生，自然而化的观点。(二)斥偏浅。将佛教判为五等：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称前四教为“不了义教”，末一教为“了义教”。对人天教主张的众生依业力而轮回于六道；小乘教主张的众生由色、受、想、行、识“五蕴”聚合而成；大乘法相教主张的阿赖耶识为万物(包括众生)之源；大乘破相教主张的诸法(包括众生)皆空等学说进行了批判。(三)直显真源。正面论述了一乘显性教关于“本觉真心”为天地万有的本源，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主张。(四)会通本末。对前面批斥过的儒道二教和佛教中的“不了义教”(人天、小乘、大乘法相、大乘破相教)，以作者主张的“一乘显性教”加以会通。认为，所有这些学说如果用“真心”加以统摄的话，又都是对的。

有关《原人论》的注疏今存的有二十六家。其中有：北宋净源《原人论发微录》三卷、元代圆觉《原人论解》三卷、日本同鉴《续解》一卷、宣道《发微录训蒙记》三卷、圆通《羽翼略解》一卷、了荣《新论》一卷、慧铠《大纲》一卷、洞达《详解》一卷等。

第七节 律宗教典

律宗，又称“四分律宗”，因这一宗派以《四分律》为依据的根本



经典而得名。律宗形成于唐初,起初有三派:长安终南山道宣创立的南山宗(又称南山律宗);相州日光寺法砺创立的相部宗;法砺的弟子、长安西太原寺怀素创立的东塔宗。五代以后,相部、东塔两宗衰微不传,唯南山一宗盛行,故通常说的律宗,指的是南山宗。

南山宗的传承法系,据日本佛教大师凝然(所处的时代相当于我国宋末、元初)《八宗纲要》、《三国佛法传通缘起》所列为二十二祖:第一祖唐代道宣、二祖周秀、三祖道恒(著《行事钞记》十卷)、四祖省躬(著《行事钞顺正记》六卷)、五祖慧正、六祖玄畅(又称法宝大师,著《行事钞显正记》)、七祖元表(著《行事钞义记》五卷)、八祖守言、九祖元解、十祖法荣、十一祖处恒(又名处云,著《拾遗记》三卷)、十二祖择悟(著《义苑记》七卷)、十三祖宋代允堪(会正派的创立者)、十四祖择其、十五祖元照(资持派的创立者)、十六祖智交、十七祖准一、十八祖法政、十九祖法久、二十祖了宏、二十一祖妙莲、二十二祖行居。如据南宋志磐《佛祖统记·诸宗立教志》“南山律学”条所列,道宣以后的律学大师,仅允堪、元照两人而已。

律宗的主要教理有:

一、戒体论 律宗将戒分为四科: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戒法,指的是佛陀制定的各种戒律;戒体,指的是受戒者在受戒以后所产生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心理功能;戒行,指的是恪守戒律的行为;戒相,指的是根据出家或在家、男子或女子、不同的年龄等确定的戒法的类别,也就是通常说的“别解脱戒”(又称别解脱律仪、波罗提木叉律仪、律仪戒),包括:未满二十岁的出家男子(沙弥)或出家女子(沙弥尼)受持的五戒,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的出家女子(式叉摩那,又译学法女、学戒女、正学女)受持的六法戒(染心相触戒、盗人四钱戒、断畜生命戒、小妄语戒、非时食戒、饮酒戒),年满二十岁的出家男子(比丘)和出家女子(比丘尼)受持的具足戒(比丘戒为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为三百四十八条),在家男子(优婆塞)或



在家女子(优婆夷)受持的五戒,在家男女子于一日一夜之中依仿出家者受持的八关斋(又称八戒)。四分律宗的三家,其主要分歧在于对戒体的理解上。相部宗依据小乘空宗的《成实论》,以“非色非心”为戒体,认为戒体既非有形的物质(色),也非无形的精神(心),而是一种有差异变化的抽象体,性质上属于与时数方位等相似的“不相应法”;东塔宗依据小乘有宗(即说一切有部)的《俱舍论》,以“色法”为戒体,认为戒体虽然是无形的东西,但它却是禀受地、水、火、风“四大”而生的,因而在性质上属于不显露、无质碍的物质“无表色”(又称无表业)。而南山宗则依据大乘有宗的学说,以“心法”(或称种子)为戒体,认为《四分律》虽然是小乘的律典,但它的内容通于大乘,所谓戒体,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含藏的种子(见唐道宣《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卷三)。

二、二教说 南山宗根据戒、定、慧“三学”,将佛陀一代言教判为二教:化教和制教。化教,指的是佛陀为使众生发生禅定(定)和智慧(慧)而施行的教法,它是通过三藏中的“经”和“论”而得到表述的;制教,指的是佛陀为制御众生的行为而施行的教化,它是通过三藏中的“律”而得到表述的。化教又分为三教:(一)性空教。指《阿含经》等说的小乘教。(二)相空教。指《般若经》等说的大乘浅教。(三)唯识圆教。指《华严经》、《楞伽经》、《法华经》、《涅槃经》等说大乘深教。制教又分为三宗:(一)实法宗。指以诸法为实有的小乘说一切有部。(二)假名宗。指以诸法为假名的小乘经量部。(三)圆教宗。指以诸法为识体的变现的大乘有宗。道宣还将三教说引入观法,形成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后世称为“南山三观”。南山宗认为,自己属于三教三宗中的“圆教宗”。因此,南山宗的理论特色之一,乃是将唯识学引入了律学。

律宗的主要教典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以上合称南山三大



部)、《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律比丘尼钞》(连前合称南山五大部)、《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四分律疏》、《四分律开宗记》等。

一、《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又名《四分律行事钞》、《行事钞》，三卷(因上、中、下三卷的每一卷，各分一、二、三、四，故又作十二卷)。唐代道宣撰，初成于唐武德九年(626)，修定于贞观四年(630)。道宣的生平事迹见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以《四分律》的本文为基础，参阅其他三藏文字和古师著述，对僧人应当依持的各种制规事项作全面系统的论述的著作。书名中所说“删繁”，指删略《四分律》疏家繁广的情见。“补阙”，指补充《四分律》疏家未予说明的文义。“行事钞”，指将《四分律》的内容按便于僧尼行持的原则所作的分类编纂。书首为序文，分为十门：序教兴意、制教轻重意、对事约教判处意、用诸部文意、文义决通意、教所诠意、道俗七部立教通局意、僧尼二部行事通塞意、下三众随行异同意、明钞者引用真文去滥传真科酌意。对本书的体例撰法作了说明。正文分为三十篇。上卷，十二篇：标宗显德篇、集僧通局篇、足数众相篇、受欲是非篇、通辨羯磨篇、结界方法篇、僧网大纲篇、受戒缘集篇、师资相摄篇、说戒正仪篇、安居策修篇、自恣宗要篇。主要论述了戒法、戒体、戒行、戒相，以及僧团的各种行事仪则，如羯磨法、治罪法、受戒法、依止法、说戒法、安居法、自恣法等；中卷，四篇：篇聚名报篇、随戒释相篇、持犯方轨篇、忏六聚法篇。主要论述了六聚(指波罗夷、僧伽婆罗尸沙、偷兰遮、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等六类犯戒的罪业)的名义，比丘二十五戒，以及持犯、忏法。下卷，十四篇：二衣总别篇、四药受净篇、钵器制听篇、对施兴治篇、头陀行仪篇、僧像致敬篇、赴请设则篇、导俗化方篇、主客相待篇、瞻病送终篇、诸杂要行篇、沙弥别行篇、尼众别行篇、诸部别行篇。主要论述了僧尼的随机要行，包括日常



用品(衣、药、钵器等),节身离染的十二头陀行,礼敬、赴请、化俗、待客、瞻病、送终和其他杂事的仪轨,沙弥戒、比丘尼戒、式叉摩那戒、沙弥尼戒的行法,以及其他律典上说的与《四分律》不同的一些事相。书中保存了今已失传的南北朝时期的一些著述,如北魏道覆的《四分律疏》、北齐洪理的《四分律钞》、梁代真谛的《明了论疏》等,以及一些律学观点,弥为珍贵。对于“戒体”,本书虽然对《成实论》中说的“非色非心”不表示异意,但思想上仍倾向于以“心相”(亦即心法)为戒体。

有关《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注疏有:唐代大觉《四分律钞批》十四卷、志鸿《四分律行事钞搜玄录》二十卷(今存残卷)、五代景霄《简正记》二十卷、宋代元照《资持记》十二卷、《科》三卷、澄渊《评集记》十四卷等。其中以元照的《资持记》(全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最为精详。有关《资持记》的注释,又有宋代则安撰的《资持记序解并五例讲义》一卷、道标《资持记立移注题拾义》一卷。

二、《四分律含注戒本疏》 又名《四分含注戒本疏》、《四分戒本疏》,四卷。唐代道宣撰,成于唐永徽二年(651)。通行本有:天津刻经处本、《卍续藏》第六十二册所收宋元照《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本。作者曾于贞观八年(634)撰《四分律含注戒本》三卷,分为教兴所由、摄教分齐、解开名义、释今题目四门,对根据《四分律》录出单行的《四分律比丘戒本》(此《戒本》与《四分律》中的文字有出入,也不同于题为后秦佛陀耶舍译的《四分比丘戒本》的单行本)所立诸戒的缘起以及内容进行了解释。以后又对《含注戒本》作疏,形成了《含注戒本疏》一书。

本书先略说佛陀制戒的本意,以及戒律的名义(尸罗、波罗提木叉、毗尼等)、律典的种别、广律(包含比丘戒和比丘尼戒,以及其他事项的律典)的传译等,随后对《含注戒本》的正文进行解释。释文之中,科“皈敬偈”为总序分;“和合僧集”以下,分广教行法、略教



行法二分。其中“戒经序”至“七灭净”毕为广教行法，“七佛略戒”为略教行法。对比丘二百五十戒的解释，是为广教行法的内容，也是全书的重点。

有关《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的注疏有：宋代元照的《戒本疏行宗记》二十一卷、《科》八卷。

三、《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 又名《四分律羯磨疏》、《四分律业疏》、《业疏》，二十二卷。唐代道宣撰，成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通行本有天津刻经处本、《卍续藏》(第六十四册)本等。作者曾于贞观九年(635)撰《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二卷。分为十篇：集法缘成篇、诸界结解篇、诸戒受法篇、衣药受净篇、诸说戒法篇、诸众安居法篇、诸众自恣法篇、诸分衣法篇、忏六聚法篇、杂法住持篇。对僧众日常应用的羯磨法(和合作事的规范)作了论述。以后又对《羯磨》作疏，形成了《羯磨疏》一书。

本书先略说能辨之教(羯磨)、所被之事(缘务)、弘法之人(僧伽)、设教之所(结界)，即通常说的羯磨四法(法、事、人、界)，随后对《羯磨》的正文进行了解释。释文中，科第一篇集法缘成篇为序分，第二篇诸界结解篇至第九篇忏六聚法篇为正宗分，第十篇杂法住持篇为流通分。同时论述了化教三观(性空观、相空观、唯识观)、行教三宗(实法有宗、假名宗、唯识圆宗)，明确地将唯识学中说“本识”(阿赖耶识，又称心法)定为戒体。并且指出，一切小乘戒法，皆成三聚圆融大戒，即由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组成的大乘戒。

有关《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的注疏有：宋代允堪《四分律羯磨疏正源记》八卷、《科》四卷、元照《济缘记排科》二十二卷、清代读体《毗尼作持续释》十五卷、照远《四分律羯磨疏显缘抄》二十卷等，其中以元照的《济缘记排科》较为流行。

四、《四分律拾毗尼义钞》 又名《拾毗尼要义钞》、《拾毗尼义



钞》、《集义钞》、《要义钞》，原为三卷，宋时佚下卷，今存就上、中两卷分成四卷。唐代道宣撰，成于唐贞观元年（627）。通行本有《卍续藏》（第七十一册）本等。

本书为有关《四分律》的诸师章疏的钞集，以作《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补充和解释。但引文一般不注出典，泛指“昔解”、“又解”等，只有对本作者本人的老师智首《四分律疏》，才标出名氏，称为“首解”。今存本凡有十六段：毗尼大纲、起戒差别、十三难、不学无知渐顿、转业变根、破僧大意、时非时、四波罗夷、十三僧残、二不定、三十舍堕、九十单提、四提舍尼、众学、七灭诤、四诤。前七段的内容与《行事钞》上卷相当，后九段内容与《行事钞》中卷相当。

有关《四分律拾毗尼义钞》的注疏有：宋代允堪《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六卷、元照《科》一卷。

五、《四分律比丘尼钞》又名《比丘尼钞》，三卷（一作六卷）。唐代道宣撰，成于唐贞观十九年（645）。通行本有《卍续藏》（第六十四册）本等。

本书为《四分律》中有关比丘尼行事的要钞。全书分为三十篇：劝学、释聚、结界、集众、足数、受欲、十戒、学戒、畜众、具戒、六念、受衣、受钵、净施、说戒、安居、受日、自恣、师徒、致敬、随戒、匡众、翻净、受药、赴请、届寺、忏悔、送终、二衣、杂要。所钞不仅限于《四分律》，如《四分律》不备的，则引其他律典的记载补阙。

有关《四分律比丘尼钞》的注疏有：宋代允堪《四分律比丘尼钞科》一卷等。

六、《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又名《护律仪》、《教诫律仪》，一卷。唐代道宣撰，成于唐贞观八年（634），永徽元年（650）重修。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五册）本等。

本书为新学沙弥应当遵奉的律仪的叙录。书首有序，略说学习律仪的重要。正文分为二十三章，总计四百六十五条：（一）入



寺法,十一条。(二)在师前立法,六条。(三)事师法,五十一条。(四)在寺住法,三十一条。(五)在院住法,五十五条。(六)在房中住法,三十二条。(七)对大己五夏阁梨法,二十二条。(八)二时食法,六十条。(九)食了出堂法,十条。(十)洗钵法,十七条。(十一)护钵法,十三条。(十二)入众法,十二条。(十三)入堂布萨法,十二条。(十四)上厕所法,二十条。(十五)于六时不得语笑法,六条。(十六)入温室法,十六条。(十七)见和尚阁梨得不起法,五条。(十八)见和尚阁梨不得礼法,十一条。(十九)看和尚阁梨病法,十二条。(二十)敬重上座法,十六条。(二十一)扫地法,八条。(二十二)用水瓶法,十条。(二十三)入聚落法,三十条。其资料主要取于后汉安世高译的《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行文简洁,甚便初学。

有关《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的注疏有:日本宝田通玄《教诫律仪指要钞》二卷、湛堂慧淑《教诫律仪讲述》二卷等。

七、《四分律疏》二十卷 唐代法砺撰,成于唐武德(618—626)末年。法砺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三。通行本有《卍续藏》(第六十五册)本等。它与北齐慧光的《四分律疏》四卷、唐代智首的《四分律疏》二十一卷,合称“《四分律》三要疏”,在唐初十分有名。以后怀素作《四分律开宗记》,与法砺《疏》相对立。世人遂称法砺《疏》为“旧疏”,怀素《开宗记》为“新疏”。唐代“新疏”派和“旧疏”派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曾敕令三宗(南山、相部、东塔)大德十四人在安国寺聚会,决定新旧两疏的是非,并检定一本行世。最后,由如净等人作《敕检定四分律疏》十卷,以调和新、旧两疏学者之争的纷争,并允许两疏继续并行。

本书为相部宗的代表作。卷一为序说(或称玄谈),下分三科:举宗摄教、知教指归、释律初题。其内容为辨析教旨,解说律题;卷



二至卷二十为《四分律》的随文解释,其中对于每一类戒律,先总说,后别释。书中依据《成实论》而建立相部宗的戒律论:戒学不兼定、慧二学,而以止持(止恶)、作持(修善)为宗;戒体的性质为“非色非心”;戒行包括受戒和随戒两个方面。受戒,指的是从师受戒,发心禀持;随戒,指的是依戒而行,不令毁失。受戒,分受缘、受体二种。受缘,指的是受戒的因缘,有善来、上法、三师、八敬、羯磨五种。受体,指的是受戒的法体,有以“色”为体的作戒、以“非色非心”为体的无作戒二种;随戒,分专精不犯、犯已能悔二种。专精不犯为上根人所为,犯已能悔为下根人所为。

有关《四分律疏》的注释有:唐代定宾《四分律疏饰宗记》二十卷。

八、《四分律开宗记》又名《四分律记》、《四分律疏》,二十卷。唐代怀素撰,成于唐永淳元年(682)。怀素的生平事迹见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通行本有《卍续藏》(第六十六册、六十七册)本等。怀素初从法砺受业,研习法砺《四分律疏》积三年之久。法砺卒后,曾师事玄奘(《宋高僧传》本传说,怀素十岁出家,贞观十九年玄奘从西域归国后,师事玄奘。受具足戒以后,专攻律典,从法砺受业。这里所说的先师玄奘,后从学于法砺的时间顺序是不对的。因为法砺早在玄奘归国前十年就去世了)。怀素因感到法砺的旧疏“未能尽善”,乃于咸亨元年(670)发心著述新疏,十二年后告成。其间还听过法砺的弟子道成讲律。故他的新疏中或许也有从道成处汲取的某些思想成份。

本书是东塔宗的代表作。卷一为序说(或称玄谈),下分三科:总简藏别、别藏宗归、释藏题目。这里所说的“藏”,是指律藏,实指《四分律》;卷二至卷二十为《四分律》的随文解释。书中依据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毗婆沙论》、《俱舍论》而建立了东塔宗的戒律论:律文兼举定、慧二行,定、慧为戒学所摄,故律须以戒行为宗;戒体



的性质为“色法”。并对法砺旧疏的十六大义(止作、受随、止恶、修善、教行、专精不犯、因果等)加以评破,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唐开元(713—741)年间,相部宗的传人定宾曾作《破迷执记》一卷,对怀素的《开宗记》加以弹斥,以维护法砺《疏》。

第八节 禅宗宗典

禅宗,梁代菩提达摩创立,因主张修持禅定,遣荡执著,明心自觉,见性成佛而得名。禅定,意为“静虑”,本是印度流行的一种止想念念,专注一境,以激发智慧和神通的修行方法,佛教修它,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派也修它。而在佛教内部,不同的流派修禅的内容和方法又各有差别,因而有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如来禅(又称如来清净禅、最上乘禅)等不同的种类。禅宗所说的“禅”属于“如来禅”(唐末,禅宗五家之一的沩仰宗的开创者仰山慧寂,又因当时如来禅滞于义解名相,未达菩提达摩西来所传禅法的真趣,故又称禅宗之“禅”为“祖师禅”)。另外,禅宗把佛教分为“教”与“禅”两大系统。“教”,指的是用经典文字载录下来的释迦牟尼佛的言教,凡是以研习佛典的文句和义理为主,并依之实践的宗派,如天台、三论、华严、法相、律宗等都属于“教”的系统;而禅宗则为“教外别传”。相传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常在灵山说法。有一天,他拈花示众,众人皆茫然不知其意,唯独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表示领悟。于是,佛陀宣布,他已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微妙法门”传付给摩诃迦叶,以后一代一代相承相传,直至菩提达摩。这种通过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印证方式传下来的禅法,实际上是“佛心”,故禅宗又称“佛心宗”。也由于这一缘故,禅宗的典籍一般不称“教典”,而称为“宗书”或“宗典”,以示“禅”与“教”的



区别。

禅宗在中唐时期确立的法统(又称祖统)为: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西天二十八祖的初祖为摩诃迦叶,第二十八祖为菩提达摩。东土六祖依次为:初祖菩提达磨、二祖慧可(又作惠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又作惠能)。其中,慧可为北齐人,僧璨为隋代人,道信、弘忍、慧能均为唐代人。但在慧能之前与同时,禅宗内部又存在着一些支派。如四祖道信的另一个弟子法融,以“心境本寂(空)”立说,在金陵(今南京)牛头山传教,其法嗣见于记载的,凡有七代,世称“牛头宗”(见南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二);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以“渐悟”立说,在荆州当阳(今湖北当阳县)、长安(今西安)传教,其法嗣见于记载的,凡有四代,世称“北宗”(见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四)。而当时的慧能,以“顿悟”立说,主要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一带传教,其派被称为“南宗”。南北二宗在谁为禅宗正脉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神秀的弟子普寂称自己为禅宗东土七祖(见唐代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而尊神秀为六祖,与慧能的地位相抗衡。只是到了唐开元年间,慧能的弟子神会北上游说,并著《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显宗论》等,就宗旨的是非、法嗣的正旁,对北宗展开猛烈的抨击,南宗的顿教才由南向北得到广泛的传播,北宗衰落绝传。自此以后,天下禅宗皆出于南宗。通常说的禅宗,即指慧能的南宗。

禅宗的主要教理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认为,众生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菩提般若之智人皆有之。只是由于执著外部境物,产生妄念,才像浮云遮盖青天一样,将自性蒙蔽住了。一旦能做到“无念”,即眼见一切境物,但又不为它们所执著,心遍一切处,但又不为任何地方所束缚,就能内外明彻,顿见本性。众生与佛的本性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悟”与“不悟”之间,前念迷即是凡



夫,后念悟即是佛。因此,所说的“禅”,并不是要人们“看心”(观空)、“看净”(观净),或者整天端坐不动,而是要人们“随缘任运”,在日常生活中,随顺本然,直了见性。

禅宗的主要经典有:《坛经》、《神会和尚遗集》、《禅宗永嘉集》、《禅源诸论集都序》、《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宗镜录》、《碧岩录》等。

一、《坛经》又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敦煌本、敦博本)、《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同上)、《六祖坛经》(惠昕本、日本兴圣寺本)、《韶州曹溪山六祖坛经》(日本大乘寺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契嵩本、宗宝本、德异本)、《法宝坛经》(同上)等,一卷(惠昕本作二卷)。唐代慧能说,弟子法海集记。慧能的生平事迹见《坛经》,法海的生平事迹见《全唐文》卷九百十五。《坛经》初集于唐先天二年(713)之后、开元二十年(732)之前。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这个《坛经》祖本(或称法海原本)屡经增益和改易,形成了内容不尽相同的各种传本。今存各本中,以敦煌本(见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敦博本(见藏于我国敦煌县博物馆)为最古,二本同源成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至贞元十七年(801)之间的敦煌原本,而敦煌原本在内容上较接近于《坛经》祖本。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本(内收敦煌本、宗宝本)、上海医学书局1922年版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本(内收宗宝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郭朋《坛经校释》本(内收敦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本(内收敦博本)等。

《坛经》是一部以记录慧能在韶州大梵寺讲堂说法的内容为主,兼及其他言行的著作。敦煌本和敦博本不分门或品,大体上说,以“大师往曹(曹)溪山,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一语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部分。从卷首开始,至此语之前的文字,为前部



分;自此语以下,至卷终的文字为后部分。前部分可以说是《坛经》的原始部分。主要内容有:《坛经》的編集缘起;慧能在大梵寺讲堂说法时,所介绍的自己的身世,赴蕲州黄梅县冯墓山参拜五祖弘忍,并得法传衣的经过,以及所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包括定慧一体、一行三昧、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禅法),所授的无相戒(包括归依三身佛、四弘誓愿、无相忏悔、无相三归依戒);说法结束后,刺史韦璩的问疑与慧能的开示。后部分可以说是《坛经》的补续部分。主要内容有:慧能的行化;“南能北秀”(南宗慧能与北宗神秀)的顿渐之争;志诚、法达、智常、神会的参请机缘;慧能对法海等十弟子(怀让、行思、玄觉不在其内)所作的开示;禅宗的传承法系(自七佛,终慧能,凡四十代);慧能入灭前的付嘱与灭度后的安葬;《坛经》的传授等。全书所贯穿的基本思想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二、《神会和尚遗集》 又名《神会集》,一册。近代胡适根据敦煌唐写本中有关神会的各种资料汇编校订。1930年初版(上海东亚图书馆),1968年增补后再版(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神会是六祖慧能门下,与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大系并列的第三大流派—荷泽宗的创立者。虽然荷泽宗流传的时间没有南岳、青原两系长,从神会算起,只有七代,历时约二百年(见释明复《中国佛学人名辞典》附件一《诸宗师资传承系统表》,中华书局1988年1月版)。但在慧能入灭以后的数十年间,荷泽宗的影响远远大于南岳、青原两系。因为在当时,“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唐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神会的弟子普寂,成了“二京(长安、洛阳)法主、三帝(中宗、睿宗、玄宗)国师”,无人能与匹敌。那时,怀让、行思均山居修道,没有进行公开的传法活动,他们的禅风,只是到了弟子马祖道一、石头希迁这一代才开始显露和光大。只有神会,以“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



是非”的惊人胆略和气概，北上游说，论定神秀一门“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终于使“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慧能的六祖地位的最终确立，实赖于神会之力。有关神会的生平事迹详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八、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六等。

本书所收的神会资料有：《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独孤沛集并序）、《顿悟无生般若颂》（又名《显宗论》）、《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其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记录了唐开元二十年（732），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就南北二宗宗旨的是非和法系的正傍展开辩论的情况；《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记录了神会在洛阳作坛场开法传禅的主要内容，在《神会和尚遗集》所收各资料中，尤为重要。

与《神会和尚遗集》性质相同的神会资料集，还有日本铃木大拙等编的《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日本东京森江书店1934年版）令人杨曾文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7月版）。

三、《禅宗永嘉集》 又名《永嘉禅宗集》、《永嘉禅集》、《永嘉集》，一卷。唐代玄觉撰，庆州刺史魏靖（一作魏静）辑，约成于唐开元（713—741）初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本等。玄觉，字明道，俗姓戴，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八岁出家，遍探三藏，尤精天台止观法门。后受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的激励，与东阳玄策禅师游方寻道。至曹溪，参六祖慧能而得印可。慧能留之一宿，翌日即归原住的龙兴寺，时称“一宿觉”。著作除《永嘉集》以外，尚有《永嘉证道歌》一首，甚为有名。生平事迹详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八、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等。

本书分为十篇：慕道志仪、戒橘奢意、净修三业、奢摩他颂、毗



婆舍那颂、优毕叉颂、三乘渐次、事理不二、劝友人书(即答左溪玄朗书)、发愿文。书中融会了天台宗的止观学说和禅宗的禅法,对修禅悟道的要旨和历程作了论述。

有关《禅宗永嘉集》的注疏有:宋代行靖《永嘉集注》二卷、明代传灯《永嘉禅宗集注》二卷、高丽己和《永嘉集说谊》二卷等。其中,传灯的《永嘉集注》对《永嘉集》各篇的次第及篇名作了大的更改,所定的次第为:归敬三宝、发宏誓愿、亲近师友、衣食诫誓、净修三业、三乘渐次、事理不二、简示偏圆、正修止观、观心十门。

四、《禅源诸论集都序》 四卷。唐代宗密撰,约成于唐太和二年(838)至开成五年(840)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本等。宗密为华严宗五祖,同时又是荷泽宗禅法的禀受者。他本是儒生,在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的途中,偶尔听闻遂州大云寺道圆禅师开法,大启敬心,于是师从道圆,披剃出家。而道圆就是荷泽神会的三传弟子。因此,宗密极力主张禅教一致。有鉴于当时禅宗与教派(华严、天台、法相等)互相非毁,禅宗内部各派也互相排斥,于是他收集了著名禅师有关禅理的论述(包括法语、文章、偈颂等)近一百家,编成了《禅源诸论集》(又名《禅那理行诸论集》)一百卷。后值唐武宗会昌灭佛和唐末五代之乱,原集佚散,只有为集子所作的总序流传至今,这便是《禅源诸论集都序》。

本书以和会禅、教为宗旨,对禅、教两派以及内部的不同派别在学说上的异同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其中,卷一,对《禅源诸论集》的名义、禅的性质和分类进行了论述,并从师有本末、禅有诸宗、经如绳墨、经有权实、量有三种、疑有多般、法义不同、心通性相、悟修顿渐、师授方便等十个方面阐述了禅宗与经论的关系。卷二,将禅宗分为息妄修心宗、泯绝无寄宗、直显心性宗等三宗,将教派分为密意依性说相教(包括人天因果教、说断惑灭苦乐教、将识破境教)、密意破相显性教、显示真心即性教等三教,对它们的学说



特点分别进行了介绍,并作了配对。卷三,从法义真俗异、心性二名异、性字二体异、真智真知异、有我无我异、遮诠表诠异、认名认体异、二谛三谛异、三性空有异、佛德空有异等十个方面,详细辨析了空宗与性宗(即有宗)的区别,并表达了作者对顿渐法门的看法。卷四,论述了从不觉到觉,从迷到悟的修证方法。作者认为,无论是六道凡夫,还是三乘贤圣,都具有“灵明清净一法界心”,此心具有真如、生灭二门(两个方面)，“由真不变,故妄体空,为真如门;由真随缘,故妄成事,为生灭门”。但两者是互相融入的,生灭即真如,真如即生灭,真妄和合,非一非异。众生的这一心性,便是禅的本源,即书名中说的“禅源”。因此,本书的基本思想实是根据《大乘起信论》展开的。

五、《景德传灯录》又名《传灯录》,三十卷。北宋道原撰,成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道原为法眼宗人,其生平事迹见北宋李遵勗《天圣广灯录》卷二十七。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等。禅宗典籍的文体很多,有传记、谱牒、语录、灯录、拈古、颂古、评唱、笔记、文集等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语录和灯录。语录为禅师的机缘语句(参禅或接引学人时的对话与开示)的汇编,通常是以个人专集的形式出现的,编者均为该禅师的弟子。同时也有汇纂几家或更多的禅师语录而成的总集,但为数不多;灯录则为禅宗传法世系以及相关人物(既有禅师,也有王臣居士)的言语行事的汇编,它从来就是综合性的,语录仅是它在编写时所选取的主要资料之一。《景德传灯录》便是我国第一部以“灯录”命名的灯录体著作。虽然在《传灯录》以前,由南唐静、筠两禅师编写《祖堂集》二十卷,已经具有灯录的性质,但由于《祖堂集》在我国本土失传较早,于世罕闻,只是到了近代,才在日本发现它的高丽重刻本,复传我国,故《祖堂集》在佛教史上的影响远不及《传灯录》来得大,而且它并不以“灯录”命名。缘此,学术界一般都把《传灯录》看作是禅



宗灯录体著作的始祖。

本书是自禅宗有史以来迄道原撰书时为止,禅宗世次人物及其思想最为完整系统的记叙。所记世次,上起七佛(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下迄禅宗六祖慧能门下南岳怀让法嗣第九世和青原行思法嗣第十一世。总计一千七百十二人,其中九百五十四人有机缘语句(略称机语)见录,七百五十八人只列名字,缺乏机语。卷一、卷二,七佛、天竺祖师(禅宗西天二十七祖,始摩诃迦叶,终般若多罗)。卷三、卷四,中华五祖(菩提达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并旁出尊宿(弟子)。卷五,慧能和他的弟子。卷六至卷十三,南岳怀让法嗣第一世至第九世。卷十四至卷二十六,青原行思法嗣第一世至第十一世。卷二十七,禅门达者(禅宗以外以习禅闻名的僧人),并附“诸方杂举征拈代别语”(即诸方禅语)。卷二十八,诸方广语(南阳慧忠等人除前面本章所载以外的其他语录)。卷二十九,赞颂偈诗。卷三十,铭记箴歌。这中间包括了后世禅宗经常谈论的许多公案(具有典型意义的禅门机缘语句)。

有关《景德传灯录》的续作有:北宋李遵勗(临济宗)《天圣广灯录》三十卷、惟白(云门宗)《建中靖国续灯录》三十卷、南宋悟明(临济宗杨岐派)《联灯会元》三十卷、南宋正受(云门宗)《嘉泰普灯录》三十卷、明代居顶《续传灯录》三十六卷、文琇《增集续传灯录》六卷等。

六、《五灯会元》二十卷。南宋普济集,成于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普济为临济宗杨岐派人,其生平事迹见南宋圆悟《枯崖漫录》卷中、明代居顶《续传灯录》卷三十五等。通行本有:《卍续藏》(第一三七册、一三八册)本、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版苏渊雷点校本等。

本书为《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



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五部灯录(五灯)所载禅宗世次人物及其思想的汇编。作者有感于“五灯”卷帙浩繁,合起来有一百五十卷之多;所载的世次人物层见叠出,重合之处很多;对六祖慧能门下南岳、青原二大系世次的计算与编录程序不尽一致,一般学人罕能通究。为此,他以“五灯”为基本素材,删并整理,编成了这部《五灯会元》。

全书所记,上始七佛,下迄青原(行思)下十六世和南岳(怀让)下十七世。卷一,七佛、西天祖师、东土祖师。卷二,四祖大医禅师(道信)旁出法嗣第一世至第八世、五祖大满禅师(弘忍)旁出法嗣第一世至第四世、六祖大鉴禅师(慧能)旁出法嗣第一世至第五世,附“西天东土应化圣贤”(文殊菩萨等)。卷三、卷四,六祖大鉴禅师法嗣南岳怀让禅师,以及南岳下第一世至第五世。卷五、卷六,六祖大鉴禅师法嗣青原行思禅师,以及青原下第一世石头希迁至第七世,未附“宋世玉音”(宋太宗等)和“未详法嗣”(宝性大师等)。卷七、卷八,青原下第二世天皇道悟至第九世。卷九,沩仰宗。卷十,法眼宗。卷十一、卷十二,临济宗。卷十三、卷十四,曹洞宗。卷十五、卷十六,云门宗。卷十七、卷十八,临济宗黄龙派。卷十九、卷二十,临济宗杨岐派。大凡南宋嘉泰四年(1204)以前禅宗人物为启发学人的禅机,所作的正说、反说、庄说、谐说、横说、竖说、显说、密说,以及瞬目扬眉、擎拳举指、竖拂拈槌、掀床作拜、持叉张弓、辊毬舞笏、拽石搬土、打鼓吹毛、吁笑棒喝等机锋,大多见录其中。

有关《五灯会元》的续作有:明代净柱《五灯会元续略》四卷、清代元贤《续灯录》六卷、通问《续灯存稿》十二卷、性统《续灯正统》四十二卷等。有关《五灯会元》的节抄本有:明代如昙《禅宗正脉》十卷。

七、《古尊宿语录》 初名《古尊宿语要》,又名《古尊宿语》、



《古尊宿录》，四卷。南宋贻藏主（守贻）集，成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至绍兴八年（1138）之间。后经南宋末年的咸淳三年（1267）和明初的永乐（1403—1424）初年两次重刻增补，增至四十八卷。传今的即为四十八卷本。贻藏主为福州鼓山寺管理藏经的执事（藏主），其余事迹不详。通行本有《已续藏》（第一一八册）本等。

本书是禅宗的一部语录总集。全书收有唐宋时期著名禅师的语录三十六家（另有一种本子收四十三家）。其中有黄檗希运、临济义玄、兴化存奖、南院慧贻、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慈明楚圆、南泉普愿、赵州从谗、云门文偃、杨岐方会、白云法演、龙门清远、鼓山神晏、洞山守初、宝峰克文、佛照德光等。这些语录的主体，是各禅师在不同的居住地、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上堂示众、室中垂语、勘辨对机等）所说的法语。同时，也包括各禅师所作的或与之有关的偈颂、歌赞、拈古、颂古、短文、行状、塔铭、语录序等，为研究唐宋禅宗的重要思想资料。

有关《古尊宿语录》初集的续作有：南宋师明《续古尊宿语要》六卷。

八、《宗镜录》又名《宗鉴录》、《心境录》，一百卷。北宋延寿撰，成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延寿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八、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以“心”为主题，采撷大乘经论和贤圣著述，融会禅、教（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宗）两系宗旨的佛教通论。作者以“一心”为宗，喻此心为映照“万法”的镜子，进而围绕这一宗旨，选录资料，展开论述，故将书名取为《宗镜录》。全书约八十万字，分为标宗、问答、引证三章。卷一的前部分为标宗章，标“一心”为宗，明“心外无法，触目是道”之理，提举全书的纲旨，相当于总论。卷一的后部分至卷九十三为问答章，用问答的形式，对与“心”有



关, 并及法相、法性等义的约八百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以去除疑情。卷九十四至卷一百为引证章, 援引大乘经论一百二十种、祖师之语一百二十种、贤圣集六十种, 总计三百种著述, 以证成心宗(又称圆宗)的深妙。本书引证广博, 保存了唐末五代一大批思想资料, 其中包括像《中论玄枢》、《唯识义镜》这样的逸书, 以及众多的法师、禅师的逸文和言语。在“教”方面, 由于作者尤尊华严宗, 故书中引证华严宗的理论也最多。然而, 由于作者只罗列众家之说, 而不加料简辨析, 故本书也存在着繁芜而缺乏条理的缺陷。

有关《宗镜录》的节略本有: 清雍正皇帝的《御录宗镜大纲》二十卷。

九、《碧岩录》又名《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碧岩集》, 十卷。北宋克勤(赐号圆悟, 又号佛果)撰, 成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克勤的生平事迹见南宋祖琇《僧宝正续传》卷四、普济《五灯会元》卷十九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正续藏》(第一一七册)本等。禅宗将参禅问道或上堂开示时, 禅师们为接引学人在平实的一机一境之上, 解粘去缚, 勘破疑情, 截断常流, 当下彻悟, 而呈示的言语动作(机锋), 称为“机缘”(应机施缘之意)。泛而言之, 一切具有启发禅机作用的言句、行事、偈语、经文等, 也可以称为“机缘”; 唐代禅僧将蕴意深刻的禅门机缘, 称为“公案”, 因为这些祖师的言行犹如公府的案牍, 是后世禅人揣摩、体会、勘辨、观照, 最后豁然省悟, 进入禅境的范例; 入宋以后, 随着《景德传灯录》等灯录的刊行, 丛林参究公案的风气日益兴盛, 出现了摘取灯录中的公案, 加以品评的文字。其中, 无固定的韵律和句式的散文(又称长行), 称为“拈古”。有一定的韵律和句式(如三言四句、四言四句、五言四句、七言四句等)的偈颂, 称为“颂古”。拈古和颂古的性质, 犹如史书上附在人物和史事之末的“论”或“赞”; 摘录拈古或颂古的原文(包括每则拈颂的对象“公案”), 再加以评析的, 称



为“评唱”。作为评唱体著作的始祖，便是克勤的这部《碧岩录》，禅界称之为“宗门第一书”。

本书是对北宋云门宗僧人雪窦重显《颂古百则》的评唱(讲评)。所收的《颂古百则》有:圣谛第一义、赵州至道无难、马祖日面佛月面佛、洞山麻三斤、忠国师无缝塔、俱胝只竖一指、麻谷持锡绕床、禾山解打鼓、赵州渡驴渡马、南泉斩却猫儿、云门古露柱、维摩不二法门、玄沙三种病人、大光这野狐精、巴陵吹毛剑等。克勤采用夹叙夹议的形式,对这一百则禅门公案以及重显的颂语一一作了评析。内容包括公案的蕴意、历史背景、所涉人物的言语行事,以及克勤颂语的含义等。在本书的影响下,曹洞宗人万松行秀对天童正觉的《颂古》加以评唱而作《从容庵录》六卷,行秀的弟子从伦对投子义青的《颂古》加以评唱而作《空谷集》六卷,对丹霞子淳的《颂古》加以评唱而作《虚堂集》六卷。明人将这四部著作称为“四家评唱”,广为刊布(日本《大藏经索引·收录典籍解题》用行秀对天童正觉《拈古》加以评唱而作的《请益录》二卷,取代《碧岩录》,称为“四家评唱”是不对的。详见拙作《佛典精解》纂集部第三门第六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第九节 净土宗教典

净土宗,又称“净土教”,因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即唱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意为归依),以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又称极乐世界、乐邦、莲邦、阿弥陀佛净土)而得名。又因东晋元兴元年(402),庐山慧远集合同道一百二十三人,在东林寺般若台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精修念佛三昧,共期西方净土,为结社念佛之始,而此社于东林寺东西两池,广种白莲,以喻其志(经论上说,极乐世



界的众生以莲花为居所，并以莲台迎接生前修持净土法门的人），世称白莲社，略称莲社，故净土宗又名莲社。净土宗所依据的根本经典是三经一论：《无量寿经》（二卷，曹魏康僧铠译）、《观无量寿佛经》（一卷，刘宋畺良耶舍译）、《阿弥陀经》（一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往生论》（全称《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一卷，印度世亲造，北魏菩提流支译）。

由于生死问题是人生最为重大的一个问题，而净土宗所倡导的净土法门，则为人们指示了死后往生的极乐境界以及达到这种境界所需修习的简便易行的方法，故在佛教诸宗中，此宗最具吸引力和普及性。修习者既有僧人，也有俗人，有专修者，也有兼修者，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人士兼弘净土法门的为数极多。因此，与其他宗派不同，净土宗的法统（或称祖统）并不是以师承关系为依据确定的，而是根据其人在弘扬净土法门中的功绩认定的。后世净土宗普遍认同的是南宗志磐在《佛祖统纪》卷二十六《净土立教志》所确立的莲社七祖：初祖东晋慧远、二祖唐代善导、三祖承远、四祖法照、五祖少康、六祖五代延寿、七祖北宋省常。这中间，除三祖承远和四祖法照为师徒以外，其他祖师之间并无师承关系，而六祖延寿同时也是禅宗五宗中法眼宗的三祖。日本佛教界也有以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为中国净土宗五祖的（见日本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版），并认为中国净土宗有三派：慧远派、善导派（包括昙鸾、道绰、善导）、慈愍派（指唐代赴印求法后回国的慧日），但这是按教理的差异来划分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净土宗流派（见日本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版）。而在莲社七祖中，善导是中国净土宗教理体系的集大成者。

净土宗的主要教理是：称名念佛，他力往生。净土宗认为，国土有秽土和净土之分。有情众生所在的娑婆世界，是充满苦难的



秽土；而十方诸佛居住的地方，则是充满幸福的净土。在十方净土中，以阿弥陀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尤为殊胜，它是阿弥陀佛通过过去世修菩萨行而获得果报（报土）。人死以后，如果能往生那里，就可以永远脱离生死轮回，获得种种福乐利益，并且享有无量的寿命，“阿弥陀”的字义就是“无量寿”。反之，如果往生其他净土，譬如弥勒净土——弥勒佛居住的兜率天宫，虽说较人间不知要优胜多少倍，但只能享有一定年限的寿命（一说四千年），命终之后，仍然要退落人间。另外，阿弥陀佛在成佛前（时为法藏比丘）曾许下四十八种誓愿，其中之一就是：无论何等众生（包括平时做尽坏事，理当入地狱的恶人），只要发愿往生极乐净土，并且念十遍“南无阿弥陀佛”，临终时，他都会前去迎接。因此，在“末法”之世，依靠自力，按经律论上的要求，修习戒定慧，断惑证理，入圣得果，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依靠他力，即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称名念佛，以期往生，则是简便易行的。为此，净土宗倡导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的净土法门。

净土宗的主要教典有：《略论安乐净土义》、《往生论注》、《安乐集》、《观无量寿经疏》、《净土论》、《释净土群疑论》、《龙舒增广净土文》、《乐邦文类》、《庐山莲宗宝鉴》、《西方合论》等。

一、《略论安乐净土义》 又名《安乐净土义》、《安乐义》，一卷。北魏昙鸾撰，约成于北魏永安二年（529）至东魏兴和四年（542）之间。昙鸾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七册）本等。据唐代迦才《净土论》卷下说，昙鸾撰有《无量寿佛经奉赞》七言偈一百九十五行并《问答》一卷。这《无量寿佛经奉赞》即今存的《赞阿弥陀佛偈》，《问答》即是《略论安乐净土义》（《续高僧传》卷六称之为《安乐集》）。起初，《略论安乐净土义》与《赞阿弥陀佛偈》当是合在一起流行的，以后便各自独立，分作两本流传。



本书是一部用问答体写成的解释阿弥陀佛净土的功德、庄严以及生因的著作。全书共设六番问答(六个问答题),对三界摄否、庄严多少、往生辈品、边地胎生、四智破惑、十念相续等六个问题作了解答。指出,安乐净土由阿弥陀佛别业所得,非三界所摄;它有十七种器世间清净、十二种众生世间清净(此据世亲《往生论》所说);往生安乐净土的众生有三辈九品之别(此据《无量寿经》所说),其中,发菩提心、专意念佛、发愿往生三者为净业修持者共同的因缘(条件);在安乐净土中,边地胎生者不受欢迎,惟忆出离;阿弥陀佛有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胜智等“四智”,能破胎生者的疑惑心;净业修持者的念佛方法为“十念”(十念相续,又称十念往生)，“念”为“忆念”之义,以忆念阿弥陀佛的总相和别相,心无他想为一念,如此十念相续,可成往生之因。

有关《略论安乐净土义》的注疏有:日本妙观《里书》一卷、圣观《同见闻》一卷、智及《句解》二卷等。

二、《往生论注》又名《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无量寿经论注》,二卷。北魏昙鸾撰,约成于北魏永安二年(529)至东魏兴和四年(542)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册)本等。

本书是世亲《往生论》(又名《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无量寿经论》)唯一的注释书,也是涵盖净土主要教理的最重要的净土宗教典。《往生论》由二十四首偈颂和解释偈颂含义的长行两部分组成。本书卷上为总说分,解释世亲造的偈颂。主要内容为:依龙树《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而论难、易二道,依世亲《往生论》而说“五念”法门,依《观无量寿经》而说“十念业成”。所说的难、易二道,指的是难行道和易行道。依靠“自力”(自己的力量),修持戒定慧“三学”,断惑证真的为难行道;依靠“他力”(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念佛往生的为易行道。“五念”法门,指的是:(一)礼拜门。清净身业,恭敬礼拜阿弥陀佛。(二)赞叹门。清净口业,专念阿



弥陀佛的名号。(三)作愿门。止息散念,修习奢摩地(意为“止”)。(四)观察门。观察阿弥陀佛净土的功德庄严(凡二十九种),修习毗婆舍那(意为“观”)。(五)回向门。将自己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愿同生极乐国土。“十念业成”,指的是一切众生只要一心忆念阿弥陀佛,相续积得十念(十个念头),便完成了往生净土所需要的条件(业事成办)。卷下为解义分,下分愿偈大意、起观生信、观行体相、净入愿心、善巧摄化、离菩提障、顺菩提门、名义摄对、愿事成就、利行满足等十科,对世亲作的长行作了归纳和解释,强调以阿弥陀佛为增上缘,即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的第十一大愿、第十八大愿、第二十三大愿为依靠,修行往生,自利利他。

有关《往生论注》的注疏有:日本良空《无量寿经论注记》五卷。

三、《安乐集》二卷。唐代道绰撰,约成于唐贞观(627—649)初年。道绰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七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阐述净土宗要义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二大门。每一大门之下又分若干番料简(意为分别,即若干小节),总计三十八番料简。广引经论,劝信净土,并自设问答,对有关净土往生的各种疑问作了解答。所述的主要教理有:秽净二土(秽土与净土)、难易二道(难行道与易行道)、自他二力(自力与他力)、圣净二门(圣道门与净土门)等,其中以圣净二门为其核心思想。作者认为,大乘圣教所说的修行法门,归纳起来不出二门:一是圣道门,指唯依自力,研习经教,修学证理,由凡入圣;二是净土门,指既靠自力(称名念佛),也靠他力(阿弥陀佛在众生命终时前去接引),修持净业,往生净土。在末法时代(释迦牟尼逝世以后佛法衰落的时代),按圣道门去修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原因有二:一是距离佛陀之世遥远,无从求教;二是佛经义理深奥,证解不易。而依净土门去修行,则简便易行。即使是一生做尽坏事的人,只要他能经常念



佛,或者仅仅在临终前念十遍“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消除一切罪业,往生弥陀净土,更何况是不做坏事的人。道绰的这一思想不仅对唐代及后世净土宗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净土宗的主要教说。

有关《安乐集》的注疏有:日本圆谛《纂释》二卷、法海《庚宣记》六卷、知空《钥闻》七卷、敬恩《唯净记》十卷、廓莹《开关记》五卷、木阿《要解》二卷、空慧《扶轮》五卷、慧然《讲录》六卷等三十七种(见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

四、《观无量寿经疏》又名《观无量寿佛经疏》、《观经疏》、《观经四帖疏》(“帖”意为卷)、《四帖疏》,四卷。唐代善导撰,约成于唐贞观十九年(645)至永隆二年(681)之间。善导的生平事迹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七《会通传》附,唐文谔、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北宋戒珠《净土往生传》卷中等。北宋王古《新修净土往生传》(相对戒珠之书而称“新修”)卷中、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二十八,在《善导传》之外,另列《善道传》,两人既同代又同师(均为道绰的弟子)。据学者考证,善导、善道当为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写法,实际上并无两个善导(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中华书局1982年8月版)。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七册)本等。

本书为刘宋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一卷的注释。善导的著作共有五部九卷,除本书以外,尚有《往生礼赞偈》一卷、《净土法事赞》二卷、《般舟赞》一卷、《观念法门》一卷。后世净土宗人将本书称为《本疏》或“教相分”、“安心分”,而将另外四部五卷称为《具疏》或“行仪分”、“起行分”。本书分为玄义分、序分义、定善义、散善义四部分,每一部分各为一卷。玄义分,下分七门料简,对《观经》的宗旨作了论述;序分义,将《观经》分为序分、正宗分、得益分、流通分(附阿难为大众复述)四分,并对序分的内容作了解释;定善分,



解释《观经》正宗分所述十六观的前十三观(始日观,终杂想观);散善分,解释《观经》正宗分所述十六观的后三观(上辈观、中辈观、下辈观),以及《观经》得益分、流通分的文义。有关《观经》的注疏不少,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北周慧远的《观无量寿经义疏》二卷、隋代智颢的《观无量寿佛经疏》一卷、吉藏的《观无量寿经义疏》一卷。但慧远、智颢、吉藏都是基于圣道门的立场来注释《观经》的,而善导则是基于净土门的立场来注疏《观经》的,故本书对前代诸师的解释多有纠正,并对净土法门的正义(包括教相、教义)作了全面的论述(日本佛教界因此而称之为《楷定疏》、《证定疏》)。关于《观经》的宗旨,慧远以观佛三昧为宗,智颢以心观为宗,吉藏以劝物修因往生为宗,而本书则以观佛三昧、念佛三昧为宗(即“一经两宗”说);关于《观经》的基本内容“十六观”,慧远等认为属于“定善”(以息虑凝心的禅定修习的善业),而本书则以十六观中的前十三观为“定善”,后三观为“散善”(以去恶修善的散心修习的善业);关于《观经》所说阿弥陀佛及其净土的性质,慧远、吉藏认为是应身应土,智颢认为是应身同居土,而本书则认为是报身报土;关于《观经》所说往生净土的“九品”(九种等级,分上、中、下三品,每一品又分上、中、下,合计为九品),慧远认为,上三品为大乘之机,中三品为小乘之机,下三品为大乘始学凡夫之机(过去修习大乘,而后犯下种种罪业的人),而本书则认为九品皆为凡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将往生净土的行业分为正行和杂行两类。正行为依据净土宗三经一论(净土门)而修的行业,下分读诵正行、观察正行、礼拜正行、称名正行、赞叹供养正行五种,合称“五正行”。其中,称名正行为“正业”,读诵、观察、礼拜、赞叹供养正行为助业;杂行为依据其他经教(圣道门)而修的行业,下分读诵杂行、观察杂行、礼拜杂行、称名杂行(称念阿弥陀佛以外的其他佛、菩萨的名号)、赞叹供养杂行五种,合称“五杂行”。正行与“十



六观”中的前十三观所说的“定善”相应，杂行与后三观所说的“散善”相应。本书强调，一切善恶凡夫只要以称名念佛为正业，读诵、观察、礼拜、赞叹供养为助业，就能够凭藉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善导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日本净土宗就是以善导的这些思想为基础创立的。

有关《观无量寿经疏》的注疏有：日本隆宽《散善义问答》、幸西《玄义分抄》等。

五、《净土论》 又名《迦才净土论》，三卷。唐代迦才撰。迦才为唐初长安弘法寺僧人，生平事迹不详。从本书记有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之事，而新罗元晓(617—686)在中年所著的《游心安乐道》(今存，一卷)中引有本书的论述来推断，约成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至弘道元年(683)之间，即唐太宗、高宗时期。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七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用问答体写成的论述净土教义的著作。作者在自序中说，因道绰的《安乐集》“文义参杂，章品混淆”，致使读者踌躇未决，因而“搜检群籍，备引道理”，撰写了本论。但迦才的主要思想仍然是与《安乐集》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依据《安乐集》而来的，但在表述上则更具条理性与鲜明性，同时也夹有根据唯识学和如来藏思想而展开的一些新见解。全书分为九章：定土体性、定往生人、定往生因、出道理、引圣教为证、引现得往生人相貌、将西方兜率相对较量优劣、明教与时节、教人欣厌劝进其心。对西方净土(弥陀净土)的性质；往生的根机；往生的通因(发菩提心、修三福净业)与别因(念名号、礼拜、赞叹、发愿、观察、回向)；念佛往生的方法(临终十念和七日念佛法)；凡夫往生的教证(经典上的依据)；僧俗二十人的往生事迹；西方净土与兜率净土(弥勒净土)的优劣；忏悔念佛的时机；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行门(修行实践)等，作了具体的论述。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评价说：“此书载唐初净土宗说



教及净土诸大师之史料颇详,甚可重视。”(中华书局 1982 年 8 月版)

有关本书的注疏,有日本知俊《余晖钞》五卷。

六、《释净土群疑论》 又名《净土群疑论》、《群疑论》、《决疑论》,七卷。唐代怀感撰。据唐代孟铣《序》说,本书在怀感在世时未及脱稿,乃是同门怀恽补修完成的。从怀恽的活动年代来看,本书约成于武则天永昌元年(689)至大足元年(701)之间。怀感的生平事迹见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六,怀恽的生平事迹见思庄等撰的《隆闡(怀恽)大法师碑铭》(见《金石萃编》卷八十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七册)本等。

本书也是一部用问答体写成的论述净土教义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二编,总计一百十六章,对陈隋以来摄论学派、三阶教、唯识宗对弥陀净土的质难,北周慧远、隋代智颢、唐代吉藏虽然研究净土宗经典,但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与善导一派有所不同等问题作了辨答,进而阐明了包括弥陀身土、往生行因等在内的净土宗要义。由于作者初奉唯识学,后依善导而修净土,故书中对唯识学与净土教之间的歧异多有调解。据日本净土宗相传,怀感所述的净土义与其师善导比较,有“十五同十三异”。

有关本书的注疏,有:日本道忠《探要记》十四卷、良遍《科》一卷、湛慧《考》六卷、宣明《口义》四卷、惠然《摄要义》四卷等。

七、《龙舒增广净土文》 原名《龙舒净土文》,十卷,后人补续了二卷,改为今名。南宋王日休撰,成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王日休(号龙舒居士)的生平事迹见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二十八。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七册)本等。

本书为净土往生类文献及修行者事迹的辑编。其中,前十卷为王日休原编。内容分别是:卷一,净土起信,凡九篇。卷二,净土总要,凡七篇。卷三,普劝修持,凡九篇。卷四,修持法门,凡十五



篇。卷五,感应事迹,凡三十篇。卷六,特为劝喻,凡三十七篇。卷七,指迷归要,凡七篇。卷八,现世感应,凡十八篇。卷九,助修上品,凡十六篇。卷十,净浊如一,凡十篇。各卷之首有作者叙述的大意,尔后为文述或事迹的分篇辑录。末二卷为后人增补。内容为:卷十一,《天台智者大师劝修行人专修净土》等七篇。卷十二,附录,收《狮子峰如如颜丙劝修净业文》等九篇。本书作为南宋居士佛教的代表作之一,曾在当时及以后各代产生了持续性的重大影响。

八、《乐邦文类》 五卷。南宋宗晓撰,成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宗晓的生平事迹见《佛祖统纪》卷十八。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七册)本等。

本书为净土宗文献的类编。卷一,收经(《法华经》等经中有关净土的论述)四十六处、咒(《无量寿修观行供养仪轨》等密咒中有关净土的咒语)十道、论(《无量寿经论》等论中有关净土的论述)六处。卷二,收序跋(庐山法师慧远《念佛三昧诗序》等)三十二家、文(东晋逸士刘遗民《庐山白莲社誓文》等)十三家、赞(翰林李白《金银泥画净土变相赞》等)十七首。卷三,收记碑(礼部柳子厚《龙兴寺修净土院记》等)十九首、传(《天竺五通菩萨请佛传》等)十四篇。卷四,收杂文(天台智者大师《维摩经疏示四种佛国》等)三十三首。卷五,收赋铭(智觉禅师延寿《神栖安养赋》、慈云忏主遵式《日观铭并序》)各一家、偈(东坡居士苏轼《画阿弥陀佛像偈并序》等)六家、颂(慈云忏主遵式《十六观经颂》等)二十家、诗(晋康乐谢灵运《净土咏》等)二十二家、词(给事凭楫《和渊明归去来兮》等)七家。

有关《乐邦文类》的续编,有宗晓《乐邦遗稿》二卷。

九、《庐山莲宗宝鉴》 又名《莲宗宝鉴》、《庐山莲宗宝鉴念佛正因》、《念佛宝鉴》,十卷。元代普度撰,成于元大德九年(1305)。普度的生平事迹见清彭希涑《净土圣贤录》卷四。通行本有《大正



藏》(第四十七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阐述宋元白莲宗(净土宗支派)正统思想的著作。南宋绍兴(1131—1162)初年,吴郡延祥院子元(俗姓茅,故又称茅子元)因仰慕东晋庐山慧远的遗风,乃劝导士庶,同修净业。其主旨是归依三宝,受持五戒,素食为生,常念弥陀。倡导以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净五根,得五力,出五浊。并且撮集大藏要言而成《莲宗晨朝忏仪》,代法界众生礼佛忏悔,祈得往生。以后,子元又在平江淀山湖(今上海青浦县境内)建立了莲宗忏堂,自号“白莲导师”,率四众弟子(称“白莲菜人”)修十六观门,并作《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证道歌》、《西行集》等,申述白莲教义。被诬以“事魔”之罪,流配江州(今江西九江市),至乾道二年(1166),才获释返回。孝宗赐以“慈照宗主”之号,允许他公开传教。子元卒后,弟子小茅闾梨继承其位,白莲宗的势力迅速扩大,影响遍及江南一带。在流传过程中,小茅闾梨所倡导的白莲教义及其行法也日益显示出偏离子元原教的倾向,故在南宋末年,就被正统的佛教人士视为“邪教”(见南宋宗鉴《释门正统》卷四、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六)。入元以后,白莲教连同其他民间宗教一起遭到了朝廷的禁断。为阐明子元倡导的白莲宗的真义,破斥当时流行的托名白莲教的种种邪说邪行,时居庐山东林寺(当年慧远的居住寺)的普度(字优昙),撰写了《莲宗宝鉴》一书,并于至大元年(1308),将本书进呈朝廷。皇庆元年(1312),仁宗下诏允许复兴白莲宗,并封普度为白莲教主,赐号“虎溪尊者”(后世称普度为“优昙宗主”),《莲宗宝鉴》也因此获准行布天下。

本书卷一,念佛正因,下分十四章。卷二,念佛正教,下分十九章。卷三,念佛正宗,下分八章。卷四,念佛正派,下分二十二章。卷五,念佛正信,下分六章。卷六,念佛正行,下分十四章。卷七,念佛正愿,下分七章。卷八,念佛往生正诀,下分十二章。卷九,念



佛正报,下分五章。卷十,念佛正论,下分二十五章。每卷的第一章均为总说,如念佛正因说、念佛正教说、念佛正宗说等等,以下诸章或摘录净土文论,或略叙古德行状。其中卷十诸章,着重破斥了被视为背离白莲宗真义的各种异说。它是研究宋元净土宗思想的重要资料。

十、《西方合论》十卷。明代袁宏道撰,成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的生平事迹见清彭绍升《居士传》卷四十六、《明史》卷二百八十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七册)本等。

本书是一部以五代时永明延寿(法眼宗三祖、净土宗六祖)等主张的禅净双修说为依据,排释当时禅宗、儒家人士对净土法门的非难,进而阐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旨的著作。全书分为十门:(一)刹土门。下分毗卢遮那净土等十章。(二)缘起门。下分一大事等十章。(三)部类门。下分经中之经等四章。(四)教相门。下分纯有教等六章。(五)理谛门。下分即相即心门等四章。(六)称性门。下分信心行等五章。(七)往生门。下分菩萨生人中者等六章。(八)见网门。下分断灭堕等十章。(九)修持门。下分净悟门等十章。(十)释异门。下分刹土远近释等十章。

有关《西方合论》的注疏有:明代明教《西方合论标注》四卷。

第十节 密宗教典

密宗,又称瑜伽密宗、密教,因以大日如来(又称摩訶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为至高无上的本尊(供奉的对象),主张修持三密(身密、口密、意密),即身成佛而得名。据唐代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记载,密宗中金刚界教法的传承是:大日如来—普贤—妙吉祥(即文殊)—(经十二代传)龙猛—(经数百年传)龙智—金



刚智—(入华后传)不空(并一行、善无畏等)—惠果—(日本)空海。胎藏界教法的传承是:大日如来—金刚手—(经数百年传)达磨庵多—善无畏—(入华后传)玄超(并一行、金刚智等)—惠果—(日本)空海。空海回国后创立了日本真言宗。北宋以后,密宗在汉地已成绝响,但在日本,其法脉延绵至今。

密宗的主要教理是:三密加持,即身成佛。密宗认为,无论是佛还是众生,都是由地、水、火、风、空、识这“六大”(六种因缘条件)聚合而成的,因此,佛与众生的本体(或称体性)是同一的。佛和众生都具有身、口、意“三业”(三种表征与作用),但佛的三业表现为身密、口密、意密“三密”,它是清净的、秘密的,遍满宇宙而又赅通万有的,而众生的三业则是不净的、有局限性的。众生只要在密宗阿闍梨的指导下,受灌顶,入坛场,修持密法,就能藉手印的功德力,清净自己的身业,并使它与佛的身密相应(瑜伽);藉持咒的功德力,清净自己的口业,并使它与佛的口密(又称语密)相应;藉观想本尊的功德力,清净自己的意业,并使它与佛的意密相应(以上合称三密瑜伽)。这样,佛的三密就会降临并作用于修行者的三业(三密加持),使修行者的三业转化为佛的三密,即此肉身而成为如来(即身成佛),并因此而具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功能(如息灾、增益、降伏、敬爱、钩召等)。

密宗的主要教典是《大日经疏》。

《大日经疏》,又名《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二十卷。唐代一行撰,成于唐开元十三年(725)至十五年(727)之间。一行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五、《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三十九册)本等。

本书为《大日经》的注疏。《大日经》共七卷三十六品,其中前六卷三十一品(始《入真言门住心品》,终《嘱累品》)为本经,是唐代善无畏根据无行在北天竺获得的梵本于开元十二年(724)翻译的;



末一卷五品(《真言行学处品》、《增益守护清净行品》、《供养仪式品》、《持诵法则品》、《真言事业品》)原为题为《大毗卢遮那佛说要略念诵经》(又名《大毗卢遮那供养次第法》)的单品经,是善无畏根据自己在天竺获得的梵本于开元十三年(725)翻译的。一些年后,密宗传人将两本合作一本,传抄于世。作为《大日经》前七卷的注疏,是一行撰的《大日经疏》七卷(后抄成十四卷、二十卷);作为末一卷的注疏,是新罗入唐求法僧不可思议撰的《大毗卢遮那供养次第法疏》二卷。《大日经疏》相传是善无畏在译出《大日经》以后,应诸方之请作讲解,由一行笔录整理而成的。实际上是一行根据善无畏对《大日经》梵文原典(而非汉译本)的讲说,并加以自己的理解组织的。由于疏中所引的《大日经》本文出于尚未勘定的梵文原典,故大多与传今的《大日经》汉译本不同。所标的“阿闍梨言”,指的是善无畏的解释;私谓、今谓,指的是一行的看法。疏中对《大日经》各品的义理进行了阐释,内容包括密宗的基本教义、各种仪轨、行法(事相)等。所引除密典以外,还有《大品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大智度论》、《中论》、《璎珞经》、《无尽意经》、《大般涅槃经》、《佛性论》等显教经论。为《大日经》研究中最具权威的指南书。

有关《大日经疏》的注疏在日本有一百几十种,其中有:道范《大疏遍明钞》二十一卷、赖瑜《大疏指心钞》十六卷、杲宝《大疏钞》二十九卷、宥快《大疏钞》八十五卷、宥祥《大疏义述》三十一卷、信日《大疏勘文》三十卷等。

有关《大日经疏》的再治本,有唐智俨、温古整理的《大日经义释》十四卷。对《义释》作释的,有辽代觉苑《大日经义释浪秘钞》十卷、日本仁空《大日经义释搜决钞》十二卷。



第十一节 藏传佛教宗派教典

西藏佛教以公元 841 年藏王朗达玛(838—842)灭佛为界,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从时间上来讲,前弘期在唐代,后弘期在宋、元、明、清时代,前弘期与后弘期之间有一百三十七年(另说七十年、一百零八年)的佛教中断期,其时在唐末五代。藏传佛教宗派便是在后弘期形成的。

清代土观在《土观宗派源流》中,将藏传佛教宗派分为别宗和正宗两系。别宗,指的是创立于后弘期初叶(时间相当于北宋,个别小派成立于元代)的一些宗派。据书中所列有:一、宁玛派。二、噶当派。三、噶举派。四、希解派。五、萨嘉派。六、觉朗派。七、几类零散流派。但希解派(包括它的旁支“觉域派”)、觉朗派,以及“几类零散流派”中提到的博东派、霞鲁(又译夏鲁)派、洛扎派,都是一些小派。别宗中真正称得上大派的,只有宁玛、噶当、噶举、萨嘉四派;正宗,指的是创立于明初,以后成为藏传佛教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派——格鲁派。

一、宁玛派 “宁玛”意为“旧”,此派因相传由前弘期莲花生等传出,并以弘传前弘期译出的旧密咒为主而得名。但实际上,此派在前弘期并无自己的传承法系、寺庙、僧伽组织以及有系统的教义。一直到北宋年间,素尔家族中的“三素尔”,即素尔波且(又译素薄旦·释迦生、索波齐·释迦迥乃,1002—1062)和他的养子素尔穹喜饶扎巴(又译素穹·协饶扎、素穹慧称,1014—1074)、孙子濯浦巴(又译卓朴巴释迦狮子、卓浦巴·释迦僧格,1074—1134)建立寺庙,进行有组织的传教活动,才真正形成所说的宁玛派。宁玛派的主要教理是“九乘”说和“大圆满法”。“九乘”说类似内地佛教所说



的“判教”，指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以上合称“共三乘”，为显密二教共习的教说，化身佛释迦牟尼所说）、作密、行密、瑜伽密（以上合称“外密乘”，相当于密教中的事部、行部、瑜伽部，为报身佛金刚萨埵垂长所说）、大瑜伽密、无比瑜伽密、无上瑜伽密（以上又称生起大瑜伽、教敕无比瑜伽、大圆满无上瑜伽，合称“内密乘”，相当于密教中的无上瑜伽部，为法身佛普贤所说）。而“大圆满法”就是九乘中的最后一乘“无上瑜伽密”的修持法门，包括：心部、界部（又称自在部、陇部）、教授部（又称要门），主张心体本纯，只要离俗脱尘，任意自在，安于虚静，即可成佛。

宁玛派依据的根本经典为十八部密典。它们是：《大圆满菩提心遍作王》、《金刚庄严续教密意集》、《一切如来大密藏猛电轮续》、《一切如来遍集明经瑜伽成就续》、《胜密藏决定》、《释说幻网密镜》、《决定秘密真实性》、《圣方便罽索莲花鬘》、《幻网天女续》、《秘密藏续》、《文殊轮秘密续》、《后续》、《胜马游戏续》、《大悲游戏续》、《甘露》、《空行母焰燃续》、《猛咒集金刚根本续》、《世间供赞修行根本续》（见《中国佛教》第一辑）。这些经典名称之末的“续”字，并非正是集、续集的“续”的意思，而是“坦特罗”的意译，为密教经典的一个标志。

二、噶当派 又称迦当派、噶丹派，“噶当”意为“佛语教授”或“依如来言教而修行”。此派由阿底峡（约982—1054）创立，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建立宗规，仲敦巴的三大弟子博多瓦（1031—1105）、京俄瓦（1038—1103）、普穹瓦（1031—1106）发扬光大。它的主要教理是以阿底峡在《菩提道灯论》（又名《菩提道炬论》）中提出的“三士道”（又称三士教，指修人天乘的下士道、修声闻乘和缘觉乘的中士道、修菩萨乘的上士道）统摄经律论一切教说，主张显密同修，反对轻视显教、弃而不习的做法。下分教典、教授、教诫（又称要门）三派。教典派和教授派均根据“重在明见（正见）”、“重在明行（修



行)”和“重在见行并重”三项对大乘经典及阿底峡的著述进行分类,并据此立说;教诫派则倡导念师长为皈依、念自身为本尊、念语言为诵咒、念众生为父母、念心性为本空的“五念”法门,以及“十六明点”的修法。

噶当派依据的主要经典有七部。它们是:《大乘庄严经论》、《菩萨地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又名《集学论》)、《入菩提行论》(汉译本名为《菩提行经》)、《本生鬘论》(又名《本生论》)、《集法句经》(又名《法句集》)、《菩提道灯论》,合称“噶当七论”。

三、噶举派 又称迦举派,“噶举”意为“语传”或“教敕传承”。此派分为香巴噶举(又称响巴迦举,香巴为地名)和达布噶举(又称塔波迦举,达布为人名)二大系。香巴噶举由琼波(约990—1140)创立,传至十五世纪中、后叶而绝传。达布噶举由玛巴(又译玛尔巴,1012—1097)译师传出,他的再传弟子达布拉结(又译塔波拉结、达薄拉结,1079—1153)实际创立,其后形成九派:噶玛噶举(下分黑帽系和红帽系二支)、帕竹噶举、蔡巴噶举、止贡噶举、主巴噶举、达隆噶举、鲍戎噶举、亚桑噶举、超浦噶举,法嗣延绵不绝。后世所说的噶举派都是指由达布拉结实际创立的达布噶举而言的。噶举派在黄教兴起以前,是西藏地区支派最多、传布最广的一大宗派。元末、明代,它曾取代萨嘉派而执掌地方政权。此派依据的主要经典为无上瑜伽部中的《胜乐》、《欢喜金刚》、《大幻》、《集密》、《四座》、《怖畏金刚》等,主要修法为“大手印”法门。

四、萨嘉派 又称萨迦派,“萨迦”为寺名,意为“白土”。此派由卓弥(994—1078)译师传出,他的弟子贡乔杰波(又译衮乔杰布,1034—1101)实际创立。此派在元代的地位十分显赫,八思巴(又译发思巴,1239—1280)、胆巴(?—1303)、沙罗巴(1259—1314)、达益巴(1246—1318)曾被朝廷封为帝师、释教总统、国师等,执掌全



藏的政教大权达八十余年之久。萨嘉派主张显密融通,它既修习密乘中的欢喜金刚二次第道及其支分,也研究显教大乘中的中观派教典、因明学著作等,主要教理为“道果法”,即通过除恶修善,断除执著,体悟性空(一切皆空)以获得解脱之果。主要著述有萨班贡噶坚赞(萨嘉五祖中的第四祖,1182—1251)所著的《三律仪论》、《正理藏论》、《善说宝藏》(又名《萨嘉格言》)等。

五、格鲁派 又称格丹派、甘丹派、新噶当派、黄教。此派由宗喀巴(1357—1419)创立,因祖庭是宗喀巴于明永乐七年(1409)建立的甘丹寺(位于拉萨东北的达孜县境内)而得名,“格鲁”为“甘丹”的转音。又因宗喀巴头戴桃形尖顶的黄色僧帽,象征恪守戒律。他的弟子及后世传人也都头戴黄帽,故格鲁派又称“黄帽派”,通常称之为“黄教”。宗喀巴逝世以后,他的弟子贾曹杰(1364—1432)继任甘丹寺的“墀巴”(意为法台、座主,相当于汉地寺庙中的方丈),后被认定为第一世班禅。另一个大弟子根敦主巴(1391—1474)在格鲁派的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之外,又在日喀则的尼色日山下创建了扎什伦布寺,后被认定为第一世达赖喇嘛,从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

格鲁派的教义是宗喀巴在总摄经律论“三藏”、戒定慧“三学”、显密“二教”要义,博采藏传佛教各派,特别是噶当派之长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融会显教大乘中观应成派(弘传龙树学说的月称一派)的般若性空说,和密教无上瑜伽部修法的特点。其主要教理有:

(一)菩提道修行次第说 “菩提道”为断除一切世俗烦恼,证得涅槃妙乐的“智慧”之道。它是显教修行者和密教修行者必须经行的“共同道”。菩提道以离开增益(有)、损减(无)二边的“清净见”(又称中道正见、中道见)为根本。格鲁派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名”和“分别”加以确立的。从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得的、



“空”的；从事物生起的条件和引出的结果来说，是能够辨别的、“有”的。但自性空不等于“毕竟无”，不是说一切皆无，连善恶因果也不存在；缘起有也不等于“实有”，不是说所见所闻的事物（包括有关的条件、结果）是真实的。而是说事物是由“自性空”和“缘起有”两个方面组成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由于自性空，才依缘起有；因是缘起有，所以自性空。因此，修“清净见”实际上是修“般若空观”、“空观”。其方法是先通过对“我”（生死轮回的主体）与“五蕴”（构成生命体的五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的关系的辨析，通达“人空”。进而观察“五蕴”也同样是空而无自性的，通达“法空”。在修空的时候，要把止息一切与外部事物发生联系的意念，将心住于静态的“止住修”（音译奢摩他，略称止），与观察思维一切事物空无自性，将心置于动态的“观察修”（音译毗钵舍那）配合起来，同时修习。任何只修“观”不修“止”，或只修“止”不修“观”的做法都是偏面的，不会成功的。

（二）秘密道修行次第说 “秘密道”是在修习“菩提道”的基础上，进一步修学四部（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密法的“密乘”之道。它以依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合称二种次第）修习，使具有上品根机的人速疾成佛，中品、下品根机的人都能得到“悉地”（意为“成就”，指各种有灵验的应证）的“现证所修之果”法为究竟。所说的“生起次第”，又名“施設次第”，指通过观想本尊（密教曼荼罗中的佛菩萨）的“种子”（表征字母）和标帜（形相），以及日、月轮，使修行者进入“我身即本尊”的施設境界。“圆满次第”，又名“非施設次第”，指在“生起次第”的基础上，进一步修习气、脉、明点（光明之点），证得空性和佛身。

格鲁派的根本经典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

（一）《菩提道次第广论》 又名《菩提道次第论》，二十四卷。明代宗喀巴著，成于明建文四年（1402）。现代僧人法尊于1935年



译出。通行本有金陵刻经处影印本等。本书是以阿底峡《菩提道灯论》(又名《菩提道炬论》)中所说的“三士道”为依据,叙述菩提道修行次第的著作。所说的“三士道”,指的是:1. 下士道。此为入天教。指不为今世的生活而感到安乐,希求在死以后,能转生美满的来世(人或天神)的“下士”所修的教法。2. 中士道。此为小乘中的声闻教和缘觉教。指厌离三界苦海,希求通过修习戒定慧三学,使自己获得解脱的“中士”所修的教法。3. 上士道。此为大乘教,包括波罗蜜大乘(显教)和密咒大乘(密教)。指发菩提心,以救拔一切有情众生同出苦海,证得涅槃为己任的“上士”所修的教法。在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中,“三士道”主要是针对三种不同根机的人而说的三种教法(或称法门);而在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中,“三士道”则为一个人在修学佛法时必须经行的三个阶次。

本书卷一至卷三前部分为序说,主要叙述阿底峡的生平事迹和《菩提道灯论》的殊胜,修习“三士道”之前的预备阶段的修行(亲近善士,思惟人身难得等),以及“三士道”的名义。卷三后部分至卷二十四前部分为“三士道”。卷二十四后部分为结束语,主要叙述“上士”在学菩萨行,修止观二法,证得理智之后,当进一步修习密法(金刚乘)。全书的论述重点是“三士道”。其中,下士道包括:念死无常,三恶趣(地狱、饿鬼、畜生)苦,皈依三宝(佛、法、僧),深信业果(善恶报应)。中士道包括:希求解脱,思惟苦谛(八苦、六苦、三苦等),思惟集谛(烦恼产生的次第、原因和过患),十二缘起(即十二因缘),除邪分别(关于“不应厌离生死”义的理解),解脱正道。上士道包括:入大乘门,菩提心次第,仪轨受法,学菩萨行,六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奢摩他(止),毗钵舍那(观)。

《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略本名《菩提道次第略论》,六卷。也是宗喀巴所著,成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现代僧人法尊于1932年



译出。通行本有上海佛学书局影印本等。《略论》的基本内容和叙述层次与《广论》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删去了《广略》中众多的引文、辨析,叙义较为简洁。它和《广论》具有同等的权威性。

(二)《密宗道次第广论》又名《密宗道次第论》,二十二卷。明代宗喀巴著,成于明永乐二年(1404)。现代僧人法尊于1939年译出。通行本有上海佛学书局影印本等。本书是一部以密教经论为主要依据(起首部分也引用了众多的显教经论),叙述密教修行次第的著作。全书科分极细,共有二十多个层次,汉译本将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全部用上去,以表示章节,仍还不够。大体说来,卷一至卷二前部分为序说。主要是说,佛教是解脱之道;佛教分为小乘和大乘;大乘分为波罗蜜多乘(又称因乘)和金刚乘(又称果乘、密咒乘、持明藏、续部)。卷二后部分至卷二十二终均为金刚乘详说,叙述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密法的修行次第,其中以无上瑜伽部修行次第(无上瑜伽部次第)为最详悉,占的篇幅也最多(卷六后部分至卷二十二终)。所说的“无上瑜伽部道次第”包括:成就修道法器、净三昧耶律仪、住彼如何修道、现证所修之果四个方面。在“成就修道法器”中,着重叙述了举行灌顶的仪轨次第;在“净三昧耶律仪”中,略陈了守护三昧耶律仪的重要性;在“住彼如何修道”中,详析了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名义和修行方法;在“现证所修之果”中,强调修习波罗蜜乘须经无数大劫方能成佛,只有修习无上瑜伽部密法,才能即身成佛。

因此,宗喀巴虽然显密同弘,但他的学说的归结点仍然是密教。显教只是通向无上瑜伽部密法的初阶而已。

对于藏传佛教各派的修持法门,南怀瑾《大圆满禅定休息清净车解前叙》曾作了以下的概括:“大概而言,红教(指宁玛派)以大圆满、喜金刚为传法之重心。白教(噶举派)以大手印、六成就法、亥



母修法为传法之重心。花教(指萨迦派)以大圆胜慧、莲师十六成就法为传法之重心。黄教(指格鲁派)以大威德、时轮金刚、中观正见与止观修法为传法之重心。”(载于《中国文化泛言》，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 1992 年 1 月版)

第七章 中国佛教文史类典籍

中国佛教文史类典籍,指的是以记叙中国佛教的宗派、人物、教理、典制、译述、寺塔、事件、术语(名相),以及中外交往、释儒道三教关系等为主的一类典籍,概而言之,即是以记叙中国佛教的史迹及相关事项为主的典籍。它的起源同样可以追溯到先前已经介绍过的东汉末年牟子所作的《理惑论》。《理惑论》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人士对佛教的非议而作的,具有护教性质,因此属于“护法类”(也称护教类)著作,而护法类著作乃是佛教文史类典籍中的一个门类。

中国佛教文史类典籍,以往习称为“中国佛教史籍”。而社会上一般图书中的史籍,按清代《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合计十五大类。一些大类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如“传记类”中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地理类”中又分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政书类”中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中又分经籍、金石等等。以此作参照,中国佛教撰述中除章疏论著以外的多数典籍,确实可以归于史籍之类,称之为“中国佛教史籍”也未尚不可。

不过,也有些佛教撰述,其性质相当于《四库全书》经部中的



“小学类”典籍(训诂、字书、韵书);子部中的“杂家类”典籍(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和“小说家类”典籍(杂事、异闻、琐语);集部中的“别集类”典籍和“总集类”典籍,因此,如果将它们通称为“史籍”,显然已跨大类。为此,笔者将佛教史籍连同上述撰述,合称为“中国佛教文史类典籍”,意谓中国佛教历史文化类典籍。笔者撰的《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第一版)就是这一类典籍的总汇和解析。

以下分为经录、教史、传记、宗系、纂集、护法、地志、杂记八大类,择要予以介绍。

第一节 经 录

经录,全称佛经目录,又称众经目录、一切经目录,指的是用来记载佛典的名称、卷帙、译撰者和有关事项的一类佛教典籍。内容包括:佛典的名目部卷,译撰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著录状况,繁略异同,存佚,伪妄,经旨大意,以及有关的表、诏、序、记等。

佛经目录的种类很多。有单记一人译经的译经录;有校录一寺藏经的寺藏录;有偏录一个地区流传的佛经的区域经录;有专录一个朝代译经或绍绪先前某一部佛经目录的断代录;有汇载历代译经和著述的通录;有连缀历代佛经翻译家小传而成的图纪;有作为诵持和抄写正本的人藏录;有叙列入藏录子目卷次的产品历章;有排比汉藏文佛典的对勘目录;有撮举佛典大意的解题目录;有叙列求法所获经本的求法目录;有作雕印大藏经之用的版本目录;有汇集某一佛教宗派典籍的教典目录;还有作为官私藏书目录一部分的释氏类书目等等。佛教经录类著作网罗众经,剖析源流,使佛典有据,治学有径,是佛教目录学的主要资料。



佛经目录产生于西晋。自此以后,迄至现代,先后出现了近百种佛经目录(包括日本、高丽编纂的汉文佛经目录和解题著作),有些已佚,有些见存。在见存者中,比较重要的有:《出三藏记集》、《众经目录》、《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大藏圣教法华标目》、《大明释教汇目义门》、《阅藏知津》等。

一、《出三藏记集》 又名《出三藏集记》、《三藏集记》、《出三藏记》,简称《僧祐录》、《祐录》,十五卷。梁代僧祐撰,约成于天监九年(510)至天监十三年(514)之间。僧祐的生平事迹见《高僧传》卷十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五册)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苏晋仁点校本等。本书是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全书共收佛典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撰缘起(卷一)。记叙天竺(印度)结集经律论“三藏”的经过,以及汉地传译佛典的初况,尤其是对一些佛教名词术语所作的前后不同的翻译。包括:集三藏缘起(出《大智度论》);《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菩萨处胎经》出八藏记;胡汉译经音义(又作文字音义)同异记;前后出经异记。凡五项。(二)诠名录(卷二至卷五)。叙列东汉至梁代翻译佛经和述作的名称、卷数、译撰者、译时、同异、存佚、真伪等情况。卷二:新集经论录(又作《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新集异出经录(又作《新集条解异出经录》);新集表序四部律录(有目无文,疑与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录》相差无几),凡三录。卷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出《毗婆沙》);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新集律来汉地四部序(又作记)录,凡七录。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凡一录。卷五:新集抄经录;新集安公疑经录;新集疑经伪撰杂录(又作《新集疑经录》);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长安睿(慧睿)法师



《喻疑论》，凡四录二文。(三)总经序(卷六至卷十二)。集录汉地僧俗为汉译佛典作的前序及后记一百二十篇。(四)述列传(卷十三至卷十五)。收录后汉至南齐的僧人(以译经僧为主,兼及义解僧和求法僧)传记三十二篇。书中保存了今已失传的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的基本内容,以及大量珍希的经序、经记。

二、《众经目录》又称《法经录》，七卷。隋代法经等撰，成于开皇十四年(594)。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五册)本等。全书开为总别二录，别录六卷，总录一卷，共收佛典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一)别录(卷一至卷六)。凡九录四十二分(“分”相当于部分、项)。初六录三十六分，编录大小乘经律论。它们是：大乘修多罗(经)藏录、小乘修多罗藏录、大乘毗尼(律)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论)藏录、小乘阿毗昙藏录。每录都有六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后三录六分，编录佛灭度后西域和此方(指汉地)的抄集、传记、著述。它们是：佛灭度后撰集录、佛灭度后传记录、佛灭度后著述录。每录二分，依西域圣贤和此方诸德区分。(二)总录(卷七)。为上皇帝表(无标题)与《法经录》总目。它的主要特点是分类细致，录得得当，对疑伪经甄别极细。

三、《历代三宝记》又名《开皇三宝录》、《三宝录》，略称《长房录》、《房录》，十五卷。隋费长房撰，成于开皇十七年(597)。费长房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附。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九册)本等。本书分为四部分：(一)帝年(卷一至卷三)。上编甲子、朝代、年号，下注其间重要的政事或佛教大事。始于周庄王十年(前687)，终于隋开皇十七年(597)。现存的《房录》帝年表有列至唐己未岁的，显系后人所添。(二)代录(卷四至卷十二)，叙述后汉至隋代的译经概况。所载凡一百九十七人，所出经律论及撰集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



(三) 入藏录(卷十三至卷十四)。下分大乘录入藏目、小乘录入藏目二项。每一项又分修多罗(经)有译、失译;毗尼(律)有译、失译;阿毗昙(论)有译、失译。(四) 总目(卷十五)。有《上开皇三宝录表》、《开皇三宝录总目序》、全书总目和历代经录目录。本书的特色在于:有按历史顺序记叙的历代译经目录(代录),而且编得很有章法;首创入藏录;记录了隋代以前已佚的和见存的佛经目录的情况。

四、《大唐内典录》 简称《内典录》,十卷。唐道宣撰,成于麟德元年(664)。道宣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十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五册)本等。本书分为十录,共收录后汉至唐代的十八个朝代,翻译或撰作的佛典二千二百三十二部,七千二百卷。(一) 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卷一至卷五),记载后汉至唐各代的译经和撰述。(二) 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卷六、卷七),分别记载大乘三藏(经律论)和小乘三藏单本(一本一译)及重翻(一本数译)的译者、译时、译地和用纸数。(三) 历代众经总摄入藏录(又称《历代众经见入藏录》)(卷八),胪列大乘经单重翻、小乘经单重翻、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贤圣集传为几帙,中间、左间、右间以上第几隔。(四) 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卷九),载录在诸种重翻经中选出的善本目录。(五) 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卷十),载录阙本。(六) 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卷十),载录撰述。(七) 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卷十),载录别生经。(八) 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卷十),载录疑伪经。(九) 历代众经录目终始序(又称《历代所出众经录》)(卷十),载录经录。(十) 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卷十),载录诵持佛经的感应事迹。其中,《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所记载的东汉至隋代的传译情况,主要是根据《历代三宝记》转录的,也有一些是作者增补的。至于唐代传译情况,则全是新录的。另外,《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以译本的优劣、主次为标准,对不同译本内



容上的广略繁简、译文上的畅达艰涩进行了比较,选择善本供学人阅读,别具特色。《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是汉地佛教撰述的专录,为其他经录所无。

五、《古今译经图纪》 又名《大唐古今译经图纪》,简称《译经图纪》、《图纪》或《靖迈录》,四卷。唐靖迈撰,约成于麟德元年(664)或次年。靖迈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五册)本等。本书是为唐代长安大慈恩寺翻经院所画的历代佛经翻译家的图像所配写的题记。全书共收录后汉至唐初的译师一百十五人。除隋代达摩笈多、唐代波罗颇迦罗、玄奘三人以外,其他人物的资料均取于《历代三宝纪》。书中对人物的生平事迹着墨不多,叙说十分简略,而对他的译典则一一具列。从这点上来说,它具有经录的特征。

六、《开元释教录》 简称《开元录》,二十卷。唐智升撰,成于开元十八年(730)。智升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五。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五册)本等。本书是历代佛经目录中编得最好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为三部分:(一)总括群经录(卷一至卷十)。对汉地佛经作纵向的叙述,共收录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凡十九代六百六十四年间的佛教译撰者一百七十六人,所出佛典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四十六卷。(二)别分乘藏录(卷十一至卷十八)。对汉地佛经作横向的归类。下分七录:1. 有译有本录。收载经录上有著录或经本上署题译人(有译),并有传本行世的佛典。下分菩萨三藏录、声闻三藏录、圣贤传记录三项。底下又分子目。2. 有译无本录。收载经录上有著录(有译),但无传本行世(无本)的佛典。3. 支派别行录。收载从大部中抄出别行的“别生经”。4. 删略繁重录。收载“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不应作为汉译佛经正本的经典。5. 补阙拾遗录。收录“旧录阙题,新翻未载”的佛典。6. 疑惑再译录。收录有疑问的



佛典。7. 伪妄乱真录。收载托名伪造的佛典。(三)入藏录(卷十九、卷二十)。收载经甄别以后,确认真实无伪,可以作为诵持、抄写、收藏的正本的佛典。下分大乘入藏录和小乘入藏录二项。前者又分大乘经、大乘律、大乘论三目;后者又分小乘经、小乘律、小乘论三目,末附贤圣集传。共收录佛典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考证详悉,类例明审。书中对见录的每个译师的译籍均有一番仔细的考订。对三藏下的科目,进行了独到而又恰当的分类。如:第一次明确地以部类为次第,编载大乘经和小乘经。将大乘经区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和五大部外诸经。将小乘经区分为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杂阿含四大部和四大部外诸经(又称四阿含外诸经)。又将大乘论分为解释契经的“释经论”和论述义理的“集义论”等。这些分类法则,成为后世经录相沿的规式,影响巨大。宋代以来《大藏经》的雕印绝大多数是以本书《入藏录》所列的书目为基准进行的。

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十卷。元庆吉祥等编集,成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二十四年(1287)。通行本有日本编《法宝总目录》(第二册)本等。本书是一部综括唐代《开元录》、《续开元录》、宋代《祥符录》、《景祐录》、元代《弘法入藏录》五录的入藏经(简称藏经),拾遗增补,并在梵文佛典的汉译本之下,标注藏文译本(蕃本)的有无异同,而编成的藏经对勘目录。全书所收,“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戊辰(应为丁卯),至大元圣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一千二百一十九年。中间译经朝代历二十二代,传译之人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六卷。”(见卷一),实际见录的是一千六百四十四部,千字文帙号从“天”字排到“植”字。其中,属于本书新收的经典,分别被编在“拾遗编入”和《弘法入藏录》两项之中。



八、《大藏经纲目指要录》 简称《大藏纲目》、《指要录》，八卷（其中卷二、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各分上下卷，故又作十三卷）。北宋惟白集，成于崇宁三年（1104）。惟白的生平事迹见南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六。通行本有《法宝总目录》（第二册）本等。本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藏经》解题著作。解说的对象为《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中收录的佛典，总计为一千零五十部。卷一至卷五上前部分：大乘经。卷五上中间部分：大乘律。卷五上后部分至卷五下末：大乘论。卷六上至卷六下前部分：小乘经。卷六下后部分至卷七上前部分：小乘律。卷七上后部分至卷七下末：小乘论。卷八：圣贤传记。它的主要特点是解题详悉。无论是大部头经典还是小部头经典，无论卷数的多寡，一般都逐卷解说（内容重叠的经典除外）。

九、《大藏圣教法宝标目》 简称《法宝标目》、《标目》，十卷。北宋王古撰，成于崇宁四年（1105）。王古的生平事迹见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二十八、卷四十七。通行本有《法宝总目录》（第二册）本等。本书是唯一被编入官版《大藏经》的解题著作。全书共诠释佛典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卷一至卷九的前部分，为《开元录》入藏经的提要，卷九的后部分，为《贞元录》新编入藏经的提要。卷十为宋朝新译经及唐宋五部撰述的提要。主要特点是简明扼要，便读易晓。有些提要取材于经序、经记、注疏和论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十、《大明释教汇目义门》 简称《释教汇目义门》、《汇目义门》、《义门》，四十一卷。明寂晓集，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通行本有天津刻经处 1936 年刻本等。本书是一部以天台宗的“五时”判教说为依据，对藏经和部分藏外佛书进行分类，并予以解说的解题著作。全书共汇释经籍一千八百零一部，七千三百四十九卷。分为八大部：华严部（卷一至卷四）、阿含部（卷五至卷九）、方



等部(卷十至卷十六)、般若部(卷十七、卷十八)、法华部(卷十九、卷二十)、涅槃部(卷二十一、卷二十二)、陀罗尼部(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七)、圣贤著述(卷二十八至卷四十一)。每一大部之下又分若干子类,对见录经籍的名称、卷数、译撰者以及大意旨趣作了叙释。书中设“陀罗尼部”以统收密教经典,不立“大乘律”,用“阿含部”来统收小乘经律论,以及按宗派对汉地佛教著述进行分类,具有新意。在解题方面,节录了许多疏论、序跋、偈颂的原文。它的节略本为《大明释教汇门标目》四卷。

十一、《阅藏知津》 简称《知津》,总目四卷、正文四十四卷。明智旭撰,成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智旭的生平事迹见清成时的《灵峰宗论·八不道人传》。通行本有《法宝总目录》(第三册)本等。本书为历代《大藏经》解题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为四藏,共解说佛典一千七百九部。(一)经藏(卷一至卷三十一)。下分大乘经和小乘经。大乘经依天台宗的五时判教,分为五部: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这中间方等部又分为方等显说和方等密咒两部,方等密咒部再分为经和仪轨两项;小乘经不分部。(二)律藏(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三)。下分大乘律和小乘律。(三)论藏(卷三十四至卷四十)。下分大乘论和小乘论。大乘论分为释经论、宗经论、诸论释三类,每一类又分为西土和此方两项;小乘论不分类。(四)杂藏(卷四十一至卷四十四)。下分西土撰述和此方撰述。西土撰述不分类。此方撰述分为十五类:忏仪、净土、台宗、禅宗、贤首宗、慈恩宗、密宗、律宗、纂集、传记、护教、音义、目录、序赞诗歌、应收入藏此土撰述。近代日本刊印的《弘教藏》和我国刊印的《频伽藏》就是根据《知津》的分类法编成的。

本书在解题方面的特色有:经藏和律藏各部之首均有“述曰”,概述收录经典的主旨及范围;在经典的题名下,依明南北藏标注卷数、函号,并叙列它的译撰者;对多数经典,尤其是卷帙较多而涉阅



较少的经典,进行逐品解说,振裘挈领,开示纲要;另外,还有经本的考证,译文优劣的评判,以及经籍地位的介绍等。

第二节 教史

教史,又称佛史,全称佛教史,或佛教通史,指的是用来记叙佛教的渊源历史的一类佛教典籍。它取材宽泛,涉猎浩富。诸如印度佛教的起源,原始佛教的僧伽、寺院、戒律及教理,释迦牟尼入灭以后教法的传承,经律论三藏的结合,小乘佛教的部派,大乘佛教中的中观派、瑜伽行派和密教,佛教的对外传播与它在印度本土的盛衰、佛教入华的经过,汉地译经事业的开展,讲说著述的状况,习禅明律的事迹,历代王臣的信佛与毁佛,儒释道三教的抗衡与融合,朝廷对僧团的管理,名僧与名士的交往,寺塔的兴建,经像的雕刻,以及诵经兴福、感通神异等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它是佛教在印度、中国以及其他地区产生、发展、兴盛、演化的历史过程的抽象和缩写,是佛教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今存的佛教史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纪传体、编年体(包括纲目体)、一般记叙体。其中,纪传体佛教史均出自天台宗人之手,编年体佛教史均出自禅宗之手,一般记叙体则为藏传佛教史书所采用。其中,较为重要者有《释门正统》、《佛祖统纪》、《隆兴编年通论》、《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释氏稽古略续集》、《佛教史大宝藏论》、《印度佛教史》、《如意宝树史》等。

一、《释门正统》八卷。南宋宗鉴撰,成于嘉熙元年(1237),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三〇册)本等。本书是现存最早的纪传体佛教史,也是现存最早的天台宗史。全书共分本纪、世家、志、传、载记五大类,大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有小序冠首。(一)本纪



(卷一前部分)。下分: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世尊本纪、天台高祖龙树菩萨本纪二目。(二)世家(卷一后部分、卷二)。下分:天台祖父北齐(慧文)南岳(慧思)二尊者世家、天台教主智者灵慧大师(智顓)世家、山门结集祖师章安(灌顶)尊者世家、山门传持教观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溪(玄朗)三尊者世家、山门记主荆溪(湛然)尊者世家、山门授受邃(道邃)修(广修)外(物外)琇(元琇)竦(清竦)寂(义寂)通(义通)七祖世家、中兴教观法智(智礼)大师世家七目。(三)志(卷三、卷四)。下分:1. 身土志。叙佛的“三身”(报身、法身、应身)及其示现的世界。2. 弟子志。叙释迦牟尼入灭以后佛法的传承,以及在中国演为天台宗、贤首宗(又称华严宗)、慈恩宗(又称唯识宗、法相宗)、南山宗(又称律宗)、密宗(又称密教)、禅宗等宗派的情况。末附天台宗传法世系表,始龙树,终虚堂本空,约四百人。3. 塔庙志。叙佛塔、佛像、佛画、佛殿、善慧大士(即梁代的傅翕)的转轮藏、沙门瑞新的壶更等物的由来。4. 护法志。叙阚泽、张商英、何尚之、玄奘、赵令衿、铠庵(吴克己)等人的护法言论。5. 利生志。叙放生、施食、设水陆道场、烧纸钱等事缘。6. 顺俗志。叙忏悔、念佛往生、设盂兰盆会、打钟息苦、为亡人悬挂黄幡、持斋、放灯等事缘。7. 兴衰志。以编年的形式,记叙后汉明帝永平七年(64)至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之间有关佛教的数十则大事。8. 斥伪志。叙唐代大秦教(又称景教,基督教中的一派)、末尼教(又作摩尼教)、袄(音掀)教(又名火袄教)和宋代白莲教、白云教的流传情况。(四)传(卷五至卷八前部分)。下分:荷负扶持传、本支辉映传、扣击宗途传、中兴(知礼)一世至七世诸传、护法内传、护法外传六目。(五)载记(卷八后部分)。下分:禅宗相涉载记、贤首相涉载记、慈恩相涉载记、律宗相关载记、密宗思复载记五目。

二、《佛祖统纪》 五十四卷。南宋志磐撰,成于咸淳五年



(1269)。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九册)本等。本书是天台宗编撰的一部纪传体佛教史。全书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大类,每一类下又分若干子目。(一)本纪(卷一至卷八)。下分:释迦牟尼佛本纪、西土二十四祖纪、东土九祖纪、兴道(道邃)下八祖纪等四目,分别记叙释迦牟尼、天台宗西土二十九祖(始迦叶,终师子)、东土十七祖(始龙树,终知礼)的生平事迹。(二)世家(卷九、卷十)。下分:南岳旁出世家、智者大师旁出世家、章安旁出世家、天宫旁出世家、左溪旁出世家、荆溪旁出世家、兴道旁出世家、至行旁出世家、正定旁出世家、妙说旁出世家、高论旁出世家、净光旁出世家、宝云旁出世家等十三目,分别记叙天台宗慧思、智颚、灌顶、慧威、玄朗、湛然、道邃、广修、物外、元琇、清竦、义寂、义通等十三祖旁出法嗣(即旁传弟子)的生平事迹。(三)传(卷十一至卷二十二)。下分:诸师列传、诸师杂传、未详承嗣传三目,分别记叙天台宗山家派、山外派和未详师承的人物的生平事迹。(四)表(卷二十三、卷二十四)。下分:历代传教表、佛祖世系表二目,分别记叙梁武帝至北宋仁宗之间天台宗各祖的传教行迹,以及天台宗的师资传授系统。(五)志(卷二十五至卷五十四)。共分九志:1. 山家教典志。叙列天台宗人的著述(以“山家”派为主,兼收“山外”派)。2. 净土立教志。记净土宗人物。3. 诸宗立教志。记禅、贤首、慈恩、密、律五宗祖师或重要人物。4. 三世出兴志。记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中成、住、坏、空各劫的情况。5. 世界名体志。用图文描绘佛教所说的种种方界。6. 法门光显志。记佛教的典故和制度。7. 法运通塞志。用编年法记载中国佛教的历史。始周昭王二十六年,终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8. 名文光教志。收唐梁肃《天台禅林寺碑》等二十四篇。9. 历代会要志。分类汇编佛教故事。

本书的特点是博大精深。从史料方面而言,它征引的佛教经



律论和僧传集记有七十二种,天台宗教典二十一种,天台宗以外的佛教文述二十四种,儒家著作(包括官私修撰的史书)四十二种,道教经典二十种。从体例和内容方面而言,它兼采各种文体,纵横交错,条贯缕析,综括了南宋末年以前整个中国佛教发展的源流态势及各类人物、史事。因此,堪称为中国古代的佛教百科全书。

三、《隆兴编年通论》 简称《编年通论》、《通论》,二十九卷。南宋祖琇撰,成于隆兴二年(1164),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三〇册)本等。本书是禅宗编撰的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佛教史。全书所记佛教史事,上始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下迄五代时后周显德四年(957),凡八百九十四年。每代之首间有“叙”(通“序”),用来介绍该代兴废始末及所译经卷;所载史事之末间附“论”,以抒发作者的议论。书中博综南宋初年以前传世的各类佛教文献和史书,如僧传、经录、文集、灯录、法要、专论、序记、书翰、碑表、诏令、正史、别史等,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对东汉至五代佛教的弘传,以及其间重要的佛教人物、事件和述作等,作了历史的记述。特别是唐代部分的编年史,在正文二十八卷中独占十八卷(卷十后部分至卷二十八前部分),内容最为丰赡。

四、《佛祖历代通载》 简称《佛祖通载》、《通载》,二十二卷。元念常集,成于至正元年(1341),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九册)本等。本书是一部以雷氏(名字不详)干支纪年表为时序编制的编年体佛教史。所记史实,上始远古时代的盘古,下迄元代元统元年(1333)。其中,东汉至五代部分,主要是从南宋祖琇的《隆兴编年通论》上抄录的,宋元部分则是作者新编的。所采的史料主要有:《佛祖统纪》、《禅林僧宝传》、《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碑铭、文集、传状、诏制以及正史等。特别是元代的史料,由于与作者的生活时代比较接近,取材较新,故学术价值尤为重大。



五、《释氏稽古略》 初名《稽古手鉴》，后改今名，简称《稽古略》，四卷。元觉岸撰，成于至正十四年（1354）。觉岸的生平事迹见明代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十八。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九册）本等。本书是以历代帝统为经，佛家世次行业为纬，并参照南宋本觉《释氏通鉴》的写法，每年必录（有事则记事，无事则单记干支、年号）而编成的编年体佛教史。所记史实，上始远古时代“三皇”中的太昊包牺氏，下迄南宋少帝（又称恭帝）德祐二年（1276）。它的特点有：详述政事，具有一半是佛史，一半是世史的性质；备载帝王的兴佛事迹；汇集各代译经、造寺、度僧等基本数据；援据宏富。所征引的史传、文集、碑铭、志乘、政书、笔记等各类著述，总计有一百几十种。另外还辑存了许多有关佛教史事起源的掌故。

六、《释氏稽古略续集》 简称《稽古略续集》，又称《续集稽古略》，三卷。明幻轮撰，成于崇祯十一年（1638）。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九册）本等。本书是《释氏稽古略》的续作。所记史事，上始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下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前后总计三百六十四年。它的编叙体例与前集相同，也是按皇帝的统系、年月的先后编排史实的，见录的政事也相当多。书中所记，除元代部分有与《佛祖历代通载》相重合的地方以外，明代部分全是作者根据明代佛教传记、灯录、语录、纂集、笔记、序跋以及佛教以外的诏令、书疏、典志、实录、野史等资料新录的。其中，载录最详的是明太祖朝的佛教情况，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奉佛事迹，以及他制定的一系列管理僧团的法规条文。

七、《佛教史大宝藏论》 又名《善逝教法源流》、《布顿佛教史》，一册。元布顿（又译布敦，藏传佛教霞鲁派创始人）著，成于元至治二年（1322）。通行本有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郭和卿汉译本。本书是一部集史、论、目录为一书，对印度和西藏地区佛教的源流、教法及典籍作详细记叙的藏传佛教史名著。分为四卷。卷一：第



一总纲“明闻、说正法的功德”、第二总纲“明所闻、说之法”和第三总纲“如何闻、说及修学法”，论述听闻、宣讲和修持佛法的功德与要求。卷二：第四总纲“所修之法如何而来的情况”所分二节中的第一节“总说世间中佛法如何而来的情况”，记叙印度佛教的历史。卷三：第四总纲第二节“分说西藏佛教如何而来的情况”所分三小节中的前二小节，即“前弘时期西藏佛教的情况”和“后弘时期西藏佛教的情况”。记叙西藏佛教的历史。卷四：第四总纲第二节“分说西藏佛教如何而来的情况”中的第三小节“西藏所译出的佛经和论典目录”，叙列西藏译出的显教和密宗的经典。

书中对自佛教产生以来，迄作者撰书时为止的千百年佛教史，特别是印度大乘佛教史和西藏地区佛教史，作了精湛扼要的记述，提供了一大批有关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流派、学说和典籍方面的珍贵史料。叙事之细密，议论之透辟，考订之明审，语言之通畅，在藏传佛教史籍中是首屈一指的。

八、《印度佛教史》一册。明多罗那他(藏传佛教觉囊派传人)著，成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通行本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张建木汉译本。本书是一部以印度历代王统为序，以其间护教的国王，特别是弘教的佛教大师的活动为重点，简明而又系统地介绍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印度佛教的传承、流布、嬗变和盛衰的藏传佛教史名著。所记，上始公元前五世纪初在位的中印度摩揭陀国阿闍世王(相传阿闍世王即位的第八年释迦牟尼佛入灭)，下至十二世纪末在位的斯那王朝的末代国王罗提迦斯那王。全书共分为四十四章，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一)第一章至第十二章。记叙了阿闍世王至迦腻色迦王(二世纪初在位的大月氏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期间，小乘佛教的传承、流布和分派。(二)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七章。记叙自迦腻色迦王去世之后，迄瞿毗旃陀罗王(七世纪左右在位的印度阿波兰多迦国的国王)为止，以中观、瑜伽行



派为主的大乘佛教,和其间尚存的小乘佛教的流布情况。(三)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七章。记叙瞿波罗王(八世纪初在位的波罗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至罗提迦斯那王(十二世纪末在位的斯那王朝的末代国王)期间,以密教为主的晚期大乘佛教的流传和印度佛教被毁灭的情况。(四)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四章。记其他佛教史实。其中,有关晚期大乘(主要是密教)的人物资料可补汉传佛教史籍的空阙。

九、《如意宝树史》又名《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一册。清代松巴堪布(青海佑宁寺第三世松巴活佛)著,成于乾隆十三年(1748)。通行本有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蒲文成第汉译本。本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佛教在印度和我国藏、蒙、汉族地区的产生、传播情况的藏传佛教史名著。全书分为“二总目”,“总目”下又分子类,对以往的史料多有综合与辨正。

第三节 传 记

传记,全称“佛教传记”,指的是用来记叙佛教人物的生平事迹的一类佛教典籍。内容包括:人物的姓名、字号、里籍、家世、履历、交往、佛教因缘、学识、德行、言语、著述,以及生卒年代等。如果所记的是僧人,则还包括他(比丘)或她(比丘尼)的法名、住寺、出家、受戒、参学、师承、弘化、僧腊(又称法腊,指受具足戒以后的僧龄)、弟子等。

佛教传记的种类很多。有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佛陀传(又称佛传);有记佛教宗派中某一祖或某几祖的祖师传(前者为单传,可以纳入僧人别传之列;后者为合传,从属于宗类著作,也可视为僧人类传的一种);有记历代高僧或名僧的僧人总传(又称僧



人通传);有记某一类僧人,如比丘尼、求法僧、禅僧、地区僧(一地、一山、一寺的僧人)、神僧等的僧人类传;有记单个法师、律师、禅师、长老、大德等的僧人别传(又称僧人单传、僧人专传);有记在家奉佛者的居士传;有记净土修持者的往生传。此外,记载佛法僧(三宝)感应事缘和僧俗因果报应故事的感应传,既可看作杂记类著作,因可视为佛教传记中的“杂传”。

数量众多的佛教传记,是各个时期内具有不同经历和个性的佛教人物,从事佛教活动的历史记载,它是佛教研究领域中各个分支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人物资料。

今存的佛教传记有三十多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属于僧人总传的《名僧传抄》、《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属于僧人类传的《比丘尼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禅林僧宝传》、《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属于僧人别传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属于居士传的《居士传》;属于往生传(或称净土传)的《净土圣贤录》、《净土圣贤录续编》等。

一、《名僧传钞》一卷。原为《名僧传》三十卷,梁代宝唱撰,成于天监十三年(514),已佚。今本为日本僧人宗性于1235年根据原本节录的摘抄本。宝唱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三四册)本等。本书由三个部分内容构成:(一)《名僧传》目录。此为《名僧传》原本目录的转录,学术价值最高。于中可知,《名僧传》分为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师七科,共收后汉至南齐的著名僧人四百二十五人。由于当时南北分裂,迫于区域所限,见录的大多数是晋、宋、齐三代的江南名僧,北方的较少。(二)《名僧传》钞。此为宗性对《名僧传》原文的



摘钞,所钞以有关弥勒感应的内容为主,旁及其他。(三)《名僧传》说处。此为宗性从《名僧传》中逐卷摘出的要点,共计一百八十四条。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弥勒感应之事的,也有的是关于僧人突出的事迹、著述和其他事情的。从中反映了《名僧传》原本搜集宏富,并通过转引言论和著作,衬托人物思想的特点。

二、《高僧传》 又称《梁高僧传》,十四卷。梁慧皎撰,成于天监十八年(519)。慧皎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六。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中华书局1992年版汤用彤校注本等。本书前十三卷为僧传,末一卷为序录。僧传分为十科,所收僧人,上始东汉永平十年(67),下迄梁天监十八年(519),正传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四十三人。(一)译经(卷一至卷三)。收录或逾越沙险,或泛漾洪波,委命弘法,传梵为汉的译经僧。(二)义解(卷四至卷八)。收录深达经论,讲说著述的义学僧。(三)神异(卷九、卷十)。收录显现神通,感化强梁的僧人。(四)习禅(卷十一)。收录端坐辍虑,专修禅定的僧人。(五)明律(卷十一)。收录弘赞律部,戒行贞素的僧人。(六)亡身(卷十二)。收录或自委于虎,或割肉赈饿,或燃指烧身,以资供养的僧人。(七)诵经(卷十二)。收录讽诵经文,六时无辍的僧人。(八)兴福(卷十三)。收录起寺建塔,铸佛像,敦修福业的僧人。(九)经师(卷十三)。收录善于用一定的音调诵咏佛经中的长行(散文部分),即会“转读”,或善于用一定的曲律歌唱经中的偈颂,即会“呗赞”的僧人。(十)唱导(卷十三)。收录斋集时,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以宣讲佛理的僧人。

本书所创立的僧人总传(又可称僧人通传)的体例,成为继作者的楷模,而具有深远的影响。所载人物行事颇为详实。

三、《续高僧传》 又称《唐高僧传》,三十卷。唐道宣撰,成于麟德二年(665)。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等。全书分为



十篇：译经篇（卷一至卷四）、义解篇（卷五至卷十五）、习禅篇（卷十六至卷二十）、明律篇（卷二十一、卷二十二）、护法篇（卷二十三、卷二十四）、感通篇（卷二十五、卷二十六）、遗身篇（卷二十七）、读诵篇（卷二十八）、兴福篇（卷二十九）、杂科声德篇（卷三十）。所收僧人，上始梁初，下迄唐麟德二年（665）。丽藏本所收，正传四百一十四人，附见二百二人；明藏本所收，正传四百九十三人，附见二百十五人（明藏本较丽藏本增收的人物见《大正藏》本《续高僧传》卷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三、卷二十四、卷二十五后附）。本书征采周富，叙事详悉，凡《高僧传》未载的梁代高僧，以及下至作者撰书时已去世或仍在世的唐初高僧，皆尽搜罗入内。尤其是义解篇，虽为十篇之一，但卷数达十一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还多，载录僧人最多。书中既记人物的生平履历，又记他的学识著述，每传的平均字数也是古代僧人总传中最多的。另外，作者在各篇之末所设的“论”，撮示一科指归，溯沿佛学源流，评议人物史事，内容也相当丰富。

四、《宋高僧传》 又称《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北宋赞宁撰，成于端拱元年（988）。赞宁的生平事迹见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中华书局 1987 年 8 月版范祥雍点校本等。本书的体例与《续高僧传》相同，也分为十篇：译经篇（卷一至卷三）、义解篇（卷四至卷七）、习禅篇（卷八至卷十三）、明律篇（卷十四至卷十六）、护法篇（卷十七）、感通篇（卷十八至卷二十二）、遗身篇（卷二十三）、读诵篇（卷二十四、卷二十五）、兴福篇（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杂科声德篇（卷二十九、卷三十）。每篇之末有论，提纲挈领，总括一篇大旨。一些人物的传记之末，还附有“系”，为对该传所记人和事的评论。所收人物的时限绍接《续高僧传》。大体是始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终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前后凡三百二十年。正传五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二



十五人。其中在感通、读诵、杂科声德三篇收录的个别人为《高僧传》和《续高僧传》所阙载。全书所收绝大多数为唐代僧人,其次为五代,再次才是宋代。特别是习禅篇,分为六卷,无论是卷数还是见录的人数均是各篇之最。对唐初至宋初禅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物资料。另外,书中还详细记叙了历代译场的组织体制,包括宋代译场的人员、职司、规模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五、《大明高僧传》 又称《明高僧传》,八卷。明如惺撰,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等。本书是作者在读览史志文集时,摘取一些高僧的事迹,稍事编缀而成的。全书分为三篇:译经篇(卷一前部分)、解义篇(卷一后部分至卷四)、习禅篇(卷五至卷八)。所收僧人的年限,大体起自北宋宣和六年(1124),终至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前后四百六十九年。在起始的时间上,与《宋高僧传》并不衔接,中间空缺了一百四十七年。正传一百十二人,附见七十人。

六、《补续高僧传》 二十六卷。明代明河撰,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通行本有《已续藏经》(第一三四册)本等。本书是《宋高僧传》的补续之作。全书分为十篇:(一)译经篇(卷一)。(二)义解篇(卷二至卷五)。(三)习禅篇(卷六至卷十六)。(四)明律篇(卷十七)。(五)护法篇(卷十八)。(六)感通篇(卷十九)。(七)遗身篇(卷二十)。(八)赞诵篇(卷二十一)。(九)兴福篇(卷二十二)。(十)杂科篇(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书中补录了属于《宋高僧传》收录范围,而前书未收的唐五代的一些僧人,新续了宋(辽、金)、元、明时期的一批高僧。总计正传五百四十八人,附见七十二人。其中习禅篇占的比例最大,为全书的五分之二,义解篇和杂科篇次之,各近五分之一。所收人物年代最早的是卷六的龟洋禅师(慧忠),他大约卒于唐僖宗广明至光启年间(880—887)。年代最晚的是卷十六的明律(字三空),他卒于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上下约七百三十年。本书各篇之末没有“论”；正传中既有一个人的单传，也有二人或三人的合传。

七、《比丘尼传》 四卷。梁代宝唱撰，成于天监十六年(517)。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等。本书是一本专门记叙汉地佛教僧团中的女性出家者(或称出家的女子)，即比丘尼的生平事略的传记。释迦牟尼在创建佛教僧团的初期，只收男性出家者，他们称为“比丘”。据记载，第一批比丘是陪随释迦牟尼出家求道的憍陈如等五人，世称“五比丘”。数年以后，释迦牟尼重返故乡，度他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意译大爱道)出家，僧团中才开始有女性出家者，即“比丘尼”。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也只有比丘，而没有比丘尼，一直到西晋末年武威太守之女仲令仪(即净检)从罽宾国沙门智山出家，汉地始有比丘尼。本书上起东晋升平(357—361)末年(此为净检的卒年)，下迄梁天监十五年(516)(此为法宣的卒年)，共收录比丘尼六十五人。其中，卷一录东晋比丘尼十三人，卷二录刘宋比丘尼二十三人，卷三录齐代比丘尼十五人，卷四录梁代比丘尼十四人。

八、《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简称《西域求法高僧传》、《求法高僧传》，二卷。唐义净撰，约成于天授二年(691)前后，时作者居于南海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义净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一。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中华书局1988年9月版王邦维校注本等。本书是一部以唐初赴印度求法的僧人(玄奘除外)的行履事迹为记叙对象的传记。正传收五十六人，大体上按照西行求法的年代为顺序排列。贞观(627—649)末年杖锡西迈的太州玄照法师为第一人，弘道元年(683)泛舶南海的澧州大津法师为末一人。附出四人，他们是协助义净在室利佛逝抄写梵经的贞固、怀业、道宏、法朗。作者通过为这些僧人立传，对西行求法的原因和路线，西行路上的艰险，西行者的品格、学识，以及他们对促进中



印佛教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等,作了详细的叙述。传文还叙及西行沙门沿途的所见所闻,其中有地理环境、风俗人物、寺庙建筑等等,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

九、《禅林僧宝传》三十卷。北宋惠洪撰,成于宣和六年(1124)。惠洪生平事迹见南宋祖琇《僧宝正续传》卷二。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三七册)本等。在中国佛教史籍中,以禅僧为记叙对象的著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灯录,如《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等,它以记录人物的言语为主,并按授受的谱系编制;另一类是传记,它以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主,同时也载录一些重要的言谈,是不按宗派世次编制的,本书即是其中之一。全书收录唐末至北宋政和(1111—1117)年间的禅宗僧人八十一人。主要有:曹山本寂、云门文偃、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玄沙师备、罗汉桂琛、清凉文益、石霜庆诸、云居道膺、天台德韶、圆通缘德、洞山守初、智觉延寿、雪窦重显、天衣义怀、荐福承古、大阳警玄、圆照宗本、浮山法远、投子义青、慈明楚圆、黄龙慧南、真净克文、东林常总、圆通法秀、明教契嵩、达观昙颖、杨岐方会、黄龙惟清等。

十、《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初名《南宋元明僧宝传》,重刻时改为今名,十五卷。清自融、性磊撰,成于康熙三年(1664)。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三七册)本等。本书为《禅林僧宝传》的续作。全书共收录南宋初年至清代初年的禅僧九十八人。收录的人物主要有:佛灯守珣、竹庵士珪、此庵景元、文殊心道、宏智正觉、真歇清了、虎丘绍隆、应庵昙华、大慧宗杲、雪堂道行、瞎堂慧远、密庵咸杰、育王妙堪、白杨法顺、松源崇岳、灵隐之善、北磬居简、无淮师范、断桥妙伦、天童如净、全一至温、庆寿印简、径山妙高、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笑隐大沂、元叟行端、千岩元长、海舟永慈、恕中无愠、季潭宗泐、楚山绍奇、笑岩德宝、龙池幻有、寿昌慧经、博山元



来、湛然圆澄、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吹万广真等。书中对他们的身世、学历、言语、行事、交往等作了详细的记叙,为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

十一、《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简称《智者别传》,一卷。隋灌顶撰,成于大业元年(605)之后。灌顶的生平事迹见《续高僧传》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等。本书是一部记载天台宗创始人智顓(赐号智者大师)生平事迹的传记,也是《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顓传》的资料来源之一。

十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又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藏法师传》、《慈恩传》,十卷。唐慧立、彦棕撰,初撰于麟德元年(664),续成于垂拱四年(688)。慧立、彦棕的生平事迹分别见《宋高僧传》卷十七和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孙毓棠等点校本等。本书是一部记载法相宗创始人玄奘生平事迹的传记。书名中的“大慈恩寺”是他的居寺的题额,“三藏法师”是对精通经、律、论三藏的学识而给予的尊称。玄奘是唐代第一名僧,因而在他去世后不久,有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卷四《玄奘传》、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记述他。时间稍远又有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传》,更远还有刘轲的《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而《慈恩传》则是所有这些有关玄奘的传状中撰作较早而记载最详的一种,在历代名人谱状中,也堪称第一。

十三、《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卿行状》 简称《善无畏行状》,一卷。唐李华撰,约成于开元二十四年(736)。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等。全篇行状约六百字,扼要地记述了印度胎藏界密法的传播者、唐代密宗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善无畏的事迹。



十四、《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 简称《不空三藏行状》、《不空行状》，一卷。唐赵迁撰，成于大历十年（775）。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等。全篇行状约三千八百字，概述了印度金刚界密法的传播者、唐代密宗的主要代表人物不空的事迹。

十五、《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 又名《惠果和尚行状》、《惠果行状》，一卷。唐代佚名撰，约成于开成四年（839）至会昌五年（845）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等。全篇行状约一千九百字，对受唐代宗、德宗、顺宗三朝皇帝尊崇的，密宗胎藏界和金刚界两部大法的重要传承者惠果（又作慧果）的生平事迹作了记叙。由于《宋高僧传》不收惠果，唐海云的《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仅有惠果事迹的片段，故本书和日本空海撰的《惠果和尚碑》（见收于笔者撰的《密宗史的一则珍贵资料》一文，《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1期），成了记述惠果生平始末的两篇最重要的资料。

十六、《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又称《贤首国师传》、《法藏和尚传》，一卷。新罗崔致远撰，成于唐天祐元年（904）。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册）本等。本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详细记载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生平事迹的传记。全书分为十科。第一科，记族姓。第二科，记游学。第三科，记削染（出家）。第四科，记讲演。第五科，记传译。第六科，记著述。第七科，记修身。第八科，记济俗。第九科，记垂训。第十科，记示灭。每一科分别记叙法藏生平行事的一个方面。其中以“第五科”、“第六科”最为重要。由于书中并非是依照年月的顺序编次法藏的行历。故对了解法藏各阶段的活动带来不便。清代，续法以《法藏和尚传》为基本素材，也吸收了《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贤首宗教·三祖贤首法藏法师传》的一些材料，打乱重编，以年月为经，以事迹为纬，编



成《法界宗五祖略纪·三祖贤首国师传》，纠正了这一缺失。

十七、《居士传》 五十六卷。彭绍升(又名彭际清)撰,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彭绍升的生平事迹见《居士传》卷五十六《知归子传》、清胡珽《净土圣贤录续篇》卷二。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九册)本等。本书是一部专门记叙汉地佛教的世俗信仰者(或称在家的佛教信徒),即居士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们的佛教活动的传记。全书所收,上始后汉,下迄清乾隆(1736—1795)年间,正传收二百二十七人,附见七十七人。第一人是牟融,最末一人是“知归子”,即作者自己。传主大多以字或号相称,如称孙绰为“孙兴公”,颜真卿为“颜清臣”、王维为“王摩诘”、黄庭坚为“黄鲁直”等,只有少数才直呼其名。传末均注有出典,有佛教的和世俗的史传、文集、序录、笔记等好几十种。有些列传的末尾间附作者和汪缙的评论。书中收录的人物,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政治地位或学术地位的宰官士夫。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全力扶持僧团,开展民间的佛教活动,而且利用自己较高的文化修养,撰作各种阐释佛理或记叙佛教史迹的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佛教的内容,形成了影响至大至深的居士佛教。因此,本书乃是研究东汉末年至清代中叶,居士佛教的发展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十八、《净土圣贤录》 九卷。清彭希涑撰,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彭希涑的生平事迹见清胡珽《净土圣贤录续篇》卷二。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三五册)本等。本书是历代往生传的集成之作。所说的“往生传”,又称“净土传”,指的是以修持净土法门(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物为记叙对象的传记。本书共立传五百余篇(包括附传),分为十科:净土教主、阐教圣众、往生比丘、往生比丘尼、往生人王、往生王臣、往生居士、往生杂流、往生女人、往生动物类。每篇传略的末尾均注有出典(即资料的出处),每科之末有“论曰”(即作者的评论)。



十九、《净土圣贤录续篇》四卷。清胡珽撰，约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三五册)本等。本书为《净土圣贤录》的续作。全书分为七科：往生比丘、往生比丘尼、往生王臣、往生居士、往生杂流、往生女人、往生物类。共立传一百数十篇，所收录的人和物仅限于清代，编次以年月为序。《净土圣贤录》以《往生比丘》收录的人物为最多，而本书以《往生居士》收录的人物为最多。

第四节 宗系

宗系，全称诸宗谱系，又称宗史，指的是用来记载佛教各宗派的传承世系(又称传法世系、法系)以及宗人的言语行事的一类佛教典籍。它不只是某一佛教宗派人名的简单排列，而是以一宗的来龙去脉为主线编撰的、有着丰富内涵的宗派史著作。内容包括：一宗的起源、祖统(西天祖师和东土祖师)、教典、教义、判教(对释迦牟尼说教的先后次第和各类佛经的性质意义所作的评判)、传承世次、大宗与支派、嫡传与旁出、主要人物的事迹、派系的考证与人事的评论，以及有关的文述，如拈颂偈诗、铭记箴歌、文论杂著等。

佛教宗系类著作中，数量最多的是灯录体。这是禅宗创造的按传法世次编制的、以记载历代禅宗人物的机缘语句(参禅或接引学人时的对话与开示)为主的一种文体。灯录中，有从毗婆尸佛(七佛之首)或释迦牟尼佛(七佛之末)叙起，至六祖慧能以下南岳怀让系(简称南岳系)和青原行思系(简称青原系)某世的通录；有在传法世次上绍绪先前问世的某一部灯录(通常是《景德传灯录》或《五灯会元》)的断代录；也有记载某一地区禅僧或历代习禅居士的专录(后者称为《居士分灯录》，它不是按传法世次编制的，与严



格意义上的“灯录”尚有一定的差异)。

其次是传记体(或称记传体)。有汇载一宗(如天台宗、华严宗等)东土诸祖行实的合传,有记叙一宗(如密宗、喇嘛教、禅宗等)一派(如禅宗中的北宗、保唐寺派等)始末的师资记、付法记、传法记或法宝记;也有综述不同国别或地区佛教各派源流的渊源录、晶镜史。再次是图表体,如用表示师徒关系的竖线,与表示同学或平辈关系的横线组合起来,并略加说明的世谱、世系表、世系图。最后还有史评体,对派系的嫡旁、人物的师承、史迹的真伪等与宗派史有关的人和事加以评析。

佛教宗系类著作,不仅翔实地记载了佛教各大宗派的历史与学说,为编撰天台宗史、华严宗史、密宗史、禅宗史、喇嘛教史等提供了大量可以依据的珍贵资料,而且影响超出佛教界,成为专史中的重要分支——学术史的实际开拓者。由于灯录体著作,本书已在第六章第八节“禅宗宗典”中择要作了介绍,故以下要介绍的是除此之外的一些重要的宗系类著作。它们是:属于密宗的《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属于禅宗的《楞伽师资记》、《传法宝记》、《历代法宝记》,属于藏传佛教宗派的《土观宗派源流》。

一、《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 又名《两部付法次第记》,二卷。唐海云撰,成于大和八年(834)。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等。本书是密宗史的重要著作。全书记叙了密宗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教法师资传授史,以及各自依据的本经《金刚顶经》和《大日经》的大略。卷上,“略叙《金刚界大教王经》师资相承付法次第记”。卷下,“略叙《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教相承付法次第记”。书中保存了许多独一无二的史料。例如它著录了一行的六部著作,其中除《大毗卢遮那(经)义释》(又名《大日经疏》)一部七卷,也见录于《宋高僧传》卷五《一行传》之外,其余五部,即《大毗卢遮那(经)略释》二卷、《大毗卢遮那形像图样坛仪》一



卷、《标帜坛仪法》一卷、《契印法》一卷、《金刚顶义决》三卷(当时存上卷,阙中、下卷),均为《宋高僧传》所阙载。

二、《楞伽师资记》又名《楞伽师资血脉记》,一卷。唐净觉撰,约成于开元四年(716)。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本等。本书是早期禅宗的重要史书。由于它所记述的禅宗门下“楞伽师”的最后二代,主要是禅宗北宗(神秀派)系统上的禅师,故也可视为是一部记述北宗师资传授史的著作。书中共记述了八代楞伽师,起自刘宋,终于唐朝,凡十三人。第一代,刘宋的求那跋陀罗。第二代,北魏的菩提达摩。第三代,北齐邺中沙门惠可。第四代,隋朝舒州思(当作“司”)空山僧粲(当作“璨”)。第五代,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第六代,唐朝蕲州双峰山幽居寺弘忍。第七代,唐朝荆州玉泉寺神秀、安州寿山寺玄颐、洛州嵩山会善寺慧安。第八代,唐朝洛阳嵩山的普寂、敬贤、长安兰山的义福、蓝田玉山的惠福。书中值得注意之点是:将求那跋陀罗列为禅门楞伽师之祖,而将一直作为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降为第二代,在禅宗谱系中开创了特殊的一例;着重记述人物的禅学思想,而将他们的生平行历用寥寥数语带过。

三、《传法宝纪》一卷。唐杜拙撰,约成于开元四年(716)至开元二十年(732)之间。通行本有日本柳田圣山校订本(编入法藏馆1966年版《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此为全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本(此为残本)等。本书是一部记述禅宗北宗(神秀派)传法世系的著作。所记述的人物依次是:东魏(当是北魏)嵩山少林寺菩提达摩、北齐嵩山少林寺释惠可、隋皖(皖)公山释僧璨、唐双峰山东山寺释道信、唐双峰山东山寺释弘忍、唐嵩山少林寺释法如、唐当阳玉泉寺释神秀。上述七人中,虽然除法如一人以外,其余六人也见载于先前的《楞伽师资记》,但本书所记叙的许多关于人物的行履始末及传说故事,往往为前书所未备。



四、《历代法宝记》 又名《师资众脉传》、《定是非摧邪显正破坏一切心传》、《最上乘顿悟法门》，一卷。唐佚名撰，约成于大历十年(775)至大历十四年(779)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等。本书是一部记述禅宗南宗(慧能派)支派——保唐寺禅派(即无住派)传法世系的著作。书中所记述的保唐寺禅派的传法世系凡有十代。其中前六代是禅宗南宗各派共同尊奉的祖师，始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即菩提达摩，一般禅籍均无“多罗”两字)，终唐朝第六祖韶州曹溪能(慧能)禅师。后四代是形成保唐寺禅派的实际传人，他们是：资州德纯寺智洗禅师、处寂禅师、剑南成都府净泉寺无相禅师、保唐寺无住禅师。由于后来的禅宗灯录(如《景德传灯录》等)只载无住一人事迹，余三人皆有目无文(据说是因“无机缘语句”的缘故)，事迹无闻。而本书不仅记载最早，而且四人皆载，故特有价值。其中有关无住的事迹(主要是言语)载录尤详，其篇幅约占全书的一半。

五、《土观宗派源流》 原名《讲述一切宗派源流和教义善说晶镜史》，又称《一切宗派渊源教理善说晶鉴》、《一切宗义明镜》、《宗教流派镜史》，一册。清代土观(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撰，成于嘉庆六年(1801)。通行本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刘立千汉译本。本书是一部以记述藏传佛教各派的源流及教义为主，兼叙印度、汉地、蒙古、于阗等地的佛教和其他宗派，以及西藏地区的原始宗教“本教”(又译苯教、笨教)的有关情况的佛教名著。内容包括藏传佛教各派立名的由来，产生的经过，传承系统与支派，主要人物的事迹，教典、见、修、行三方面的教说，所属的寺院，以及作者的评析等等。在藏传佛教史籍中，像本书这样全面而又系统介绍不同方域的各种宗派(特别是佛教)的源流和教义的著作，尚属第一部。

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天竺宗教源流”。记述印度宗教和



哲学的流派及其教义。分为二节：第一节“外道邪宗源流”。下分三小节：一“外道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二“略说外道的教义”、三“说明讲述外道的必要性”。第二节“内道佛教源流”。下分二小节：一“内道四种宗派源流”、二“略说四种宗派所承许之见”。第二章“雪域藏地宗教源流”。记述西藏地区宗教(主要是佛教)的流派及其教义。分为四节：第一节“总说藏地佛教源流”。下分二小节：一“佛教前宏(一作弘)期的情形”；二“佛教后宏期的情形”。第二节“别说各种不同宗派的源流”。下分二小节：一“别宗的源流”。下分：宁玛派源流、噶当派源流、噶举派源流、希解派源流、萨嘉派源流、觉朗派源流、几类零散流派的源流七目。二“格鲁派的源流”。下分：教主宗喀巴降生世间的情况、诸持教法嗣弘扬大师正宗的情况、本派殊胜之处三目。第三节“承余略说显密教法和各明处的源流”。第四节“略说笨教(通常译为本教)的源流”。下分五小节：一“笨教的起源”、二“笨教各派的起源”、三“笨教的法要”、四“笨教关于见修方面的教理”、五“笨教的道场”。第三章“汉地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教派源流”。记述汉地宗教和哲学的流派及其教义。分为四节：第一节“如星的教派儒家学说的源流”。第二节“如月的教派道家的源流”。第三节“一类小派的源流”。第四节“如日的教派所谓释教即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情况”，下分二小节：一“由天竺传入的情况”、二“由藏地传入的情况”。第四章“霍尔、李域、苦婆罗等地的宗派源流”。记述蒙古(霍尔)、于阗(李域)以及传说中的密教时轮教法的发源地苦婆罗的佛教源流。下分三节：第一节“霍尔(蒙古)地区佛教兴起的情况”。第二节“李域(于阗)地区佛教兴起的情况”。第三节“苦婆罗佛教兴起的情况”。第五章“用讲述完成义作结束”，用赞颂的形式总结全书的义旨。



第五节 纂 集

纂集,全称佛教纂集,指的是用采录、整理、分类、述解等方式,将不同的资料按一定的主题,井然有序地编集起来,以供研读和保存的一类佛教典籍。这类典籍往往具有广采博搜、知识密集的特点。它们包罗万象,不仅涵盖佛教知识的各个领域,而且泛涉人文掌故、自然知识、伦理道德、语言文字等众多的方面。诸如佛教的时空观念、宇宙图式、善恶说教、修持法门、称谓仪礼、名物制度、纲科职事、斋节活动、文翰史迹、故事传说、名词术语(名相)、译梵法式,乃至君臣忠孝、贫富贵贱、智愚勤惰、择交志学、商贾工巧、医药术数、天文地理、音乐图像、飞禽走兽、物产珍宝等,莫不毕集。它们综括大藏经籍,旁撷世间典籍,辑存了许多今已失传的坠简遗文,是一批深受内外学者重视的资料集和工具书。在佛教文史类典籍中,纂集的数量是最多的。

佛教纂集的门类很多,而且有些门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大体说来,有摘录汉译经律论和僧俗撰述中的事理或史实,分类排纂的类书;有对佛教术语(包括梵文义译名词和音译名词)以及佛典中使用的古汉语词汇(主要是复合词)进行训释的辞书;有搜集佛典中常用的汉字加以解析的字书;有荟萃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佛教撰述的总集(各按不同的主题编集);有汇载某一佛教人物的各种文述的别集;有叙录佛教史上重要事件和制度的起源、沿革的典故集;有汇编某一类事项的专集;此外还有一些杂集。其中,较为重要的佛教纂集有:《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大藏一览集》、《南海寄归内法传》、《释氏六帖》、《大宋僧史略》、《释氏要览》、《敕修百丈清规》、《法门名义集》、《大明三藏法数》、《教乘法数》、《一切



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等。

一、《经律异相》 五十卷。梁宝唱等集，成于天监十五年（516）。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三册）本等。本书是一部采录汉译经、律、论中的佛教故事，分类排纂，以供研读的现存最古的大型佛教类书，也是一部重要的佛教故事总集。全书以天、地、佛、菩萨、僧、国王、国王夫人、太子、国王女、长者、优婆塞、优婆夷、外道仙人、梵志、婆罗门、居士、贾客、庶人、鬼神、畜生、地狱为序，分为三十九部。每部下面又分子类和细项。共收佛教四圣（佛、菩萨、缘觉、声闻）、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和境（境界、处所）、行（修行）、果（修行所获的果报）方面的故事（统称子目）七百六十五则。每则事类之末均注有出自某经某卷的出处，有些行文中间有考校诸经所云异同或释梵名的夹注。书中的资料主要取自“经”和“律”这两类翻译著作，数量约有二百种。除此之外，还采录了属于“论”的《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和属于汉地佛教撰集的《释迦谱》、《诸经中要事》。其中，辑存的佚经约有三十种。

二、《法苑珠林》 简称《珠林》，一百卷。唐道世撰，成于总章元年（668）。道世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三册）本等。本书是一部总括大藏经典，旁摭世间典籍，卷帙繁多而事理渊博的大型佛教类书。全书约一百多万字，分为一百篇，始自《劫量篇》，终于《传记篇》。书中不仅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佛教的各项教理和一般知识，如佛教的时空观念、宇宙图式、善恶说教、圣凡分类、戒律禅观、神通咒语、史迹经典、法数名相（即名词术语）、寺塔器物、音乐图像、仪礼行止、卫生保健等等。而且根据大乘佛教“世间与出世间不二”、住世证得涅槃的精神，广泛地讨论了人世间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伦理是非，集出世与入世于一书。所引用的内外经籍约有四、五百种。其中三分之二是佛教经典，如大小乘经律论和汉地佛教集传，三分之一是佛教以外的诸子百家



的各种著作,如志怪小说、笔记、野史、杂传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引用了十多种由汉地佛教徒托名伪造的佛经。这些著作虽然并非“佛说”真经,但由于它们善于将佛教教义中国化和通俗化,故一度广泛流布,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此外,还保存了未见佛经目录记载的一大批佚经。

三、《大藏一览集》 又作《大藏一览》,十卷。南宋陈实编。通行本有日本编《法宝总目录》(第三册)本等。本书是一部摘录藏乘(藏经)义理,分类汇编的小型佛教类书。全书分为八门六十品,见录事项总计一千一百八十一则。第一门,“首标大觉先容,俯为众生作则”。叙释迦牟尼生平。下分八品,凡十三则。第二门,“次辨教门究竟,庶使学者知归”。论佛教的地位。下分六品,凡二十则。第三门,“果于此道可入,岂离自己本来”。论无我。下分三品,凡六十二则。第四门,“良由善恶二途,故使升沉六道”。论善恶。下分十六品,凡四百一十九则。是八门中份量最大的一门。第五门,“天堂延以少欢,地狱待其剧苦”。论天堂、地狱。下分八品,凡九十七则。第六门,“欲超三界轮回,是假三乘修证”。论修证。下分六品,凡一百五十三则。第七门,“功成果登正觉,相好妙用神通”。论佛果。下分四品,凡四十八则。第八门,“四十九年苦口,末后一切收功”。叙释迦牟尼的教相和禅宗谱系。下分九品,凡三百五十九则。

四、《南海寄归内法传》 简称《南海寄归传》、《寄归传》,四卷。唐义净撰,成于武周天授二年(691)。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本、中华书局1995年4月版王邦维校注本等。本书是一部以作者在西行求法时的见闻为基础,着重记载公元六、七世纪印度和南海诸国佛教寺院施行的、从源流上来说属于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律仪规式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气候、物产、衣食、起居、风俗、礼节、历法、技艺、医药、卫生、语言、文



字、经籍、学者,以及作者的师友与自己的经历等。全书分为四十章(又称四十条、四十事)。卷一,九章:破夏非小、对尊之仪、食坐小床、餐分净触、食罢去秽、水有二瓶、晨旦观虫、朝嚼齿木、受斋轨则。卷二,九章:衣食所须、着衣法式、尼衣丧制、结净地法、五众安居、随意成规、匙箸合否、知时而礼、便利之事。卷三,十二章:受戒轨则、洗浴随时、坐具衬身、卧息方法、经行少病、礼不相扶、师资之道、客旧相遇、先体病源、进药方法、除其弊药、旋右观时。卷四,十章:灌沐尊仪、赞咏之礼、尊敬乖式、西方学法、长发有无、亡财僧现、受用僧物、烧身不合、傍人获罪、古德不为。书中介绍的许多历史知识大大开阔了世人的视野,填补了中外史书上的一些空白。

五、《释氏六帖》 又名《释氏纂要六帖》、《义楚六帖》,二十四卷。后周义楚集,成于显德元年(954)。义楚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七。通行本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影印本。本书是一部仿唐代白居易《白氏六帖》的体例而编辑的、以采录佛教掌故为主的佛教类书。全书分为五十部,始《法王利见部》,终《师子兽类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门,总计四百四十门。每一门收有多寡不等的词目,少的只有一、二条,多的达几十条,甚至上百条。所叙录的内容极为广泛,不仅有大量的佛教掌故和术语,而且有各种各样的人文掌故和自然知识。诸如佛法僧的含义、大小乘的修持、王侯卿相对佛教的态度、僧尼不拜王者的长期争论、师徒之间的教诫、行住坐卧的礼仪、高僧的德业、圣贤的著述、寺舍塔殿的建置、衣物用具的名目、儒家的伦理道德、道教的天尊道法、君臣之道、人事交往、天文地理、物产珍宝、饮食娱乐、医药术数、军旅交通、商贾工巧、以及飞禽走兽、草木虫鱼等等,尽皆收纳。书中保存了不少今已失传的隋唐佛教撰集的缀简佚文。其中有隋代灵裕的《寺诰》、唐代彦棕的《西京寺记》、太原居士郭遵的《新定一切经类音》等。



六、《大宋僧史略》 略称《僧史略》，三卷。北宋赞宁撰，成于咸平二年(999)。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本等。本书是一部采用典志体编撰的、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佛教典故集。它以佛教史传的载录及作者的见闻为本，以事为题，类聚条分，详尽地记叙并考证了自东汉初年佛教东传以来，迄北宋初年为止，中国佛教史上六十多项重要的事件和制度的起源及沿革。诸如佛教史上汉传佛教的由来，出家受戒的首例，梵本经律论的创译，注疏讲说的发端，禅观密法的施授，西行求法的肇始，汉地僧制的确立，服章仪礼的变迁，寺院的纲科职事，僧官的设置演化，法社的缔结，度牒的买卖，朝廷对名僧的封爵赐号，僧人对王者的一般称谓，民间与宫廷的佛事活动，佛教与道教的位次争辩等等，都有专条加以论叙。原书分为六十门，今本分为五十九门，其中最后一门不是佛教事类，而是总论。卷上，二十三门。始《佛降生年代》，终《传密藏》。卷中，十七门。始《道俗立制》，终《僧籍弛张》。卷下，十九门。始《诞辰谈论》，终《总论》。

七、《释氏要览》 三卷。北宋道诚撰，成于天禧三年(1019)。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本等。本书是一部分门别类地介绍佛教名物制度和修行生活方面的名词术语及事项的佛教辞典。全书分为二十七篇，总计收词目六百七十九条。卷上，九篇：姓氏、称谓、住处、出家、师资、剃发、法衣、戒法、中食。共收词目二百二十六条。卷中，九篇：礼数、道具、制听、畏慎、勤懈、三宝、恩孝、界趣、志学。共收词目二百三十九条。卷下，九篇：说听、躁静、净忍、入众、择友、住持、杂纪、瞻病、送终，共收词目二百十四条。本书叙述有致，言语明白，知识性很强。后世曾将它与《翻译名义集》、《教乘法数》合称为“佛学三书”，广为初学者所用。

八、《敕修百丈清规》 略称《百丈清规》、《清规》，八卷。元德辉编，成于至元元年(1335)。通行本有《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本等。



本书是自中唐百丈山怀海禅师创制《禅门规式》(又名《丛林清规》,通常称之为《百丈清规》)以来,迄元顺帝时为止,各种丛林(即禅林)清规的集大成者。由于怀海编的《百丈清规》的原本早佚,故本书实际上是根据当时丛林中流传较广的北宋宗赜撰的《禅苑清规》(又名《崇宁清规》)十卷、南宋惟勉撰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又名《咸淳清规》)二卷、元代一咸撰的《禅林备用清规》(又名《至大清规》)十卷,会稽参同,折衷得失,删繁、补缺、正讹,重新论次而成的。

全书分为九章。对禅寺的僧职设置、管理制度、日常行事、礼仪规范、节斋活动,以及各种应用文书,如牒状牌示、疏文口词等作出了细致的规定。每章之首有小序,叙说本章义旨;卷文中夹有小注,对佛事活动中回禀、白众、陈事、回向、念诵、祝香、进拜、展礼、答谢、颂赞等时的用语,以及若干礼仪规范的细节,作了补充性的说明;一些章节的末尾间附作者的案识,对叙及的人和事加以阐述与评论。(一)祝釐章(卷一前部分)。记为皇帝或皇太子祝寿的时日和规式。下分六节。(二)报恩章(卷一后部分)。记国忌日(皇帝的死日)和国家遇到自然灾变时的祈祷规式。下分二节。(三)报本章(卷二前部分)。记佛陀和元代帝师拔合思巴(即通常说的“八思巴”)纪念日的佛事活动。下分三节。(四)尊祖章(卷二中间部分)。记禅宗祖师纪念日的佛事活动。下分四节。(五)住持章(卷二后部分至卷三毕)。记禅寺住持的日常行事、任退程序、迁化以后丧事的料理,以及新住持的产生办法。下分六节。(六)两序章(卷四前部分)。记禅寺东西两序(住持之下仿朝廷文武两班设立的执事,西序选学德兼优者充任,东序选精通世事者充任)和从事杂务的各种僧职、进退(任职与辞职)程序,以及有关的礼仪。下分二十一节。(七)大众章(卷四后部分至卷七前部分)。记僧众的行持规范。下分二十五节。(八)节腊章(卷七后部分)。



记结制(又称结夏、坐夏、坐腊,指自夏历四月十五日始居寺不出、安心修道的安居期)、解制(又称解夏,指夏历七月十五日安居期结束)、冬至、年朝,即丛林“四节”的佛事活动与仪规。下分十八节。(九)法器章(卷八)。记禅寺的法器及其击打规式。下分七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住持章、两序章和大众章。这三章揭示了禅宗丛林制度的主要内容。本书是研究禅宗丛林制度的重要史料。它既是元代天下丛林统一遵依的规制,也是明代丛林遵依的规制。传至清代,有仪润撰《百丈清规义记》九卷(今存),对它加以注释。

九、《法门名义集》一卷。唐李师政撰,成于武德年间(618—626)。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本等。佛教有一套独特的名词术语(名相),这些佛教术语的构成可区别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含数字的,如烦恼、禅、般若、真如、佛性、无我、如来藏、空、戒、涅槃、阿赖耶识等;另一类是以数字开头,或为使术语的含义更为明了,在数字前加修饰词限定的,如一乘、二谛、三无性、四缘、五蕴、六凡四圣、七佛、八大地狱、九种大禅、十地、僧伽二和、大乘五位、外道六师、大集七喻等,别称“法数”或“名数”。本书是一部专门解释后一类术语的小型佛教辞典。全书共汇释带有数字的佛教名词术语一百二十条,按它们的性质主题分类汇编,总为七品。(一)身心品。释“四大”等七条。(二)过患品。释“二边”等十七条。(三)功德品。释“三归”等四十三条。(四)理教品。释“三佛”等二十二条。(五)贤圣品。释“七种学人”等十三条。(六)因果品。释“三行”等七条。(七)世界品。释“三世”等十一条。作者采用的是直截了当的诠释,不搞引经据典,语言比较简洁明了。

十、《大明三藏法数》又名《三藏法数》,五十卷。明一如等编,成于永乐十七年(1419)。通行本有上海医学书局1923年刊行本等。本书是一部佛教辞典。全书共汇释佛教含有数字的名词术



语(法数)一千五百五十五条,按词目第一个字的数目的大小依次排列。如果词目的第一个字并非数字,则按词目中间出现的数字的大小,编入相应的数字之中。所释的第一条是“一心”,最后一条是“八万四千法门”。每条术语之下,均注有出典。所收录的佛教法数绝大多数集中在自“一”至“十”的数字之内,自“十”以后的名数是很少的。这也反映了佛教法数总的构成情况。本书的释文平易通畅,义理完备,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作者对词目释文中所涉及的其他佛教名词(有带数字的,也有不带数字的),一般都用夹注的方法,一一加以诠释。有些佛教名词在不同的词目中都要提到,则在不同词目的释文中均加以解释,以便使读者读一条词目便能洞晓该词目的全部义理,不必再查他条。故所收的词目的正条虽然只有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但释文中注解的名词术语则有正条的数倍,两项的总和达到一万余条,又为同类著作中实际收词最多的一部书。

十一、《教乘法数》 十二卷。明圆滢集,成于宣德六年(1431)。通行本有北平刻经院1934年据明版影印本。本书是一部以汇释佛教法数为主,兼收少量儒道诸子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中带有数字的常用名词的佛教辞典。全书共收词目约二千九百八十条,其中绝大多数为“教”派(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等)用语,也有少数(约二十条)为“禅”派(禅宗)用语,另外还收录了儒道诸子经典中的一些用语(约七十条)。这与《大明三藏法数》只收“教”派用语有一定的区别。但编次仍以名词所含数字的大小为序,始自“一心”,终于“八万四千法门”。所收的词目,有的标注出处,有的则阙。释文的特点是图表式。全书除少量词目无须或无法用图表来表述,如“一心”、“一劫”、“一瞬”、“八万四千法门”等以外,其余的词目基本上都采用简练的文字与线条(偶用图形)相组合的方式来表述。这在佛教辞书中是独一无二的。



十二、《一切经音义》 同名的著作凡有两部：一部别称《玄应音义》，二十五卷。唐代玄应撰，约成于永徽六年(655)至龙朔三年(663)之间。通行本有日本编《卍正藏经》(第六十七册)本等；另一部别称《慧琳音义》，一百卷。唐代慧琳撰，成于元和二年(807)。慧琳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五。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本等。此处要介绍的是后一部著作，即《慧琳音义》。

《慧琳音义》是唐代佛经音义的集大成者。全书共收录佛典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卷(《大正藏勘同目录》只列了一千二百二十一部，脱载了《离垢施女经》等九部)，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记载的藏经为主，兼收《开元录》以外和以后的其他典籍，如《释门系录》、《利涉论衡》、《道瓠定三教论衡》、《崇正录》、《荆州沙门无行从中天附书于唐国诸大德》、稠禅师《宝法义论》、神秀《观心论》(以上著作已佚)等。始自唐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终于唐义净撰的《护命放生法》。由于《显无边佛土功德经》等一百三十余部佛典只录书名而不释音义(作者称为无字、未音、无字可音、无字音训等)，故实际训解的是一千一百六十余部佛典的音义。其中，《放光般若经》(见卷九)等三百三十余部的音义，是从《玄应音义》上转录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见卷三十一)、《大灌顶经》(同卷)、《法华经论》(见卷四十七)、《佛本行赞传》(见卷七十四)等四部的音义，是慧琳根据《玄应音义》重订的；《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的音义(见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是从《慧苑音义》上转录的(保留了慧苑自序)；《大般涅槃经》音义(见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是根据开元二十一年(733)终南山智炬寺沙门云公撰的《大般涅槃经音义》删补的(保留了云公自序)；《妙法莲华经》音义(见卷二十七)是根据玄奘的弟子大乘基(即窥基)的《法华音训》增订的(保留了大乘基自序)；其余的佛典音义为慧琳所撰。释文包括注音、释义、析字、辨体、正讹等方面的内容。书中征引的经史子集各类古书约有二百



余种,以收录语词最多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音义为例,其中就征引了六十多种,内有不少今已亡佚的著作。它既是一部辅导学人阅读《大藏经》的佛学辞典,也是一部诠释详密的古汉语大辞典。由于作者生于中唐,所引的典籍大多为唐初的古本,故近人不仅用它来考订词或字的古音古义,校正今本文句上的讹夺衍倒,而且用它来补辑逸书。

十三、《续一切经音义》 简称《希麟音义》,十卷。辽代希麟集,成于统和五年(987)。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本等。本书是《慧琳音义》的续作。全书共收录佛典一百十部二百六十一卷,以《开元录》以后新译的密教念诵仪轨为主体,次收拾遗编入的说一切有部律典及传录等。由于其中《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经》等十六部经典只录书名,不释音义(即无字可音训),故实际训释的是九十四部佛典的音义。在释文中,作者共征引了六十多种古书,其中半数以上是今已亡佚的著作。

十四、《翻译名义集》 略称《翻译名义》、《名义集》,七卷。南宋法云编,成于绍兴十三年(1143)。法云的生平事迹见《佛祖统纪》卷十五。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四册)本等。本书是一部摘列佛典中梵语音译名词(《宗翻译主篇》收录的法显、智猛、智严、宝云、玄奘、义净等汉地出身的佛经翻译家例外),分类排纂,予以诠释的佛教辞典。全书共分为六十四篇,收词目二千余条。每篇之首均有序言,对篇名、义旨以及有关的事理加以叙释。由于篇序以及词目的释文中又提到了许多梵语音译名词、义译名词、音义合译名词,故书中实际诠释的佛教名词术语的有四千八百条。卷一,十三篇,始《十种通号篇》,终《释氏众名篇》。卷二,十一篇,始《八部篇》,终《时分篇》。卷三,十四篇,始《帝王篇》,终《显色篇》。卷四,十篇,始《总明三藏篇》,终《众善行法篇》。卷五,六篇,始《三德秘藏篇》,终《半满书籍篇》。卷六,四篇,始《唐梵字体篇》,终《阴入



界篇》。卷七,六篇,始《寺塔坛幢篇》,终《统论二谛篇》。全书之末有《翻译名义续补》。所补的主要是《十种通号篇》、《诸佛别名篇》、《宗翻译主篇》、《八部篇》、《五果篇》、《百华篇》、《众香篇》、《法宝众名篇》等的近三十条词目。书中对所收词目的解释,通常包括:列举异译、说明义译、引证、阐释诸项内容。所征引的经籍,以汉地僧人撰作的疏论、记传、音义等为最多,其次是汉译经律论,此外也引用了一些世俗典籍和道教经典。总计约四百种。像唐玄奘“五种不翻”的翻译理论(见卷一《十种通号篇》“婆伽婆”条)等稀有的史料也往往见载其中,可补他书未载之阙。

第六节 护 法

护法,又称护教,是佛家常用的一个术语,意为护持佛法。护法类著作,就是指在与社会上怀疑、讥讽、批评、废毁佛教的思想和力量作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儒家、道家的交涉、抗衡中产生的,旨在维护佛教信仰和立场的一类佛教典籍。它们不拘体裁,有针对确定的辩驳对象和议题组织的理论体著作;有搜采有关佛教的历史文献以及朝野道俗弘扬佛法的各种作品的纂集体著作;有叙录佛教与朝廷、佛教与道教交争冲突事件的纪事本末体著作;有记载历代王臣奉佛事迹的传记体著作;此外还有与佛教史事件密切相关的诏令奏议、文翰简牍等。它们是一批研究儒佛道三教关系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其中,较为重要的护教类著作有:《弘明集》、《广弘明集》、《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集古今佛道论衡》、《辩伪录》、《辩正论》、《谭津文集》、《佛法金汤编》等。

一、《弘明集》十四卷。梁僧祐撰,成于天监六年(507)至天监十三年(514)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二册)本等。本



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佛教护法类总集。主要辑录东汉至梁代弘扬佛教的文论书表,同时兼载论敌的辩难对答。全书共收录各种文述一百八十四篇(不包括《弘明论》),其中东汉一篇,东晋四十七篇,刘宋三十九篇,南齐十五篇,梁代七十二篇(包括王公朝贵六十二人致法云的答书),姚秦十篇;作者一百二十二人,其中绝大多数为王臣士子,沙门仅十八人(不包括僧祐本人)。由于它保存了中国早期佛教的一批珍篇,特别是名士之作,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六代遗编,流传最古,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传世者,颇赖以存。”(卷一四五)它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泛释世人的非议的,有专驳道教的诘难的,有辩论形神因果的,有汇叙佛教与朝廷之间的交涉的,有讨论佛教仪规的,有细绎佛法大义的,也有檄魔的。另外,附于书末的《弘明论》对全书的义旨作了总结,并对社会上流传的六种怀疑佛教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由于本书具有兼收信佛与排佛两派的不同观点的特点,保存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理论抗争和事件的原始资料,故自问世以来,备受重视,成为佛教史,特别是佛教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二、《广弘明集》三十卷(又作四十卷)。唐道宣撰,成于麟德元年(664)。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二册)本等。本书是一部绍续和增广《弘明集》的著作。全书分为十篇(篇首有作者的小序),总计收载各种文体(论、文、疏、序、书、表、诏、行状、诔铭、颂、赞、赋、诗等)的佛教作品和史志三百多篇,作者有一百三十多人。所采,大体上始自曹魏(如三国曹植的《辩道论》),终于唐高宗朝。(一)归正篇(卷一至卷四)。主要辑录史书上有关佛教的记载和尊崇佛教的文论。(二)辩惑篇(卷五至卷十四)。主要辑录历代,特别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高祖三朝,佛教与外界(帝王、道教、排佛者)之间的冲突、交诤的文论。(三)佛德篇(卷十五至卷十七)。主要辑录称颂佛菩萨的赞铭诏记等。(四)法义篇(卷十



八至卷二十二)。主要辑录东晋至唐代讨论佛教义理的各类文述。(五) 僧行篇(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主要辑录褒彰僧人德行的诔文、行状、书札,和南北朝、唐初有关僧尼管理(尤其是沙汰僧徒)的诏表等。(六) 慈济篇(卷二十六)。主要辑录止杀生、断酒肉的文论。(七) 戒功篇(卷二十七)。主要辑录有关持戒净业的文书。(八) 启福篇(卷二十八)。主要辑录施物、舍身、斋会、度僧、造寺等有关兴福的文翰。(九) 悔罪篇(卷二十八)。主要辑录忏悔文。(十) 统归篇(卷二十九、卷三十)。主要辑录晋宋以来,尤其是梁代赞颂佛教的诗赋及檄魔文。本书上采列朝帝王的诏旨敕令,下摭名士法师的各类文述,岁历数百,地贯南北。搜罗至富,刊存了大量不见他书的坠简遗文;记叙委悉,缕述了中国佛教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大至朝廷的宗教政策,一国之内的兴佛与毁佛,僧尼的管理制度,佛教与儒、道的门争。小至一个佛教理论问题的商讨,一篇诔文对僧人卒年的考定,一首诗赋对作者思想经历的表述。以至于可以说,离开了《弘明集》和《广弘明集》这两大文苑史库,就编不成中国佛教史。

三、《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 又称《沙门不敬录》、《集沙门不拜俗议》,六卷。唐彦惊撰,成于龙朔二年(663)。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二册)本等。本书为历代有关沙门是否应当跪拜君亲(即拜俗)之争的文献和事件的集录。所录,上始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下至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十月。全书分为《故事篇》、《圣朝议不拜篇》和《圣朝议拜篇》,每篇均分上下。篇末有“论曰”、“赞曰”,为作者对一篇内容的评论。总计集录奏、启、表、状、论、书、诏,以及属于叙事性质的“事”,凡一百二首。书末有彦惊写的《沙门不应拜俗总论》。(一) 故事篇(卷一、卷二)。辑录东晋至隋代有关沙门是否应当致敬王者的奏诏书论,间有叙事。(二) 圣朝议不拜篇(卷三、卷四)。汇编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下达的令沙门



致拜君亲诏令,和僧人、大臣中主张沙门不应致拜君亲的议状表启。(三) 圣朝议拜篇(卷五、卷六)。汇编在唐高宗敕令之后,大臣中主张沙门应致拜君亲的议状,以及后来唐高宗决定沙门不必致拜君王,僧人要求同时也不必致拜父母的奏状诏表。书中系统地记叙了自佛教入华以来,至作者撰书时止,所发生的六次朝廷令沙门拜俗的事件,以及沙门法献、玄畅在齐武帝面前,以“贫道”自称,自此之后沙门皆称名于帝王之事(即《齐武帝论沙门抗礼事》)。为研究佛教与封建礼仪的冲突及化解的重要资料。

四、《集古今佛道论衡》 简称《佛道论衡》,四卷。唐道宣撰,前三卷成于龙朔元年(661),后一卷成于麟德元年(664)。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二册)本等。本书为历代佛教与道教之间交争事件的叙录。所叙,上始东汉,下至唐初。全书共叙事三十四件(包括附出的一件)。卷甲,叙后汉、三国、东晋、北魏、刘宋、梁、北齐诸朝佛道论衡事十件。卷乙,叙北周、隋朝佛道论衡事六件。卷丙,叙唐高祖、太宗朝佛道论衡事十件。卷丁,叙唐高宗朝佛道论衡事七件(附一件)。它的主要特点是,不仅细致地记述了历次佛道论争的背景、缘由、人物、议题、过程、结局,而且突出地叙述了历代帝王在佛道论争中的态度、倾向、观点和政令。从而为研究当时王权与佛道的关系,以及受这一关系制约的佛道两大宗教派别势力的消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升降,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对隋代两帝、唐初三帝行业的记述,尤可注意。

五、《辩伪录》 全称《至元辩伪录》(辩或作辨),五卷。元祥迈撰,成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二册)本等。本书为元代佛道争斗史实的叙录。所载,既有实录(纪事),也有专论和有关的历史资料。卷一和卷二以收载破斥元代道士令狐璋、史志经编写的《老子八十一化图》的专论为主,兼及其他文献。下分十四节。用引一段道士所说的“八十一化”中的第几化



的原文,加一段“辩曰”的辩驳文字写成。卷三、卷四:主要记述元代佛道争斗的由来、经过和结局,属于实录性质。卷五:收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翰林院唐方、王磐等撰的《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至元十七年(1280)判决将指使人放火烧粮的道教提点甘志泉斩首,余犯或割耳朵鼻子,或流放边远的官碑;至元十八年(1281)大都报恩禅寺林泉伦吉祥长老为奉敕下火焚烧道藏所撰的文辞;祥迈撰的《如意答石介怪记》;祥迈撰的《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书中较为详细地叙说了元太祖成吉思汗时,道教中全真教的兴起;元宪宗蒙哥时,全真教对佛教寺庙与其他产业的侵占,以及佛教的反措施;元世祖忽必烈时,焚毁道藏伪经的始末。从而成为研究元代佛道争斗历史的重要资料。

六、《辩正论》八卷。唐法琳撰,约成于贞观七年(633)。法琳的生平事迹见唐彦棕《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二册)本等。本书针对武德九年(626)清虚观道士李仲卿的《十异九迷论》和刘进喜的《显正论》而作。全论分为十二篇:(一)三教治道篇(卷一、卷二)。论儒、道、佛三教与治国的关系。(二)十代奉佛篇(卷三、卷四)。记晋(西晋、东晋)、宋、齐、梁、陈、魏(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十代君臣敬信佛教的事迹。(三)佛道先后篇(卷五)。论佛教产生在先,道教产生于后。(四)释李师资篇(卷五)。论佛为老子之师。(五)十喻篇(卷六)。立从生有胜劣等“十喻”,对答道士李仲卿《十异九迷论》中的“十异”,争辩老子与释迦的高卑优劣。(六)九箴篇(卷六)。立周世无机等“九箴”,对答《十异九迷论》中的“九迷”,力辨世人奉佛非是“迷惑”。(七)气为道本篇(卷六)。谓道教的“道”本是“气”,除了“气”以外,别无“道君”、“道神”一类的天神仙官。(八)信毁交报篇(卷七)。列数种种善恶报应的事例,论证信佛则有灵验,毁佛则有恶报。(九)品藻众书篇(卷七)。



谓儒典浩汗,唯有《孝经》一书“言约旨弘,尽美尽善”。(十)出道伪谬篇(卷八)。从灵文分散谬等八个方面,对道教经典进行抨击。(十一)历代相承篇(卷八)。从道家无金刚密迹师子等方面,对道教从佛教那里引进,或者受佛教的启发而仿立的天神、节日、法器、仪式、道经进行了抨击。(十二)归心有地篇(卷八),载录梁代武帝的《舍道敕文》、邵陵王萧纲的《奉敕舍老子受菩萨戒文》。

本书是历代护法专论中保存佛教史资料最多的一部书。尤其是它的《十代奉佛篇》系统地叙载了西晋以下至唐初十代王臣的奉佛事迹,特别是历代皇帝造像立寺、设斋度僧、诵经持戒的事例,以及历代僧尼、寺庙、译经的数目等,为了解各个时期佛教概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史料,不仅为唐道宣《释迦方志》和道世《法苑珠林》所转载,而且也为后世的许多佛教史籍所征引。

七、《镡津文集》初作二十卷,今作十九卷。北宋契嵩撰,成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契嵩的生平事迹见北宋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载于《镡津文集》卷首)、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五。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二册)本等。本书是北宋云门宗(禅宗分支)名僧契嵩的个人文集。契嵩的著作传世的有《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以及这部文集。集子汇集了契嵩所撰的各种论、书、启、状、叙、志、记、铭、碑、赞、传、评、诗和杂著,内容十分丰富。卷一至卷三:《辅教编》。卷四:《皇极论》、《中庸解》。卷五至卷七前部分:《论原》。卷七后部分至卷八前部分:杂著。卷八后部分至卷九前部分:书。卷九后部分:书启。卷十:书启状。卷十一:叙。卷十二:志记铭碑。卷十三:碑记铭表辞、述题书赞传评。卷十四至卷十六:《非韩》。卷十七:古律诗。卷十八:与杨公济晤冲晦山游唱诗。卷十九:附录诸师著述。

书中最重要的是《辅教编》。它是一部护教性的小型文集。原由不同时期撰作的《原教》、《劝书》、《广原教》、《孝论》和《坛

经赞》五篇文章组成。后来,编者怀悟将《真谛无圣论》也纳入其中,成为六篇。《辅教编》作为单行本,曾被敕编入藏,在宋元明清,广为流传,影响极大。

八、《佛法金汤编》 初为十卷,后作十六卷。明代心泰撰,成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八册)本等。本书是历代帝王、宰臣、名儒、硕彦弘护佛法事迹的汇编。作者认为,这些王臣的护法事迹,犹如为佛教筑起了抵御外侮的金城汤池,故取名为《佛法金汤编》。全书所收,上始西周,下迄元末,凡三百余人。以朝代的先后为序,依次编录。每个朝代的开头,均有一段有关这一朝代的建都、起尽国主、历几代、合几年的简说。见录的人物大多是一人一传,也有一些是二人或数人的合传。在收录的人物传记中,序记铭赞、文论言语的节抄占有很大的比例,有些甚至占整篇传记的一半以至大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部资料汇编,为研究居士佛教提供了大量的极为珍贵的思想资料和历史资料,是志者编纂《大藏经》的别部《居士藏》的重要索引。

第七节 地 志

地志,全称佛教地理志,指的是以记叙佛教发源地和流布地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名胜古迹(尤其是寺塔)、人物传说和佛教状况为主,兼及其他的一类佛教典籍。一般的地理类著作,主要是用来记叙疆域、山川、风俗、物产、古迹、人物、艺文等事项的,有通记全国情况的总志,有偏记州、郡、府、县等情况的地方志,也有专记某一方面情况,如河渠、边防、风土、名胜、方物、宫室、苑囿、外国等的专志。佛教中的地理类著作,既具有一般地理志的性质,又有佛



教的内涵,它们更着力于反映佛教的历史文化。

在佛教地理志中,有记中国僧人乘危履险,西行求法的行记、外国传、西域记;有记汉地高僧九死一生,东渡传律的东征传;有记日本僧人入唐求法的行历和见闻的巡礼记;有记佛教发源地(印度)、流播区(西域等),特别是华夏佛教的兴盛地和僧众聚集地的星野、輿地、名迹、高僧、碑碣、题咏等的方志、山志;有记与佛教的信仰和传教有特殊关系的佛教名山记;有记都会郡县众多的寺塔群,或某一名刹宝塔的伽蓝(即“寺”)记、寺塔记、寺志等等。这些著作,为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印度、西域和南海诸国的历史文化;中外佛教关系;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佛教状况;佛教的建筑、雕塑、绘画、诗文、掌故、传闻等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有不少属于首次记录或独家记载的资料。因此,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外国,佛教界还是史学界,佛教地理志均享有极高的声誉。今存的较为重要的佛教地志类著作有:《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唐大和上东征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释迦方志》、《广清凉传》、《补陀洛迦山传》等。

一、《法显传》 又名《历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等,一卷。东晋法显撰,成于义熙十二年(416)。法显的生平事迹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高僧传》卷三等。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章巽校注本等。本书记叙了法显与同侣发迹长安,度沙河(又称流沙,指敦煌以西至今新疆若羌县之间的沙漠),逾葱岭(指喀喇昆仑山),历经艰辛而至北天竺,尔后周游西天竺、中天竺、东天竺,最后从海上返回的全部行程及其见闻。所记凡三十二国,依次是:乾归、耨檀(上二国在长安至敦煌之间,分别是北方十六国中的西秦和南凉)、鄯善、焉夷、于阗、子合、于麾、竭叉(上六国在敦煌至葱岭之间,在今新疆境内)、陀历、



乌菴、宿呵多、键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毗荼(上十国是北天竺和西天竺诸国,分别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和印度北部一带)、摩头罗、僧伽施、沙祇大、拘萨罗、蓝莫、毗舍离、摩揭提、迦尸、拘睢弥、达唎、瞻波、多摩梨帝(上十二国是中天竺、东天竺诸国,大部分在今印度境内,个别处于尼泊尔南部)、师子、耶婆提(上二国为归途所经)。其中达唎国系作者听闻所见,其余的三十一国均为作者游履所及。此外,还有一些未标国名的城市,如罽饶夷城、迦维罗卫城、拘夷那竭城等。书中不仅简要地记载了法显游历天竺的行进路线、住留时日及主要活动,而且真实地记叙了所经亚洲各国及我国新疆地区在公元五世纪初的历史状况,如里程、方位、山川、气候、人口、语言、风俗、物产、政治、宗教等,特别是佛教的寺庙、遗迹、僧尼数目、所习教说,以及众多的佛教传说。它是汉人从长安经西域至印度的陆路行程,和从印度泛海至中国的海路航线的最早记录。由于书中记叙的西域古国早已灭亡,典册罕存,本书便成了研究这些古国的历史变迁的稀世珍宝,因而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自十九世纪以来,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此书的著作。

二、《大唐西域记》 简称《西域记》,十二卷。唐玄奘撰,成于贞观二十年(646)。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版章巽校点本等。本书是继《法显传》之后出现的又一部蜚声海内外的佛教游记,也是研究唐代西域地区和古印度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于贞观三年(629)发自高昌,杖锡西行,周游印度各地,参学巡礼,最后赍经回国的漫长旅程中,所经行的一百一十国和听闻的二十八国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国家的名称、方位、疆域、地形、城廓、居室、种族、刑政、兵制、赋税、货币、言语、文字、教育、岁时、衣饰、饌食、礼仪、风



习、气候、田畜、物产,以及名胜古迹、人物传说、历史掌故、宗教信仰等。尤其是作者在卷二的前言中对印度概况所作的介绍,以及各卷对西域和印度各国佛教状况的翔实记载,勾勒了印度佛教产生、发展的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以及各国佛教的盛衰异同,为佛教史研究者所特重。本书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虽然都是按玄奘取经时经行的路线记述的,但在经行国家的先后顺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唐大和上东征传》一卷。日本元开(又称淡海三船)撰,成于日本宝龟十年(779),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等。本书主要记述了唐代高僧鉴真,应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等的邀请,在天宝二年(743)至天宝十二年(753)的十年间,六次东渡,五次失败,最后终于抵达日本,筑坛授戒,成为日本律宗之祖的事迹。有关鉴真的事迹,也见载于《宋高僧传》卷十四,但记载远不及本书来得详实。它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律学传入日本,并形成独立的佛教宗派的重要史料之一。

四、《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略称《巡礼行记》、《巡礼记》、《求法行记》、《入唐记》,四卷。日本圆仁撰,成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通行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版顾承甫等校点本。本书以日记的形式(其中无重要事情可记的日子略去不记),翔实地记述了圆仁入唐求法的行历和见闻,始自日本承和五年(836)六月十三日,终于承和十四年(847)十二月十四日,首尾九年七个月。内容涉及唐文宗、武宗两朝(间及宣宗朝)的朝政史事、州府地理、水陆交通、丰灾气候、市贾物价、民情风俗、牒状书简、佛道争斗、寺院状况以及与日本、新罗的关系等。原书用汉文写成,自日本明治十六年(1883)在京都东寺观智院发现它的最早抄本以来,立即被尊为日本的国宝,世人将它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纪》并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书中记叙最多最详的,乃是作



者沿途所见所闻的佛教状况,如高僧的行业;寺院的规模、职事、田产和日常生活;戒斋、诵经、礼佛和俗讲的仪式;佛教节日;朝廷的佛教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唐武宗会昌毁佛的始末经过等。这些记载均可补中国佛教史传的阙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五、《释迦方志》二卷。唐道宣撰,成于永徽元年(650)。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中华书局1983年1月版范祥雍点校本等。本书是一部记述释迦牟尼诞生地和教说流布地的佛教史迹的著作。内容包括:西域(尤其是印度)的地理环境,中印交通的路线和经行国的情况,西行求法的人物,佛教入华的传说和经像灵异,佛教住世(传世)的时数,历代帝王的奉佛事迹和寺院、僧尼等基本数据,及其他。全书共分为八篇:(一)封疆篇(卷上)。记释迦牟尼教化的世界——索诃世界(又译娑婆世界,意为忍土)的封域。(二)统摄篇(卷上)。记索诃世界铁轮山(又称铁围山)之内的情形。(三)中边篇(卷上)。从名、里、时、水、人五个方面,论证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位于“天地之中央”,非为边地。(四)遗迹篇(卷上末至卷下初)。记唐代从陆上去印度的三条路线及沿途各国的情况。其中,“东道”(这是从印度出发到中国所经道路的称谓。若从中国出发去印度,不应称“东道”,而应称“南道”)即从河州出发,经鄯州、承风戍、青海、白兰羌国、多弥国、苏毗国、敢国、吐蕃国,至北印度尼波罗国的路线,为《释迦方志》第一次予以著录;“中道”是根据玄奘回国时经行的路线写的;“北道”是根据玄奘去印度时经行的路线写的。(五)游履篇(卷下)。记西汉至唐,使者或沙门(以沙门为主)十六次出游西域的事迹。(六)通局篇(卷下)。记佛教入华的各种传说以及佛舍利(遗骨)、经像的感应故事。(七)时住篇(卷下)。记释迦如来(即释迦牟尼佛)所在的劫期和佛法住世的年限。(八)教相篇(卷



下)。记西晋至隋代历代皇帝的奉佛事迹,和寺院、译师、译经、僧尼的数目。

六、《洛阳伽蓝记》 五卷。北魏杨衒之撰,成于武定五年(547)。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版范祥雍校注本等。本书是一部以名刹大寺为主纲,中小佛寺为附目,详细地记述北魏时期洛阳城内和城外佛教寺院的兴废沿革,以及有关的史事、景物、掌故、传闻的名作。文辞秣丽秀逸,叙述委婉有致。内容包括:寺名、建寺年月和建寺者、道里位置、周围的第宅和官署、塔殿、堂廊、楼阁、房院、林池、雕塑、图像和人物故事等。全书共记大寺四十所,一些大寺之下附记了四十多所中小寺。卷一:城内。记永宁寺等九寺。卷二:城东。记明悬尼寺等十三寺。卷三:城南。记景明寺等七寺。卷四:城西。记冲觉寺等九寺。卷五:城北。记禅虚寺等二寺。

本书虽然以“伽蓝”为主题,但它所记述的具体内容却远远超出伽蓝和与之相关的佛教史素材(如人物、禅讲、节日活动等)的范围,涉及北魏时期的许多史事。被清代学者评价为:“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关,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巨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指他作的《魏书》)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核已也。”(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卷五用绝大部分的篇幅,详细地记载了北魏神龟元年(518)十一月,敦煌人宋云和崇立寺比丘惠生奉胡太后之命,出使西域,求取大乘经的经过及沿途的见闻。保存了今已失传的《宋云家纪》、《惠生行记》、《道荣传》的部分内容。它不仅是佛教寺院志的名作,也是一部很好的研究北魏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七、《广清凉传》 三卷。北宋延一撰,成于嘉祐五年(1060)。



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等。本书是一部记叙佛教名山——五台山(又名清凉山)胜迹的传记。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相传它们分别为文殊、观音、普贤、地藏菩萨的显化之地,故又称“四大道场”。其中,以五台山为最有名。有关五台山胜迹的传记凡有三部,除本书以外,还有唐代慧祥的《古清凉传》二卷、北宋张商英的《续清凉传》一卷。本书是三传中对五台山的历史、古迹、景观、物产、人物和传说等记载最为周详的一传。全书分为二十三篇。卷上,七篇,始《菩萨生地见闻功德》,终《释五台诸寺方所》。卷中,十二篇,始《菩萨化身为贫女》,终《高德僧事迹》。卷下,四篇,始《高德尼事迹》,终《大圣文殊师利古今赞颂》。

八、《补陀洛迦山传》一卷。元盛熙明撰,成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等。本书是一部记述普陀山(又名补陀洛迦山)胜迹的传记。原本分为五篇:《自在功德品》、《洞宇封域品》、《应感祥瑞品》、《兴建沿革品》、《附录》。今本在《附录》之后,尚有《观音大士赞》和《名贤诗咏》二篇,均为后人附益,而且署称“唐王勃制”的《观音大士赞》也并非王勃的作品,而是他人的伪托。

第八节 杂 记

杂记,全称佛教杂记,又称佛教笔记,指的是缀辑旧史(往昔的佛教史料),杂述闻见的一类佛教典籍。佛教杂记叙录的范围极为泛杂。诸如三宝(佛、法、僧)感应;善恶报验;朝野趣闻;丛林轶事;尊宿大德之高行;名贤士夫之酬唱;示众法语;入道机缘;大乘要籍的源流;经律论译本的序记;梵呗法乐;图像斋会;舍利佛牙;施药



舍身；以及僧俗的诗词偈颂、琐言逸迹等等，或得于碑碣册简，或得于游履清谈，莫不纤悉胪载。佛教杂记的体例也不拘一格。有的条贯缕析，分篇立题；有的信手漫录，不别类次。它们之中的多数词旨清澹，接近于史笔；也有少数铺染夸饰，接近于文学。因此，无论是佛教史学还是文学，都离不开对佛教杂记的访求和撷取。其中，较为重要的佛教杂记有：《法华经传记》、《华严经传记》、《林间录》、《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罗湖野录》、《云卧纪谈》、《丛林盛事》、《人天宝鉴》、《枯崖漫录》、《山庵杂录》、《名公法喜志》等。

一、《法华经传记》又名《法华传记》，十卷。唐僧祥撰，约成于开元四年(716)至开元二十九年(741)之间。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等。本书是一部专记传习《法华经》的人物和事情的著作。全书分为十二篇：(一)部类增减(卷一)。记叙《法华经》梵本的部类(即单部流通的各种卷本)和偈品。(二)隐显时异(卷一)。记叙《法华经》梵本的隐显经过。(三)传译年代(卷一)。根据佛经目录，记叙《法华经》的翻译年代和鸠摩罗什事迹。(四)支派别行(卷一)。记叙《法华经》的派生经。(五)论释不同(卷一)。记叙疏释《法华经》的梵本论著的传译。(六)诸师序集(卷二前部分)。收录《法华经》的序记七篇。(七)讲解感应(卷二后部分和卷三前部分)。记叙讲解《法华经》的僧人十九人的略历和感应事迹。(八)讽诵胜利(卷三后部分至卷六终)。记叙讽诵《法华经》的僧俗八十九人的略历和感应事迹。(九)转读灭罪(卷七前部分)。记叙因咏读《法华经》而得以除灭罪业的僧俗十六人的感应事迹。(十)书写救苦(卷七后部分至卷八终)。记叙因书写《法华经》而得以免除大苦的僧俗三十四人的感应事迹。(十一)听闻利益(卷九)。记叙因听闻《法华经》而得大利益的僧俗、天人，以至鸽子、毒蛇、猴、犬、蝙蝠等动物的感应事例十七则，附出“轻毁见报”的事例五则。(十二)依正供养(卷十)。记叙依《法华经·药王菩



萨本事品》烧身供佛的僧俗八人的事迹，附出“法供养”即供奉《法华经》经卷的事例和教说九则。与本书性质相同的著作有唐代慧祥撰的《弘赞法华传》十卷。《弘赞法华传》分为图像、翻译、讲解、修观、遗身、诵持、转读、书写八篇，也对《法华经》的传习源流作了记叙。但就内容的总体而言，本书要胜于《弘赞法华传》。因为它收集的资料更为广泛，记叙《法华经》的几次翻译以及译本的同异点更为详细。特别是卷二《诸师序集》载录的几篇《法华经》序记，对于研究《法华经》的译本，意义极大。

二、《华严经传记》又名《华严传》，别称《纂灵记》（新罗崔致远《法藏传》中所称），五卷。唐法藏撰，成于先天元年（712）十一月之前（为作者生平撰作的最后一部书）。通行本有《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本等。本书是一部专记传习《华严经》的人物和事情的著作。全书分为十篇：（一）部类（卷一）。记《华严经》梵本的偈品。（二）隐显（卷一）。记《华严经》的隐显经过。（三）传译（卷一）。记《华严经》的三位翻译家东晋佛驮跋陀罗、唐代地婆诃罗、大周实叉难陀的事迹。（四）支流（卷一）。依佛经目录（即经录）的注录方式，叙列和介绍相当于《华严经》某一品或某一会（一会包含一品或数品，品从属于会）的单行经，和托名《华严经》的伪妄经（即伪造的经本）。（五）论释（卷一）。记疏释《华严经》的梵汉论著，并附出有关译撰者的事迹。（六）讲解（卷二、卷三）。正传记东晋至唐代以敷弘《华严经》著称的十七名僧人的事迹，末附“博综群艺、兼弘斯典”、“既非专业、又无祥瑞”即兼习《华严经》的二十四名僧人的名单（间有小注）。（七）讽诵（卷四）。记以读诵《华严经》为恒业的僧俗十一人的感应事迹。（八）转读（卷四）。记擅长用音律唱诵《华严经》的僧俗九人的感应事迹。（九）书写（卷五）。记书写《华严经》的僧俗六人的感应事迹。（十）杂述（卷五）。著录有关《华严经》的撰述十五种，并介绍写作缘由、内容及相关事项。这



中间属法藏撰的有十一种,数量最多。本书对于研究《华严经》的流传史和华严宗的宗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作者法藏在华严宗中的地位很高,此书又是他的一部力作,而且是因为书中的一些记载(例如信奉《华严经》的民间团体“福祉”的活动情况等),或在当时流行的著作中尚未见录,或与已有见录的相异,具有他书不能取代的独立的价值。

三、《林间录》二卷。北宋惠洪撰,成于大观元年(1107)。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八册)本等。本书是一部以丛林(原指一切佛教寺院,禅宗兴起后多指禅寺,故又称“禅林”)见闻为记述内容的佛教笔记。此类文体的著作在宋代禅宗著述家中颇为流行,见存的就有好几种,而它则是其中撰作早、知名度高的一种。全书主要根据作者平日交游或触事有感的一些札记编成。所记不限于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一科、一类。凡作者认为有意义的,不论是出自缙门尊宿,还是出自名公士夫,本朝还是前代,是他人的则故事还是本人的一段经历,是见于文字的序赞偈颂还是流于口传的行迹言谈,是对人和事的评议还是读经读论的感受,莫不加以综录。全书共录三百余事,绝大多数是“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见序),即当时禅门流传的各种逸闻轶事,其次是作者的一些杂感。每事均无标题,也不分类,按先录在先,后录在后的顺序自然编排。卷上,始自“杭州兴教小寿禅师”(原书并无标题),终于“嵩明教(契嵩)”。卷下,始自“大觉禅师(怀琏)”,终于“王文公(王安石)”。本书虽然不像一般禅宗史传那样叙事较为系统集中,但它保存了佛教传记、行状、文集、语录、灯录以及作者言行的许多片段,又可作为编写史传之参考。

四、《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简称《大慧宗门武库》、《大慧武库》、《武库》等,一卷。南宋道谦编。初成于绍兴十年(1140),重编于淳熙十三年(1186)。道谦的生平事迹见《五灯会元》卷二十。



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二册)本等。本书书名中的“大慧普觉禅师”指的是临济宗杨岐派名僧宗杲。但它并非是宗杲的语录集,而是以记叙宋代临济宗(包括杨岐、黄龙二派)、云门宗僧人的言谈逸事为主,兼及其他禅林人物(禅僧与参禅的宰臣士夫)的行迹和宗杲自己的若干言语的杂录,性质上属于禅宗笔记(或称禅林笔记)。书名中所说的“宗门”,泛指禅门,而不是作者所属的某一宗某一派。全书一百余事段(或称一百余则事例)皆不立标题,随意编次。所叙及的人物大多以字号、地名或僧人法名的后一个字尊称,说出全名的较少。语言平易质朴,在禅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五、《罗湖野录》 二卷。南宋晓莹撰,成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晓莹的生平事迹见《大明高僧传》卷八。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二册)本等。本书也是一部禅宗笔记。全书共汇集宋代禅宗名衲和习禅文士的言语行事九十五则。不别门类,不立标题,按所得先后自然编次。卷上,始自“赵清猷公”,终于“乌巨雪堂行(道行)禅师”,凡四十六则。卷下,始自“蒋山佛慧泉禅师”,终于“鼎州灵岩安禅师”,凡四十九则。本书所辑录的各种资料,不仅有作者平日出处丛林,从他人的谈吐中获悉的各则消息,也有作者本人从几近湮没的断碑残碣、蠹简陈编中寻觅到的种种记载,所载基本上都是宋代禅宗宗师和士夫的言行,有很强的时代性,而且有关人物基本情况的介绍,如字、号、籍贯、俗姓、经历等,有时要较惠洪的《林间录》稍详些。具有较高的佛教史料价值。

六、《云卧纪谈》 又作《感山云卧纪谈》、《云卧纪谭》,二卷。南宋晓莹撰,约成于绍熙元年(1190)至嘉定十七年(1224)之间。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八册)本等。本书根据作者的所见所闻,共编录了宋代(主要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公卿宿衲在丛林的琐言逸迹七十六则。编次不别时间的先后和事情的性质。卷



上,始自“富弼颂书”,终于“寂音(惠洪)获谴”,凡三十二则。卷下,始自“尼慧光说法”,终于“政书记诗”,凡四十四则。由于作者平生好吟咏擅诗颂,晚年在这方面的造诣尤为深沉,故受此影响,见录于书中的宋代散逸的丛林诗词偈颂也特别多,形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七、《丛林盛事》 二卷。南宋道融撰,成于庆元三年(1197)。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八册)本等。本书共收录丛林逸事一百四十一则。除个别(如唐代的虞世南、慈恩法师窥基)以外,基本上都是北宋初年至南宋中叶禅宗各系(主要是临济宗)名僧与士大夫的禅语禅行,而以禅语为主。所录事条,皆不分类目。卷上,始“程大卿参黄龙(慧南)”,终“孝宗诏径山潜(道潜)”,凡七十则。卷下,始“宝峰祥叉手”,终“荥阳郡王”,凡七十一则。书中所载人物的言语故事,有的是从以前的禅籍(如灯录)脱胎演化而来的。也有不少人物的言语故事,是作者第一次著录的。

八、《人天宝鉴》 一卷。南宋昙秀撰,成于绍定三年(1230)。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八册)本等。本书是一部以记叙禅林尊宿的遗闻轶事为主,兼及其他教派(如儒家、道家和佛教中的教、律二派)有关修心言行的禅宗笔记。全书共收事例一百十八则,始自“唐德宗问昙光法师”,终于“永明寿(延寿)禅师”。所录各事,皆不分类目,也不立标题,然而于事例之末均注有出典。所用的资料基本上来源于见于文字的碑传实录,如传记、杂录、塔铭、石刻、文集、语录、灯录、行状、行业记、影堂记等。这与先前的几部禅宗笔记大量采录言谈资料有很大的不同。这中间有些是于世罕传的著作,如《闻道传》、《投机传》、《怡云集》等。

九、《枯崖漫录》 初名《漫录》,后将作者的字号添入书名,成为今名,又称《枯崖和尚漫录》,三卷。南宋圆悟撰,成于景定四年(1263)。通行本有《卍续藏经》(第一四八册)本等。本书是作者根



据平昔的闻见,哀集南宋中叶以来禅林大德和参禅学道的仕宦的人道机缘、示众法语及其他禅迹而成的禅宗笔记。全书共收录事例一百四十七则。不立标题,也不标出处。卷上,始“圆通宗照”,终“秀岩瑞禅师”,凡四十九则。卷中,始“祖贤首座”,终“平江府虎丘坳堂济禅师”,凡五十一则。卷下,始“蒙庵聪禅师”,终“平江府开元别翁甄禅师”,凡四十七则。所用的资料,有些得之于言谈口传,有些得之于残编短偈。由于它撰于南宋悟明的《联灯会要》、正受的《嘉泰普灯录》、普济的《五灯会元》之后,故其中有许多人物为灯录所未收;有些人物虽然已见录于灯录或其他禅书,但有的在机缘语句方面有脱漏,有的在某项史实方面有些差错,而本书所载正可以用于补正。

十、《山庵杂录》二卷。明无愠撰,成于洪武八年(1375)。无愠的生平事迹见《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通行本有《卮续藏经》(第一四八册)本等。本书共收录作者平昔游历丛林,从师友的谈论、湖海的见闻中,所获自南宋末年以来,迄明代开国之初为止(以元代为主),丛林大老(与“尊宿”、“大德”等同义)的出处言行、僧俗的善恶报应故事,以及作者的行履实录和对人、事的评判议论,凡一百二十九则。每一事段之首不立标题,其末不标出典,篇次无定例。卷上,始“定水宝叶和尚”,终“易首座(字无象)”,凡六十八则。卷下,始“湖州妙觉期堂僧净”,终“皇朝洪武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坛主德颺会十师,大开戒法”,凡六十一则。本书在学术上的一大特色,是作者对一些禅林作品的记载和评论,使这个为南宋以来禅宗笔记的撰作者所一直忽略的重要方面,重新受到关注。明代禅林人士对之评价甚高,将它列为“宗门七书”之一(见《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二)。

十一、《名公法喜志》略称《法喜志》,四卷。明夏树芳撰,约撰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通行本有《卮续藏经》(第一五〇册)本



等。本书是一部哀集历代名儒宰官和忠孝节义之士歆羨佛教、体契佛理的事迹而成的著作。全书所收，上始西汉武帝时的东方曼倩（即东方朔），下至元末明初的杨铁崖（即杨维禎），凡二百八人，其中与禅宗有关连的约占三分之二。每人一传，大多以人物的字号为传名。卷一：始东方曼倩（东方朔），终苏琼，凡五十五人。卷二：始陶贞白（陶弘景），终裴宽，凡五十七人。卷三：始白少傅（白居易），终刘元城（刘安世），凡四十八人。卷四：始胡康侯（胡安国），终杨铁崖（杨维禎），凡四十八人。每篇小传先寥寥数语介绍人物的姓名、字、籍地、行历、才学、性情、交游等，然后着重记叙他与佛教的因缘，如与佛教有关的一件事、一篇文章、一首诗颂、一封书信、一次谈论等。传末阙注出典。本书虽然卷帙不多，而蕴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历代名士的佛教因缘于中可以略见一斑。

第八章 汉文《大藏经》的源流与版本

《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详而述之,它也是综罗传世的一切经律论以及经审选后确定的其他佛教撰著,分类编次的大型佛教丛书。

第一节 《大藏经》的由来

“大藏经”一词,是中国佛教首先创用的。

在印度佛教中,人们常见的与大藏经同义的用语是集合经藏、律藏、论藏而说的“三藏”。除此之外,小乘佛教中的某些部派也有在“三藏”的基础上,增立杂藏(如大众部),或咒藏(如上座部中的犍子部)而说“四藏”的。增立咒藏、菩萨藏(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或杂集藏、禁咒藏(如大众部中的一说部)而说“五藏”的;大乘佛教也有说“二藏”(声闻藏、菩萨藏),或“八藏”(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见《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经品》)的,但迄今为止,尚未在汉译佛经中发现有“大藏经”一词。

在中国佛教中,最早使用“大藏经”一词的,是隋代天台宗人灌顶所著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作者在传文的最后引“铎法师”



的话,对智顛一生的业绩作了概括:“铎法师云:大师所造有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人,造栴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不可称数。”中国佛寺建筑中历来都有专门存放佛经的“藏经楼”,而钞写、讽诵、讲解、疏释、听闻、供养佛经,历来是佛教僧俗修行积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铎法师所说的智顛生前造“大藏经十五藏”,显然是指请人抄写的旨在供藏经楼收藏的当时传行的各种佛经十五套。这与后人在“佛教经典总汇”的意义上使用“大藏经”一词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在当时及以后的一个相当的长时期内,“大藏经”一词并没有被佛教学者所广泛使用。从考据学的观点来看,东汉至隋代用来指称“大藏经”的,乃是“藏经”、“众经”、“一切经”,尤其是佛经目录学著作,较多使用是的“众经”一词,如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道流《众经录》、僧睿《二秦众经目录》、刘宋佚名《众经别录》、南齐县宗《众经目录》、梁代僧绍《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宝唱《梁世众经目录》、北魏李廓《魏世众经目录》、北齐法上《齐世众经目录》、隋代法经等《众经目录》、彦琮等《众经目录》等等。唐代使用较多的是“一切经”一词,如静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郭遵《新定一切经类音》等。就连上面提到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大藏经”一词,在道宣所作的《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顛传》中也改作“写一切经一十五藏”。可见“一切经”为当时流行的说法。

只是从五代开始,特别是自北宋以后,“大藏经”一词见于典册的次数日益增多,呈现出逐渐取代“众经”、“一切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普遍使用的佛教术语。这可从五代时后周行瑫的《大藏经音疏》、北宋文胜的《大藏经随函索隐》、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等著作的题名中得到印证。随着中国佛教的对外传播,“大藏经”



后来也成为朝鲜、日本佛教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

我国古代典籍的载体和传播形式,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大体说来,在商代是以甲骨为主,西周是以金石为主,春秋至西汉是以竹简和帛书为主,东汉至唐代是以写本为主,五代至清末是以刻本为主。与之相对应的是,自东汉末年才开始出现的汉文佛经,在北宋以前,一般是以手钞的写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的。其间虽然也伴有其他形式,如自北齐开始出现的刻在石壁、摩崖、石板上的石经,自晚唐开始出现的个别佛经的雕印(后详),但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由单本佛经汇聚而成的汉文《大藏经》,在东汉末年至五代是以手钞本(写本)为主,北宋至清代是以木刻本为主,近代是以铅印本为主,现代是以电脑排印本为主。

写本《大藏经》是怎样构成的呢?

从历史上看,由于各个朝代都有陆续译出的新的佛经,佛经的总量在不断地递增;各种佛经目录在对佛经的甄别、著录、分类、编次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各《大藏经》屡受社会环境、物质条件以及文化交流渠道的制约,很难将传世的佛经无一遗漏地搜集起来,这在像东晋南北朝那样的分裂割据的年代里尤其是如此,因此,写本《大藏经》的构成是不确定的,出于不同的年代和地域的《大藏经》所收的佛经的名目部卷及其编制方式是不同的。

就其同一性而言,凡是历代佛经目录中有著录的,翻译有源的佛经,以及当时新译的佛经,都是各种写本《大藏经》搜集的对象。特别是自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中首创《入藏录》,开列了应当入藏流通的佛经目录以来,一些重要的佛经目录,如唐代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明佺等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也纷纷依仿而设立《入藏录》。这就为写本《大藏经》的编集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一些写本



《大藏经》在收录典籍和分类编次上的差殊，便是由所据《入藏录》的不同造成的。敦煌文献中的《龙兴寺藏经目录》，就是以《大唐内典录》中的《入藏录》(全称《历代众经总摄入藏录》)为基础编集的(见方广钊《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版)。

刻本《大藏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业始于中唐。最早记载雕印之事的是唐代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所作的《序》。《序》中说，白居易所作的一些诗篇，在当时广为传诵，“至于缮写摹勒(刻印)，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此序作于穆宗长庆四年(824)，说明那时在南方的扬州、越州，已经有人刻印白居易的诗，用来卖钱，或换酒茶。也就是说，已经有刻本在民间流传。继之，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东川节度使冯宿在《禁版印时宪书奏》中说，在剑南的西川、东川(今属四川)和淮南道(今属江苏、安徽)，每年在朝廷颁下新历之前，早已有“版印历日(日历)鬻于市”(《册府元龟》卷一六〇)。僖宗中和三年(883)，中书舍人柳玭在四川时，看到书摊上出售的书籍，“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柳氏家训序》)。至五代，雕印业终于形成规模经营。

后唐宰相冯道首创并主持雕印儒家要典“九经”(《诗》、《书》、《礼》、《易》、《春秋》、《左传》、《论语》、《尔雅》、《孝经》)以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经典释文》。后蜀宰相毋昭裔也以私财刻“九经”、诸史、《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另外，前蜀任知玄以俸钱雇人雕印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后晋高祖石敬瑭敕令雕印《道德经》，这样儒、道二家的要典都有刻本了(以上见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2 月版)。

这种情况反映到佛经的流通上，就是在晚唐已出现了单本佛



经的刻本。现存的最早的实物,就是近代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人王阶刻于懿宗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此经后被英人斯坦因掠走,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继之,则有1917年在湖州天宁寺经幢中发现的、五代时吴越王钱弘俶于显德三年(956)敕令雕印的《宝篋印陀罗尼经》。入宋以后,崇尚佛教,曾“手写《金刚经》,常自读诵”的宋太祖赵匡胤,为弘扬佛法,扩大佛经的流布,于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宫廷的内侍)张从信到印刷业较为发达的益州(四川成都),以《开元释教录》中的《入藏录》为基准,并以千字文标写帙号,雕造了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世称《开宝藏》(后详),以此为标志,汉文《大藏经》步入了刻本时代。

刻本《大藏经》与写本《大藏经》相比,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是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分类法则和见录典籍为基础刊行的。尽管刻本《大藏经》同样也遇到写本《大藏经》所面对的汉文佛典的总量在不断递增的问题,但一般是采用在《开元录·入藏录》所收典籍的基础上,增补新编入藏的经典的办法来解决的。也就是说,各种木刻本《大藏经》的主体部分是同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增补部分上。这增补的入藏经主要是有三部分构成的:《开元录·入藏录》遗漏未收的经典;《开元录》撰成以后新译出的经律论;新编入藏的中国佛教撰著。

现在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开元录·入藏录》是没有千字文帙号的,而刻本《大藏经》均有千字文帙号,这千字文帙号是从哪里来的?

凡是读过《开元录》的人都知道,《开元录》中有一录名为《有译有本录》,专门收载佛经目录上有著录或经本上署题译人(有译),并有传本行世(有本)的佛典。下分菩萨(指大乘)三藏录、声闻(指小乘)三藏录、圣贤传记录三项。《菩萨三藏录》的构成是:一菩萨契经藏。包括大乘经重单合译(相当于一般经录上说的重译、重



翻、同本异译)和大乘经单译。其中,大乘经重单合译又分:《般若经》新旧译、《宝积经》新旧译、《大集经》新旧译、《华严经》新旧译、《涅槃经》新旧译、五大部外诸重译经六目。二菩萨调伏(律)藏。三菩萨对法(论)藏,下分大乘释经论、大乘集义论二目;《声闻三藏录》的构成是:一声闻契经藏。包括小乘经重单合译和小乘经单译。其中,小乘经重单合译又分:根本《四阿含经》、《长阿含经》中别译经、《中阿含经》中别译经、《增一阿含经》中别译经、《杂阿含经》中别译经、《四阿含》外诸重译经六目。二声闻调伏藏,下分正调伏藏、调伏藏眷属二目。三声闻对法藏,下分有部根本身足论、有部及余支派论二目;《圣贤传记录》的构成是:一梵本翻译集传,二此方撰述集传。总计收经一千一百二十四部五千四十八卷。

《开元录》中的《入藏录》就是依据《有译有本录》编制。但在移录过程中,为了简约起见,有些地方也作了变动。这主要表现在:将《有译有本录》中的若干标题类目作了改动或删略,如将“菩萨三藏录”、“菩萨契经藏”、“菩萨调伏藏”、“菩萨对法藏”分别改为“大乘入藏录”、“大乘经”、“大乘律”、“大乘论”,将“声闻三藏录”、“声闻契经藏”、“声闻调伏藏”、“声闻对法藏”分别改为“小乘入藏录”、“小乘经”、“小乘律”、“小乘论”,将“圣贤传记录”改为“圣贤集传”,删略了大乘经中“般若部”等五大部的类名,另外还删去了每部佛典的译撰者(包括年代)以及一些考证性文字(如第几译等),所录的项目仅限于经名、卷数(包括异名、异卷)、合帙(那几部书合为一帙)、用纸(此为《有译有本录》中所无)。但收录典籍的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先后程序仍保持不变。从表面上看,《入藏录》所收典籍的总数为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合成四百八十帙,在部数上较《有译有本录》少了四十八部,但正如智昇自己所解释的,那是因为《大宝积经》一部,在《有译有本录》中是按它所分的四十九会作四十九部计算的,而在《入藏录》中则作一部计算(见《开元释教录》



卷十九之末的附语),因此,《入藏录》和《有译有本录》实际收录的典籍的部卷是相同的。

由于《开元录》考订精审,分类得当,其学术质量居历代佛经目录之冠,故自问世以后,备受世人的赞誉和推崇,越来越多的佛教学者将它作为搜集、点勘佛经的主要依据。在这种社会需求的作用下,《入藏录》像许多佛经既有大部(大经),又有根据大部中某一部分内容编成的别生经(小经)一样,也产生了它的单行本——《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

《略出》作为离开母本《开元录》单独流行的著作,为着内容上的完整性,重新恢复了《有译有本录》中有,而被《入藏录》删去的一些类名和每部佛典的译撰者(包括年代)。另外在部卷、用纸、合帙等项目上也作了一些改动。例如,新收了隋达摩笈多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曹魏白延译的《须赖经》二卷、东晋卑摩罗叉译的《(十诵律)后毗尼序》三卷、未曾翻译的《施設足论》一万八千颂,删去了《入藏录》中误录的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申日儿本经》的异名《申日经》一部。故《略出》所收的典籍的帙数实际为四百七十九帙,千字文编号为“天”至“群”字;部数为一千七十八部(《施設足论》不计在内);卷数为五千六十二卷(以上参见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版,以及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2月版)。

至于《开元释教录略出》是否为智升在完成《开元录》之后另行编撰的一部书,因史料缺乏,尚难断论。按情理推断,《略出》作为《入藏录》的传钞本,很可能是后人抄录的,千字文帙号也可能是钞者添加的。但由于《略出》的基本内容出自《开元录》的《入藏录》和《有译有本录》,故将它定为智昇的著作也是可以的。这与先秦的一些古籍如《庄子》、《荀子》等都有后人增益的成份,但世人仍称为



“庄子撰”、“荀子撰”一样。说汉文《大藏经》中的千字文帙号肇始于《略出》也是对的。只不过千字文帙号究竟是智升所编,还是后人所编,尚可进一步讨论。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对智升的中晚年活动一无所知,即使是为智昇立传的北宋赞宁,他也不知道智升的里籍、行历和生卒年代(见《宋高僧传》卷五),这又为智昇在《开元录》之后另编这部《略出》留出了考证的余地。

千字文帙号的出现,使刻本《大藏经》趋于定型化,自《开宝藏》之后出现的各种刻本《大藏经》都是沿用《略出》的千字文帙号编制的,即使有新续入藏的经典,其合帙的帙号也是依前顺延的。

刻本《大藏经》对于佛教经典的整理与流传,乃至整个佛教文化的积累与传播,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的历史作用。今存的抄本佛经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为最多,约有数百种,但绝大多数残破不全,仅为零卷残片。首尾完整、内容齐全的本子只有几十种,而且由于抄写潦草,错讹衍脱之处比比皆是。至于保存在国外(如日本)的唐代写本佛经也是于世罕见。因此,汉译佛经依赖于木刻本而得以大量印行并传至今日,而集刻本佛经之大成的便是刻本《大藏经》。即使到了近现代,刻本《大藏经》也仍然在影印使用,一些采用明智旭《阅藏知津》的分类法或新的佛典分类法编制的铅印本和电脑排印本《大藏经》,其收录佛典的底本绝大多数也来自刻本单经或刻本《大藏经》。

汉文《大藏经》的版本众多,自北宋初年《开宝藏》雕印以来,迄今为止,在我国和高丽(韩国)、日本雕印(或排印)的汉文《大藏经》约有四十种。但这只是一个概数,因为要确切地说出历代藏经的版次是十分困难的。其中的原因有:古代的一些版本,大多在流传过程中散失,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仅数部而已。而在《大藏经》雕印的同时,佛经的单行本也在雕印,今存的一些带有千字文帙号和题记的刻本佛经,既可能是历史上某种《大藏经》的组成部分,也可



能是据某种《大藏经》翻刻的单行本；有些《大藏经》，史书上有过片言只语的记载，但由于没有实物传世，它们究竟是一种仅刻了几部佛经而告中止的计划，还是实际完成的大藏，便成了悬案；刻本《大藏经》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反复印刷，在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中，会增入一些佛典，替换一些损坏的旧版，因而出现一些差异。另外，对各版《大藏经》所收典籍的考校也有待进一步深入。这是因为：有些《大藏经》有藏经目录传世，有些则没有。但《大藏经》的目录与实际雕印的情况有时存在着不一致。如果目录编制在先，实际雕印在后，则实际雕印时所作的变更在目录中没有反映出来。反之，如果目录是在全部藏版刻完后编制的，同样也会在帙、部、卷的增减分合及相关的统计数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将一部经典重复收录（编在不同的帙号里）的情况也不少（见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

本章将介绍历代雕印或排印的汉文《大藏经》二十九种，内容包括：它们的名称、雕印年代、地点、主持人、始末经过、结构分类、所收部卷、装帧形式、版式、目录，以及存佚情况等。同时，为完备起见，兼叙二十九种《大藏经》的版本以外的，尚无定论的十一种藏经版本（一般放在“其他”一项中叙述，也有的放在一节的开头介绍）。

第二节 宋版·辽版·金版

宋代雕印的《大藏经》主要有：北宋的《开宝藏》、《崇宁藏》、南宋的《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磧砂藏》。

辽代雕印的《大藏经》有：《契丹藏》。

金代雕印的《大藏经》有：《金藏》。



另外,还有两种宋代刻本待考:《婺州藏》、《明州藏》。

一、开 宝 藏

《开宝藏》,又名《开宝大藏经》、《北宋敕版大藏经》、《蜀版大藏经》、《蜀版》、《蜀本》。官版。宋太祖敕令雕印。始刻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完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前后历时十二年。主持人为奉敕监造的高品(内侍官名)张从信,刻藏的地点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全部经版总计十三余万块在刻成之后,运回汴京(今河南开封),贮藏在太平兴国寺译经院西侧新建的印经院,译经院和印经院合称“传法院”,为北宋朝廷主持运转的翻译、雕印、流通佛经的总机构。《开宝藏》即是在那里不断印刷,流向天下寺舍的(见北宋慧宝《北山录·外信篇》注、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等)。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以《开元释教录略出》为基本目录,并稍作变动编成。全藏总计四百八十帙(千字文帙号为“天”至“英”),收经一千八十一部五千五十七卷(见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与《略出》相比,《开宝藏》少收了《大方等大集日藏经》(隋那连提耶舍译)、《大集月藏经》两部;增收了《须摩提经》(唐菩提流志译)、《不空罽索神咒心经》(同上)、《月灯三昧经》(别本,称“刘宋释先公译”)、《弥勒下生经》(西晋竺法护译)、《积骨经》(同译,原附于《七处三观经》之中)五部。另外,在一些经典的卷数及编次上也与《略出》存在着相异之处。如《放光般若经》,《略出》作三十卷,《开宝藏》作二十卷;《无量清淨平等觉经》,《略出》作二卷,《开宝藏》作四卷。同一帙号内收录的经典也不尽相同。



《开宝藏》刻成之后,前后印刷了一百四十年之久。在印行过程中,由传法院的僧人加以校勘,改正了初刻本土的一些错讹的文句,损坏的版子和有错别字的地方也及时得到了更正。同时陆续增刻了一批新编入藏的经典,从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版次和印本(版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三种: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至真宗咸平(998—1003)年间修订的“咸平本”;真宗天禧(1017—1021)初年修订的“天禧本”;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熙宁四年(1071)修订的“熙宁本”。所增补的经典包括:唐代智升撰《开元释教录》时已经译出、但遗漏未编的佛经;《开元释教录》以后新译的佛经;北宋译经院新译的佛经;经朝廷准许,和熙宁四年(1072)印经院停办后,由经管《开宝藏》续印事宜的显圣寺圣寿禅院审定后编入的中国佛教撰著(有佛教史传,也有章疏和其他佛教作品)。其中有: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药事》、阿质达霰译的《大乌枢瑟摩明王经》、金刚智译的《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不空译的《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王经》、《宝篋印经》、《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佛顶尊胜念诵法》、北宋施护译的《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大明观想仪轨》、法贤译的《无量寿庄严经》、天息灾译的《楼阁正法甘露鼓经》、唐道世撰的《法苑珠林》、宋太宗撰的《秘藏诠》、赞宁撰的《宋高僧传》、道原撰的《景德传灯录》、赵安仁等编的《大中祥符法宝录》,等等。据统计,续刻的经典总计有一百五十九帙,四百四十九部一千五百四十七卷。初刻和续刻两项相加,《开宝藏》最后收录的经典已达六百三十九帙,一千五百三十部六千六百四卷(见童玮《北宋开宝大藏经雕印考释及目录还原》)。

《开宝藏》的装帧形式为卷子本。即将印出来的纸一张一张粘连起来,然后粘在卷轴上,以卷轴为中心将它们卷起来,便成了一卷。版式为每版(又作板,印一张纸)二十三行(第一版有时为二十二行),每行十四字。第一版的起首用大字刻写经题、卷次、帙号,



此下各版的板首用小字刻写经题、卷次、张次(第几张)、帙号。每卷之末往往用大字刻写雕造的年代,印本上有时加盖印工的名章、施经愿文、执事僧等墨记,这些构成了通常所说的题款。

《开宝藏》初刻和续刻的印本,曾作为朝廷的礼物赠送给日本、高丽、女真国、西夏国,影响扩大到邻国。它是木刻本《大藏经》共同的祖本。后来问世的《初刻高丽藏》、《赵城藏》是以《开宝藏》的初刻本为底本雕刻的;《契丹藏》是以《开宝藏》的天禧本为底本雕刻的;《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是以熙宁本为底本雕印的(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宋刻蜀版藏经》)。另外,有学者认为,北宋惟白于崇宁三年(1104)撰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王古于崇宁四年(1105)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所据的本子为《开宝藏》的咸平本。此事的详实情况尚待进一步研究对勘。总的来说,和多数木刻本《大藏经》存在着初刻和续刻的情况一样,《开宝藏》的前后印本也是不一样的。

《开宝藏》初刻本和续刻本的全藏已佚。我国保存的散本有:《大般若经》卷二百六、卷五百八十一、《大方等大集经》卷四十三、《阿惟越致遮经》卷上、《中论》卷二(残缺)、《杂阿含经》卷三十九,它们分别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山西省博物馆、山西省高平县文博馆。日本保存的散本有:《华严经》卷一、《佛本行集经》卷十九、《十诵尼律》卷四十六、《龙树菩萨劝戒王颂》一卷。它们分别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南禅寺、东京书道博物馆等。由于《开宝藏》一般在卷末刻有“雕造”(雕版)的年次、干支,有时加盖长方形的、记载“印造”(印刷)的年月和人员的墨印,这对于考证雕版和印刷的年代提供了便利。从中可知,《大般若经》卷二百六雕造于开宝五年(972),印刷于元符三年(1100),为传世诸卷中雕造年代最早的本子之一;《十诵尼律》卷四十六雕造于开宝七年(974),印刷于大观二年(1108),为传世诸卷中印刷时间最晚的



本子之一。

二、崇宁藏

《崇宁藏》，又名《东禅寺大藏经》、《崇宁万寿大藏》、《崇宁万寿藏》、《东禅寺本》、《闽版》、《闽本》。私版。宋代福州东禅等觉院（位于闽县城外白马山），劝募雕印。始刻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完成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发起人为东禅等觉院住持冲真、参知政事元绛等，主持人为刻院历任住持冲真、智华、智贤、道芳、普明等。

据北宋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十四记载，普明为临济宗黄龙派僧人，故此藏也可以说是临济宗雕造的一部《大藏经》。起初是以“上祝今上皇帝（指神宗）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的名义发起刊刻的。崇宁二年（1103），经福州籍的礼部员外郎陈旸的活动，东禅等觉院被升格为崇宁寺——天下各州设立的祝徽宗皇帝“圣寿”的官寺。新刻的《大藏经》也被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其印本颁与各地的崇宁寺。

《崇宁藏》的初刻本大体上依《开元释教录略出》雕造，总计四百八十函（千字文函号为“天”至“英”），收经一千八十七部。与《略出》相比，《崇宁藏》初刻本所收的经典有增有减，前后顺序也有出入。《崇宁藏》增收的经典有：《观弥勒菩萨下生经》、《奈女耆婆经》、《咒时气病经》、《檀特罗麻油述经》、《辟除贼咒害经》、《咒小儿经》、《咒齿经》、《咒目经》、《开元释教录略出》等；减少的经典有：《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瑜伽师地论释》、《显扬圣教论颂》等。

另外，还有开合上的不同，如在《略出》中，《阿弥陀经不思议神



力传》是附在《阿弥陀经》之后,《诸礼佛忏悔文》为《集诸经礼忏文》的组成部分,而在《崇宁藏》中它们各自独立,分作二部,如此等等(见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该书还提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也是《崇宁藏》较《略出》新增的经典之一,但笔者翻检《福州东禅大藏经目录》发现,《崇宁藏》所收的是《刊定众经目录》,即《略出》也收录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并无《贞元新定释教目录》)。

东禅等觉院在《崇宁藏》初刻本告成以后,又利用印经的收入,进行了续刻入藏经的工作。所刻的经典为《开元释教录》以外和以后的翻译佛经和东土撰著。其中,徽宗大观七年(1107)至政和二年(1112)续刻了八十四函。编次具有随机性,次第为:(一)唐代佛教撰著。收《法苑珠林》(道世撰),十函(函号为“杜”至“罗”)。(二)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至咸平二年(999)新译经。收《大乘庄严宝王经》(天息灾译)、《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法天译)、《分别善恶报应经》(天息灾译)等,二十函(函号为“将”至“穀”)。(三)宋代佛教撰著。收《景德传灯录》(道原撰)、《宗镜录》(延寿撰)、《天圣广灯录》(李遵勗撰)、《建中靖国续灯录》(惟白撰)、《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同上)、《御制秘藏诠》(宋太宗撰)等,二十六函(函号为“振”至“衡”)。(四)北宋咸平三年(1000)以后新译经和《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圆照撰)新编入藏经。收《大集法门经》(宋施护译)、《集大乘相论》(同上)、《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宋法护译)、《本生心地观经》(唐般若、利言译)、《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唐不空译)等,二十八函(函号为“庵”至“勿”)。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至淳熙三年(1176),东禅等觉禅院又续刻了十六函(函号为“多”至“虢”)。所刻的经典,以天台宗“三大部”及其注释为主,兼及禅宗、华严宗的一些撰著。有《大慧语录》(宋宗杲撰)、《法华玄义》(隋智顓撰)、《法华文句》(同上)、《摩



诃止观》(同上)、《华严合论》(唐李长者撰)等。这样,《崇宁藏》最后已达五百八十函(千字文函号为“天”字至“號”字),收经一千四百四十部六千三百十二卷(另说,《崇宁藏》前后所刻,有“五百九十五函”、“一千四百五十部”、“六千四百三十四卷”或“六千一百零八卷”)。

与《开宝藏》不同,《崇宁藏》的装帧形式为梵夹本(又称折装本、折叠装)。这在木刻本《大藏经》中是第一部。每版(印一张纸)的版心高约二十四公分,宽五十八公分。上面刻三十行,每行十七字(补刻的天台宗三大部及其注释,每行为十九字)。每版折成五面(也有称为五页、五个半页的),这样,每面的实际行数是六行。版心上下有界线,中缝(折叠处)刻经名、函号、卷次、纸序和刻工姓名,偶尔还刻施主姓名。每卷的第一版(第一页)还在经题前空出三行或四行,刻写题记(刻藏愿文和雕刻年代),唯《大般若经》六百卷的卷头无题记,可能是由于它的雕刻年代更早(也许在元丰三年以前)的缘故。每一函之末均附有音释(解释经文中难识和难懂的字)。《崇宁藏》的这种版式,为其后的《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磻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所沿用,影响至为深远。

《崇宁藏》今存。日本宫内省、高野山劝学院、高野山上醍醐寺、京都东寺都存有它的全藏。不过,其中的一些印本是用福州开元寺刻的《毗卢藏》补缺的,故见存的《崇宁藏》实际上是两藏的混合本。

《崇宁藏》的总目名为《福州东禅大藏经目录》,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三册)。据考证,《目录》中所列的一些经典,是据《毗卢藏》补足的。



三、毗卢藏

《毗卢藏》，又称《毗卢大藏经》、《开元寺大藏经》、《福州开元寺本》。私版。宋代福州开元寺（位于闽县城内东芝山）劝募雕印。始刻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发起人为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本明、本悟等，主持人为开元寺历任住持本明、法超、惟冲、必强、了一。据《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十五记载，本明为曹洞宗僧人，故此藏也可以说是曹洞宗雕造的一部《大藏经》。

《毗卢藏》的初刻本为五百六十四函（函号为“天”至“勿”）。与《崇宁藏》相比，增收的经典有：《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宝陀罗尼经》、《瑜伽师地论释》、《显扬圣教论颂》、《王法正理论》、《大方广圆觉经略疏注》等；减少的经典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唯识三十论》、《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菩萨名经》等。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开元寺又在“时”、“阿”函收入《传法正宗记》和《辅教编》，以替代原先的《注入楞伽经》和《注楞伽经纂》。乾道八年（1172），补刻了三函（函号为“多”至“实”），增收《大慧语录》和《大慧普说》（这在《崇宁藏》中也有）。初刻和续刻两项相加，《毗卢藏》最后已有五百六十七函（函号为“天”至“实”），收经一千一百十七卷（也有人根据《崇宁藏》和《毗卢藏》的混合本，说“全藏五百九十五函，一千四百五十一部，六千三百三十二卷”，一说“总计一千四百六十四部”）。

《毗卢藏》的装帧形式和版式依遵《崇宁藏》。也是梵夹本。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各卷之首均有题记，但各函之末缺音释。其版面略小于《崇宁藏》。



《毗卢藏》全藏已佚，今存散本。其散本混编在日本保存的各种《崇宁藏》本子（据小野玄妙调查，共有七部）。

《毗卢藏》的总目名为《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一册）。但这一目录已非《毗卢藏》的原目，而是《毗卢藏》与《崇宁藏》的混合目录。至今，人们对《毗卢藏》究竟收录了多少部经典，合计有多少卷，说法不一，是由于缺失原目可考造成的。

四、圆觉藏

《圆觉藏》，又名《圆觉禅院大藏经》，《思溪圆觉藏》、《前思溪藏》、《思溪版》、《浙版》、《湖州本》。私版。宋代湖州思溪圆觉禅院（位于浙江湖州）雕印。始刻于北宋徽宗（1101—1125 在位）末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发起人为密州观察使王永从、其弟崇信军承宣使王永锡等，主持人为思溪圆觉禅院住持怀深、平江府大慈院住持净梵、湖州觉悟教院住持宗鉴（天台宗人）等。由于圆觉禅院乃是王氏一族在其家乡——两浙道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村创建的寺院（并建有十一层佛塔和印经坊），雕版印经的费用也来源于王氏家族的捐赠，故以一族之财力刻成一部《大藏经》，这在汉文《大藏经》的雕印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圆觉藏》是参照《崇宁藏》的结构（包括初刻和续刻），略作增减分合刻成的。全藏总计五百四十八函（函号为“天”至“合”。原刻上的王氏题记称有“五百五十函”，可能是误计了其中的两函的函号），收经一千四百三十五部五千四百八十卷。其结构为：（一）《开元释教录略出》所录入藏经（始《大般若经》，终《护命放生仪轨》）并附（《略出》、《释音精严集》）。（二）唐代佛教撰著《法苑珠



林》。(三)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至咸平二年(999)新译经(始《大乘庄严宝王经》,终《仁王护国经》)。(四) 宋太宗佛教撰著五种(《御制逍遥咏》、《御制缘识》、《御制秘藏论》、《御制佛赋》、《御制显源歌》)。(五) 北宋咸平三年(1000)以后新译经和《续开元录》所录入藏经(始《未曾有正法经》,终《百八名真实圆义陀罗尼经》)。(六) 补编和拾遗(《大宋高僧传》、《南本大般涅槃经》)。

与《崇宁藏》比较,增收的经典有:《仁王护国经》、《大乘密严经》、《南本大般涅槃经》、《释音精严集》、《宋高僧传》等;减少的经典有:《千手千眼观音大悲心陀罗尼咒本》、《普遍智藏般若心经》、《千手千眼观自在真言释》等。

《圆觉藏》的装帧形式和版式与《崇宁藏》相同。为梵夹本,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各函之末有音释。但绝大多数经典的卷首无题记,这是与《崇宁藏》相异的。

《圆觉藏》今存。日本东京增上寺存有它的全藏。

《圆觉藏》的总目名为《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上下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三册)。

五、资 福 藏

《资福藏》,又名《资福禅寺大藏经》、《思溪资福藏》、《后思溪藏》、《宋藏》、《宋版》、《宋本》。私版。宋代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雕印。据考证,“安吉州”一名是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由湖州吴兴改名而来,而“思溪法宝资福禅寺”是思溪圆觉禅院在获赐“法宝资福禅寺”的匾额以后的名称,并非是两所不同的寺院。另外,从传今的《资福藏》的印本来看,《资福藏》所保存的一些题记实际上都是《圆觉藏》印本上的题记。故《资福藏》实际上是在《圆觉



藏》的基础上,于淳祐年间(1241—1252)进行补刻,并对个别经典作了增移分合的调整而成的。

《资福藏》总计五百九十九函(函号为“天”至“最”),收经一千四百五十九部(一说一千四百六十三部)五千七百四十卷(一说五千七百十四卷)。其结构为:(一)前五百四十八函(函号为“天”至“合”)一千四百三十七部,大体上据《圆觉藏》经版重印,始《大般若经》,终《南本大般涅槃经》。其中,增收了《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舍利弗目犍连游四衢经》两部,个别经典有分合之异。(二)后五十一函(函号为“济”至“最”)二十四部,为后来补刻,始《宗镜录》,终《大藏经目录》(指《资福藏》目录)。其中《宗镜录》、《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决》、《大藏一览集》、《大乘集菩萨学论》、《福盖正行所集经》、《施設论》等二十一部为《圆觉藏》所阙,而《资福藏》新补。《大乘中观释论》、《海意菩萨初心净印法门经》、《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三部为《圆觉藏》原有,可能是因为原版已损坏,重新雕版以后,编在后面。

《资福藏》的装帧形式与版式与《圆觉藏》相同。为梵夹本,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

《资福藏》今存。我国的北京图书馆,日本的东京增上寺、日光轮王寺、琦玉喜多院、爱知岩屋寺、岐阜长流寺、京都大谷大学、奈良唐大招提寺、大和长谷寺,均有它的全藏。其中,北京图书馆所藏缺六百多卷。日本诸寺所藏亦有少量残缺。它是日本《天海藏》所用的底本,《缩刷藏》和《大正藏》所用的校本(称宋藏、宋版、宋本)。

《资福藏》的总目名为《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上下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一册)。



六、磧砂藏

《磧砂藏》，又名《延圣禅院大藏经》、《延圣院本》、《延圣寺本》。私版。宋代平江府磧砂延圣禅院（位于江苏吴县陈湖中的磧砂洲）雕印。始刻于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其间，因寺院火灾及宋元之交的战乱，刻事中断了二十多年。发起人为保义郎（后升为成忠郎）赵安国，主持人为延圣禅院藏主法忠等。

《磧砂藏》总计五百九十一函（函号为“天”至“烦”），收经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其结构为：（一）前五百四十八函（函号为“天”至“合”）为初刻，是以《圆觉藏》为底本刊刻的。所收经典始《大般若经》，终《南本大般涅槃经》，凡一千四百三十五部。除增收《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一部，减少《大乘不思议神变境界经》一部，个别经典有分合之异以外，基本上与《圆觉藏》相同。（二）后四十三函（函号为“济”至“烦”）为补刻，是以元代的《普宁藏》为底本刊刻的。其中由元代管主八雕造的九十一部秘密经（详见后面的《普宁藏》一节）和《宗镜录》出自《普宁藏》的初刻本。另外五部禅籍即《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辅教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出自《普宁藏》的补刻本。

《磧砂藏》的装帧形式和版式与《圆觉藏》大致相同。为梵夹本，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每一版的第一面或第二面折缝处刻有函号和版号，有时还刻有刻工姓名。卷末有时刻写经人姓名。从印本保存下来的题记来看，参加刻藏的有孙仁等四百二十三人，参加写经的有僧人清满等五十人。

《磧砂藏》今存。1931年，在我国西安的开元寺和卧龙寺，1942



年在山西太原的崇善寺发现了它的全藏。它是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印本,由于年代已远,其中约有十分之二的经典已经缺失。保存下来的经典,也夹杂了《碛砂藏》以外的一些刻本,如《大般若经》、《大宝积经》为元代吴兴妙严寺于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至顺帝至正九年(1349)刻的本子。1935年,由朱庆澜、叶恭绰等组成的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曾以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的《碛砂藏》印本为底本,藏内所缺的经典用《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宋代景定陆道源本、元代亦黑迷失本等加以补足,编成《宋版碛砂大藏经》影印流通。影印本《碛砂藏》为六十函五百九十三册(内有目录一函二册),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近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将它们合为四十册,再次影印出版。

《碛砂藏》的总目有两种。一种为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编写的《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上下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一册)。它是《碛砂藏》初刻时所编的目录,只有五百四十八函;另一种是1931年至1935年影印《碛砂藏》时编的目录,有五百九十一函。通常使用的是后一种目录。

七、契丹藏

《契丹藏》,又称《辽版大藏经》、《辽藏》。官版。辽国兴宗敕令雕印。始刻于兴宗重熙(1032—1054)初年,完成于道宗清宁九年(1063)。主持人为总秘大师、燕京圆福寺僧人觉苑(著有《大日经义释演秘钞》十卷)。刻藏的地点在燕京(今北京)。

辽国是在圣宗太平元年,即北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得到宋朝赠送的《开宝藏》(天禧修订本)的。至兴宗朝,便命人搜集北方



流传的写本佛经,并由觉苑编纂经目(时称《太保大师入藏录》),开始雕藏。全藏总计五百七十九帙(据金代段子卿《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经记》),虽然也用千字文编帙号,但同一帙号内所收的经典与《开宝藏》有些出入。所收经典包括:《开元释教录略出》所录入藏经;《续开元释教录》所录入藏经;宋代新译经;新编入藏的中国佛教撰著。其中,《大日经义释》(唐一行撰)、《往生集》(辽非浊撰)、《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行琳撰)、《一切佛菩萨名集》(思孝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道殷撰)、《续一切经音义》(希麟撰)、《龙龕手镜》(行均撰)等均为北方流传的特有的佛教撰著。

《契丹藏》为梵夹本。每版二十四行,每行十七字(也有刻十五、十六、十八字的)。其版心是古代木刻本《大藏经》中最小的,故与《开宝藏》、《崇宁藏》等相比,字显得稍密。但校勘精良,对《开宝藏》中的错讹多有订正。

《契丹藏》在汉文《大藏经》雕印史上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辽代,由朝廷拨款,对由隋代静琬开创的房山石经进行大规模的补刻,补刻的石经所使用的底本即是《契丹藏》。另外,自道宗清宁九年(1062),辽朝向高丽赠送《契丹藏》之后,《契丹藏》数度传入高丽。高丽义天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其中有不少经典采自《契丹藏》。它是《高丽续藏经》和《再刻高丽藏》(又称《再雕高丽藏》)使用的底本和校本之一。

《契丹藏》全藏已佚。近代,在吐鲁番发现了几种刻本佛经的残卷,其中有《大般若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其卷首有扉画(释迦牟尼说法图),每行约十八、十九字,经题下所刻的千字文帙号,也与宋元版藏经完全不同,仅与后晋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所用的函号相同。另外,辽国(又称契丹)全盛时,其影响曾扩展到吐鲁番。十二世纪初,女真族的金国灭辽



时,契丹的一族也曾在吐鲁番建立过西辽国。据此,学者考定,这些木刻佛经均系《契丹藏》的印本。日本书道博物馆、静嘉堂文库、龙谷大学藏有这种《契丹藏》的残卷(参见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十册)。另外,1978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了五十多卷木刻佛经,其版式为每版二十四行,每行十五字至十八字,有《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二等。据考证,也是《契丹藏》的残卷。

八、金 藏

《金藏》,又称《金版大藏经》、《赵城藏》。私版。金代山西民间集资雕印。始刻于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完成于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发起人为山西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崔法珍。主持者为解州静林山天宁寺(位于山西解县)“开雕大藏经版会”。此藏由崔法珍断臂劝募以后,山西民间深受感动,纷纷解囊相助,甚至有破产以响应者(题记中记载了村民有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以应募的情况)。大定十八年(1178),崔法珍将全藏一部送到燕京(今北京)。金世宗特命在圣安寺设戒坛,为崔氏剃度出家授比丘尼戒。大定二十一年(1182),崔氏又将全部经版送到燕京,贮藏于弘法寺,印刷流通。两年后,被赐以“宏教大师”之号。

《金藏》以《开宝藏》的各次印本(包括初印本、咸平本、天禧本、熙宁本)为底本雕印。另外,还增收了当时在北方流传的一些佛教著述(主要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的章疏)。它是当时搜集宋代新译经最全、中国佛教撰著最多的一部《大藏经》。

全藏总计六百八十二帙(帙号为“天”至“几”),收经约一千五百七十部七千卷,始《大般若经》,终《万善同归集》。其结构为:



(一)《开元释教录略出》所录入藏经,四百八十帙(帙号为“天”至“英”)。(二)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至咸平二年(999)新译经,三十帙(帙号为“杜”至“穀”)。(三)《续开元录》所录入藏经(包括《续开元录》自身),二十七帙(帙号为“振”至“庵”)。(四)北宋咸平三年(1000)至熙宁六年(1073)新译经,四十三帙(帙号为“宅”至“兢”)。以上四部分,与《高丽藏》所收基本相同。(五)中国佛教撰著,四十四帙(帙号为“践”至“亭”)。收《华严经合论》、《法苑珠林》、《传灯玉英集》、《景祐天竺字源》、《天圣广灯录》、《大中祥符法宝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双峰山曹溪宝林传》、《御制秘藏论》、《景德传灯录》等。(六)北宋元丰元年(1078)至政和二年(1112)新译经,四帙(帙号为“雁”至“塞”)。(七)中国佛教撰著,五十四帙(帙号为“鸡”至“几”)。其中属华严宗的有:《华严清凉疏》、《清凉疏科》、《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属天台宗的有:《法华经玄义》、《玄义释签》、《法华经文句》、《法华文句记》、《摩诃止观》、《止观辅行传弘决》、《金光明经文句》、《观音经玄义》、《四教义》、《四念处》、《金刚铎》、《国清道场百录》等;属法相宗的有:《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枢要》、《法苑义林章》、《因明入正理论疏》、《瑜伽师地论略纂》等;属于净土宗的有:《万善同归集》(以上参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金刻藏经》;蒋唯心《金藏雕刻始末考·广胜寺大藏经简目》,《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十册)。

《金藏》在金末元初因兵火而损坏了四分之一。元太宗八年(1236),耶律楚材征集中书省属下的财力和人力,与民间集资相结合,对《金藏》中缺损的经版进行了补雕。从保存下来的题记来看,原刻的刻工一般是平民百姓,而补雕的刻工多是从诸山名刹征召来的刻字僧。他们分别来自燕京路的弘法寺、宣德路的蔚州普勤山大明寺、真定路的中山天宁寺、河间路的河间天宁寺、益都路的寿光方林院、临淄广化寺、即墨崇福寺、密州龙应寺、滕州大明寺、



汾州治平寺等三十多所寺院,从而使《金藏》得以补齐,并继续印刷了几十年。

《金藏》的装帧形式和版式大体上依照《开宝藏》。为卷子本,黄表赤轴,长短大小,略有参差。版式分为两种:凡《开元释教录略出》、《续开元录》所录入藏经和宋代新译经部分(即前面在讲到此藏结构时,所说的第一、二、三、四、六部分),版心高约二十二公分,宽约四十七公分,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版首刻经名、卷次(第几卷)、纸序(又称版数,即第几纸)、帙号(千字文帙号);凡《开元释教录略出》、《续开元录》所录以外的中国佛教撰著(即前面说的第五、七部分),版心较高较宽,每版二十二行至三十行,每行十五字至十七字。卷末往往刻有题记。装帧形式除卷轴装(即卷子本)以外,间有梵夹装(即梵夹本),如《华严经合论》等,每五行略留空白,以便折叠。又有册页装(即方册本),如《传灯玉英集》等,有行线、中缝。形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这些入藏著述原先多为单行本,收入时照原版翻刻,故造成入藏著述与翻译佛经在版式上的差异。

《金藏》今存。1933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释范成为搜集散逸的《碛砂藏》经本,偶而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临济宗寺院)的弥勒殿,发现四大橱古版藏经,经与元代庆吉祥等人编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核对,证实为金代所刻。《金藏》、《赵城藏》之名由此而起。广胜寺所藏的《金藏》共有四千九百五十七卷,以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零散的经本,连前总计有五千一百多卷。从一些经本的刻记(原先就刻在版子上的题记)和墨记(后来加盖在印本上的墨印或手书)来看,它是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时的印本。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在《金藏》中选择了其他宋版藏经所阙的珍本四十七种,如《传灯玉英集》、《景祐天竺字源》、《大中祥符法宝录》、《天圣释教总录》、《景祐新修法宝录》、《双峰山曹溪宝林传》、



《因明正理论过类疏》等,编为《宋藏遗珍》三集十二函一百二十册(上集四函四十册,中集六函六十册,下集二函二十册),以线装本的形式,影印出版。近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将它们合为六册,再次影印出版(据该公司编的1994年《图书解说目录》说,《宋藏遗珍》所收的四十七种经典中,“为《磻砂》所无者只四十四部”)。

《金藏》现存于北京图书馆。1959年9月,在西藏萨迦寺中发现了木刻卷子本佛经三十一种五百五十九卷,据考证,其帙号、版式、字体、捐资者、刻工等基本上与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金刻藏经相同,从属元代补雕的那部分经版的印本。因此,《金藏》的传世本除广胜寺本以外,还有萨迦寺本。

九、其 他

宋辽金时期雕印的《大藏经》,除以上介绍的《开宝藏》等八种版本以外,有的书上还提到以下两种刻本:

(一)《婺州藏》 此说成立的依据是:北宋杨亿《武夷新集》卷六有太宗至道初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开元寺印大藏之语。但世无传本,也没有其他史料可以证实它确实开雕过。

(二)《明州藏》 此说成立的依据是:我国和日本今存的《大般若经》印本上有明州奉化县(今浙江奉化)忠义乡瑞云山王公祠堂的题记。但在古代,私人出资雕造一部或几部佛经,作为功德赠送流通的例子比比皆是。故王氏一族所刻的仅是单部佛经,而不一定是全藏。



第三节 元 版

元代雕印的《大藏经》主要有：《普宁藏》。

另外，还有五种刻本待考：《弘法藏》、《智化藏》、《铜版藏》、《妙严藏》、《云南藏》。

一、普 宁 藏

《普宁藏》，又名《普宁寺大藏经》、《元藏》、《元版》、《元本》。私版。元代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位于浙江余杭）雕印。始刻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完成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发起人为普宁寺住持道安。主持人为道安及其继任者如一、如志、如贤、如隐等。普宁寺是北宋末年清觉创立的民间佛教宗派白云宗（因清觉居于白云庵而得名）的主要寺院。故此藏也是白云宗独自雕造的一部《大藏经》。

《普宁藏》总计五百八十八函（函号为“天”至“约”），收经一千五百二十八部六千三百二十卷。其结构为：

（一）前五百五十九函（函号为“天”至“感”）一千四百三十部六千零四卷。大体上是以《资福藏》为底本雕印，始《大般若经》，终《宗镜录》。其中，删去了宋太宗的《御制逍遥咏》、《御制缘识》、《御制秘藏诠》、《御制佛赋》、《御制显源歌》，增收了《景德传灯录》。《资福藏》在《宗镜录》之后收录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诀》、《大藏一览集》、《国清百录》等撰著，自然也未加收录，但《资福藏》在《宗



镜录》之后收录的《大乘中观释论》等译籍则被编入《普宁藏》所收《宗镜录》之前诸函中。

(二) 次二十八函(函号为“武”至“遵”),九十一部三百八卷。在《普宁藏》目录中只空出函号,而未列细目(文云:“‘武’至‘遵’计贰拾捌号秘密经另有目录。”)这二十八函秘密经原为元代燕京弘法寺收藏的《金藏》中特有的经本,元代松江府僧录管主八鉴于先前江南雕印的各版《大藏经》,如福州的《崇宁藏》、《毗卢藏》、湖州的《圆觉藏》、《资福藏》、平江府的《磧砂藏》同缺这些经典,于是特将这些经本选出(其中绝大多数是密教经典,也有一些不是,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大宗地玄文本论》为显教经典,《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至元辨伪录》、《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等为撰著),作为独立的一部“秘密经”(确切地说是“续藏经”),于大德十年(1306)及次年在杭州路印造流通,以补天下各版藏经之不足(其印本甚至远至高丽)。《普宁藏》中的这二十八函“秘密经”就是由此而来的(编目时,这部分经典尚未印成)。这副秘密经的经版,后由管主八的儿子管辇真吃刺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施与平江府磧砂延圣禅院,成了《磧砂藏》的组成部分(见李富华《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秘密经和〈普宁藏〉的续补问题》,陕西省社科院《人文杂志》1993年增刊)。

(三) 末一函(函号为“约”)七部八卷。所收的经典为:元代沙啰巴译的《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一卷、《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一卷、《佛说坏相金刚陀罗尼经》一卷(《普宁藏》目录将上二经合为一卷)、《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二卷、《念诵仪轨供养法》一卷(《普宁藏》目录未计卷数)、白云宗净觉撰的《白云和尚初学记》一卷、《白云和尚正行集》一卷。

《普宁藏》在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至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曾进行过补雕。除重雕了一些已经损坏的经版(如《景德传灯录》



等)以外,还新刻了《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论》、《辅教编》、《天目中峰和尚广录》等五部禅籍(这是依据《磧砂藏》中存有据此藏翻刻的五部著作的印本以及印本上的题记考定的。《普宁藏》目录中未及著录)。

《普宁藏》的版式和《圆觉藏》大致相同。为梵夹本,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版心稍小于《圆觉藏》。每版的第一面的折缝处刻有函号和版号。卷末刻有题记,函末有音释。

《普宁藏》今存。日本东京增上寺、浅草寺存有它的全藏。另外,日本岐阜安国寺、三井园城寺、京都东福寺、奈良西大寺也藏有它的印本。它是日本《缩刷藏》、《大正藏》所用的校本(称之为元版、元藏、元本)。

《普宁藏》的总目名为《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四卷)。它是大普宁寺僧人如莹在元大德三年(1299)编纂的。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

二、其 他

元代雕印的《大藏经》,除《普宁藏》以外,有的书上还提到以下几种刻本:

(一)《弘法藏》 此说成立的依据有两条:一是元代庆吉祥等编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在《开元录》、《续开元录》、《祥符录》、《景祐录》之外,别立了《弘法入藏录》,著录了它所收录的七十八部著作(均为中国佛教撰著,有《一切经音义》、《宝林传》、《万善同归集》等);二是今存的《磧砂藏》中的《大般若经》为元代湖州吴兴(今浙江吴兴)妙严寺经坊所刻,刻者在此经卷一之末的题记中提到了



“大都弘法、南山普宁、思溪法宝、古闽东禅、磧砂延圣之大藏”，即五种《大藏经》版本，其中“大都弘法”之大藏，指的就是燕京弘法寺《大藏经》。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撰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至元二十四年（1287），吴兴妙严寺经坊的题记刻于文宗至顺三年（1332）。而其间弘法寺收藏的《大藏经》乃是由金代崔法珍募刻、元代耶律楚材补雕的《金藏》。故所说的《弘法藏》实际上就是补雕后的《金藏》。至于《弘法入藏录》所收录的经典以及所编的函号与今存《金藏》的不完全一致，是因为弘法寺除了藏有《金藏》以外，还收集了其他一些地方的经坊刊刻的单本佛经和民间的手抄本，而《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在著录时，又作了一些调整，因而呈现种种差异。

（二）《智化藏》 此说成立的依据是：1986年夏天，在北京智化寺如来殿的佛像内发现了元代刻印的三卷佛经。它们是《大宝积经》卷五（函号为“鸟”字，卷首残缺）、《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函号为“积”字，首尾齐全）、《陀罗尼集经》卷三（函号为“福”字，卷首残缺）。均为卷子本。版心高约二十三公分，宽约四十九公分。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偶有十五字）。版首刻经名、卷次（第几卷）、纸数（又称版数，即第几张）、帙号（某字号）。卷首有题记。由于这三卷的帙号、版式、题记等与《金藏》不同。故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悬疑已久的《弘法藏》（见许惠利《〈弘法藏〉新考一得》，中国佛教协会《法音》学术版1987年12月）。笔者对勘后发现，此三卷经本的帙号，不仅与《金藏》不同，而且也与《磧砂藏》、《普宁藏》、《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所编的函号不同。从《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卷首刻写的“育黎八力八达刊印三乘圣教经律论三十三大藏，上报列圣在天之灵，仰追释梵，垂裕后昆，次愿宝祚延长，慈闱康乐，眇躬是保，兆民永赖，一切有情，咸臻善果。大元延祐丙辰三月”的题记来看，它们均为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敕造



的、今已失传的《大藏经》中的一部分。此藏当是依仿《金藏》刻的，但在编次和版式上略有变动，开雕的时间为延祐三年(1316)，共印了三十三部。

(三)《铜版藏》 此说的成立依据是：明代明河撰的《补续高僧传》卷一《法祯传》说，“(元)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治铜为板，而文多舛误。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较(校)，师(法祯)与湛堂、西谷三人为总督，重勘诸师所较，仍新为目录，旌赏特加。”但这段文字使用的“将”字，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英宗即位后，打算将《大藏经》刻为铜版，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因为英宗是至治元年(1321)至至治三年(1323)在位的，其间，法祯等人只完成了校勘三藏，编纂新目的工作，还来不及根据新编的《大藏经》目录来雕版印行。

(四)《妙严藏》 此说成立的依据是：南宋牟猷撰的《湖州妙严寺记》说，位于湖州归安县太元乡徐林的妙严寺，“宋嘉熙间，是庵信上人(上人与和尚同义)于焉创始。结茅为庐舍，板行《华严》、《法华》、《宗镜》诸大部经”。信上人逝世以后，弟子道安继任住持。道安于“至元间，两诣阙廷(指朝廷)，凡所陈皆为法门。乃刊大藏经版，悉满所愿”。今存的《磧砂藏》中的《大般若经》卷一、卷十、卷八十、卷八十二、《大宝积经》卷十等卷，从卷末的题记来看，均为“吴兴妙严寺经坊”所刻，时间为元泰定帝泰定二年(1325)至文宗至顺三年(1332)之间。所刻的经典除《法华经》(七卷)一部卷数较少以外，其余的均为卷数较多的大部，如《大般若经》(六百卷)、《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华严经》(八十卷)、《大般涅槃经》(四十卷)、《宗镜录》(一百卷)。校勘精良，所用的校本有五种之多，它们是《弘法藏》(即补雕后的《金藏》)、《普宁藏》、《资福藏》、《崇宁藏》、《磧砂藏》。但妙严寺经坊所刻的佛经，从总体上来说，仍是单行本，而不是整部《大藏经》。

(五)《云南藏》 此说成立的依据是：1982年12月，在云南省



图书馆藏书中,发现了元代刻印的佛经三十二卷。其装帧形式为梵夹本(又称折装本),每版四十二行,折成七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上下有外粗内细的双栏线。每版的中缝刻有千字文函号。卷首刻有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太皇太后的施印愿文,卷末刻有刻藏人员的衔称及姓名。据残存的经册所编的千字文函号推测,全藏至少有六百五十一函六千五百余卷(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汉文大藏经”条)。由于元惠宗在位的时间长达三十五年(1333—1368),故其间由太皇太后出资雕造一部《大藏经》,并竣工告成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节 明 版

明代雕印的《大藏经》主要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

另外,还有两种刻本待考:《武林藏》、《万历藏》。

一、洪武南藏

《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官版。明太祖敕令雕印。始刻于洪武五年(1372),完成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参与者有宗泐、如玘、净戒等四方名僧。刻藏的地点在南京,经版收藏于天禧寺。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因寺僧本性纵火,经版与寺院俱毁,但因印本已在此前流通,故没有绝传。寺院也于永乐十年(1412)重建,改名为大报恩寺,后来的《永乐南藏》也是在这里雕印的。

《洪武南藏》总计六百七十八函(函号为“天”至“鱼”),收经一



千六百余部七千一百余卷。其结构为：(一) 前五百九十一函(函号为“天”至“烦”),大体上以《磧砂藏》为底本雕印(也用了元代吴兴妙严寺的一些校刻本)。始《大般若经》,终《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其中,增收了《救度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一卷、《药师功德经》一卷(藏文)、《番大悲神咒》一卷(藏文)、义忠《百法论疏》等(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明初刻南藏》)。(二) 后八十七函(函号为“刑”至“鱼”)为新编。始《四十华严》,终《嘉泰普灯录》。其中,除《四十华严》为译籍以外,其余的八十多部经典均为中国佛教撰著,包括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的一些著作及其他,如《净土十疑论》、《六祖坛经》、《万善同归集》、《宗门统要续集》、《大慧语录》、《古尊宿语录》、《法华玄义》、《华严清凉疏》、《佛祖统纪》、《翻译名义集》等。

《洪武南藏》的装帧形式和版式与《磧砂藏》相同。为梵夹本,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

《洪武南藏》今存。1934年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了它的全藏(略有残缺,并杂有一些补抄本和坊刻本)。这部藏经的印本是明永乐十四年(1416)由蜀献王赠与的,今存于四川省图书馆。

二、永乐南藏

《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南藏》。官版。明成祖敕令雕印。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完成于永乐十五年(1417)。参与者有居敬、善启等。刻藏的地点和经版收藏处在南京大报恩寺。此藏至明末清初仍在印行。

《永乐南藏》是在《洪武南藏》所收典籍的基础上,重新分类,并略有增删编成的。在《永乐南藏》以前刊行的各版《大藏经》(包括



《洪武南藏》),都是在《开元释教录略出》所收入藏经的基础上,增补《略出》未收和《略出》以后新译的佛经,以及新编入藏的中国佛教撰著而成的。而《略出》的分类法则是先分“乘”(大、小乘),再分“藏”(经、律、论)。新编入藏的佛经和著述,又在《略出》所收典籍之后,交叉杂编,凌乱无序。《永乐南藏》对之作重大的改革。它参照《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先分“藏”,再分“乘”的分类法,对藏经的编排次序作了大的调整。全藏总计六百三十六函(函号为“天”至“石”),收经一千六百十部(据《南藏》目录,一说实际有一千六百十四部)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其结构为:(一)大乘经,二百四函(函号为“天”至“贤”)五百三十三部。(二)小乘经,四十六函(函号为“克”至“当”)二百四十三部。(三)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三十七函(函号为“竭”至“安”)三百部。(四)西土圣贤撰集(并附密典补遗),十九函(函号为“定”至“优”)一百五十部。(五)大乘律,五函(函号为“登”至“从”)二十六部。(六)小乘律,五十函(函号为“政”至“交”)五十八部。(七)大乘论,五十函(函号为“友”至“华”)九十一部。(八)小乘论,七十四函(函号为“夏”至“漆”)三十七部。(九)续入藏诸论,五函(函号为“书”至“罗”)二十三部。(十)此方撰述,一百四十六函(函号为“将”至“石”)一百五十三部。其中,删去了《洪武南藏》中的《药师功德经》(藏文)、《百法论疏》、《嘉泰普灯录》等,增收了《密咒圆因往生集》、《护法论》、《圆觉经略疏注》、《般若心经集注》等。据考证,最初刻成的是前六百二十八函(函号为“天”至“塞”),后八函(函号为“鸡”至“石”)是在印刷过程中陆续补刻的。

《永乐南藏》为梵夹本。每版三十行,折成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洪武南藏》所用的《磻砂藏》本子上的题记,除少数有关校勘方面的说明在翻刻时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的均被删去了。

《永乐南藏》今存。据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李圆净《历代汉

文大藏经概述》说,“济南图书馆存有全藏”(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十册)。

《永乐南藏》的总目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南藏目录》(又名《大明南藏目录》,一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它是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南京礼部祭请吏司编的。由于《永乐南藏》刻在前,而目录编在后,故这一目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当时刊行的、包括初刻和初刻在内的《南藏》的情况。

三、永乐北藏

《永乐北藏》,又名《北藏》。官版。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敕令雕印。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完成于英宗正统五年(1440)。参与者有道成、一如等。刻藏的地点在北京,经版由司礼监掌管,藏于祝崇寺内的汉经厂(寺内还建有收藏明版藏文《大藏经》的番经厂)。

《永乐北藏》是参照《永乐南藏》的结构分类,但在编函(将某几部经典编为一函)方面又作了较大的调整编成的。全藏总计六百三十六函(函号为“天”至“石”。其中,有些函内收有两类性质不同的经典),收经一千六百十五部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始《大般若经》,终《大明三藏法数》。其结构为:(一)大乘经,二百六函(函号为“天”至“念”)五百三十七部。(二)小乘经,四十五函(函号为“作”至“竭”)二百三十九部。(三)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三十四函(函号为“竭”至“言”)三百部。(四)大乘律,五函(函号为“言”至“初”)二十五部。(五)小乘律,四十八函(函号为“初”至“爱”)五十九部。(六)大乘论,五十函(函号为“爱”至“逸”)九十三部。(七)小乘论,七十三函(函号为“逸”至“弁”)三十七部。(八)宋



元续入藏诸论,五函(函号为“转”至“通”)二十三部。(九)西土圣贤撰集,十九函(函号为“广”至“漆”)一百四十七部。(十)此土著述,一百五十一函(函号为“书”至“石”)一百五十五部。

《永乐北藏》在初刻本告成之后,由于藏在京城,故一直作为官赐藏经,由朝廷印刷,下赐各地寺院。在南、北两藏中,它更具有官方性质和权威性(《永乐南藏》的印刷则较为容易,一般信众也可出资印经)。

到了明万历十二年(1584),神宗因母后施印佛藏之愿,下敕雕造《永乐北藏》的《续入藏经》,并为之序。《续入藏经》共计四十一函(函号为“钜”至“史”),收经三十六部四百十卷,始《华严悬谈会玄记》,终《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全是中国佛教撰著。其中有:《大佛顶首楞严经会解》、《大乘起信论疏》、《肇论新疏》、《维摩诘所说经注》、《华严原人论》、《天台四教仪集注》、《教乘法数》、《佛祖历代通载》、《翻译名义集》、《百丈清规》、《三教平心论》、《禅源诸诠集都序》、《庐山莲宗宝鉴》等。

这样,初刻的正藏和初刻的续藏两项相加,《永乐北藏》至明万历十二年时,已有六百七十七函(函号为“天”至“史”),收经一千六百五十一部六千七百七十一卷。

《永乐北藏》为梵夹本。每版二十五行,折成五面,每面五行,每行十七字。《永乐北藏》今存。据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说:“南通狼山广教寺,镇江超岸、广教、定慧等寺,均存有全藏。”

《永乐北藏》的总目名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又名《大明三藏圣教目录》、《北藏目录》,四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北藏目录》卷一至卷四所列的是《北藏》初刻的正藏的目录,卷四之后附出后来补刻的续藏的目录(又称《大明续入藏诸集》),以及“北藏缺南藏函号”(即《南藏》收录,而《北藏》未予收录的经典的函号、经名、卷数)。它实际上是南、北藏的对勘目录,因



为在每一部经典上方用大字标列它在《北藏》中的函号,而在下方则用小字注出它在《南藏》中的函号。由于《北藏目录》编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而今本《南藏目录》编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故《北藏目录》中注以“南藏缺”的一些经典,有的已在后来的《南藏目录》中补上了(如《心经集注》)。而注以“南藏”某字函的一些经典,有的则未见于后来的《南藏目录》(如《维摩经注》)。这是研究者要留意的。

四、嘉兴藏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楞严寺版》、《方册藏》。私版。明代以嘉兴楞严寺为中心劝募雕印。筹划于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始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发起人为袁了凡、道开(字密藏)、法本(字幻余)、真可(号紫柏)、陆光祖、冯梦楨、陈瓚、德清(号憨山)等。主持者为道开、法本、如奇、利根等。刻藏的地点屡经变迁。万历十七年及其后的三年,在山西五台山紫霞谷的妙德庵;万历二十年(1592)冬,因气候寒冷、交通不便等原因南迁杭州径山(今浙江余杭县境内)的兴圣万寿禅寺(临济宗寺院)寂照庵;万历三十一年(1603)以后,因集中刊刻在资金上有困难,始将经本分散到嘉兴漏泽寺、吴江接待寺、吴郡寒山化城庵、姑苏兜率阁、虞山华严阁、金坛雇龙山等处就地募款雕版,经版后来集中存放在径山东麓的化城寺,由嘉兴楞严寺经坊印刷流通(一说径山为印经处,楞严寺为装订流通处)。

《嘉兴藏》为宋元明清官私版《大藏经》中收录典籍最多(特别是中国佛教撰著)的一部藏经。全藏总计三百四十三函,收经二千零九十部(据《嘉兴藏》目录。一说实际有二千零九十三部)约一万



卷(一说七千三百三十四卷)。其结构为:(一)正藏,以《永乐北藏》为底本,《永乐南藏》和宋、元版藏经为校本刊刻。二百十函(函号为“天”至“竭”,包括《永乐北藏》目录后面附出的《南藏》有、《北藏》无的五函)一千六百五十四部,始《大般若经》,终《佛祖统纪》。(二)续藏,为新编入藏的中国佛教撰著。九十函(函号用汉语数字即“第几函”来表示,而不用千字文)二百三十七部,始《华严经会本大钞》,终《法华受手》(有的传本作《指月录》)。(三)又续藏,为新续的中国佛教撰著。四十三函(函号的表示法与《续藏》部分相同)一百九十九部,始《楞严经定解》,终《天一悦禅师语录》。在《续藏》、《又续藏》收录的典籍中,既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各宗的章疏论著,也有史传,其中禅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禅籍中又以禅宗语录的数量为最多(约占半数)。此为《嘉兴藏》的一大特色。

《嘉兴藏》在康熙十六年(1677)以后又有续雕。据雍正元年(1723)刊印的刻本目录记载,其中《续藏》从九十函增至九十五函,《又续藏》从四十三函增至四十七函,连同《正藏》的二百十函,总计为三百五十二函(各函的内容也略有变化),约一万二千六百十卷(据吕澂之说)。

在《嘉兴藏》之前刊刻的各版《大藏经》除《开宝藏》和《金藏》为卷子本以外,其余均为梵夹本。这两种装帧形式均有不便收藏和读览的缺陷。为此,明代中叶,武林(今浙江杭州)昭庆寺经坊在版印佛经时,首次将梵夹本改为方册本(即今人所见的线装本)。受此启发,《嘉兴藏》的装帧形式也取方册式,从而成了我国第一部方册本《大藏经》,并对清代、近代的《大藏经》装帧形式产生直接的影响。

《嘉兴藏》的版式为每页(即每版)二十行,折成正、反两面,每面十行,每行二十字。每页的四周有边框,行界有界线(行线),折



缝处刻部类、经名、页数、函号。每卷之末刻有音释、题记(记载与刻经有关的人员、年月、地点)。用线将印好的单页装订成册,这便成了携带方便的线装本佛经了。

《嘉兴藏》今存。据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说,“北京嘉兴寺、洞庭西山显庆寺有正(正藏)、续(续藏)全部,其余南北各寺院存者尚多,但正、续往往不齐”。它是日本《黄檗藏》所用的底本,日本《缩刷藏》、《大正藏》所用的校本。近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将它影印出版,题为《明版嘉兴大藏经》,精装四十册。

《嘉兴藏》正藏的总目名为《藏经板直画一目录》(直画又作值画、值划),编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续藏、又续藏的总目名为《续藏经值画一》、《又续藏经值画一》,编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一般人对书名中的“直画一”、“经值画一”颇感费解。原来,当时《嘉兴藏》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刊刻,印本的售价不一。为了“画一经值”,即统一经本的售价,故编制了这三份目录。原目在经名下都注有它的售价(经值),近代翻刻时因它们已失去实际意义,故将售价全部删去了。

五、其他

明代雕印的《大藏经》,除《洪武南藏》等四种以外,有的书上还提到以下几种刻本:

(一)《武林藏》 此说成立的依据是:《嘉兴藏·刻藏缘起》说,明代“浙之武林仰承风德,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后来,有人根据《嘉兴藏·续藏》中载的《华严疏钞会本》,为明嘉靖年间(1522—1566)武林(今杭州)昭庆寺所刻,进而推断《武林藏》为昭庆寺刊刻的《大藏经》。也有人根据1982年新发现的、由“杭



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坊”于永乐二十年(1422)印行的九部佛经的十七卷残卷(如《大宝积经》卷一百一等),认为,《武林藏》为“杨家经坊”印造。以上诸说不足论定《武林藏》确有其事。因为自宋以后,随着印刷业的发达,民间刻经印书极为普遍,一些寺院也建有印经坊,专门印造单行本佛经。其中,有些是由信众出资的,用于施赠,也有些是经坊出资的,用于营售。因此,武林昭庆寺所印造的单行本佛经的装帧形式为方册本,这是完全可能的,至于是否印出了全藏,这是有疑问的。至于杨家经坊依《磻砂藏》翻刻的佛经,均为梵夹本,这与相传的《武林藏》的最显著的特点——方册本不相符合,因而也属于坊间所刻的单行本佛经。

(二)《万历藏》 此说的成立依据是:1979年在山西宁武县延庆寺发现一部明刻《大藏经》。全藏原有六百七十八函(函号为“天”至“鱼”),收经一千六百五十九部六千二百三十四卷。今存六百六十函,收经一千五百六十三部五千九百九十七卷。经对勘,它是在《永乐南藏》的基础上,增收《永乐北藏》的《续入藏经》四十一函而成的。发起人为明惠王选侍王氏,施印者有陆光祖、钱谦益、周天成、吴崇宗等。刻印的时间当在明万历十三年(1585)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之间,地点在南京。由于此藏收录的经典均见于《永乐北藏》,故实际上是《永乐北藏》的翻刻,还不是一种独立的《大藏经》版本。

第五节 清 版

清代雕造的《大藏经》有:《龙藏》。

《龙藏》,又名《清藏》、《乾隆版大藏经》。官版。清世宗敕令雕印。始刻于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完成于高宗乾隆三年



(1738)。主持人为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参与者有北京贤良寺住持超盛(临济宗)、万寿寺住持超广(临济宗)、大慈观音寺住持自垲(贤首宗兼慈恩宗)、静默寺住持海宽(贤首宗)等。经版初存于故宫武英殿,后因请经不便,移储柏林寺,今存于智化寺。

《龙藏》总计七百二十四函(函号为“天”至“机”),收经一千六百六十九部七千二百四十卷(不包括《龙藏》目录)。其结构为:(一)前四百八十五函(函号为“天”至“漆”)一千四百六十部,分为九大类:大乘经(下分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五大部外单译经)、小乘经(阿含部、单译经)、宋元入藏诸大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宋元续入藏诸论、西土贤圣撰集,全依《永乐北藏》雕印。始《大般若经》,终《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二)后二百三十九函(函号为“书”至“机”)二百九部,为“此土著述”专类,在《永乐北藏》“此土著述”类的基础上作较大的增删调整而成。始《维摩诘所说经注》,终《御录经海一滴》。其中,《永乐北藏》收录,《龙藏》删去的经典有四十一部。它们中有:《释迦氏谱》、《释迦方志》、《出三藏记集》、《古今译经图纪》、《续古今译经图纪》、《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法华经玄义》、《止观义例》、《国清百录》、《华严经疏》、《华严疏演义钞》、《一切经音义》、《武周刊定众经目录》、《教乘法数》、《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功德经》等;《永乐北藏》未收,《龙藏》增补经的经典有五十四部。分两次奉旨入藏。第一次为雍正十三年(1735),编入《华严悬谈会本》、《华严经疏钞会本》等四部。第二次为乾隆元年(1736),编入《明高僧传》、《碧岩集》、《五灯会元》、《楞严正脉》、《紫柏尊者全集》、《憨山大师生梦游全集》、《密云悟禅师语录》、《毗尼关要》、《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准提经会释》、《重订教乘法数》、《御选语录》、《御录宗镜大纲》等五十部。乾隆二年(1737),负责刻藏事务的藏经馆对上述见录的“此土著述”,以朝代为序,重新作了编次,成为



定本(见《龙藏》目录之后的附记)。

《龙藏》刻成之后,曾有过三次敕令撤除若干种著作的经版的情况。乾隆三十年(1765),下令撤出明末清初钱谦益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六十卷。乾隆三十三年(1768),下令撤出《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辩伪录》五卷、《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功德经》二卷、《永乐御制序赞文》一卷。乾隆四十一年(1776),下令撤出《华严经》内武则天制的序。所撤出的著作大多与政治上有关联,但为何撤出《开元释教录略出》殊不可解。另据《龙藏》目录,《龙藏》原先就没有收录《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功德经》,不知为何重撤。由于《龙藏》的大批量印刷是在刻成后的次年,即乾隆四年(1739)进行的。那一年共印了一百部,分赐各地名刹大寺。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印了三部。在撤毁若干种著作的经版的敕令下达以后印刷的《龙藏》,为数很少。故通常人们所见到的仍然是完整的、未有撤毁的《龙藏》。

《龙藏》的装帧形式和版式依仿《永乐北藏》。为梵夹本,每版二十五行,折成五面,每面五行,每行十七字。

《龙藏》今存。1988年10月,中国佛教协会、文物出版社用藏于智化寺的《龙藏》经版七万余块,并对其中的残损部分作了补刻,重新印刷了《龙藏》(七百二十四函)。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也出版了《龙藏》的影印本《新编缩本乾隆大藏经》(原书为七百二十函,编为精装一百六十五册)。另外,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有清末慈禧太后赠与日本西本愿寺的《龙藏》一部。

《龙藏》的总目名为《大清三藏圣教目录》(五卷),编于乾隆三年(1738)。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

第六节 近代版

近代用铅字排印出版的《大藏经》有：《频伽藏》、《普慧藏》。

另外，有的书上还提到，近代由杨文会创立的金陵刻经处等刻的佛经，汇集起来也是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可以称之为《百衲藏》。但出版佛经单行本与出版整部《大藏经》并不是一回事。近代，出版佛经（包括丛书）较多的书局、机构多达十多家，但它们所出版的佛经，都不足以构成一部有着内在体系的《大藏经》。为此，本书只介绍《频伽藏》和《普慧藏》，而不列《百衲藏》。

一、频伽藏

《频伽藏》，全称《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近代上海频伽精舍铅印。始刻于1909年，完成于1913年。发起人为频伽精舍（设在英人哈同的私家花园内）的主人罗迦陵（法名大纶）。主持者为镇江金山寺宗仰。参与者有余船愿、黎端甫等。

《频伽藏》是我国近代出版的第一部铅印本《大藏经》，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又名《弘教藏》）为底本（略作取舍），以《嘉兴藏》、《龙藏》和各经坊单刻的善本为校本编成。全藏总计四十帙（帙号为“天”至“霜”），分为四百十四册（内含目录一册），收经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四百十六卷。其结构为：（一）大乘经，下分华严部、方等部、般若部、法华部、涅槃部等五大类，收四百五十三部。始《大方广佛华严经》，终《莲华面经》。（二）小乘经，收三百二十部。始《增一阿含经》，终《撰集百缘经》。（三）大乘律，收三



十部。始《梵网经》，终《菩萨五法忏悔文》。(四)小乘律，收七十二部。始《四分律》，终《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五)印度大乘宗经论，收九十三部。始《瑜伽师地论》，终《菩提行经》。(六)印度大乘释经论，收二十六部。始《十住毗婆沙论》，终《遗教经论》。(七)印度大乘诸论释，收十一部。始《瑜伽师地论释》，终《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释论》。(八)印度小乘论，收四十六部。始《佛说立世阿毗昙论》，终《部执异论》。(九)印度撰述杂部(附外道论、疑似经)，收六十三部。始《四十二章经》，终《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疑似经)。(十)秘密部，下分录内(日本槩山宝藏院刻本)、录外(日本丰山、槩山、灵运寺、高野山刻本)、知津(《阅藏知津》所录)三大类，收五百七十六部。始《受菩提心戒仪》，终《密咒圆因往生集》。(十一)支那撰述，下分经疏、论疏、忏悔、诸宗(又分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六目)、传记、纂集、护教、目录、音义、序赞诗歌十大类，收二百十三部。始《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终《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十二)日本撰述，下分天台宗、真言宗、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五大类，收十三部。始《显戒论》，终《融通圆门章》。

与底本《缩刷藏》相比，《频伽藏》一方面删去了《道宣律师感通录》、《辩正论》、《御制秘藏诠》、《御制逍遥咏》、《御制缘识》、《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玄应音义》、《慧苑音义》、《绍兴重雕大藏经》、《御制莲华轮回文偈颂》以及十五部日本撰述。另一方面，又将《缩刷藏》中作为附出的一些经典单独立目，如《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后附的《大纶金刚陀罗尼》、《传法正宗记》后附的《定祖图》、《禅宗永嘉集》后附的《证道歌》、《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后附的《宛陵录》等都分别立为两目。删、增两项相抵，《频伽藏》的收经总数仍与《缩刷藏》相同，为一千九百十六部。《缩刷藏》所收经典原有校勘记(排在每页的上方)，《频伽藏》在排印时，将它们都删去了，由



于排校上的疏误,正文中的错别字不少,这是在阅读时须留意的。

《频伽藏》为方册本(线装本)。正文用四号字体排印。每页四十行,折成正反两面,每面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每面有边框,折缝处刻有经名、页数。

《频伽藏》今存。我国的许多图书馆和寺院存有它的全藏。

《频伽藏》的总目名为《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总目》(一册),与全藏一起流通。它的特色在于,在每部经名的上方,依次标注其在清(《龙藏》)、明(《永乐北藏》)、元(《普宁藏》)、宋(《资福藏》)、丽(《再刻高丽藏》)等五种藏经版本中的函号,甚便查检。

二、普 慧 藏

《普慧藏》,全称《普慧大藏经》。近代上海普慧大藏经刊行会铅印。1943年开始编纂,计划是:翻译南传巴利文《大藏经》,校勘前代经本,搜采先前各藏所未载的重要典籍,1946年出版第一期单行本五十种(装订成八十二册)。其后因经费困难等原因自行中止。发起人为盛幼庵(法名普慧),编纂者有持松、芝峰、黄幼希、许圆照、范古农、李圆净等。刊行会会址初设于上海静安寺,后迁法藏寺。

《普慧藏》第一期所收的典籍有:《南传长部经典》(江炼百译)、《南传中部经典》(芝峰译)、《南传小部经典》(夏丐尊译)、《泰国大藏经小部经》(黄谨良译)、《发趣论》(范寄东译)、《大发趣论注》(同译)、《转法轮经》(岫庐译)、《三宝经》(法舫译)、《吉祥经》(同译)、《婆罗门正法经》(同译)、《南传大悲经》(同译)、《南传法句经》(了参译)、《南传大般涅槃经》(巴宙译)、《阿毗达磨摄义论》(法舫译)、《释氏六帖》(五代义楚撰)、《华严经疏论纂要》(清道需撰)等。其



中多数为南传巴利文佛典的首次汉译(有些是据日译本转译的),也有一些为各版藏经未载的罕见的中国佛教撰述。

《普慧藏》为方册本。每页十六行,每行四十一字。经文中或卷末刊有校注。

《普慧藏》今存。1946年,虚云、圆瑛等人发起刊行《民国增修大藏经》,曾将《普慧藏》第一期五十种作为该藏的第一期单行本予以重印。其纸型今存于南京的金陵刻经处,现已重印。

第七节 现代版

现代铅印或电脑排印出版的《大藏经》有:《中华大藏经》、《佛教大藏经》、《佛光大藏经》(电脑排印)、《大藏经补编》等。

一、中华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有两种名称相同、内容相异的版本。

(一)大陆版《中华大藏经》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主编。1984年起陆续刊行,尚未出齐。分为正续两编,拟收佛典四千二百余种二万三千余卷。其中,正编以传今的《赵城藏》(即《金藏》)为底本影印,其缺失部分由《高丽藏》补足。此外,还将编入《房山石经》、《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磧砂藏》、《至元录》(取存目阙经的方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龙藏》、《高丽藏》中有千字文编号的各藏特有的一批经典;续编收录《房山石经》、《频伽藏》、《普慧藏》、《大正藏》、《嘉兴藏》中的《续藏》和《又续藏》、《卍续藏》中未被收入正编的那些经典。目前已出



版的是正编二百二十册中的前几十册。

(二) 台湾版《中华大藏经》 蔡运辰主编, 1956年起陆续刊行, 尚未出齐。分为正藏、续藏、译藏、总目录四大类。正藏, 拟收见于各版《大藏经》的经典(以宋版《碛砂藏》和《宋藏遗珍》为基础增补, 重复者去除); 续藏, 拟收历来未曾入藏的佛典; 译藏, 拟收译为外文的佛典; 总目录, 拟列本藏目录、基本目录、有关目录、参考目录四项。目前已出版的是正藏中的第一辑宋版佛典, 第二辑明版佛典。

二、佛教大藏经

《佛教大藏经》。广修编修。台湾佛教出版社 1977 年至 1983 年出版。全藏总计一百六十二册(另有《目录索引》一册), 分为正藏、续藏两大部分, 共收经二千六百四十三部一万一千零五十三卷。正藏, 以《频伽藏》为底本, 《大正藏》、《碛砂藏》、《嘉兴藏》、《卍正藏》、《卍续藏》, 以及由藏文、巴利文译出的佛典为增补编成; 续藏, 以《普慧大藏经》为底本, 并收绝版的经论注疏等编成。

三、佛光大藏经

《佛光大藏经》。星云法师监修, 《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主编。台湾佛光出版社于 1983 年起陆续出版发行, 尚未出齐。全藏分为十六藏: 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华严藏、唯识藏、秘密藏、声闻藏、律藏、本缘藏、史传藏、图像藏、仪志藏、艺文藏、杂藏。目前已出版的是阿含藏(共十七册), 禅藏(五十一册)、



般若藏(四十二册)、净土藏(三十三册)。其中,阿含藏系以《高丽藏》为底本,《嘉兴藏》、《频伽藏》、《中华藏》、《卍正藏》、《大正藏》为校本,加以标点、分段、校勘、注释、解题而刊行,并附有综述性的专论、相关经典(南传巴利文经本、北传异译本等)的对照和其他索引。其余各藏底本及校本不一,集录各藏精华和近代名著。

四、大藏经补编

《大藏经补编》。蓝吉富主编。台湾华宇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全书分为三十六册,共收录《大正藏》、《卍续藏》未收的佛典二百多种。有:《南传长部经典》(江炼百译)、《南传中部经典》(芝峰译)、《南传小部经典》(夏丐尊译)、《集量论略解》(法尊译)、《正理滴论》(王森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法尊译)、《密宗道次第广论》(同译)、《西藏王臣护法记》(郭和卿译)、《藏逸经书标目》(密藏编)、《南朝寺考》(刘世珩著)、《古今图书集成》(选辑)、正史选辑、《禅林象器笺》(无著道忠著)、《律宗灯谱》(源谅著)、《元亨释书》(师炼著)、《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凝然述)、《中华大藏经总目录》(蔡运辰编)等。其中,有巴利文、梵文、藏文佛典的汉译本,各版藏经未曾收录的海外孤本、敦煌遗书、四库珍本等。

第八节 高丽版

朝鲜(古代由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组成)佛教和日本佛教同属北传佛教文化圈,两国的佛教都是由中国传入而后在本土扎根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古代乃至近代的相当长时间里,朝、日两国



使用的基本的佛经,和中国一样,同为汉文佛经。宋太宗端拱二年(998)和次年,宋朝应高丽成宗之请,分别向高丽赠送新印的雕版《大藏经》各一部,《开宝藏》初刻本由此传入高丽。真宗乾兴元年(1022),《开宝藏》的天禧修订本也传入高丽。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在《开宝藏》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契丹藏》又传入高丽。另外,高丽义天等人人宋求法,回国时带回了大批汉译佛经和著述。这就为高丽雕印汉文《大藏经》提供了样式和底本。高丽版的汉文《大藏经》主要有三种,它们是:《初刻高丽藏》、《高丽续藏经》、《再刻高丽藏》。另外,也有人提到高丽曾翻刻过《契丹藏》,因史料不足,阙而不论。

一、初刻高丽藏

《初刻高丽藏》,又名《初雕高丽藏》、《高丽藏初雕本》、《高丽藏初刻本》、《初刻丽藏》。高丽显宗为祈求佛佑,击退契丹入侵而敕令雕印。始刻于高丽显宗二年(1011),完成于文宗三十六年(1082)。主持者为崔士成。经版藏于岭南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1232),蒙古入侵,经版被焚毁。

《初刻高丽藏》是以《开宝藏》初刻本为底本,并增入《续开元录》新编入藏经而编成的,全藏总计五百七十函,收经一千一百零六部五千九百二十四卷(函数和卷数据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部卷据韩国金煥泰著、柳雪峰译《韩国佛教史概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初刻高丽藏》为卷子本。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

《初刻高丽藏》全藏已佚,今仅存残本(据李圆净之说)。



二、高丽续藏经

《高丽续藏经》，又名《续刻高丽藏》、《续雕高丽藏》。高丽兴王寺雕印。始刻于高丽宣宗八年(1092)，完成于肃宗元年(1096)。发起人和主持者为文宗第四子义天。义天于宣宗二年(1085)入宋求法，参访高僧名德，研讨诸宗法要。次年返国，带回了求获的中国佛教经律论注疏等一千余卷。回国后任兴王寺住持，并奏请在寺内设置教藏都监，以收藏从宋、辽(契丹)、日本以及国内搜集到各种佛教著作(以章疏为主，兼及其他)。先编纂目录，随后依目录刊行这些未见于《开宝藏》的经律论注疏，这便是《高丽续藏经》。经版原存于兴王寺，高丽高宗十九年(1232)毁于蒙古兵火。

《高丽续藏经》共收佛教著述一千零八十六部。其中，经疏六百十九部，律疏一百四十五部，论疏二百十七部，其他(论著、纂集、史传等)一百零五部(以上据《佛光大辞典》)；一说，收典一千零十部四千零四十卷，其中，经疏五百六十一部二千五百八十六卷，律疏一百四十二部四百六十七卷，论疏三百零七部一千六百八十七卷(见《韩国佛教史概说》)。这些著作的作者多为中国僧俗，也有一些为高丽、日本僧俗。

《高丽续藏经》为卷子本。每版二十三行，每行二十字(有时为二十一字)。

《高丽续藏经》的总目名为《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三卷)，义天编。收入《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高丽续藏经》全藏已佚，仅有《大般涅槃经疏》卷十的残本见存于朝鲜松广寺。

三、再刻高丽藏

《再刻高丽藏》，又名《再雕高丽藏》、《高丽藏再雕本》、《高丽藏再刻本》、《再刻丽藏》、《丽藏》、《丽本》。高丽高宗为祈求佛佑，击退蒙古入侵而敕令雕印。始刻于高丽高宗二十三年(1236)，完成于高宗三十八年(1251)。主持人为相国李奎极。刻藏的地点在江华岛(高宗迁都于此)。经版初藏于禅源寺，朝鲜太祖七年(1398)移存支天寺，次年再移海印寺(今韩国庆尚北道伽耶山海印寺)，至今仍存。

《再刻高丽藏》是以《初刻高丽藏》为底本，《契丹藏》和《高丽续藏经》为补充和校本编成的。全藏总计六百三十九函(函号为“天”至“洞”)，收经一千五百二十四部(据该藏目录，一说实际为一千五百十七部)六千五百八十九卷(据日本《缘山三大藏总目录》所说)。其结构为：(一)《开元释教录略出》所录入藏经，始《大般若经》，终《集诸经礼忏仪》，共一千零九十四部(较《略出》有增加)。(二)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至咸平二年(999)新译经，始《大乘庄严宝经》，终《大教王经》，共一百八十八部。(三)《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著述，共五部。(四)《续开元录》所录入藏经，始《四十华严》，终《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共一百四十部。(五)《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佛名经》等著译，共五部。(六)北宋咸平三年(1000)以后新译经及拾遗编入，始《法印经》，终《一切经音义》，共九十二部。

《再刻高丽藏》为方册本。每面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

《再刻高丽藏》的总目名为《大藏目录》(上中下三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



《再刻高丽藏》今存。它是日本《缩刷藏》、《大正藏》所用的底本(日本东京增上寺藏本)。近年,韩国利用海印寺今存的八万一千余块经版(每块经版的正反面均刻有经文)予以重印,传行邻国。由于海印寺版已经后世补雕,故在收经方面与《大藏目录》所载略有出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高丽大藏经》(即《再刻高丽藏》)的影印本,共计收经一千五百十三部六千八百零五卷。分为四十八册。其中前四十二册为正藏,第四十三册至第四十七册为补遗,第四十八册为总目录、解题索引。由于《再刻高丽藏》校订严密,故学术界认为,它是汉文《大藏经》中最精审的一个版本。

第九节 日本版

汉文佛经,最初是在我国南北朝时的梁代,由朝鲜的百济国间接传入日本的。日本钦明天皇七年(538),百济国的圣明王进献佛像、幡盖、经论,并上表赞颂弘扬佛教的功德,此年既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也是汉文佛经传入日本之始(据日本《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日本书纪》作钦明天皇十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600),摄政的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为使,赴隋通好。次年,又派留学生四人和学问僧四人入隋学习,以此为启端,汉文佛经又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大量地、直接地从中国传到日本。特别是唐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最为频繁,传到日本的唐代写本佛经的数量也最多。据记载,在华留学十八年,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回国的日僧玄昉,就携回汉文佛典五千余卷,约当于《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所录的全部藏经。其后,最澄、空海、圆行、常晓、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入唐八大家”,相继来华求法巡礼,并带回了在各地求获的写本经论章疏总计一千八百多

部三千二百多卷(上述八人每人都编有一部《请来目录》,今存)。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对写本汉文《大藏经》组织传抄流通。圣武天皇天平十一年(739),日本东大寺依敕抄《开元释教录》所录入藏经总计五千零四十八卷。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东渡日本的中国高僧鉴真也奉敕率众抄录《开元录》入藏经全部。其后,“嵯川天皇嘉保三年三月十八日,令僧俗一万人,一日写一切经。”“顺德天皇天历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一万五千僧一日写一切经。”(见日本弘教书院《缩印大藏经缘起》)也就是说,一天之内就抄成一部汉文《大藏经》。

及至宋代,木刻本汉文《大藏经》也开始传到日本。在宋参学十八年,于北宋雍熙元年(982)回国的日僧裔然带回了宋太宗赐予的新雕的《开宝藏》一部;巡礼浙江天台山、阿育王山,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回国的重源,带回了宋版《大藏经》一部(可能是《圆觉藏》);在宋参学十五年,于南宋绍定元年(1228)回国的净业,也带回宋版《大藏经》一部(可能是《毗卢藏》)。

其后,日本也开始雕印汉文《大藏经》。相传,嵯川天皇康和四年(1101),曾刻一切经,为日本木刻汉文《大藏经》之始(见日本《缩印大藏经缘起》)。但其本不存,详情无考。宇多天皇弘安十年(1287),相州灵山寺也刻过一切经(有的书上称之为《弘安藏》),但仅刻成《观无量寿经》、《传法正宗记》等少量单行本,尚未完成全藏。今存的木刻本或排印本(用木刻活字或铅字排印)汉文《大藏经》主要有:《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正藏》、《卍续藏》、《大正藏》。



一、天 海 藏

《天海藏》，又名《东睿山藏》、《宽永寺版》。日本东睿山宽永寺用木活字排印。明正天皇宽永十四年(1637)至后光明天皇庆安元年(1648)刊行。发起人为德川家光。主持者为僧正(僧团领袖)天海。

《天海藏》是日本第一部活字版汉文《大藏经》。以南宋版《资福藏》为底本，元版《普宁藏》为补充编成。全藏总计六百六十五函(函号为“天”至“税”)，收经一千四百五十三部六千三百二十三卷。

《天海藏》为梵夹本。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

《天海藏》的总目名为《日本武州江户东睿山宽永寺一切经新刊印目录》(五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但目录中所编的全藏函号为“天”至“最”，共计五百五十九函，收经一千四百四十九部(据编号统计。一说实际为一千四百五十一部)。此中疑有误差。

《天海藏》今存。日本宽永寺存有它的全藏。

二、黄 檗 藏

《黄檗藏》，又名《铁眼藏》。日本山城州宇治郡黄檗山万福寺宝藏禅院劝募雕印。灵元天皇宽文九年(1669)至天和元年(1681)刊行。发起人和主持者为该院铁眼道光禅师。

《黄檗藏》是木刻版汉文《大藏经》。以《嘉兴藏》正藏为底本，增入日本《铁眼语录》、《宝洲语录》等编成。全藏总计七百三十四

函,装订成二千一百零五册,共收经一千六百十八部七千三百三十四卷。由于《嘉兴藏》正藏原本错讹之处颇多,据此复刻的《黄檗藏》依旧未改,故日本宝永三年(1706)至宝永七年(1710)京都狮子谷法然院忍激招集同志者十余人,据《再刻高丽藏》对《黄檗藏》加以校订,相异之处改从《丽藏》。文政九年(1826)至天保七年(1836),越前再生北郡丝生乡净胜寺顺惠,也用《再刻高丽藏》对校《黄檗藏》,勘正了其中的错讹。

《黄檗藏》为方册本。其版式与《嘉兴藏》正藏相同。

《黄檗藏》今存。其经版四万八千二百余块见藏于日本黄檗山万福寺。

三、弘教藏

《弘教藏》,又名《缩刷藏》、《缩刷藏经》、《缩刻藏》、《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日本东京弘教书院编。明治十三年(1880)至明治十八年(1885)刊行。发起人和主持者为岛田蕃根、福田行诚等。

《弘教藏》是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以东京增上寺所藏的《再刻高丽藏》为底本,南宋《资福藏》、元代《普宁藏》、明代《嘉兴藏》为校本,并参照《阅藏知津》的门类重新予以分类编成。全藏分为十二大类:大乘经、小乘经、大乘律、小乘律(附疑似杂伪律)、印度大乘宗经论、印度大乘释经论、印度大乘诸论释、印度小乘论、印度撰述杂部(附外道论、疑伪经)、秘密部(下分录内、录外、《知津》三类)、支那撰述(下分经疏部、论疏部、忏悔部、诸宗部、传记部、纂集部、护教部、目录部、音义部、序赞诗歌部十类,其中,“诸宗部”又分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六项);日本撰述(下分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真宗、日莲宗、



时宗、融通念佛宗十项)。共计四十帙(帙号为“天”至“霜”),装订成四百十八册,收经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五百三十八卷(不包括目录)。

《弘教藏》为方册本线装书。正文用五号字体排印,有句读。每面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每页的上方排有校勘记,记载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用线条与正文隔开(上栏短、下栏长)。

《弘教藏》的总目名为《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目录》(一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

《弘教藏》今存。日本昭和十年(1935),铃木大拙等曾对《弘教藏》加以影印,题名为《昭和再订大日本大藏经》(略称《昭和再订缩刷藏》)。并对《弘教藏》中错讹加以订正,编成《大日本校订大藏经正误》十一卷(今存稿本)。

四、卍 正 藏

《卍正藏》,又名《卍正藏经》、《卍字大藏经》、《大日本校订藏经》。日本京都藏经书院编。明治三十五年(1902)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刊行。发起人和主持者为滨田竹坡、米田无静等。

《卍正藏》是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以京都狮子谷法然院忍濲用《再刻高丽藏》校订过的《黄檗藏》为底本,相异之处(经名、经文、题记、音释)改从《丽藏》排印。全藏总计三十七套三百五十七册。其中,正文三十六套三百五十五册(前三十五套为每套十册,末一套为五册),目录一套二册,收经一千六百二十二部(据目录。一说实际为一千六百二十五部)七千零八十二卷(一说六千九百九十二卷)。

《卍正藏》为方册本线装书。正文用四号字体排印,有句读。



每面分上下栏,每栏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卍正藏》的总目名为《大日本校订藏经目录》(一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

《卍正藏》今存。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卍正藏经》即是它的影印本,作七十册(其中目录一册)。

五、卍续藏

《卍续藏》,又名《卍续藏经》、《大日本续藏经》、《续藏经》。日本京都藏经书院编。明治三十八年(1905)至大正元年(1912)刊行。发起人和主持者为前田慧云、中野达慧。

《卍续藏》是《卍正藏》的续编。所收多为南北朝至清代佛教撰述的珍籍要典,其中有不少是我国国内久佚的绝版孤本。全藏分为两编一百五十套,每编各附补遗,总计收经一千六百五十九部七千一百四十三卷。(一)一编,九十五套八百六十二部。其中,正编(第一套至第八十七套前部分)收经七百三十四部,包括印度撰述(下分经部、律部、论集部、密经仪轨部四项)一百八十三部和支那撰述(下分大小乘释经部、大小乘释律部、大小乘释论部三项)五百五十一部。补遗(第八十七套后部分至第九十五套)收经一百二十八部,包括印度撰述(经部)十三部和支那撰述(下分大小乘释经部、大小乘释律部、大小乘释论部、诸宗著述部、礼忏部五项)一百十五部。(二)二编,五十五套七百九十七部。其中,正编全为支那撰述,包括甲编三十二套(不署“甲”字)和乙编二十三套(署“乙”字),每套皆五册。甲编(第一套至第三十二套),下分三论宗著述部、法相宗著述部、天台宗著述部、华严宗著述部、真言宗著述部、戒律宗著述部、净土宗著述部、禅宗著述部、禅宗语录通集部、禅宗



语录别集部十项,收经四百七十三部。乙编(乙第一套至乙第二十三套前部分),下分礼忏部、史传部二项,收经二百零七部。补遗(乙第二十三套后部分)包括印度撰述(经部)十一部和支那撰述(下分大小乘释经部、诸宗著述部二项)六部。

《卍续藏》为方册本线装书。正文用四号字体排印。每面分上下栏,每栏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卍续藏》的总目名为《大日本续藏经目录》(四卷),收入日本编的《法宝总目录》(第二册)。

《卍续藏》今存。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曾以《续藏经》为题影印了五百部。近世,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卍续藏经》也是它的影印本,作一百五十一册(其中目录一册)。

六、大 正 藏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大正十三年(1924)至昭和九年(1934)刊行。发起人和主持者为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

《大正藏》是近代以来流传最广、使用最为普遍的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以《再刻高丽藏》为主要底本,其他各版藏经及抄本为补充,采用诸版对校及新的分类法编成。全藏分为正编(又称正藏)、续编(又称续藏)、图像、总目录四部分,总计一百册,收经三千四百九十三部一万三千五百二十卷。(一)正编(第一册至第五十五册),主要收录汉译经律论和中国佛教著述。底本为东京增上寺所藏的《再刻高丽藏》以及一些古写本、古刊本,校本为同寺所藏的宋本(《资福藏》)、元本(《普宁藏》)、明本(《嘉兴藏》)以及正仓院藏经、敦煌写本、巴利文佛经、梵文佛经。共收经二千二百七十六部



九千零四十一卷。下分二十四大类:阿含部、本缘部、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槃部、大集部、经集部、密教部、律部、释经论部、毗昙部、中观部、瑜伽部、论集部、经疏部、律疏、论疏部、诸宗部、史传部、事汇部、外教部、目录部。(二)续编(第五十六册至第八十五册),主要收录日本佛教撰述,兼及敦煌、日本所传的古逸经、疑似(疑伪)经。共收经七百七十七部二千九百二十九卷。下分七大类:续经疏部、续律疏部、续论疏部、续诸宗部、悉昙部(以上均为日本佛教撰述)、古逸部、疑似部。(三)图像(另编十二册),收录日本各寺院收藏的各种佛教图像(以密教图像为多)。共计三百六十三部一千三百四十五卷。(四)总目录(名为《法宝总目录》,另编三册),收录《大正藏》总目录、一览、勘同目录、著译目录、索引目录以及中国、日本的各种汉文《大藏经》目录。共计七十七部二百零五卷。

《大正藏》为现代精装本。正文用五号字体排印。每页分上、中、下三栏,每栏二十九行,每行约十七字。行文中间有句读。每页下栏之下附有校勘记。

由于各版汉文《大藏经》收录的经本,基本上都是用古文写成的,大多不分段、无标点,再加上佛教术语的艰涩难懂,这给阅读和使用带来了种种困难。因此,整理和出版依照新的分类法编制的校点本《大藏经》,将是汉文《大藏经》发展的总趋势。